中国军事通史 第六卷

东汉军事史

目　　录

第六卷　东汉军事史

书末附图：

绪　论

东汉王朝（25～220年）自刘秀建立开始，至献帝刘协下台结束，历时195年。这是继秦、西汉以后第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东汉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维持统一局面的时间较长，立国近2个世纪；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比西汉发达；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渐趋完备；此外，在军事领域也有建树，是个颇具特色的时期。

人类的军事活动，源远流长。作为研究人类军事活动发展规律的军事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东汉的军事史，不仅在时序上承前启后，而且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在当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武器装备得到了更新和改良；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私有制深化，促使集兵方式由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导致武装力量体制改革和军权的更加高度集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决定着战争的多发性和延续性；军事活动错综复杂和斗争的广泛深入，使军事思想、军事学术既有继承又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纵观东汉一代，在战争、军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皆有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索。这里，仅就其中的主要之点首先做个概述。

其一，战争类型多，连续时间长，作战的决策和方法有特色。

东汉政权是西汉的继续，自建立之日起，便面临着各种问题和矛盾。自安、顺以降，豪族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故连绵不断的战争，贯穿于东汉的始终。不仅连续时间长，而且战争的类型也多，出现了封建的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农民战争，还有军阀割据战争等。这些战争的决策指导和战略战术等，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性。

东汉的统一战争。始自建武元年（25 年），止于建武十二年（36 年）。当刘秀镇压赤眉、绿林农民起义后，紧接着便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例如：在关东地区，先后平定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的刘永、昌虑（今山东枣庄西北）的董宪、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的张步、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彭宠等。在河西、陇右地区，先后平定了窦融、卢芳、隗嚣等。在南方及夷陵地区，先后平定了江淮的李宪，南阳的董䜣、邓奉，以及成都的公孙述等。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进行的统一战争，无论在时空上，还是在作战对象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汉初年刘邦时的情况。经过这十余年的统一战争之后，东汉直到灵帝之前，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分裂局面，维护了国内的统一。这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统一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多势力、多政权并存，以一方消灭其他各方为根本目的。刘秀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利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有利条件，长于策划，驾驭战略全局。他很注意观察形势，把握战机；重视战略基地，占取地利优势；善于发现与选拔各种人才，聚集杰出的军事将领；积极争取盟友，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同时在作战指挥上，能巧妙地运用战法，对敌诱之以利，迫之以兵，以少击多，以弱胜强。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些经验，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借鉴。

东汉的民族战争。始于建武十一年（35 年），一直延续到灵帝中平四年（187 年）以后，为期 160 余年，历时极长。其间主要的军事活动有：（一）从建武十一年至灵帝建宁二年（35～169 年），东汉与羌族的战争，以平定诸羌的反抗而结束。（二）从建武十五年至顺帝永和六年（39～141 年），东汉与匈奴的战争，以彻底击败北、南匈奴而告终。在此期间，由于打败了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经过多次交战，东汉重新统一了西域地区。（三）从建武二十二年至灵帝中平四年（46～187 年），东汉与乌桓、鲜卑的战争，虽未完全战胜鲜卑，但终于击败了乌桓。（四）从建武十七年至灵帝当政期间（41～188 年），东汉征讨南蛮及西南夷的战争，以平定

蛮夷的反抗而结束。这些民族战争的性质比较复杂，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既有为统一中国而战的进步战争，也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不义之战。东汉用兵西域是统一战争的继续。北击匈奴，征讨乌桓、鲜卑是保卫中原王朝，开拓边疆的军事行动。至于东汉对蛮夷、西羌各部族的战争及出师交趾，乃既有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的一面，也有镇压人民起义性质一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的主流，中原地区的统一及中原和边疆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①。东汉时期，边境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匈奴、乌桓、鲜卑等，当时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经常“寇抄”边境。因此，汉王朝与它们的战争，实际上是先进与落后、封建主与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战争。汉军的胜利，对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统一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东汉的民族战争，延续时间长，作战对象多，战场兼及南北，战争频发率高。在此期间，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东汉统治集团，在这频繁的民族战争中，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和具体方法不尽相同。但最常用的办法是“以夷伐夷”或“以夷制夷”。同时，在战争策略上，常采用恩威并用，远程包抄，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这些作战策略与战术，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经验。

东汉的农民战争。自安帝永初二年（108 年）至东汉末年，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续不断。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大起义，是东汉后期历次农民起义的总汇，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当时广大农民为了反奴役、求生存，利用宗教作掩护，经过长期准备，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② 的政治口号。起义动员令发出后，三十六方，同日俱起。“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斗争

---

①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之激烈，为史所罕见。这时，东汉政权急忙研究对策，紧急进行部署，采取先防后剿的措施，首先加强京师外围的防御，继而调发天下精锐，分颍川、冀州、南阳三大战场出击，采用深夜进兵，虚张声势，顺风火攻等战术围剿黄巾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加之叛徒告密，仓促起义，战略失误，各地缺乏配合，黄巾主力经过九个月的奋战，最后失败了。但黄巾军余部（黑山军、白波军、青徐军等）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进行。黄巾农民军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使之名存实亡，有力地扫荡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大大地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局面。这一历史经验，对以后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至献帝刘协下台。经过黄巾农民起义打击后，东汉政权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州郡牧守权力膨胀与豪族地主武装势力发展而形成军阀集团，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各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厮杀，使全国陷于军阀割据的混战之中。经过大小军阀十余年的混战兼并，广大中原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考诸东汉时期的战争，呈现着千姿百态、纵横交错的局面。各类战争连续不断，几乎没有间隙。在东汉的195年中，先后发生各类大小战争竟达260多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战争史。当时参预这些战争的势力，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也有各少数民族。由于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始终掌握着东汉政权，并成为各类军事活动中唯一全部参预其事的主体力量，所以探讨东汉的战争史时，不难发现，东汉政权作战的决策和方法在实践中体现出了许多特点，作战的指导艺术也有一定的提高。不少军事将领，还承袭历代战争中所使用的作战手段，表现出了多种战术并用的指挥才能。如：政治攻心，分化瓦解，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远程奔袭，欺诈伪装，兵不厌诈，军事间谍等。所有这些，都给军事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其二，军事制度上，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注重军

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

东汉立国后，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体制，在政治上，着力于防范功臣、诸侯王干政；限制“三公”权力，提高尚书台地位；完善监察系统等。在此同时，对与政治相适应的军事制度，也围绕着集中军权，贯彻“居重驭轻”的方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东汉军制改革的重点在郡国。刘秀在“精兵简政”的过程中，对地方军进行了大量的裁减。如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①，取消地方上的专职武官；同年又“无都试之役”②，消弭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建武七年（31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③取消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制。尽管其时编户的军籍仍存，有事仍可征发。但通过这样的改革，大大精简了地方军事力量，当然也减少了地方官吏借用“都试”之期，发动武装作乱的可能性。

至于中央的军事力量则相对加强。虽然其时对中央军也作了些调整，如对将吏在权力分配上的更动及卫士数量的部分压缩。但若和地方军相比，中央军的实力仍在不断强化。例如：以期门、羽林为主体的宫廷禁军，这时更加庞大和精锐；北军五校的实力加强，“置中候，以监五营”④；新增设了“黎阳营”和“雍营”这两支中央常备军。此外，当时各地所设的其他营士和屯兵，也收归了中央直接指挥，成为中央军的重要构成。中央军不仅在建置上日臻完备，而且较之地方军具有明显优势。它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统领，兵力集中，待遇优厚，武器精良等。故东汉一代，凡是较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有赖于中央军出击。中央军的主体地位，比西汉显得更为突出。

东汉除调整武装力量的结构之外，在领导体制上，还强调军

---

①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权的高度集中。当时，凡武装力量的征发、调遣和动用之权，统归皇帝掌握。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成了事实上的军事权力机构。相反，全国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太尉，虽位居“三公”之首，但若非“录尚书事”，则无权统率和指挥军队。负责战场指挥的大将军、骠骑将军等，一概由皇帝任免，地位极不稳定。同时，监军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中央直辖军中常设监军吏员，对征战部队派使者随营监军，对地方部队乃实行督军制。监军吏员的权力很大，掌握和控制着军队的一切行动，以确保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

诸多史实表明，东汉军制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武装力量、兵役制度、军事训练到领导体制等，皆与西汉大异其趣。然其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军权高度集中，在军队建设上，贯彻“居重驭轻”的方针，也就是强干弱枝，强化中央军，精简和削弱地方军，以中央军驾御地方军。宋人山斋易氏说：“汉之兵制，莫详于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①。其说甚是。

在军队建设上实行“居重驭轻”，组建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它对稳定东汉政治局势、拱卫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国家统一起有重要作用。为尔后几千年的军队建设，也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但另一方面，由于“罢材官、骑士”，“无都试之役”，又从整体上削弱了封建国家的军事力量，留下了反面经验。这表现在：一是大量裁减地方军、废除更戍役制后，导致战略后备力量薄弱。为弥补这个缺陷，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轮番的正卒；在边郡利用弛刑徒、属国兵守边，以替代从前的戍卒。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兵源不继”问题。二是罢除“都试”后，军队缺乏严格、必要的训练，而招募来的士兵，又成分复杂，素质很差，军风败坏，“不讲戎阵”。故到东汉后期，往往“每战常负，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

王旅不振"[①]，战斗力不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其三，武器装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得到更新和改良。

东汉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重大发展。尤其是手工业中与军工有关的冶铁、炼钢及舟车制造业等比西汉发达。

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武器的改进与更新。在当时，主要的常用武器，如矛、戟、刀、剑等，基本上均由钢铁制作而成，质量较高；一些不太适用的兵器，如戈、殳、钺等，或逐渐被淘汰，或退居次要地位；弩箭、铠甲等重要武器，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改进。已创制了"毒箭"[②]，以增强杀伤力。此外，东汉还发明了"钩镶"、"偃月刀（长刀）"等新式武器[③]。这些武器的更新和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军队的其他一些装备也得到了改良和发展。东汉时期，除军马广泛使用，指挥传令器具相对齐备外，军用车、船发展很快。当时，装备军队或用于战争的车辆，种类甚多。见于文献记载者，主要有轻车[④]、戎车、云车[⑤]、指南车[⑥]、辎车。还有所谓辎车、衝车[⑦]、轈车、钝车、驰车[⑧] 等等。这各种车辆的数量不一，功能有别，或用于征战如攻城、陷阵，或用于军资运输。至于装备水军的战船，其型制也较多样。主要有楼船[⑨]、蒙冲[⑩]、冒突[⑪]、赤马（舸）[⑫]、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③ 参见《考古》1975 年第 2 期；《三国志·魏书·典韦传》。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⑤⑦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⑥ 《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

⑧ 《说文·车部》。

⑨ 杜佑：《通典》。

⑩ 《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⑪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⑫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江表传》。

斗舰①等。打仗时出动的战船，往往动辄数千、上万艘之多。如：岑彭的军队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②；曹操挥师东征，“大兴水军，凡舟万艘”③。不仅船的种类和数量多，而且船上已经使用了帆、舵、橹、锚等先进设备。④ 它和同期罗马木船相比，先进得多。故东汉的水军装备，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武器装备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⑤ 又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及有关胜负，取决于物质即经济的条件。”⑥战争不仅是军力和政治的竞赛，同时也是物质的竞赛。一个国家要建设强有力的军队，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发展生产，提高综合国力的整体水平。但是也要看到，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毕竟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只有人和武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克敌制胜的威力。历史经验证明，尽管东汉时的武器装备有所更新和改良，然而，由于当时武官多用文吏，不知兵要；特别自安、顺以降，政治腐败，兵员素质很差，“边郡守御之兵不精”。所以，仍然酿成长期边患，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点，和军事史上的许多正面经验一样，同样是宝贵的前车之鉴。

其四，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

东汉一朝，由于统治者“偃武修文”，武官多近儒，对军事学术不太重视，加之谶纬神学笼罩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界。故当时的军事思想同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发展得较为缓慢，有影响的兵书

---

① 《三国志·蜀书·张昭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③ 《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七，引曹丕《沂淮赋序》。

④ 上海交大史话组：《秦汉的船舶》，《文物》1977 年第 4 期。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06、210 页。

不多。但是，军事思想归根结底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汉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战争和长期的军事活动实践，对军事思想仍然有所推进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思想：注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东汉在实现全国统一之前，除更始政权外，群雄林立，还有各地的割据势力。面对众多的敌人，刘秀不是四面出击，而是首先消灭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更始政权。再以土地完富的河内为基地。“东举青徐”、“北取幽并”、“南面以号令天下”①。逐次剪灭关东、北境、南方等地的割据势力。最后，折转锋芒，全力进军陇蜀。刘秀在这些重大的战略行动中，不仅重视战略基地的作用，派寇恂镇抚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②，而且策划周密，先东后西，由近及远，分清主次先后，歼灭一个，再及其余，表现出了相当高超的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汉廷也是先解除党禁，加强防御，然后“发天下精兵”，对颍川、冀州、南阳三支主力黄巾军进攻，同样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可见东汉兵家对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十分重视。由于牢牢掌握着战争主动权，驾驭战略全局，所以能实现战略意图，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策略思想：主要采用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方法。刘秀在与王郎的对峙中，开初实力不如王郎。但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联合多数，能争取信都任光、和成邳彤、上谷耿况等势力，共同对付王郎，以造成我众敌寡的态势，故使王郎军迅速土崩瓦解。嗣后，在民族战争中，这一策略思想更是多有运用。如明帝征伐北匈奴时，汉军联合周边各少数民族共同出击。东汉在出征的四路大军中，均曾联合了南匈奴、乌桓、鲜卑的兵力。因军容很盛，北匈奴闻之，只好急忙逃往漠北。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班超于建初三年（78年），联合疏勒、康居、于寘、拘弥等国之兵万人，打击姑墨；永元六年（94年），联合龟兹、鄯善等八国

---

①《后汉纪》卷第一上《光武皇帝纪》。

②《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兵力，合7万人，征讨焉耆，最后使西域50余国，皆纳质归汉。除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外，还实行“恩威并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将政略、战略、策略紧密配合，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联合多数，“以夷制夷”，不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打击主犯，而且有助于改变汉军兵源结构，减轻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使东汉王朝“坐享大功”①。

边防思想：主张整修武备，充实边疆。东汉初的边防政策虽较保守，重守而不主攻。但对边防设施仍很重视。刘秀曾多次采取措施，修缮“障塞、亭候”，以恢复与加强防务体系。然自安、顺以降，随着政治腐败，朝臣对边境“不明修守御之备”，导致“边郡虚荒”。王符针对当时状况，集中抨击了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的行径，认为：“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自古未曾有“民危而国安者”也。为加强边防，振民安疆，他提出了充实边疆的理论和具体设想。首先，明确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朝臣“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任听边患蔓延；而一旦有警，则强令“边民内迁”。故今日边郡，“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如此，不仅在经济上带来严重后果，也是政治上的“大忧”，必须设法制止。接着，他论证了“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自古君王皆懂得“务实边，盖以安中国”的道理。只有充实边疆，国家、人民才能“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而地处边疆之民，“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他们安土重迁，热爱家业，实边本有可能。所以应该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边郡以优惠政策。这样，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②。王符的边防思想，是西汉晁错“移民实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针对东汉后期的边防弊政，提出如上见解，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② 以上所引，均见王符《潜夫论》中的《救边》、《议边》、《实边》。

治军思想：强调将帅的素质和修养。东汉前期，治军选将比较严格，重视人才。刘秀本人就是一位军政兼备、智慧豁达，刚毅稳健的著名军事统帅。当时重用了一大批治军有方的杰出将领。主要有：长于韬略、刚柔兼备、善于决策、治军威严、深得吏卒敬服的冯异；足智多谋、用兵灵活机动、英勇作战的岑彭；长于筹划、准确料敌、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有“马革裹尸”精神的马援；勇识非凡、善于出奇制胜的班超等等。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但到东汉后期，却有相当一部分将吏不懂军事。他们不明战略，不知抚死禄生，不明赏罚。军事素质、修养很差。故王符重新提出要认真选拔将帅。他认为必须选拔“宜踔踔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也就是要选拔那些才智卓绝、深通谋略的大才来担任将帅，掌握兵柄。在具体要求上，他认为：除应具备《孙子》中所说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这五条标准之外，还要有“敬”的品质，因为“智以折（料）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将帅只有集智、仁、敬、信、勇、严于一身，才能统兵打仗，使军队听从将帅的指挥。王符对将帅增加“敬”的条件，认为“敬以招贤”，不可缺少，这是对《孙子》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此外，对选拔将领的途径和办法，王符认为要任人唯贤，不能论资排辈，“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②]否则，就等于把国家交给敌人。选择将帅是中国古代兵家历来就很重视的问题。王符在吸收前人经验和总结当时将帅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中不乏光彩之论，这是对军事理论的一个贡献。

最后，需要特别在这里指出的是，东汉军事史的内容虽然很丰富，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仍是我们目前研

---

① 《孙子兵法·计篇》。

② 以上所引均见《潜夫论·劝将》。

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东汉军事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1900年到1992年的研究成果统计看，除农民战争外，专论东汉军事的文章甚少，而有分量的论著更是寥若晨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殊多，大概主要是由于军事史这门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难度较大，同时也是困于史料简缺所致吧。

要想全面、客观地反映东汉军事史的真相，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恩等经典作家有关战争、军队和军事学术方面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总结性的论断带有普遍意义。现代军事技术虽然较一个世纪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种种军事原则、建军思想、战争观点等，并未“过时”，仍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对我们研究工作仍有指导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方法上，还当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一）将军事与政治、经济做综合考察。研究东汉军事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当时的军制史、战争史、武器装备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多个子系统。然而，对整个东汉史这一大系统来说，军事史则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又都是子系统。因此，研究军事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孤立进行，当和同期的政治、经济等状况进行全面考察。例如：东汉兵役制度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募兵制代替征兵制。这首先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核心，即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纷纷破产流亡、脱离版籍，征兵制失去了合理摊派的基础。同时，在政治体制上，“省诸郡都尉”，罢除了负责征兵的主管单位。再加上当时重文轻武，军功爵制走向轻滥。所以征兵渐衰，募兵日甚。这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军制，除取决于经济基础外，还受政治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其他如军事后勤、武器装备乃至战争等，同样都与经济、政治密切相连。经济是基础，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它们之间不可分割。故研究军事时，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进行考察，正确阐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注意各个领域和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研究工作的渗透性。

（二）将两汉的军事作比较研究。东汉时期，在很多方面继承

和发展了西汉的制度，军事上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例如：东汉的中央宿卫军分宫廷禁军、宫城近卫军和北军五校三部分，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西汉的旧制，都是由郎卫、卫士及屯戍兵三大系统组成。但在具体内容上，东汉乃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东汉的宫廷禁军比前庞大，并突出了虎贲、羽林的地位；宫城近卫军的编制比西汉有所压缩，东汉已无“南军”之名；“北军”沿用西汉旧名，但在形式上已分为执金吾所领之兵和五校尉所统之兵两部分。可见，东汉中央军的建制，既源于西汉，而又有所不同，它更加趋向于完备。将两汉的军制、兵器、后勤、军事思想等，皆作一番比较，确乎必不可少。因为比较是鉴别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是从分析、综合到抽象的桥梁，也是揭示事物矛盾、把握事物内部联系，从而认识事物本质的有效方法。通过前后的比较，有助于了解东汉军事史的发展脉络，找出它的发展阶段与层次，有助于认识东汉军事史的历史特点，探求它的发展规律。这是研究秦汉史的传统方法之一，至关重要。

（三）用考古资料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东汉军事史的文献资料不多，除熟读《后汉书》等外，必须向考古进军。对有关的简牍、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碑刻、遗址、墓葬及出土器物，要广泛搜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是进行研究的基石，为做好这部分工作，既要审定资料的可靠性，又要编写大事记及资料长编。凡文献记载阙如的问题，力求通过文物考古资料来说明。例如：东汉边防设施之一的“坞壁”，文献对其建筑形式，言之不详。但在和林格尔出土的东汉墓壁画中的“坞壁图”[①]，及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出土的“坞壁模型”[②]，却弥补了文献记录的简缺，提供了东汉坞壁的形式、结构、作用等珍贵的资料。东汉的兵器，如“钩镶”、“五十湅钢剑”[③] 等，也是如此，都有赖于出土器物才能得到

①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二期。

③ “五十湅钢剑”见《文物》1979 年第 7 期。

证明。所以，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参证，有助于反映历史的原貌。

综上所述，深入研究东汉军事史，对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军事运动的发展规律，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等，均有重要意义。但这部《东汉军事史》，诚属草创。如今公布于众，有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多予赐教。

第一章　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和东汉王朝的建立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奴婢问题日趋严重，“赋役烦数”，吏治腐败，封建统治阶级贪残征剥，骄奢淫逸。广大劳动人民在苦难境遇中绝望挣扎，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反抗斗争因而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皇朝外戚集团中的王莽于9年代汉，建立新朝并实行复古改制，企图挽救统治危机。由于王莽代表的是大贵族、大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所作所为又多不切实际，荒谬失当，因此改制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导致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爆发。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了新莽政权的短命统治。

在广大农民群众反抗王莽政权的激烈斗争中，许多地主阶级武装也乘时而起。他们在反莽的旗帜下，或自立旗号，割据一方，或汇入农民军的洪流而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王莽被推翻以后，各种势力之间更展开了十余年的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从南阳起兵的刘秀地主军事集团实力逐渐壮大，相继镇压了河北地区和绿林、赤眉等农民军，并建立起东汉政权。

第一节　新莽政权灭亡后的形势

一、更始政权及其他农民军

更始元年（23年）九月初三，更始汉军诛杀王莽于长安，反抗新莽反动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新莽

国家机器的垮台，远远没有立即形成更始政权的一统局面，使社会复归于安定。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充满了更加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一方面，众多的农民军仍然在各地活动，以求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各贵族和地主武装在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出现真空后，更加积极地扩张势力，企图夺过农民起义的果实。因此，在农民军与贵族、地主武装之间，在它们各自内部的不同系统或集团之间，原已存在的冲突和争夺也更趋表面化和尖锐化，形成了纷纭扰攘、错综复杂的格局。

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更始政权无疑是新莽灭亡后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更始政权的前身，是起于荆州的绿林军。新天凤四年（17年），荆州大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南阳（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人马武，颍川（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聚众于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北），反抗王莽暴政，称绿林军，渐有众数万人。地皇三年（22年），绿林军因发生大疫，离山向他处发展。王常、成丹率一部西入南郡（治所在郢，今湖北江陵），号“下江兵”；王匡、王凤等统领主力北入南阳，号“新市兵”。在转战中，绿林军因得到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人陈牧、廖湛所率之“平林兵”和南阳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之“舂陵兵”① 等的加入，势力大增，众至十余万人，并接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更始元年（23年）五六月间发生的著名的昆阳大战，一举消灭了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的王莽主力42万，是推翻新莽的决胜之役。而在当年二月，绿林军将领推举汉朝宗室刘玄为帝，继汉国号，建元更始，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嗣后，更始汉军克洛阳、进关中，于九月破长安，将王莽新朝送进了坟墓。更始二年（24年）正月，刘玄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

由于更始政权适应了王莽暴政下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更由

---

① 因刘氏兄弟起兵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南），故名。

于它所具有的强大实力和消灭新莽的功绩，因此更始政权曾一度拥有极高的政治威望和地位。早在昆阳战后，各地反莽武装已多奉更始正朔，“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①。与绿林军齐名的另一支农民大军——赤眉军，也在更始元年归附更始，其首领樊崇、徐宣等20余人均来到当时刘玄所都之洛阳，接受了列侯的封号。更始二年春，拥兵十万、据有陇上与河西7郡之地的隗嚣，亦东入长安，受右将军之职。赤眉和隗嚣分别属于当时最重要的农民军和地方势力之一，他们的归附，反映了更始政权乃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主要权力中心。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更始政权其兴虽忽，而其衰亦速，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很快就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可悲境地。

绿林军的诸农民将领，不过是因生计所迫而走上反莽的道路，本无明确、长远的政治目标。因而攻占长安后，他们既没有很好地利用王莽灭亡后天下景从的大好形势，积极从事政权建设，并通过政权力量团结、争取各地农民军，芟平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四方，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努力稳定社会和恢复、发展经济，相反却只知攻城略地，追求官爵钱财和一时的享乐。更始帝刘玄更是一个惟知淫乐而又暗弱无能的角色，他将政事全部交给岳父右大司马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②。而赵萌专权恣纵，随意诛戮，无所不为。这些，不仅使更始政权内部上下涣散相怨，更让关中和洛阳一带的百姓及各地民众大失所望，“关中离心，四方怨叛”③，由支持更始政权转而举兵相抗。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还在更始政权移都长安的前夕，樊崇等赤眉军将领因不满更始政权对他们的轻贱态度，脱离更始，与之分道扬镳。这是更始政权一个致命的失误和重大损失。

更始政权是农民将领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的结合体，二者在反莽这个大目标下走到一起，而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之后，他

---

①②③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们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要导致二者的矛盾冲突。更始元年，王莽尚未垮台，绿林诸将与刘玄合谋杀死刘縯，已经揭开这种斗争的序幕。此后更始政权中地主阶级虽占有一定位置，但农民将领势力更大，令前者失望不服。特别是面对更始政权“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①的现状，一些有眼光的地主阶级人士极力企图让刘玄摆脱农民将领的影响，要他“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②，用地主阶级人才及其政治方法来稳定政权，夺取天下，建立封建王朝。完全由农民将领拥立而又昏庸无能的刘玄对此未能接受，故越来越多的士人也开始摆脱或暗中背离更始政权，另找出路。其中，刘秀早在更始元年的十月间，就借机前往河北，安集各地，遂成为河北地区的一支军事力量。而更多的地主和贵族分子包括更始所封的若干宗室之王，也揭起了自己的旗帜，据有一方（详见下节）。

因此，在更始政权进入长安以后的很短时间内，更始政权实际即已失去了原有的近乎“共主”的地位，而成为仅仅据有长安、洛阳间狭长地域的一个腐败涣散，不再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政治、军事集团。它的失败，实际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此时，与更始政权并立的，还有推翻新莽政权的两大农民军主力之一的赤眉军。

赤眉军起于天凤五年（18 年）。是年青、徐二州大饥，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聚兵起义于莒县（今属山东），旋得逄安、徐宣、谢禄和杨音等人汇合，众至数万人。义军回旋作战于山东境内，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纪律，置三老、从事和卒史，后又皆以朱色涂眉，故号称“赤眉军”，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的状况，不断得到发展。地皇三年（22 年），赤眉军先后两次大败王莽派来镇压的军队，杀其大将景

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尚、廉丹，部队发展到数十万人，成为横行青、徐的东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

更始元年，赤眉军西至河南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一带，并一度归附更始政权。但其旋即与绿林军分手，活动于河南中部，先后攻下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宛、阳翟、梁（今河南商丘南）等地。这一时期赤眉军虽屡屡攻城夺邑，所向披靡，但军中将士疲惫劳顿，出现厌战情绪。特别是远离故土，使他们思乡情切，“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①。樊崇与逢安、徐宣等考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②，乃于更始二年（24年）冬季兵分两路，向西行动。樊崇、逢安率南路攻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南），徐宣率北路出陆浑关（今河南嵩县东北）。此时王莽的新朝已经灭亡，更始政权亦已迁都长安，因此樊崇等人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已拉开赤眉、绿林两大农民军主力的火并的帷幕。可是安居关中的更始君臣，却对此缺乏戒备，既不设法招抚，军事上也不曾很好防范。

除了绿林、赤眉之外，新莽灭亡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在今山东、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广大地域上，还分散存在着许多支农民军队伍。其中以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各州郡的河北农民军数量最多，势力最大。其包括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数十部，“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③，形成一个巨大的农民军集群。

在这个农民军集群里面，势力最大者为铜马军。这支农民军在首领东山荒秃和上淮况的统领下，初起于山东，后来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处的鄡（今河北辛集东南）、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和博平（今山东茌平西北）一带，有众数十万。其次为檀乡、五校部。檀乡军前身是力子都农民军，子都于王莽天凤五年（18年）起兵于东海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有众六七万，

①②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③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更始封其为徐州牧。后子都被部下杀死，余众同其他农民军汇合于檀乡（今山东兖州北），故称檀乡军。不久，该军北渡黄河与五校军合，据河南、河北交界处之魏郡（治所在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清河（治所在清阳），人数达十余万。此外尤来、大抢、青犊、上江、铁胫、五幡诸部十余万人，也是颇有实力的农民军集群。他们大多也从山东起兵，更始二年（24年）聚集于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此后大部北上，在河北北部活动。这些农民军游动各地，摧毁王莽的地方政权，但它们相互间不相统属，一般是各自为战，而且同样亦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所在寇掠”，维持军中农民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已。所以，其虽然数量众多，声势浩大，实则涣散而难于持久，极易被各个击破。①

其他地区较重要的农民军还有：

城头子路，东平（治所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人，本名爰曾，因起兵于卢城城头，故号。他当时主要活动于黄河、济水之间，部众20余万，势力很大。更始政权封他为东莱（治所在掖县，今山东莱州市）太守，行大将军事。后被部将杀害，众推副手刘诩为主。

佼强，据西防（今山东成武东），后受割据睢阳一带的梁王刘永横行将军号。

董宪，东海朐（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初为赤眉别部，后自据东海郡，又受刘永翼汉大将军号。

张步，琅琊不其（今山东青岛北）人，新莽末年聚众数千，自号五威将军，占据琅琊一郡。刘永拜其为辅汉大将军，督青、徐二州，渐占有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等郡之地。其间，他还打败过尤来、大彤农民军十余万众，“拓地寖广，

---

① 关于河北农民军，史料记载语焉不详，本文所述，主要据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收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兵甲日盛”①，成为海岱间的一大地方势力。

秦丰，地皇二年（21年）冬起兵，据南郡，攻有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邔（今湖北宜城北）、宜城（今湖北宜城南）等十余县，有众万人，自号楚黎王。

田戎，与秦丰同年起兵于南郡，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自称扫地大将军，转战数县，众数万人。

总的来说，除了城头子路部以外，这些农民军均处在中原的边缘地区，且力量多不太大，只有张步势力较盛。他们较稳固地占有一地而较少流动，有的自立政权，有的依附他人，这是不同于赤眉、绿林等农民军的地方。但从其首领和作为来看，则都缺乏远略，有的还贪于官爵，故愿为刘永这样的割据势力所驱使，事实上也成为一种封建割据势力。

二、地主武装的割据

早在王莽政权倾覆之前，各种地主阶级的武装已纷纷出现。他们有的是不满王莽篡汉的汉朝宗室，有的是为在大乱中自保或有所图谋的豪强地主和封建士人，还有的则是眼见新朝大势已去，遂据有一地，以观时变的地方官僚。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更始政权的鼎盛时期曾归于其旗下，但不少又很快就脱离而去，据地自雄。众多地主武装的割据，形成了王莽垮台后的又一历史景观。当时各地区最主要的地主阶级武装集团有以下一些：

（一）河北地区

河北刘秀：刘秀，南阳蔡阳（湖北枣阳西南）人，汉朝宗室，太学生。刘氏一族系南阳地方豪强，他们对王莽篡汉极为不满，地皇三年（22年），刘縯、刘秀兄弟在舂陵率宗族宾客等起兵，号“舂陵兵”。不久，二刘与北上的新市、平林兵汇合，成为绿林军

---

①《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

系统内的重要将领，屡建战功。特别是在更始元年（23 年）春击破新朝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十万大军于淯水（今河南白河），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阳（今河南南阳南），以及五六月间的昆阳大战中，二刘兄弟均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功绩卓著。而且因二刘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谋划，绿林军在组织上也制度大备，指挥协同和作战能力均得到提高，使王莽深感恐惧。但也正因此，刘縯、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防范和排斥。昆阳之战方毕，更始诸将杀刘縯，刘秀伪装柔顺方得免难。同年十月，更始命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持节北渡黄河，前往安抚河北地区各州郡。由此，刘秀得以摆脱更始诸将的直接监视和控制而独自发展。

刘秀初渡河时，只有很少的随从人员。而这里农民军人多势众，队伍复杂，又有数支较强的地主武装，要将河北纳于控制之下，困难重重。但刘秀一方面凭借更始政权的威望，另一方面则着意施行宽和的政策，延揽人心："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秀皆不受"①。这些措施，表明刘秀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佼佼者，既顺应了当时的民心，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一些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如邓禹、耿纯、贾复、陈俊、马成、杜茂、坚镡等亦因此而投入刘秀帐下，为此后刘秀经营河北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在邓禹的参赞下，刘秀此时已暗自定下"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② 的目标，和先图河北以为根据，进而夺取天下的战略大计。所以，虽然此时刘秀兵力单薄，又无根据地，尤其是王郎起兵后几无容身之处，前途难以乐观，但论其才能、声望和抱负，已非许多兵多地广的实力人物所能比拟。

邯郸王郎。王郎，邯郸（今属河北）人，本为卜者。更始元年十二月，他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舆，串通宗室刘林和赵

---

①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②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地的豪强李育、张参等人，占据邯郸，自立为天子。他以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又分遣将帅，移檄州郡，赵地以北、辽东以西的幽、冀二州大部归于其势力范围。在极短的时间内，王郎便成为河北地区最强的割据势力。包括原更始所封、有众十余万的真定王刘杨，也起兵附于王郎。

上谷耿况、渔阳彭宠。耿况为王莽时代的朔调连率（即上谷郡太守，郡治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新朝垮台后据郡自守。彭宠情况有所不同，他本是新莽官吏，后避乱渔阳（治所在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在大动乱中被更始政权任命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二人各自保有本郡，又先后在名义上接受了更始政权的统辖，并且一直不肯投降王郎。作为势力有限的地方实力派，耿况对时局基本上持观望态度，期待归附于较明智和强大的力量，有个安身立命的良好归宿。彭宠虽然存有野心，后来终至自立为王，但是当时他的力量尚不雄厚，因而也一直未敢自立旗号，并与耿况相交好，共求自保。

（二）陇右、河西地区

陇右隗嚣。隗嚣，天水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隗氏为成纪大族，更始元年，隗嚣叔父隗崔、隗义联络地方豪强起兵应汉，杀莽官吏。因嚣“素有名，好诗书”①，推其为上将军，遂据有雍州之天水、安定、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更始二年，隗嚣应刘玄之招至长安，先后任更始右将军、御史大夫。次年更始政权内乱，隗嚣亡归天水，据陇上故地，称西州上将军，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隗嚣注意延揽士人，安集地方，关中、洛阳一带的百姓和士大夫多奔其地避难，“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②。隗嚣因此自视很高，常自比于商末的西伯周文王，“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③，后虽为人所劝阻，但其志可见。

河西窦融。窦融原为新朝军官，更始汉军入关后投降，任校尉。他见更始政权前途难测，知道河西诸郡（武威、张掖、酒泉、

---

①②③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敦煌、金城，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富庶，兵精粮足，阻河为固，遂设法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在任抚结雄杰，怀辑羌人，很得汉、羌民众的拥戴，"河西翕然归之"①。更始失败以后，河西五郡的官吏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史称"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②。窦融治下的河西，是当时难能可贵的一个安定富足之区。

（三）巴蜀地区

成都公孙述。公孙述，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西汉末当过县官，颇有才干。巴蜀沃野丰饶，四面险阻，僻在西疆。更始政权成立后，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其时公孙述任王莽的导江卒正（相当于汉之蜀郡太守，蜀郡治所在成都，今属四川），亦诈称受更始委任，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用兵平定地方。更始二年，刘玄派李宝、张忠领兵万余人进占汉中和巴蜀，公孙述将其打败，"由是威震益部"③。是年秋，公孙述自立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25 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并遣将北守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据扞关（今四川奉节东），尽有益州之地，关中、汉中的地主武装也往往依附之。他利用"蜀地肥饶，兵力精强"④，扩军备战，屯积粮草，"会聚兵甲数十万人"，又"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⑤，一心想在据蜀自雄的基础上相机进取雍州、三辅和荆州，进而谋取天下。

（四）豫州及东南地区

睢阳刘永。豫州大致包括今河南东部、山东西南和安徽北部，是河、淮之间的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更始二年初刘玄封诸宗室、功臣为王，汉梁孝王的后人刘永被封为梁王，居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当年冬，刘永据国起兵，以弟防、少公任辅国大将军和御史

---

①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③④⑤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大夫，发兵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郡国的28县，奄有豫州大部及兖州一部。刘永还通过封拜官爵，拉拢佼强、董宪和张步诸人，“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①。更始败亡，刘永即在睢阳称帝。

庐江李宪。李宪本为王莽时的庐江连率（连率相当于汉朝太守，庐江郡治所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莽败，据郡自守。更始元年，宪自称淮南王，不久又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有9城，众十余万，是江淮间的一大势力。

（五）关中北部及并州地区

安定卢芳。卢芳，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人。王莽时他谎称自己是汉武帝曾孙，活动于安定一带。后随当地少数民族起兵反莽，更始委任以骑都尉之职，令其镇抚安定以西。更始失败，安定豪强共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据有其地。安定与匈奴接界，卢芳联结匈奴以为援助，建武元年（25年）十二月，匈奴立其为汉帝。此后卢芳曾兵败出塞，到建武五年（29年）时，又在当地豪强引导下从匈奴中入境，掠有并州的五原、朔方、云中、定襄和雁门5郡，并在匈奴支持下不断侵掠北边各地。

第二节　东汉王朝的建立

一、刘秀同王郎的作战

在新莽王朝已经灭亡而更始政权又已失去人心，各地武装集团竞争雄长之际，正在河北地区活动的刘秀逐渐崛起。他在起初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战略方针，正确运用各种策略和实施军事指挥，争取耿况、彭宠等人，消灭王郎，镇压和收编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北农民军，实现了他经略河北的基本目标，并正

---

①《后汉书》卷十二《刘永传》。

式建立了东汉政权。

王郎称帝邯郸，声势浩大。王郎与河北诸农民军及耿况、彭宠等人不同，他以刘子舆的名义称帝，公开与更始政权为敌而有并吞之心。因而他对代表更始安集河北的刘秀，必欲除之而后安，王郎传檄各地，有能擒刘秀者封十万户，使刘秀处于极为险恶的境地。因此，消灭王郎乃是刘秀能否在河北立住脚跟的关键所在。

更始二年（24年）正月，势单力薄的刘秀为躲避王郎，北至蓟县（今北京市区西南）。行经卢奴（今河北定县）时，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来投。耿弇睿智多谋，有将帅之才，此后成为刘秀麾下的杰出将领。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深感刘秀器识、为人卓越不凡，必能成就大事，因而函请耿况从上谷来到昌平（今北京昌平南），投向刘秀，使刘秀终于在河北北部有了一个可靠的支持者。而且由于耿况与彭宠关系密切，得耿则彭亦可争取。

正当刘秀在耿弇的建议下决心调发上谷、渔阳的精锐骑兵南攻邯郸之时，汉宗室刘接突然在蓟城举兵响应王郎，正在城内的刘秀在乱中冲出城门，与少数亲随几历危险，南奔信都（今河北冀县）。此时，更始所置信都太守任光仍然效忠于长安政权，不肯投降王郎。刘秀到后，双方都有了依靠，邻郡和成（治所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原王莽的卒正邳彤亦举兵来投。刘秀获得二郡之助，始有精兵6000人。这时，属下多主张借此兵力护送刘秀返回长安，但邳彤力劝刘秀，以为不可。他指出，“吏民歌吟思汉久矣”，而王郎虽然人多，却是乌合之众，以二郡之兵完全可能战胜之。现在如果西归则必失河北，而且势必影响京都地区的安全，就是部队士兵也会因家乡为王郎占据而涣散逃离，不为所用，故而万不可行。刘秀因此下定决心继续留在河北，寻机击破王郎。

刘秀命任光为左大将军，邳彤为后大将军，均为列侯，又在信都征集4000精兵，扩大了自身力量。他采取先取外围，削弱邯郸侧翼并逐步壮大自己，再图灭掉王郎的策略，首先西攻巨鹿郡（治所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部队行动前，任光派遣游骑到巨鹿境内散布檄文，声称刘秀正在率领城头子路和力子都的百万

大军由东方开来，进攻各反叛。随后，刘秀、任光率部于黄昏进入巨鹿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西北），并令部下多举骑火，布满城外大泽以虚张声势，堂阳县令惊恐投降。刘秀续攻贯县（今河北束鹿西南），该县亦降，部将邓禹也攻下乐阳。此时，昌城（今河北丰南县西北）人刘植聚众数千在昌城响应刘秀，在蓟城失散的耿纯也带宗族、宾客2000余人来会，刘秀命二人为将军，声势渐大。不久，刘秀又攻下下曲阳和卢奴，部队增至数万人。

乘战胜之余威，刘秀派人说降了依附王郎的真定王刘杨。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娶刘杨外甥女郭氏为妻，以巩固二人关系。刘杨的归降，使杨部10余万人归于刘秀，河北许多郡县也随之叛王来依，刘秀和王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转化。刘秀不失时机地挥军南下，连克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防子（今河北高邑西南），又在鄗（今河北柏乡北）击杀王郎将李恽，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打败王郎的大司马李育，形势对刘秀更加有利。

就在此期间，在上谷的耿况派功曹寇恂约彭宠共助刘秀，击破王郎。彭宠属下安乐（今北京顺义西北）令吴汉、护军盖延、狐奴（今北京顺义东北）令王梁等说服彭宠，二郡发步骑6000，由上谷长史景丹和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六将统领南下。联军先克冀北重镇蓟城，杀王郎大将赵闳，继而接连攻下涿郡（治所在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中山（治所在卢奴）、巨鹿、清河、河间（治所在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等郡的22城，斩首3万余级，并会合刘秀于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刘秀即加耿况、彭宠大将军，诸将偏将军，另拜耿、彭、盖、景四人为列侯。与此同时，更始也派尚书令谢躬率兵数万，北渡黄河进攻王郎，与刘秀合军一处。刘秀见已取得对王郎的绝对优势，遂指挥各部进攻邯郸东北的重镇巨鹿，以进一步重创敌军，并扫清邯郸外围。

因巨鹿守将王饶死守城池，巨鹿月余未能攻克。王郎遣倪宏、刘奉领兵万人来援，刘秀迎战于南䜌（今河北巨鹿北）。始战不利，景丹等率上谷、渔阳的精锐突骑冲击敌军，倪、刘大败，刘秀军

追击十余里，斩首数千级，但巨鹿仍坚守不下。为避免大军久屯坚城之下，刘秀接受了耿纯的建议，以一部看住巨鹿，自率主力直捣邯郸。大军连战皆捷，很快进抵邯郸城下。王郎穷蹇莫展，以万户侯为条件乞降，刘秀不允。经20余日的急攻，五月王郎部下开城迎汉军进城，王郎乘夜逃跑，为刘秀部将王霸追杀。

王郎是刘秀经略河北的最大威胁和障碍，消灭王郎，刘秀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大半。是役之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这时的刘秀，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军事集团，手握重兵，威镇河北，与半年前的情景已完全不同了。

二、刘秀对河北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和收编

虽然王郎已被消灭，河北各郡县也多归附，但要牢固控制河北，还必须解决散在河北各地、人数达数百万的农民军各部。在与王郎作战期间，刘秀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王郎，与农民军相安无事，可他现在既然腾出手来，就要开始镇压农民军各部了。

针对农民军分散不一的特点，刘秀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但在具体实施整个战役计划之前，刘秀先采取了若干手段，清除更始政权派赴河北的官员，而以部将朱浮任幽州牧，牢牢控制住冀州以北幽州10郡的最高行政权，以确保其下一步的行动。

刘秀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是当时活动在鄡县一带的铜马军。铜马是河北地区势力最大的一支农民军，镇压了铜马，其他各部则不难对付。更始二年（24年）秋，刘秀在原有军队之外，又从幽州10郡调来精锐骑兵，自清阳进攻鄡县。刘秀根据铜马军人多势大，但局处于黄河、滏阳河之间，且缺乏稳定持久的后勤供应的弱点，不与铜马直接决战，而是在迫近后坚营自守。农民军一再挑战，汉军均不为所动；而对铜马四出抄掠给养的小股武装，则不断予以袭击，并切断铜马粮道。一个多月后，铜马军粮尽，利用夜晚南遁，刘秀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大败其军。铜马余部

与适从东南来的高湖、重连农民军会合，复与刘秀大战于蒲阳（今河北完县西北），又被击败而悉数投降。刘秀封其主要将领为侯，并着意笼络安抚农民军士卒，“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①，投降农民军将士被刘秀的这些作法感动，尽被安心收编。由此，刘秀的军事实力一下增加至数十万人，人称“铜马帝”，对其他农民军处于极为有利的态势。

随即，刘秀统军南下进攻射犬，这里聚集着青犊、上江、大肜、铁胫、五幡及赤眉军一部共10余万人。刘秀以多打少，将诸部击溃。旋再南向取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更始所置太守韩歆及大将军吕植投降。刘秀任寇恂为太守，控制了这个西接晋南，南临黄河彼岸之荥阳、洛阳诸要点的战略要地和物产丰给的区域，为完全平定河北后逐鹿中原，准备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在此后的战争中，“寇恂调糇粮、治器械以供军，军虽远征，未尝乏绝”②，河内成为刘秀可靠的根据地。在河北局势已经明朗的情况下，鉴于此时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刘秀料定更始将失败，乃派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关中，相机进取；派将军冯异驻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扼黄河渡口，防止更始在洛阳的朱鲔、李轶等将北渡。

建武元年（25年）夏，为最后解决河北问题，消除后顾之忧，刘秀率军北上，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诸部退走，刘秀追至右北平（治所在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北），屡战屡胜。双方复战于顺水北岸，刘秀乘胜轻进，反为所败，士卒死伤数千，本人亦险被俘虏，退保范阳（今河北定兴县西南）。但农民军慑于刘秀声威，未能乘胜反攻反而撤走，使刘秀得以整军再战，于安次（今河北廊坊西北）打败诸部，余部逃入渔阳境内。刘秀令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13将追击不舍，又依陈俊计以轻骑先出敌前，在各地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断绝粮秣，难以再战。不久，农民军

---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淮阳王更始二年。

被歼溃散，残部散入辽东、辽西，又为乌桓、貊人袭击略尽。至此，曾经声势浩大的河北农民起义军已基本被刘秀镇压下去，只有弱小余部尚存或是转入黄河以南。刘秀经略河北这个首要目标经一年有半的艰苦努力之后，终于如愿以偿。

三、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在河北地区，凭借着更始政权的影响和个人才干，一步步地壮大了势力，由只有少数随从发展到拥兵数十万的武装集团。伴随着个人军事力量的扩张，刘秀同更始政权的关系日益疏远，直至自建政权，公开称帝。

还在击灭王郎之后，刘玄在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下诸将返回长安，一面让谢躬在邯郸乘便袭击刘秀，并派苗曾、韦顺、蔡充分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北郡精兵。刘秀此时已决心脱离更始，独树一帜，乃以河北未平为名，拒不就征。他派吴汉、耿弇袭杀苗、韦、蔡三人，而以朱浮为州牧，夺回幽州军政权力。更始二年（24 年）秋南攻射犬时，刘秀又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用计收斩了谢躬，并其士卒，并且迫降了更始的河内太守，夺得河内。这时，刘秀实际上已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将河北完全变成一己的地盘。

河北基本平定后，众将已在极力拥戴劝进，“议上尊号”。此时，刘秀昔日的太学同学强华从关中带来图谶《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①，宣扬天命所在，邓禹也在河东节节胜利。刘秀见各方面条件均已成熟，遂于更始三年（25 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河北鄗城（今河北柏乡北）即皇帝位，国号仍为汉，年号建武，正式建立了东汉地主阶

① 所谓图谶，是秦汉时代方士与儒生伪造的代表“天命”的图与文字，“四七”指汉代至此时二百八十年；“火为主”，汉为火德，故“火为主”是说汉代将复兴。此符将刘秀复汉证明为是上天的意思。

级政权。刘秀以邓禹为大司徒，吴汉为大司马，王梁为大司空，卓茂为太傅，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朱佑为建义大将军，杜茂为大将军，并积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延揽人才，推行较为宽和的政治措施。

刘秀称帝之时，绿林、赤眉两大农民军火并正烈，而刘永、公孙述、张步、李宪等人割据各地，刘秀所据，不过只是当时13州中的河北二州之地。统一全国，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目标。刘秀这一时期的用兵设想，是以河北为根据，先攻绿林、赤眉，取得两京，再图消灭其他集团，统一全国。绿林、赤眉是推翻新莽的两大农民军主力，各立有汉宗室为帝（此时赤眉亦已立刘盆子为帝），号召各地，影响极大。而他们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点甚多，特别是正在相互厮杀，为第三者从中取利提供了大好时机。同时，两京地区据天下之中，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均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所以，深知与农民军作战之法的刘秀以二者为称帝后的首选目标，实属必然。事实上，刘秀在更始二年冬派遣邓禹西进和以寇恂、冯异守河内时，已判断赤眉将打败更始，进入长安，故有乘隙袭取关中河洛的作战意图。从后来的战争进程看，刘秀的这一估计和计划都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节　绿林、赤眉起义军的失败

（参见附图1）

一、绿林起义军的失败

刘秀在河北羽翼渐丰，据有两京的更始政权却是腐败日盛，矛盾重重。此时赤眉军从河南攻入关中，汉军亦在洛阳予绿林军以重创，更始政权因而迅速地失败了。

（一）弘农之战

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由武关和陆浑关西进。但

次年正月，樊崇、逄安所率的南路向北运动，与徐宣之北路军会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将由此进入关中。

这时更始方面的军事部署是：在洛阳，有更始左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和河南太守武勃等统大军驻守，兵力号称30万；在河东地区，有宋国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等率军10余万人，据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等地；而在赤眉入关的必经孔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一线，则有王匡、成丹一部和将军苏茂部布防。可见，此时赤眉军的东、北、西三个方向上均为更始大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如果刘玄能够迅速调军合击，则很可能将其聚歼或击溃。然而昏聩无能的刘玄及更始政权的上层人物对赤眉的西进似并未予以充分重视，认真部署，且指挥调动不灵，再加上此时刘秀之邓禹和冯异二军，在河东、河内已极大地牵制了在晋南和洛阳的更始主力，使之不能全力对付赤眉。这就使得赤眉军得以一意西攻，打通入关道路。

建武元年（25年）正月，赤眉军在弘农击败苏茂，斩杀千余人。三月，更始遣丞相李松与朱鲔会合，与赤眉军会战于弘农以北的蓩乡。更始军大败，李松等弃军逃走，士卒死伤3万余人。赤眉军声威大震，"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①，军队组织更加有序。不久，赤眉军进占华阴、郑县（今陕西华县），长安已无险可守。

大约因刘玄在长安一带尚有重兵，赤眉军在华、郑间逗留约三月之久。六月，赤眉诸将立了一个名叫刘盆子的宗室少年为帝，徐宣任宰相，樊崇任御史大夫，逄安任左大司马，谢音任右大司马，另设列卿、将军若干，完成了进攻长安的政治准备。随之，大军进抵高陵（今属陕西），迫近长安城下。

（二）安邑、衙县之战

在赤眉军连续击败更始军队、进入关中的同时，刘秀所派遣的邓禹，也在北面与赤眉平行西进，一面注视着两虎之争，一面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攻取河东，“欲乘衅并关中”①。

建武元年正月，邓禹将精兵2万攻破太行要隘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进入河东，并获得辎重千余乘。接着，邓禹进围安邑。安邑是河东郡城，人民众庶，出产盐、铁，故对双方都极为重要，邓禹连攻数月而不能克。刘玄派大将军樊参率援军数万人从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北渡黄河，谋解安邑之围。邓禹以主力于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迎击，樊参大败被杀。更始军王匡、成丹和刘均等部合兵10余万会攻邓禹，禹军失利，部将骁骑将军樊崇战死。当晚众将都劝邓禹乘夜撤退，禹不从。次日正好是癸亥日，王匡等人迷信当时流行的兵阴阳家的观念，以“六甲穷日”不可出战而按兵不攻，使邓禹得以从容整顿部队，准备再战。第三天清晨，更始军全军来犯，直至禹军营垒之下，邓禹始命令诸将擂鼓发起冲锋，王匡等大败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擒杀刘均等多员将领，缴获大量武器，遂平定河东地区。河东南瞰伊、洛，西窥关中，物产丰饶，这一地区的取得，对于刘秀来说意义重大。

七月，邓禹率军西渡黄河，至夏阳（今陕西韩城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部10万，与左冯翊（汉长安三辅之一，辖地大致为渭河以北、泾河以东和洛河中、下游）兵共拒禹军于衙县（今陕西白水东北），又为邓禹击溃。此时赤眉军已开始攻击长安，邓禹的胜利，无疑给更始政权又一记重击，使赤眉得以顺利攻入长安。

邓禹军纪严明，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势力大增。史称：“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②。这时麾下诸将及归附的地方势力都劝邓禹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认为，自己人数虽多，实际上能战者少，补给尤缺。而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难当，不宜硬攻。然而赤眉军是没有长远打算的武装集团，财谷虽多亦不能长期坚守，久必生变。因此他采

①②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取了避实就虚，待机破敌之策，引兵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拟控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利用这里土广人稀而谷饶畜多之便，就粮养士，以伺赤眉。禹军所至，各地或破或降。几个月后的事态发展证明，邓禹的这一谋略，确实是一着不战而胜的好棋。

（三）洛阳之战

刘秀北征尤来等河北农民军期间，河内太守寇恂和将军冯异最初对据洛阳的朱鲔、李轶军取守势。但由于弘农大败，长安危殆，洛阳的更始军已军心动摇。冯异利用李轶曾与刘秀共同起兵反莽却又加害刘縯，想投降又不自安的心理，写信劝说他立功免罪，李轶心怀两端，“不复与异争锋”。冯异乘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克上党（治所在长子，今属山西）2县；南渡黄河，下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以东13县，迫降绿林军10余万。更始河南太守武勃领兵万人自洛阳东出，冯异于士乡（今河南洛阳东郊）大败武勃，斩勃以下5000余级，李轶又故意不发救兵。此时刘秀用借刀杀人之计，故意泄露李之密信，朱鲔闻知，刺杀李轶。于是洛阳“城中乖离，多有降者”①。朱鲔复令部将苏茂、贾强率兵3万渡河攻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自带万人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以牵制冯异，分别为寇恂、冯异打败，贾强以下数千人被杀，被俘万余人。寇、冯乘胜追击，直至洛阳城下。两军攻守之势至此已完全逆转。

建武元年（25年）七月，刚刚即位的刘秀南至怀，以大司马吴汉统领大司空王梁、大将军朱祐、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等11将围攻洛阳。朱鲔据城坚守，数月不能克。刘秀命曾为朱鲔部下的岑彭至城下劝降，指河为誓，恳切表示不咎既往的一切积怨。此时长安已为赤眉攻占，汉军朱祐、坚镡部亦一度突入洛阳，予守军以重大杀伤，朱鲔见大势已去，又感于刘秀、岑彭的诚恳，率全军出降。刘秀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十月，刘秀车驾入

---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城，以洛阳为国都。

随着洛阳的攻克与定都，历来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均已入于刘秀之手。现在，刘秀不仅可以居天下之中以控御四方，更直接截断了赤眉军向中原流动的道路。同时，入洛后刘秀量才立官，广封功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政权建设，从而为下一阶段打败赤眉和各个击破地方割据势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四）绿林军的内讧和赤眉军进入长安

赤眉军逼近长安，更始政权内部原有的矛盾更加尖锐。诸农民将领的流寇主义观念故态复萌，从河东败回的大将张卬与众将商议，认为长安孤城一座，势难久守，“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①。但刘玄则迷恋长安的帝王生活，坚决不允，并派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在新丰，李松在鄹（两地均在今陕西临潼东）布防，抵御赤眉。

张卬等见所议不成，便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在立秋日狩猎、祭祀时劫持更始，迫其听命。事被更始知悉，是日装病并宣召张卬等人进宫，准备将其一网打尽。张卬等入宫后察觉有诈，突出宫中，只有大将申屠建被杀。隗嚣逃回陇西，张卬与廖湛、胡殷纵兵大掠长安的商业区——东、西二市，并于当晚攻进宫城，更始逃到新丰的赵萌军中。大敌当前，绿林军却陷于分裂，其最终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

刘玄至新丰后，以同谋罪收杀陈牧、成丹，王匡率部逃回长安。李松引兵归刘玄，与赵萌合攻长安诸将。双方在长安城内混战月余，张卬、王匡败走，至高陵投降赤眉，并与赤眉军一起进攻长安。李松出城迎战，兵败被俘。九月，李松弟城门校尉李泛开城投降，更始单骑出城逃走，赤眉军进入长安。十月，更始穷蹇投降，不久为张卬等所杀。纵横湖北、河南和陕西达8年之久

---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的绿林军，就这样失败了。

二、赤眉起义军的失败

赤眉军从河南攻入关中，击垮更始，但也和更始政权一样走上了残暴失民、难乎为继的可悲道路。这一切早已在刘秀的预料之中，他不失时机地兵出两京，镇压、收编了绿林余部和赤眉军，实现了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一）赤眉军进占长安后的处境

赤眉大军进占长安以后，并没有吸取绿林军的失败教训，既不积极建设和巩固政权，更无意于安集民众，恢复经济。由于赤眉军中较少地主士大夫，而且始终以游动搜掠维系部队，因而他们比绿林军更富流寇主义色彩。从进入长安之日起，赤眉诸将就没有久据长安和三辅地区的想法，而只是把长安当做长期流动作战过程中的又一个暂住地点，也就根本谈不上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以经略。因此在长安，赤眉将领一面在宫廷里争功胡闹，一面在城内外纵兵抢掠，甚至刘盆子宫中的酒肉和长安周围郡县及坞堡的贡品也被剽夺劫去。

赤眉的所做所为，使刚刚为更始的垮台而庆幸的关中民众再次大失所望，“莫不怨恨，不复信向”，“皆复固守”①，与赤眉相对抗。赤眉比更始更快地失去了人心。而就在此时，在长安地区的四周，东有刘秀据洛阳制其出路，北有邓禹在北地一带待机南下，西则有隗嚣高居陇上虎视眈眈，南也有占据汉中的刘嘉和延岑正准备进图关中。在四面包围环伺之中的赤眉军，虽号称有百万之众，但麇集一处，既无军事上的回旋余地，又因失去民心，四野坚壁，粮食更成为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可谓战守两难。因此，赤眉军在长安的处境，实际上比起方入关时的更始政权更为不利。

---

①《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二）攻打隗嚣、刘嘉的失利

建武二年（26年）正月，赤眉军因粮食已竭，在一番大掠大烧之后，弃长安南行，重新流动作战。邓禹随即引兵南来，如最初所预料的那样，兵不血刃，取得长安。

赤眉自南山（今陕西终南山）转而向西，一路攻城围邑，以取得补给，先经扶风（治所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北至北地、安定。同年九月又欲西上陇县（今甘肃张家川），转入陇右就粮。隗嚣遣将军杨广迎击，赤眉败走。杨广尾追其后，再败赤眉军于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之间。赤眉向南退至阳城、番须山中（今陕西陇县西北），又适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①，损失巨大，只好再向东折返长安。在长安城外，赤眉尽发汉帝诸陵，以取财宝。邓禹出城攻击，在郁夷（今陕西宝鸡县西）为赤眉所败，撤退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赤眉遂重占长安。

赤眉重占长安时，原更始汉中王刘嘉已逾秦岭进至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其叛将延岑亦带人马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进屯于杜陵（今西安市东南），窥伺长安。故赤眉军以逄安将精兵10余万攻延岑，廖湛率军18万攻刘嘉，企图解除侧翼的威胁，并可能借此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邓禹乘虚反攻长安，为赤眉将谢禄击退。而逄安先是大胜，延岑部原更始将李宝伪降，与延岑里应外合，反而大败赤眉军，逄部几乎全被歼灭，逄安仅与数千人逃回长安。廖湛亦大败于谷口，本人被杀。赤眉军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

遭受了两次大失败之后，赤眉军人数锐减，关中更难立足。他们的希望，也只剩下向东与刘秀决战，重返中原和故乡一条路了。然而，现在出关的道路已难通行。

（三）刘秀对赤眉军的作战部署

当赤眉军转战关中，渐陷窘境之际，刘秀在东方则进一步镇压了檀乡、铜马、五校、青犊、尤来等农民军残部，攻克或收降

---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了更始在各地的诸多郡县，刘永受到沉重打击，张步暂时俯首称臣。建武二年（26 年）反叛的渔阳彭宠及南方的李宪、秦丰等，一时也难以构成大的威胁。因此，刘秀便可以将更大的力量用于西方，开始为最后镇压赤眉军而积极部署和行动。

刘秀的部署可分为关中和关东两个方面：

在关中，刘秀于建武二年（26 年）十一月更换了军事指挥员，以善于治军、作战稳健而素有“大树将军”之称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邓禹长于谋略，屡建战功，但带兵和临阵指挥却逊于冯异。故在关中先是有部将冯愔叛变，后又有汉中王刘嘉投降后一部复叛的事件发生；特别是他与赤眉作战失利后，“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①，因而产生急躁情绪一味求战，部队纪律亦渐变坏。因此，这一调整十分及时。刘秀在送别冯异时对他面授机宜，指出：关中自王莽以来，饱经战乱，生灵涂炭，故解决关中问题的关键，主要不在于军事上的攻城略地，而在于安抚怀集百姓，取得人心。因之他特别要求冯异严格约束部队，不得扰民。针对赤眉军勇斗而乏粮的状况，刘秀又严令尚在关中的邓禹慎勿与战，“无得复妄进兵”②。刘秀判断赤眉必将东出，决心在洛阳以西一带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扼险而聚歼之。

为此，刘秀在关外也作了相应部署。建武二年春，他派人前往并州，招降了据有其地的更始大将鲍永；又令大将盖延等在东线进攻睢阳刘永，使之自顾不暇，从而解除或减轻了河东、洛阳的侧面之忧。四月，他又派吴汉率军攻下南阳，更始所立的宛王刘赐和大将王常投降。赤眉军出商洛山区，经武关由河南南部东出的道路已被卡死。而在华阴以东，刘秀则于当年冬天以大将侯进等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弇等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等待赤眉军的东出。刘秀命令诸将：如赤眉走北路（新安），则宜阳大军会集新安，反之新安之军会集宜阳，务在中途以优势兵力阻击、消灭赤眉农民军。

---

①②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刘秀的这一番部署，知彼知己，布置周密，显示出他在军事上准确的预见性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后来战事的发展，完全是按照他的上述预想进行的。赤眉军的失败，此时已经注定了。

（四）华阴之战

建武二年冬，“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①。赤眉军在屡战不利，极度缺粮的情况下，于十二月引兵东归。此时赤眉军只剩下20余万众，且士气低落，沿途不断有逃亡、掉队者。

赤眉军进至华阴，即与冯异所率汉军相遇。冯异入关途中，“所至皆布威信”②，弘农、华阴等地的地方势力多降，实力增强很多。但冯异按照刘秀的既定方针，与赤眉相持60余日而不决战，只是不断与对方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使赤眉欲走不能，欲战不得，日益疲惫，饥寒交迫，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赤眉将领刘始、王宣等5000多人先后投降，赤眉军已有难以持久的征兆。

建武三年(27年)正月，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亦率军东至华阴。二人急于求胜，要冯异与之共同出击，合攻赤眉。冯异劝阻他们说:我军与敌人相持数十日，虽然屡俘敌人猛将，但敌军尚众，只能以恩信诱降和攻心，决不能操之过急，急于军事解决。现在，皇上已令诸将把守渑池，阻其东路，而我在时机成熟时攻击其后，一战可胜，这才是万全之策。冯异的作战方针，显然与刘秀的指示相一致，也是当时最为稳妥正确的。但邓禹、邓弘二人不但没有听从，反而单独行动，由邓弘先行率部大举出击，这正为赤眉所欢迎。双方激战数个时辰，赤眉军佯败，弃辎重而走，而其实辎重车上满载泥土，只在表面覆盖着一层豆子。汉军饥饿，争抢豆车，队伍大乱。赤眉军乘乱反击，邓弘部大败溃散。冯异、邓禹合军驰援，赤眉稍稍后撤。冯异因士卒饥倦主张收兵修整，而邓禹执意率军再战，果然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3000余人。邓禹仅带24名骑兵向东逃到

---

①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宜阳，冯异弃马与随从数人从险峻的回溪阪（今河南陕县东南）逃回后方营地。经此激战的赤眉军，遂得继续东进。

（五）崤底、宜阳之战和赤眉军的最后失败

冯异回到营中，深沟高垒，聚集溃兵，又收降招集附近据守坞堡的地方武装数万人，力量得到恢复。他利用赤眉大胜之后难免有轻敌情绪，与赤眉军约期会战，并在战场将部队化装成赤眉预伏于路旁。会战日，赤眉军以万人攻击冯异前队，冯异仅以少量兵力增援，示弱于敌。赤眉见状，全军发起冲击，冯异方以主力迎战。双方战至午后，赤眉攻势逐渐减弱，汉军伏击部队此时从道路两旁突然杀出。赤眉军突遭打击，又不辨敌我，惊恐奔逃，冯异乘胜追击至崤底（今河南洛宁西北），获得大胜，赤眉军将士及家属 8 万余人被迫投降。余部 10 余万人在樊崇、逢安、徐宣等人带领下，仓皇朝东南走向宜阳。

刘秀这时已经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阻截赤眉余部。惊恐未定而又疲劳饥饿的赤眉将士忽遇大军，惊震无措，只好无可奈何地放下武器，由刘盆子与樊崇等 30 余员将领来到刘秀大营中，肉袒投降。这样，仅仅在打垮更始政权的一年半以后，赤眉军亦为刘秀所镇压，悲壮地失败了。轰轰烈烈的新莽末年的农民战争，到这时亦可说降下了帷幕。而赤眉投降以后，冯异率军再次西进，打败延岑等人，“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①，取得了关中之地。刘秀的势力因此更加壮大，已为其时任何一个集团所不如。

三、绿林、赤眉起义军的失败原因和教训

新莽末年以绿林、赤眉军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是继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它推翻了反动、残暴的新莽王朝，扫荡、消灭了大批残酷压迫和兼并农民的封建官僚和豪强地主阶级，从而使西汉后期以来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为东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场农民革命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从根本上说，农民阶级的种种历史局限，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总是要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归于失败，对此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但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角度来看，绿林、赤眉及这一时期的其他农民军在战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既有其共性，又具有其特性，应该予以很好地分析和总结。从探讨失败原因、总结教训的立场出发，可以指出赤眉、绿林起义军存在着以下缺点：

第一，缺乏正确、明晰的政治目标。赤眉、绿林大起义，是广大小农在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度恶化的情况下为了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爆发的。绿林、赤眉及其他许多农民起义军最初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人祸之中无以为生的饥饿流民。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绿林、赤眉等足称庞大的武装集团的直接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取粮食和财物，而不是彻底推翻新莽王朝的统治并建立农民阶级政权。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口号以表明自己的有关立场，与王莽军队作战时也往往留有余地，正如《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地皇二年（21 年）荆州牧进攻绿林军大败，马武已截住其车，却不敢杀之。同年豫州农民俘虏了前来镇压的朝廷官员，也将他送回县城的官府。只是在后来随着王莽镇压日益残酷和地主阶级士人大量加入到农民军中，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他们开始建立政权，决心推翻新莽王朝。但即使此时，他们不仅只限于拥立汉朝宗室为帝，而且其逃死求食、"朝夕自快"①

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的特性也仍然非常鲜明。他们不知道努力建设和巩固政权，忽略争取人心、发展经济和安定社会，只图一时的享乐和快意，甚至每遇困难即思散伙，各自去作山大王。像昆阳之战前夕和赤眉入关之际，绿林军将领都曾有此打算。前者赖刘秀说服，后者则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这一特点实际上支配了绿林、赤眉等农民军的全部历史，也直接影响了其整个军事组织和战争行为。作为一个缺乏正确、明晰的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绿林、赤眉等农民军决不可能长期保持军事上的胜利，其为地主阶级所镇压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由于以上根本特点，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军队组织较为涣散。综观当时各支农民军队伍，均为拉家带口，老幼俱随，故人数虽众，战斗人员却要少得多，行动尤为不便。而且其建制也较为粗略。这一点在赤眉军表现得尤为突出。赤眉军等东方农民军已发展到数十万人时，依然是"迄无文号旌旗表识"①；直到建武元年（25 年）正月才将全军编成万人一营，共 30 营的部队，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而已。三老为汉代乡官之名，可知其各营下仍然缺乏严密的军事建制或指挥制度。这对作战必然是一个不利的限制因素。与此相联系，农民军军纪松散，少有约束。尽管赤眉军曾提出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坚持。为了生存，各农民军常通过掳掠来解决给养和获取财富，以至刘玄在朝堂上公然询问诸将"虏掠得几何？"② 史书中农民军"所过虏掠"、"虏掠横暴"、"数暴虐吏民"的诸多记载，并不都仅仅是针对官僚、地主阶级，也不仅仅是地主阶级史家的诬陷之词。这就给农民军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极大的困难。像绿林、赤眉军在关中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各地聚保相抗，拒输粮秣，使之陷入困境而遭致失败，直接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农民军的作战方法，以大规模、远距离的流动作战为特征。绿林军自离开绿林山后，赤眉军从一开始，便一直是纵横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

四方，流动作战；建立政权和入关以后，这两支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所以他们没有认真建立根据地的任何举措，绿林诸将企图大掠长安重新游动，赤眉军则很快就这样做了。其他较大的农民起义军如河北农民军各部也同样如此。这种流动作战的战术，在起义的初期有利于解决补给、发动群众和避敌锋锐、机动歼敌的优点，但以此为惟一的作战方式，根本不从事根据地建设，则陷入流寇主义的路线，使农民军缺乏后方，没有稳定的兵员、粮秣供应，只好"转掠求食"，流动再流动，最终只能蹈于失败。而刘秀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显著的弱点，才屡次取得胜利。

第四，在具体的战术运用上，农民军总是以死打硬拼为主，缺乏战场指挥的灵活性和谋略的运用。在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各次战斗中，农民军惟一一次运用智谋的例子，是华阴之战中赤眉假败并以粮车诱惑邓禹，将其击溃。可是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农民军与敌对军队的硬碰硬的战斗。这种作战特点，反映了当时农民军将士为求生存而勇猛敢战的斗争精神，但也暴露出农民军思想简单、缺乏军事经验的弱点。刘秀麾下名将邓禹评价各农民军的将领往往是无"深虑远图"①，在军事方面，也确如所批评。其多次为地主武装所打败并最终输掉了战争，军事上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农民军的军事行动，往往又要受到鬼神迷信的制约。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如建武元年(25 年)，更始军王匡等以十余万众在河东合击只有二万多人的邓禹，第一日邓禹"兵势已摧"，如果更始诸将次日乘胜猛攻，胜算极大，可是他们却因"六甲穷日不出"②，遂使邓禹得以从容修整部队，在第三天大破王匡等，"遂定河东"。又如赤眉军在军中蓄巫，动辄请巫祠西汉成阳景王刘章，以做决定，打仗当亦不例外③。这种深受齐、楚巫术影响的迷信

①②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③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观点，也是农民军作战方式原始、落后的一个突出体现。

第五，农民军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只有武装斗争而忽略了政治斗争及其策略运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孤立、瓦解敌人，是一切军事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绿林、赤眉及其他农民军在狭隘的眼界心胸的限制下，既没有搞好相互团结，绿林甚至冷淡、气走了来投的赤眉将领，也没有认真采取措施去团结、收拢其他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他们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厮杀，给刘秀等地主阶级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良机。更为严重的是，各农民军所到之处，往往有劫掠烧杀的现象，使各地聚众自守的地主和宗族武装乃至广大人民(包括许多曾想或已经投降归附的人们)厌恶、反对他们。而离开了上述各种力量的支持，四处游动作战的各农民军也就更加困难重重，特别是当其倒向与农民军对立的地主武装集团方面以后，更成为农民军的凶恶的敌人。赤眉军在关中的遭遇，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如此轰轰烈烈，几乎滔滔天下皆是，但最终却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刘秀等人将其次第消灭，这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相比之下，以刘秀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质，熟悉封建政治、军事制度，从一开始就表现了相对成熟与理性的特点。

首先从起兵目的上看，刘秀和他的哥哥刘縯是明确怀有乘“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兴复刘氏王朝的政治目标发难的。作为地主阶级成员，刘縯多蓄宾客，刘秀农商兼营，他们不存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问题，政权才是他们发动军事斗争的根本追求。因此刘秀在军事斗争中一直能够注重政治和政权问题，收拾人心，为建立地主阶级的皇朝而不懈努力。

其次在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二刘的武装亦非一般农民可比。史谓：“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①，已显示出较富经验的特点，故令王莽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感到了真正的担心。所以是年他大赦天下，独不放过二刘兄弟及其族党。更始政权成立以后，诸将多军容不整，“冠帻而服妇人衣”①，却只有刘秀的部队整齐规矩，颇具“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②。而且与农民军相比，刘秀能注意“除莽苛政”，“师行有纪”，甚至刘秀亲戚犯罪亦难逃军法从事，从而受到民众的欢迎。

第三在军事指挥上，刘秀善用智谋取胜。从起兵到昆阳大战和后来与绿林、赤眉的历次战斗中，刘秀多次运用谋略，或以弱胜强，或以强灭弱，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在他的战略筹画中，经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此进图天下，一直是他十分明确坚决的意图。刘秀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使河北成为他军事斗争的坚实基地，从而对农民军具有了较大优势。

最后，刘縯、刘秀兄弟都十分重视策略的运用，以争取各种力量共同对敌。在河南，二刘团结了新市兵与平林兵，取得了昆阳大战的胜利；在河北，刘秀争取了耿况、彭宠、任光、刘杨等地方势力的支持，击败了王郎；在对付绿林赤眉的过程中，刘秀则不计前嫌，收降了朱鲔、王常以及樊崇等农民军将领。这些作法，给刘秀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并为他镇压农民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有这些，都是刘秀得以镇压农民军的重要原因。而从更深入的层面上分析，则是因为：在王莽暴政被推翻以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社会的稳定，恢复社会经济与正常生活。刘秀在各方面的种种表现，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刘秀在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刘秀的胜利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从农民战争的发展史看，绿林、赤眉起义军留给后世的教训是：广大农民群众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相对的革命战争胜利，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围绕

①②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这一目标努力搞好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必须努力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心理，正确运用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必须在战争中不断提高军事指挥艺术，特别是善于运用谋略，以智胜敌。这些由绿林、赤眉及其他农民军无数将士鲜血换来的教训，在封建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能使后来同样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思想指导的历次农民战争获取真正的胜利，但它们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历史的镜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的启示下，中国的农民战争才越来越以一种趋于成熟的形态出现，推动着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和军事历史的前进。甚至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上，这些教训还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养分。

第二章　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

铜马、绿林和赤眉等农民军失败后，虽然黄河南北仍有一些农民军在各地活动，有的尚具一定规模，但总的来说，新莽末年以来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刘秀称帝前后，全国各地却布满了地主武装集团。他们各自盘踞一方，拥兵自重，故此时历史的主流，已转到刘秀的东汉政权与各地地主武装割据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场为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取得最高统治权力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中，刘秀以高超的政治、军事谋略指挥调度，用十年多的时间，次第消灭了睢阳刘永、青州张步、东海董宪、江淮李宪、渔阳彭宠、南郡秦丰和田戎、陇右隗嚣和巴蜀公孙述等割据集团，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第一节　统一战争前的形势和刘秀的决策

一、各割据势力的概况

建武三年(27 年)闰正月赤眉军残部投降前后，定都洛阳的刘秀已是当时各对立的封建军事集团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其军队总数，大约在四五十万以上，并奄有今河北的中部、南部，河南的大部，以及关中地区这一广大的传统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兵精粮足。而且身为汉朝宗室的刘秀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号召天下，在政治上也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这些优势，是其他任何集团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刘秀的东汉政权，是当时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力量。

但是，刘秀要实现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也并非易事。在东

汉政权四周的各个方向上，都存在着势力较强的地主阶级的割据政权，时人至谓“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①。他们中，睢阳刘永据洛阳东，与张步、董宪联合，直接威胁洛阳；隗嚣据陇西、天水，表面服从洛阳，实则割据自雄；窦融据河西，颇倾向刘秀；巴蜀公孙述已公开称帝，并积极准备沿江东下；另有卢芳在并州，李宪在江淮间，秦丰、田戎在江汉一带独树一帜。此外，这一时期又有原刘秀集团的彭宠叛乱于渔阳，邓奉据南阳之淯阳以抗汉，成为刘秀统一全国的新的障碍。

从表面上看，上述各个集团的实力和影响均不如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但其力量却不能低估。首先，他们多数是地主阶级的武装割据集团，有较为完善、巩固的政权组织和基本地盘，在政治、军事上亦较由下层贫苦农民组成的各农民军要有经验和眼光，有的统治者还颇为善战（如彭宠、邓奉），或能得当地人心（如隗嚣）。其次，这些割据集团多处于一隅，关山阻隔，地理条件利于固守，而东汉军队进军路途遥远，后勤供应不易保障。特别是陇右和巴蜀，天险雄关，尤为易守难攻。复次，这些集团逐渐认识到，刘秀的东汉政权是他们争夺天下乃至维持割据的主要敌人和最大威胁，因此往往相互结盟，甚至勾结匈奴，以共同对付刘秀。一些散在各地的农民军，也与他们联合作战。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连结虽然不尽稳固和有效，但毕竟增加了与之作战的危险和困难。最后，东汉控制的地区，正是新莽末年以来战争最为激烈，社会经济破坏最甚的区域，而上述割据地区则多是战乱较少，相对安宁，经济未受严重破坏甚至有所发展之地。故而各主要割据集团物力、军力均属雄厚，难以一战而定。可东汉如不能顺利结束战争，从而轻省赋役、与民休息，则势必影响其恢复经济和巩固统治，产生严重的后果。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刘秀的东汉政权地盘最大，实力最强，但是要把优势变成真正的胜利，完成统一大业，还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审慎的行动。

---

①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二、刘秀的战略决策

以上各个割据势力，其各方面情况不尽相同。论军事实力，以东方的刘永、张步和董宪的联盟最强，巴蜀公孙述次之，隗嚣、彭宠、窦融又次之，卢芳、邓奉、李宪等更弱。而论地理位置，刘永近在睢阳，距洛阳仅 500 余里，卧榻之侧，最具威胁；邓奉在淯阳亦相距很近，但力量有限，仅能自保；其他诸人，均与中原相距较远，尚不构成直接危险而又不易攻取。再从他们各自与东汉政权的关系来看，彼此亦有较大差别：刘永、公孙述、李宪等最早称帝，明显摆出要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架势；而其中刘永同属汉朝宗室，尤为中原逐鹿的对头。彭宠、隗嚣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一直以东汉的地方政权自居，与刘秀保持着臣属关系，直至建武二年(26 年)二月和六年(30 年)五月各自揭起叛旗为止。河西窦融，则较为稳定地倾向刘秀。

根据上述情况，刘秀制定的战略方针大致可以概括为：由近及远，先东后西，各个击破。即分别轻重缓急，首先平定睢阳刘永集团，消灭这个各方面都堪称是东汉大患的敌人，解除洛阳侧翼的威胁，然后再图解决中原周边的诸割据集团，最后攻取或解决据有陇、蜀之险的隗嚣和公孙述，统一全国。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则力求笼络、争取部分力量，分化、孤立主要敌人，一个个地扫除割据势力。于是，东汉统一战争的具体进程，就按照这一方针而不断展开和演进。

第二节　统一战争的作战经过

一、统一关东的作战

(参见附图 2)

关东作战是刘秀统一战争的第一步。因为关东地区割据集团

较多，分布范围较广，故而这一阶段的战争进程复杂，发生了多次重大战役。刘秀按照基本战略方针，在复杂交错的各个战场上区别轻重，全局在胸，刚柔相济，巧妙指挥，历时数载，终获胜利。

（一）先灭刘永，解除洛阳侧翼威胁

还在建武二年（26年），刘秀在积极准备对付赤眉军的同时，已开始向东进攻刘永。当年四月，刘秀令虎牙大将军盖延督马武、刘隆、马成、王霸四将率兵5万，由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一带南下，先后攻克睢阳西、东两侧的襄邑（今河南睢县）和麻乡（今安徽砀山县东北），对睢阳形成包围。八月，东汉军尽刈睢阳城外之麦，示以久困之意，然后于夜间突然架梯登城，袭入城中。刘永惊恐向东撤走，盖延率兵追击，大败刘永。刘永逃跑至谯（今安徽亳州），东汉军队乘胜攻下薛城（今山东滕县南），又进而迫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扶阳（今江苏萧县西南）、杼秋（今安徽萧县西北）和萧（今安徽萧县西北）诸城，并破斩刘永鲁郡（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太守吾丘寿、沛郡（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北）太守陈修。刘永大司马苏茂、横行大将军佼强等率军3万来攻，复为盖延大败于沛县以西，部队逃散死亡过半。刘永、佼强等退守湖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苏茂退守广乐（今河南虞城），永所据之沛、楚、临淮三郡、国（今河南周口、商丘，江苏徐州，安徽阜阳、宿县地区一带）成为东汉地。刘秀又派太中大夫伏隆持节赴青、徐二州，召降各地。二州农民军及地主武装因刘永之败，多向伏隆投降，占据齐地一带的张步也派人到洛阳上书贡献，表示归附。

然建武三年（27年），战局一度有所逆转。年初以来，镇压赤眉农民军的战役已至关键时刻，刘秀集中力量在宜阳、新安一带对付赤眉。稍后又有青犊农民军活跃于河内，邓奉等在南阳、彭宠在蓟城数败汉军，使东汉军受到牵制，一时不能在东线用兵。乘此机会，二月，刘永封董宪为海西王，立张步为齐王，张步贪此封号而杀害伏隆，再次倒向刘永。张步此时据有齐地12郡，并北

联彭宠，其再次易帜使刘永的势力得到增强。三月，睢阳发生叛乱，迎回刘永，永势复振。

同月，东汉军在大破青犊军于轵西之后，再次东攻刘永。刘秀以大司马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攻苏茂于广乐，另以虎牙大将军盖延围刘永于睢阳。刘永部将周建聚兵10余万人援救广乐，吴汉初战不利，堕马受伤，退还营中。吴汉于夜间裹创强起，杀牛励军，"令军中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① 次日晨周建、苏茂出军包围吴汉营垒，吴汉选精兵四部与乌桓突骑3000余人，擂鼓大呼冲击敌军，刘永军大溃，惶恐奔回城中。东汉军尾随紧追，夺门而入，茂、建逃往睢阳。吴汉遂率军与盖延会攻睢阳刘永。至六月，盖延再次尽刈城外庄稼，刘永乏粮不能再守，被迫与苏茂等突围东走。盖延领兵急追，永为部将杀死，睢阳守军举城投降。苏茂、周建逃至垂惠（今安徽蒙城北），共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佼强也退保西防，然已不能构成对东汉的威胁。

建武四年（28年）秋，刘秀命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垂惠。苏茂领五校农民军来救，击败马武。马武逃到王霸营外求救，王霸部下亦争请出战。王霸见敌军精锐乘胜，出援必败，因而坚守不出。苏茂乃全力进攻马武，马武军拼死抵御。直待敌人疲惫，王霸出兵猛袭苏茂军后，苏茂之军溃败。周建死，苏茂至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投董宪，刘纡则逃奔西防佼强。次年，东汉大将杜茂进攻西防，刘纡、佼强亦投于董宪。至此除张步、董宪外，刘永的势力已完全被打垮，东汉所控制的地域向东延伸到今苏、皖北部和山东西南部。

（二）击灭邓奉、秦丰、田戎，统一南郡和夷陵

邓奉原为刘秀部下勇将，官破虏将军。建武二年（26年），他请假回家乡新野（今属河南），因怨愤吴汉所部汉军军纪败坏，在

---

①《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当地虏掠横暴，遂起兵叛汉，攻破吴汉军并尽夺其辎重，占有淯阳（今河南南阳南）。在此前后，南阳一带有董䜣起兵于堵乡（今河南方城境内），许邯起兵于杏（今河南桐柏南），一些更始残部也“各拥兵据南阳诸城”①，在汉中被冯异打败的延岑亦经武关退至南阳郡内，占据数县。东汉政权暂时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只有扬化将军坚镡困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孤城。邓奉与董䜣等相联合，又同据黎丘的秦丰互通声气，其力量虽不太大，但已对东汉政权构成威胁，不能置之不理。而汉军欲南取江、汉，也必须先平定南阳。

建武二年秋，汉军由征南大将军岑彭统率攻杏，许邯投降。十一月，刘秀增派朱祐、贾复、耿弇、王常等7将军与岑彭合力进攻邓奉。汉军先打堵乡的董䜣，邓奉自将万人来援。邓、董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士卒精锐善战，故岑彭与诸将连攻数月竟不能取胜，建义大将军朱祐亦兵败被俘，双方成胶着状态。

建武三年（27年）三月，刘秀在平定赤眉军后，亲率大军南征。车驾行进至叶（今河南叶县南），为董䜣部数千人阻击不前。岑彭由堵阳北上奔袭，从侧后将其彻底击溃，汉军络绎南下。邓奉畏惧逃归淯阳，董䜣投降。四月，刘秀率岑彭、贾复、耿弇等追击邓奉，在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经激烈战斗大败邓军，邓奉穷蹙投降，为刘秀诛杀。刘秀故里南阳一带，随之大部重新平定，东汉向南方的进军通道亦已打开。

同月，刘秀乘胜令岑彭率3万余人南下进攻秦丰。秦丰与大将蔡宏阻岑彭于邓（今湖北襄阳西北），历时数月之久。七月，岑彭夜勒兵马，故意申令军中将西攻山都（今湖北襄阳西北），又佯装疏忽，纵俘归报秦丰。秦丰中计立即率军西进截击汉军，而岑彭却率部暗渡沔水（即汉水上游），在阿头山（今湖北襄阳西）大败秦丰部将张杨，而后又从山谷间伐木开道，连破驻防屯兵，向南直袭秦丰之根本——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秦丰闻讯大惊，

---

①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急忙回兵驰援，岑彭以逸待劳，一举将其击溃，蔡宏被杀，秦丰逃入黎丘。秦丰的丞相赵京举宜城（今湖北宜城南）降，随即与岑彭合兵，包围黎丘。延岑率军援救黎丘，行至顺阳（今河南淅川南），被汉军邓禹部打败，延岑退走投公孙述。

据有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的田戎得知秦丰被汉军围困，知秦败汉军必然继续南下，于建武四年（28年）春带兵沿江而下、溯汉水而上，欲投降汉军。至黎丘附近，田戎变卦反与秦丰联兵，岑彭出兵攻戎，于同年三月大破其军，田戎逃回夷陵。是年冬季，刘秀亲临黎丘前线，封赏有功将士。他见秦丰主力已被消灭，城中只有千人死守，且粮食将尽，乃令朱祐代岑彭继续围困黎丘，岑彭则挥师南下，直指夷陵。次年三月，岑彭攻占夷陵，田戎率数十骑逃往巴蜀公孙述处，其妻子、子女及数万士卒皆成俘虏。六月，秦丰无力继续抵抗而投降，被杀于洛阳。

击灭邓奉、田戎和秦丰诸势力之后，刘秀不仅巩固了中原，而且饮马长江，为东取李宪、西攻公孙述、南收江南之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北击彭宠，统一蓟燕

彭宠在刘秀经略河北过程中，与耿况以渔阳、上谷二郡之兵粮支持刘秀，打败王郎，刘秀封宠为建忠侯、大将军。及刘秀平定河北，即位鄗城，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①，然因未得封王而极度不满，又与幽州牧朱浮交恶，互相攻讦。建武二年（26年）春，光武下诏征宠入朝，彭宠不愿放弃据地自专之欲，又见“天下未定，四方各自为雄，渔阳大郡，兵马最精”②，而且郡中产铁，历年转输贸易获得了雄厚的财力和后勤保障，因而拒招并发兵叛变。二月，彭宠亲率2万余人自渔阳南攻朱浮于蓟城，并分兵攻下广阳（治所在蓟，今北京市西南）、上谷和右北平三郡的部分县邑。他还屡次派人游说耿况，试图与上谷联兵共抗光武，但

①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

② 《资治通鉴》卷四十，光武帝建武二年。

为耿况所拒绝，杀其使者。

是年秋，刘秀遣游击将军邓隆援蓟。邓隆到后，屯军于潞（今北京通县东南）南，朱浮则驻军雍奴（今天津武清西北）呼应之，两地相去百里。二将遣使报告，刘秀读毕报告，“怒谓使者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① 果然，彭宠抓住汉军相距过远、势不相及的弱点，集中兵力，进击邓隆。他以大部队正面攻击邓隆军，另用3000骑兵袭其后侧，邓隆大败而走，朱浮也只得退回蓟城。此役之后，汉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应宠。彭宠又用财物与和亲北结匈奴，匈奴出动骑兵七八千人，在境上游动为宠援兵；彭宠另遣人南使张步及富平、获索等农民军，交派人质，连横互助，声势更大。建武三年（27年）三月，蓟城粮尽失陷，朱浮在耿况接应下逃往上谷，彭宠自立为燕王。

彭宠叛变后，刘秀因先后用兵赤眉、刘永、邓奉等人，无力大举攻宠。同时他也看出，彭宠力量有限，又有耿况的牵制，向南进攻的可能性较小，内部亦不稳定，久必生变，故暂取与之相持的策略。直至建武四年（28年）夏天，赤眉早已平定，刘永已死，邓奉也已被击灭，刘秀才派朱祐、耿弇、祭遵、刘喜四将先攻张丰于涿郡，以去彭宠羽翼。祭遵军先到，强攻城池，张丰部下执丰献城投降。涿郡一克，渔阳侧翼出现缺口，但刘秀旋调耿弇、朱祐南返，进击望都（今河北望都西北）、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一带的农民军，又遣耿弇至平原（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与吴汉镇压富平、获索军，只留祭遵、刘喜分守良乡（今北京房山东南）和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继续与彭宠相持。彭宠见汉军半撤，自领万余人攻祭遵，又令弟彭纯率匈奴兵2000余骑往攻刘喜。当匈奴骑兵经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南）南下时，上谷太守耿况命子耿舒率兵突袭，匈奴败走，有两王被杀，彭宠闻讯撤退。耿况、耿舒乃进占军都，祭遵军亦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大败其军，斩首千余级。此后彭宠数次来攻，均为汉军所挫，

---

①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

部下多有降汉者。

建武五年（29年）春，果如刘秀所料，彭宠被奴仆杀死。部属立宠子彭午为王，国师韩利杀午，至祭遵军中投降，渔阳不战而平，蓟、燕归于统一。

（四）南攻李宪，统一江淮

建武四年（28年）秋，刘秀在夺取江汉、刘纡将败之际，一面积极准备进而向东解决董宪、张步，一面即在南线动手，先取割据庐江、势力较小的李宪，既得江淮之地，又进一步孤立董、张，以形成对他们的包围之势。

八月，刘秀亲从河南至寿春（今安徽寿县），令扬武将军马成、诛虏将军刘隆等征发已归顺的会稽（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丹阳（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九江（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六安（治所在六县，今安徽六安）四郡兵，合攻李宪。马成率诸郡兵包围舒城，令各军深沟高垒，围而不攻。李宪数度出城挑战，汉军坚壁不出。直至建武六年（30年）春，被围已16个月之久的舒城粮尽，马成才下令攻城。城破，李宪被杀，余部溃散。马成分兵追击，江、淮一带顺利平定。

（五）东攻董宪和张步，统一齐鲁

董宪、张步是刘永死后关东力量最大的武装集团。他们最初虽曾是农民军，但接受刘永所封之后实际已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二人分据今苏北和山东大部互为犄角，北通彭宠，南邻李宪，并且与刘永残部和活动在黄河下游的富平、获索、五校等农民军相联合，不易对付。

因此，刘秀虽以之为主要作战对象，但没有急于东进。在整个建武四年（28年），刘秀主要在北、中、西三个方向上为消灭董、张势力做准备：北以祭遵、刘喜看住彭宠，南以马成包围李宪，中间则以马武、王霸困刘纡于垂惠，以吴汉、耿弇攻富平、获索农民军于平原，扫清外围。与此同时，他派大将陈俊为泰山郡（治所在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太守、行大将军事，镇压当地与张步勾结的各地方势力。张步来攻，陈俊在嬴（今山东莱芜西北）打败步军，使

泰山郡成为汉地；又派鲍永为鲁郡太守，击讨董宪别部屯军，肃清其势力，从而楔入董、张之间，断其联系。汉军逐渐取得对董、张作战的有利态势。至建武五年(29 年)二月，渔阳平定，马武、王霸大败五校军而克垂惠，吴汉、耿弇则于平原击破富平、获索，降者 5 万余人。至此，汉军向东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月，刘秀正式下诏，令耿弇于北线进讨张步，盖延、庞萌于南线攻董宪。但攻击尚未发起，平狄将军庞萌突然叛变，率部袭击盖延，盖延败走，北渡泗水才得以摆脱。庞萌遂与董宪相勾结，自号东平王，并向南攻下彭城，杀楚郡太守孙萌。

庞萌为刘秀爱将，他的叛变更打乱了东征部署并加强了董宪的力量，使刘秀极为愤怒。刘秀亲率吴汉、王常、盖延、王梁、马武和王霸诸将先讨庞萌，命各部队集结于睢阳。董宪获悉后，与刘纡等从下邳北至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令苏茂、佼强二人助庞萌，合军 3 万围攻桃城（今山东邹县西），企图据此以扼汉军东进之路。时刘秀已东行至蒙（今河南商丘东北），闻讯立即自率精兵，星夜驰援数百里，进抵离桃城 60 里的任城（山东济宁东南）扎营。次日晨，诸将请求进兵，庞萌亦欲乘刘秀远来疲惫而挑战，刘秀一反驰援之欲速，下令休兵不出，以挫敌锋锐；又急从东郡（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招吴汉等驰赴任城。庞萌见无战机，全力猛攻桃城，而城中守军知刘秀亲至任城，“众心益固”①，一意坚守，庞萌等连攻 20 余日不能克。及汉军各部齐集任城，刘秀乃率大军进救桃城，并亲自上阵搏杀，在坚城之下已疲惫不堪的庞萌等被打得大败，夜弃辎重遁归董宪处。

七月，刘秀南至沛和湖陵，亲征董宪。董宪以数万人守昌虑（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另招至五校军残部步骑 5000 人，屯于 30 里外的建阳（今山东枣庄西南），成犄角之势。刘秀进至距昌虑百余里的蕃县（今山东滕州市），部下请求进攻，刘秀知五校乏粮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②。不久，五校果然粮尽撤走，刘秀即统诸军

①② 《后汉书》卷十二《庞萌传》。

四面围攻董宪，仅三日即将董宪彻底击溃，佼强投降，苏茂往奔张步，董宪、庞萌和刘纡与残部退至郯（今山东郯城北）。八月，刘秀令吴汉攻郯，自己转取彭城、下邳。吴汉克郯，刘纡被杀，董宪、庞萌逃到朐（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复为吴汉包围。董宪的消灭，此时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刘秀亲攻董宪的同时，北线耿弇进攻张步进展顺利。耿弇将投降的富平、获索农民军加以整编，充实部队，然后率部与骑都尉刘歆和泰山太守陈俊的部队从朝阳（今山东邹平西北）架桥渡过济水。张步命大将军费邑屯兵历下（今山东济南市），另分兵守祝阿（今山东济南市西南），又在钟城（今山东济南市南）连营数十座，以待耿弇来攻。十月，耿弇先攻驻守祝阿的较弱之敌，攻击半日，故意缺围一角，令敌逃归钟城。钟城守军闻知祝阿已败，恐慌弃营逃去，汉军一石二鸟，初战大胜。费邑立即调整防守，分兵守巨里（今山东历城东）。耿弇进迫巨里，定计围城打援，调动消灭敌军主力。他命令部队多伐树木，准备攻城器械，并传令各部三日后攻城，又有意让俘虏逃回历下报告费邑。费邑至时亲领精兵3万余人来援，耿弇仅以3000人监视巨里，自率精锐主力登上高阪，乘高冲击费邑军，大胜斩邑。巨里守军惶恐逃走，耿弇收其贮积，分攻他处，连克40余营，平定济南全郡（治所在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又一次获得大胜。

平定济南郡后，耿弇继续向东进攻。时张步都于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命其弟张蓝率精锐2万守西安（今山东桓台东），各属郡太守率诸郡兵万余人守临淄（今属山东），二地相隔40里。耿弇进兵至二城之间的画中，他见西安城池虽小，却坚固难攻，且为敌精锐所在；相形之下，临淄这个有名的大都邑却较好打，于是重施声东击西之计，宣称5日后进攻西安。至期半夜，耿弇却传令诸将天明攻临淄。部下有主张攻西安的，耿弇解释说：西安有备，临淄无备，攻之必克。临淄一下，张蓝与张步的联系被切断，也必然逃走，收到击一得二之效。反之先攻西安，顿兵坚城，伤亡必多，即使攻下，张蓝还可以至临淄合兵拒我。我军深入敌境，运输困难，旬日之

间，就会不战而困，所以攻西安不妥。清晨汉军发动进攻，果然仅半日就攻下临淄。张蓝闻知大惧，率军放弃西安退回剧县。

张步虽败，然军力尚强。而耿弇兵少深入，连战疲劳，直接攻剧条件不备。耿弇乃决心依托临淄城池，诱张步来攻，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击破之。他令部队不得掳掠，声言待张步来取其辎重作为补充，以激怒张步。张步被激，又见汉军势单劳顿，不难一战而胜，便倾其所有军队号称20万来攻临淄。耿弇率部先出淄水之上，与张步将重异相遇。弇令汉军示弱佯却，退据临淄大城西南角的小城①，而以刘歆等列阵城外。张步恃强猛攻汉军，与刘歆等大战于城下，耿弇在小城王宫高台上见战斗展开，遂亲率精兵东出大城，侧面突击张步军阵。战斗中流矢射中耿弇大腿，耿弇拔刀截断箭矢，继续指挥作战，大败步军。次日晨耿弇带伤复出，大战一日，再次大败张步，“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②。耿弇预料张步困顿必退，当晚又预设伏兵于步军左、右翼。至夜张步果然撤离，汉军伏兵从两侧突然杀出，步军败逃，汉军连追八九十里，予以巨大杀伤，并收得辎重车2000余辆。耿弇进兵逼剧，张步退走平寿（今山东昌乐东南）。

此时，刘秀从鲁地赶到临淄。他鉴于张步尚有十余万众，又得到了原董宪部将苏茂之助，便指示耿弇暂缓进攻，宣言如步降将不计前嫌，又分派使者告诉张、苏二人，“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③。张步杀苏茂，至汉军投降。刘秀依诺封张步安丘侯，另将张步部下士卒全部遣归乡里，齐地平定。

平定齐地的战役，是东汉统一战争中的一次精彩的作战。是役，耿弇在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巧妙指挥，先是屡用声东击西、一石二鸟之计，连克多城；而后又反客为主，调动敌人来攻，在临

---

① 汉代临淄城是在原先齐国故城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形状为□形，小城为宫城。

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③ 《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

淄重创张步。最后刘秀再施以借刀杀人之计，一举不战而平定齐地，为此役画上了完满的句号。所以，这一战役应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张步的败降，则意味着刘秀统一关东的战争已经取得了不可动摇的胜利。

不久，建武六年(30年)正月，吴汉攻破朐城，董宪、庞萌被杀。同月，马成等将克舒城，李宪为部下士兵杀死。至此，关东各地主要的割据势力均已被消灭，刘秀统一关东的战略目标实现了。

二、争取河西、统一陇右的作战

刘秀平定关东以后，即将用兵方向转往西部。他最初的直接用兵目标本为巴蜀的公孙述，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之不得不先解决陇右的隗嚣。于是建武六年以后，汉军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统一陇右的作战。

（一）战前的策略运用

在西方的三个大的地方势力中，河西窦融"决策东向"①，效忠东汉政权。巴蜀的公孙述早已称帝成都，负险自雄，并屡屡向汉中和南郡出兵攻略，有进取天下之志。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隗嚣，一方面早在更始政权失败后就接受了汉西州大将军的名号，建武三年（27年），还上书要求东赴洛阳朝见光武，并几次阻挡了公孙述向汉中、三辅地区的进犯，算得上是刘秀平定关东时期的一个依靠力量；但另一方面，隗嚣内心并不希望东汉统一，而企图凭险割据一方，保持独立。

在这种状况下，刘秀向西用兵，必然以公孙述为主要敌人，所以建武六年东方平定伊始，刘秀即"定议图蜀"。但显然，这又有赖于妥善解决隗嚣的问题，如此才能顺利统一陇右并形成东、北两面攻蜀的态势。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为了争取隗嚣，刘秀早就对其着意笼络。隗嚣建武三年遣使来洛阳时，刘秀“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①，以后又屡派与隗嚣私交甚好的来歙、马援出使陇右，手书往来，“恩礼愈笃”②。随着东方逐渐平定，刘秀两次遣来、马二人劝隗嚣入朝，并许以高官厚禄，均为隗嚣拒绝而仅遣子入质，其“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而割据自立的面目逐渐暴露。为此，刘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努力。其一是继续笼络，对隗嚣赐书赠宝，使者不断，又封隗嚣入质的儿子隗恂为胡骑校尉、镌羌侯，尽最大可能争取陇右；其二进一步密切与窦融的关系，建武五年（29 年）授融为凉州牧，赐黄金 200 斤，“所以慰藉之甚备”③，使其从西面制约隗嚣；其三，逐渐对隗嚣施加压力，“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建武六年春，又令隗嚣从天水攻蜀，企图以此防范陇、蜀连衡，并削弱隗嚣的势力。

刘秀的这些措施，立足点还是希望争取隗嚣，然而对隗嚣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迫其就范，不再一味笼络。但隗嚣和彭宠一样，自以为“天水完富，士马最强”④，又有陇道险阻，因而不肯放弃割据立场。他对刘秀的笼络和施压极力敷衍，并以“白水险阻，栈阁绝败”⑤为由，拒不发兵攻蜀，进一步表明了与东汉的对立态度。刘秀的争取没有收到成效，因此先陇后蜀，在用兵公孙述之前，以武力解决隗嚣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二）陇坻之战和栒邑之战

建武六年（30 年）四月，刘秀至长安，派大将祭遵、耿弇、盖延、王常、马武、刘歆、刘尚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刘秀此举，为当年春天“定议图蜀”⑥的具体实施，但这种借道图国的做法，无疑也有在隗嚣拒绝伐蜀后以武力逼迫就范之意。隗嚣借故拒绝汉军通过，刘秀召集诸将商议，诸将多主张暂不进兵，仍对隗嚣实

---

①②④⑤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⑥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行羁縻之策，等待时机。独征虏将军祭遵建言："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① 刘秀遂下决心对陇作战。他以祭遵为先锋，依原计划发兵上陇。隗嚣闻讯，立即派大将王元据守上陇关口——陇坻（今陇山），伐木塞道，公开竖起叛旗，汉军攻蜀之役立即变成进攻陇上的战斗。祭遵力克陇坻，进至新关（约在今甘肃张家川西南），与耿弇等攻隗嚣，但失利撤退。隗嚣遣兵急追，汉军幸得马武率精锐骑兵为后卫，"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②，得以全师而退。这样，刘秀在西方的首要目标不能不发生改变，必须先集中力量对付隗嚣了。

汉军退还陇下，刘秀令耿弇、冯异、祭遵分别守漆县（今陕西彬县）、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和汧县（今陕西陇县南），又调吴汉等驻屯长安，以为后援，构成纵深防御，防范隗军乘胜东下图取关中。同时，刘秀派原隗嚣部下、熟习西北情形的马援率精锐骑兵 5000 人，游说隗嚣部将及羌族豪长，"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③；又联络窦融，令其从西攻金城等地，牵制隗嚣。此时隗嚣部将王元、行巡率二万余人尾随汉军而来，王元攻汧，行巡则欲先据栒邑。冯异率部急驰先至，闭城偃旗，行巡至城下，汉军突然举旗擂鼓，开城杀出。巡部惊乱溃逃，汉军追出数十里，大败其军。祭遵也在汧地打败王元。是役后，北地诸豪长耿定等均叛离隗嚣，倒向东汉。刘秀令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击败卢芳部将贾览及匈奴奥建日逐王部，攻取北地、上郡、安定三郡。窦融也在金城大败与隗嚣结盟的先零羌封何部，呼应关中汉军。至此，陇坻战后隗嚣对汉军的攻势被扼制，双方成相持态势。

建武六年冬，隗嚣遣使向公孙述称臣，联合巴蜀，共抗东汉。次年三月，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并发兵策应隗嚣。当年秋，隗

---

①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嚣以一部攻汧县，自己则亲率步骑3万攻安定，企图在北线取得战果，配合南线，攻取关中。但两路均为汉军击退，双方继续维持对峙态势。

（三）奇袭略阳，围攻西城

为了打破战争僵局，建武八年（32年）春，汉将来歙率精锐2000余人，伐山开道，秘密地自番须（今陕西陇县西北）、回中（今甘肃华亭西南）直袭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杀守将金梁，夺取该城。略阳地形险阻，为陇上要隘，距隗嚣所都冀城（今甘肃甘谷西南）只有百余里，故其城虽小，却具有重要地位。隗嚣闻讯大惊，一面急派王元、行巡、王孟、牛邯四将分据陇坻、番须口、鸡头道（今宁夏隆德东）和瓦亭（今宁夏隆德北）诸要隘，防范刘秀大军同时上陇，一面亲率所有精锐部队共数万人围攻略阳。公孙述亦派李育、田弇率兵5000，前来助攻。隗军全力攻城不克，乃"斩山筑堤，激水灌城"①，来歙与将士拼死坚守，箭矢用尽，则折屋断木以为守具，直至秋天隗军仍未攻下略阳。

闰四月，刘秀乘隗嚣"心腹已坏"、主力聚于略阳之际，大量征发关东兵员，亲自西征。部队至漆，刘秀因地势险要而犹豫未进，部将马援进见，指出"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②。刘秀大喜，说敌人在我眼中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军事沙盘的记载）遂依策数道进军，本人亲率部队至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此时窦融率河西五郡兵及羌、小月氏等胡兵共步骑数万、辎重5000余辆来会，汉军力量已占有绝对优势，并由北而南攻击各要隘。瓦亭守将牛邯投降，刘秀拜邯为太中大夫，于是隗嚣部土崩瓦解，大将13人，属县16，部队10余万降汉。隗嚣奔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遣王元入蜀求救，田弇、李育退守上邽（今甘肃天水）。刘秀以书召降隗嚣，为嚣所

①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拒，刘秀遂命吴汉、岑彭围西城，自己与耿弇、盖延围上邽。

八月，刘秀因颍川、河东发生叛乱赶回洛阳。临行他指示诸将，攻下二城，即南击巴蜀；但又提醒吴汉罢去关东郡兵，以节省粮食，避免士气受损。吴汉贪图兵多之利未遵光武所命，“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①，二城也久攻不下。汉军引河水淹西城，城墙仅剩丈余，然守军终不肯降。十一月，王元、行巡等率巴蜀援兵5000余人到达西城附近，从高地突然鼓噪大呼冲城，汉军猝不及防，被王元等突入城中，旋又与隗嚣突围返冀城。吴汉军中粮尽，无力再战，只好烧辎重退回长安。耿弇、盖延亦相随撤围而退。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诸郡复为隗嚣所据，汉军又一次无功而退。

（四）迫降隗纯，窦融归汉

建武八年汉军攻陇虽然先胜后退，但已予隗嚣沉重打击。建武九年（33年）春，兵少粮乏的隗嚣郁愤病死，部将王元、周宗立其子隗纯为王。公孙述闻讯，派赵匡、田弇率兵援纯。刘秀决定再次攻陇，令来歙、冯异、马援等将屯兵长安。他吸取西城之战的教训，先积极储集资粮，动用400余头驴子的运输力量，在接近前线的汧县积谷6万斛，为战役提供粮食保障。

八月，来歙率冯异、耿弇诸将出动，在天水击败田弇、赵匡所率蜀军，进围冀城。隗军在冀城等若干要点坚守不降，汉军近年不能攻克，大将冯异病故。建武十年八月，刘秀亲至长安和汧县，就近指挥攻纯。同月，寇恂迫降高平第一城守将高峻及所部精兵万人。十月，来歙与诸将攻破冀城西郊的要点落门聚（今甘肃武山东）。周宗、行巡等人见大势已去，挟持隗纯投降，王元逃入蜀中。刘秀将隗纯宗族徙居于洛阳以东安置，陇右隗氏势力全被清除。

此时，东汉与凉州的交通线已畅通无阻。窦融等凉州地方将领屡次上书，请求中央派官员接替职务，本人归返洛阳。刘秀从

---

①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平定公孙述的策略考虑，诏窦融等继续镇守河西。建武十三年(37年)，窦融入朝为大司空，各郡主要属官均随至洛阳，河西走廊归由王朝直接管辖。

陇右隗氏败亡后，东汉在西方的主要敌人只剩下巴蜀的公孙述，而东汉对其南北夹击的军事态势亦已形成。

三、统一巴蜀的作战

(参见附图3)

得陇望蜀。建武十年(34年)隗纯方降，刘秀即积极准备攻蜀。经过艰巨的战争，巴蜀终于为东汉统一。

(一) 双方的部署

巴蜀四面险阻，北有巴山，东有三峡，自成天地，易守难攻。陇右隗氏败灭后，东汉军进攻蜀中已是时间问题。为防汉军进攻，公孙述一方面极力安抚内部，另一方面则在军事上积极布置。他在北线以隗嚣旧将王元和领军环安守河池(今甘肃徽县西)、下辨(今甘肃成县西)，扼住天水入川孔道；南线即东方则以攻为守，以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等将数万兵出江关(今四川奉节东)，击败汉军冯骏等部，攻占巫(今四川巫山北)、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夷道(今湖北宜都)等城，控制了荆门、虎牙要隘(今湖北宜昌东南)。田戎等在长江中架设浮桥，排列木桩，在江岸修筑敌楼，并于陆路各山隘设营，严密防范汉军溯江而上，并相机攻略汉地。

与此相应，刘秀的攻蜀部署则是南北合击，水陆并进。早在建武五年(29年)汉军攻破秦丰、田戎后，刘秀就令大将军岑彭屯驻津乡(今湖北枝江)，威虏将军冯骏驻江州①，都尉田鸿驻夷

① 江州在今四川重庆。按：此时公孙述已经据有四川，故当有误。也有人认为此江州在今武昌，然距鄂西太远，似非。疑此江州为江关之误，江关在今四川奉节东。

陵，领军李玄驻夷道，为伐蜀做准备。岑彭以官爵拉拢湖湘一带的蛮夷君长，并且派人南下，争取了自新莽末年以来一直闭境自守的交趾（治所在羸㟪，今越南河内西北）、江夏（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武陵（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长沙（治所在今湖南长沙）、桂阳（治所在郴县，今湖南郴州）、零陵（治所在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苍梧（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等郡国的守、相归汉，使湖湘及以南地区均成汉地。与此同时，他积极备战，制造装备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战船数千艘①，待机入蜀。但这一时期刘秀的用兵目标还不是公孙述，故汉军在当地兵力较少而取守势，建武九年（33 年）在蜀军攻击下仅能保有津乡一线。

建武十一年（35 年）春天，刘秀令大司马吴汉、将军刘隆、臧宫、刘歆率部至南线，又征发南阳、武陵、南郡三郡士兵和桂阳、零陵、长沙的运输船卒共计 6 万余人、骑 5000 匹，齐集荆门，准备溯江大举攻蜀。刘秀鉴于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②，特令岑彭主持南线战事。在北线，刘秀则以中郎将来歙、大将军盖延、将军马成进兵天水、武都（治所在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一带，准备南下。

从兵力部署看，汉、蜀双方都将攻防的重心置于南线，这里的胜负将是决定性的。

（二）两路入蜀与迂回广都

建武十一年（35 年）闰三月，南线汉军开始攻击荆门。岑彭以重赏募得偏将鲁奇及敢死士为突击队，乘着东风大作，驾船直冲横江浮桥。诸船为欑柱之钩钩住不进，鲁奇等拼力死战，并投掷火炬，“风怒火盛，桥楼崩烧”③。岑彭乘势率大军顺风齐进，蜀军大乱，溺死数千人。蜀将王政斩任满降，程汎被俘，田戎逃归江州设防，夷陵等城均为汉军克复。岑彭留刘隆守南郡，吴汉在

① 楼船：一种船上有楼的战船，“直进”，是形容其快速。冒突露桡：一种人在船中，桨露在外，从而可以防范敌箭的战船。“冒突”，冲击。

②③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夷陵为预备队，自率臧宫、刘歆等水陆并进，长驱西入江关。汉军沿途军纪严明，深得民心，蜀将纷纷开城投降，故很快即至江州（今四川重庆）城下。

岑彭至江州后，见田戎粮储丰裕，难以速克，留将军冯骏监视江州，本人与臧宫分兵两路，攻蜀军粮食储集地平曲（今四川合川西北）。岑彭经垫江（今四川合川）北上，臧宫率降卒5万沿涪水溯行。岑彭攻破平曲，获蜀军粮米数十万石。

六月，北线汉军开始猛攻河池、下辨蜀军，旋克二城，并乘胜南进，巴蜀北面的大门亦已打开。但此时汉军主将来歙为蜀军诈降的刺客所杀，由马成接替指挥。七月，刘秀亲至长安，指挥攻蜀。北线汉军武威将军刘尚部入蜀南下。

为应付不利的战局，公孙述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以大司马延岑、弟公孙恢及吕鲔、王元等将率主力据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南）、资中（今四川资阳），以防岑彭自平曲西攻成都，或向北接应北线汉军；另遣将军侯丹领兵2万，扼守长江之险黄石滩（今四川永川）。岑彭因此亦改变进兵路线，八月，他令护军杨翕和臧宫继续溯涪水向广汉西上，并大张声势迷惑延岑等人；自己则率兵沿嘉陵江退回江州，再由此逆长江西进，袭占黄石，大败侯丹军。接着，岑彭率部日夜兼程，急行军2000余里，奔袭攻占了成都南百余里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又派精骑直进至成都以南数十里的广都。岑彭这一长距离的战役迂回，出敌不意地避开了蜀军主力，“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①，从而直抵成都城下，令公孙述大为震骇，以为神兵天降。虽然汉军孤军深入，尚无力攻取成都，但公孙述亦不能调集主力回师，消灭岑彭这一心腹之患，处于腹背受敌的更加不利的状态。

与此同时，臧宫等由涪江进至沈水（今四川射洪东南、涪江东岸的支流杨桃溪），与聚兵待战的延岑相遇。臧宫此时粮食不继，部下的巴蜀降卒多欲叛逃，处境十分不利。但战日，他突然于凌

---

①《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晨进兵，并令军中多张旗帜，登山鼓噪，继以水军与夹河的步、骑兵同时攻击。蜀军上下不明情况，恐惧溃散，斩首、溺毙者万余人，江水为之变色。延岑逃回成都，汉军沿路追击，尽获蜀军辎重，投降者十余万人，屯驻平阳乡（今四川三台）的蜀将王元亦举城而降，蜀之战场态势已经全面恶化。刘秀致书公孙述试图招降，但公孙述拒不肯降，决心继续对抗。

（三）成都决战与统一巴蜀

十月，为扭转不利局面，公孙述故伎重施，派人诈降刺杀了岑彭。汉军由监军郑兴统领，退出武阳。刘秀令吴汉接替岑彭，吴汉于十二月率南阳郡兵及弛刑募士3万人溯江而上。建武十二年(36年)正月，吴汉在岷江渔涪津(今四川乐山北)大败拦截的蜀军，进围武阳并与郑兴军会合。公孙述派女婿史兴率5000援军来救，被吴汉尽数歼灭。汉军随即攻取广都，骑兵已至成都郊区，武阳以东的诸小城邑均投降汉军。七月，江州亦被冯峻攻克，俘田戎。

蜀军虽然连败，但实力尚强。故刘秀致信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① 令汉不可轻敌躁进，而宜据广都待敌来攻，待敌疲惫后设法击破之。但九月间，吴汉自将步骑2万余人进逼成都。吴汉在距城十余里处江北扎营，令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江南20余里外，架设浮桥沟通江两岸。刘秀得到报告后大惊，痛斥吴汉不该既轻敌深入，又轻率分兵，急令吴汉速退广都。他在诏书中说，倘使蜀军以一部牵制吴汉而集中兵力攻破刘尚，则汉军两不相顾，必败无疑。刘秀诏书尚在半路，公孙述果然派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率军十余万人围攻吴汉，另派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不能救汉。吴汉与蜀军大战一日，败守营垒，形势十分不利。吴汉激励将士，使全军上下一心，人怀死志，又休兵秣马，三日不出。至第三天夜间，吴汉在营中多树旗帜，不绝烟火，而潜军渡江与刘尚会合。次日晨，不

①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知就里的谢丰等人改以少量部队攻江北汉营，自带大军攻江南汉军。吴汉亲率全部汉军迎战，至黄昏时大败蜀军，阵斩谢、袁二人，获首级5000余级，然后将主力主动撤回广都。

同月，臧宫在成都东北连克绵竹（今四川德阳北）、涪城（今四川绵阳东）、繁（今四川彭县西北）、郫（今四川郫县）四城，斩公孙恢，“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①，予蜀军以重创。随后，他于十月从北面逼近成都。吴汉此时也在成都、广都间八战八胜，进入成都郭城，形成对成都的包围。

公孙述在困顿之中，悉出宫中金钱丝帛，招募敢死士5000余人，由延岑率领出袭吴汉军决一死战。延岑在市桥（今成都西南）假立旗帜，鸣鼓挑战，吸引汉军注意力，暗中派奇兵绕于吴汉军后侧发起突袭。汉军猝不及防而大败，吴汉亦堕水险些淹死，幸得拉住马尾才脱险上岸。此时汉军仅余七日之粮，吴汉已下令准备船只撤退。部将张堪力谏吴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②。吴汉纳张堪计，故意示弱引诱公孙述出战，以求速战速决。十一月十八日，公孙述果误以为汉军力穷，又见占卜有“虏死城下”之语，乃亲率数万蜀军出城攻击吴汉，另命延岑于城北攻臧宫。从清晨到正午，吴汉仅以少部兵力抗击，蜀军虽小胜占优，但士卒已饥饿疲劳。吴汉乘机令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投入战斗，直冲述军，蜀军顿时大乱。高午在阵上刺伤公孙述，当夜述伤重而死。次日凌晨，延岑举城投降。至此，蜀地平定，刘秀统一中国的战争也基本取得了胜利。

四、卢芳的投降

在统一西部地区的作战中，对于盘踞关中及并州北部、联结

---

①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传》。

匈奴的卢芳，刘秀虽未将其视为主要作战对象，但鉴于卢芳屡次“侵苦北边”，牵制汉军在陇右、巴蜀的行动，故汉军在陇、蜀作战时也多次出兵攻芳。

建武六年（30年）冬，冯异、祭遵在栒邑、汧县击破隗嚣部将王元、行巡后，刘秀令冯异进军义渠，击破卢芳将贾览与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三郡降汉。建武九年（33年）六月，隗嚣死，吴汉、王常等率汉军5万余人攻贾览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匈奴兵南下救援，汉军不利，只好在常山（治所在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涿郡、渔阳、上谷一线采取守势，扼制匈奴及卢芳不使南下。八月，汉将杜茂、郭凉攻卢芳将尹由于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南），贾览率匈奴骑兵万余人来救，汉军败守楼烦（今山西宁武）。次年正月，吴汉再率汉军6万余人出高柳击贾览，匈奴骑兵千人前来增援，与汉军先锋王霸、陈䜣连战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下，失败退却。吴汉与杜茂会攻崞县（今山西浑源西）、繁峙，未克。此后卢芳依旧屡与匈奴及乌桓合兵扰乱北方，为患不已。

随着统一战争特别是对巴蜀作战的顺利进行，刘秀开始大力加强北部的军事力量。如调能吏郭伋等为并州牧、守，以各郡弛刑士充实边防，修建沿边亭候烽燧，实施屯田，充实与加强后勤储备与供应，修治飞狐道以通河内、河北，以便于调动军队和后勤运输等等，为消除匈奴和卢芳之患作准备。建武十二年（36年）冬，卢芳、贾览共攻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久攻不下，部众离心。次年三月，九原守将随昱与平城守将贾丹等先后投降汉军。卢芳见众叛亲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逃入匈奴，并州全归汉域。建武十五年（39年）十二月，卢芳复入高柳，汉将张堪击破随行匈奴骑兵。次年，卢芳遣使请降，刘秀立芳为代王。此后卢芳虽然再次逃亡出塞，但已不再构成割据势力和边境威胁，十余年后死于塞外。

第三节　东汉王朝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原因

刘秀从舂陵起兵，以一介书生和数千人的队伍，建立了东汉政权。而东汉之初，论地盘亦不过黄河中游部分地区，而且强敌环伺，所谓“江湖海岱，王公十数”①，却能够逐一消灭各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其主要的原因，概而言之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刘秀及东汉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拥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第二，刘秀在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和指挥；第三，各割据势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缺陷与错误。分析这些原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东汉建国前后的军事史，也是颇具历史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和正确措施

建武三年（27 年）初迫降赤眉军以后，刘秀的东汉政权与其他各地主阶级的割据集团相比，已经表现了若干突出的优势，这是东汉王朝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土地最广”②。至建武三年，刘秀据有的土地包括司隶和冀州大部及幽州、并州、兖州、荆州的部分地区，虽然只占 13 州中的较小部分，却是占地最广者。当时只有占据豫州大部并通过张步、董宪支配青、徐的刘永与之相近，其他较大割据势力如公孙述仅据益州、隗嚣据凉州一部，范围更小。同时，刘秀所据地区正是战国秦代以来传统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域，虽然在新莽末年的战乱中破坏最烈，但在政治安定的情况下逐渐恢复后，其经济优势就

①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会显示出来。建武二年，这一区域已是“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①；至建武五年，“野谷渐少，田亩益广”②，社会经济渐渐恢复。在其后的统一战争中，这一区域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粮食，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刘秀拥有三河这一经济中心地区，使之具有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保障和根据地。

“甲兵最强”③。东汉的军事力量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者。刘秀在河北击败铜马，收其部数十万，号“铜马帝”；迫降赤眉后，又获降卒及其家属20余万人。加上他原有的部队以及从辖下各郡县可征调的士卒，其直接掌握的军队可达数十万以上。即以建武三年春夏之际的历史记载来看，其时汉军同时用于作战者，北有朱浮与彭宠相持于冀北，西有冯异攻延岑等于关中，东有吴汉、杜茂等七将军围苏茂于广乐和盖延围刘永于睢阳，南有刘秀、岑彭攻邓奉、秦丰于南阳和夷陵。每部即以4万人计，其总数亦有20余万人，而实际数字肯定在此以上。如此庞大的军队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个武装集团所不能比拟的。而且，东汉军队还有两个突出的优势，即拥有吴汉、冯异、耿弇、盖延、岑彭、来歙、祭遵、邓禹、寇恂、臧宫、杜茂、马武、马援等数十位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拥有在上谷、渔阳突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锐骑兵。这两大优势更使汉军强大无比，并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所向无敌。

“号令最明”④。作为一个杰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刘秀不仅长于军事，更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从投身反莽战争开始，刘秀就着意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自己军队的制度建设；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刘秀建立百官，完善国家政权，实施论功行赏的列侯制度，选拔重用良吏，议省刑罚，解放奴婢，释放囚徒，部分减免徭役田租和赈济灾民等，力求以宽易暴，收拾

①②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③④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民心，发展生产。他还延揽郑兴、陈元、范升、桓谭、杜林、桓荣和卫宏等著名学者，立太学，祀孔子，设五经博士，兴复文教。所以比较而言，刘秀的东汉政权在当时最具政治性和“汉官威仪”，政治和军事法纪亦较严明，为他人所不及。这一优势不仅保证了刘秀在统一战争中令行禁止，实施有效的政治运作和军事指挥，而且也使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饱尝动乱、盼望安定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①，得人心者得天下，刘秀在政治上的优长，正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声威最著。除了以上几点外，由刘秀个人的特殊才能和身份所产生的巨大声誉，也应是东汉王朝的又一有利条件。刘秀本人在起兵以来，特别是昆阳之战、安集河北和平定赤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勇过人、柔仁待民的难能品质和巨大成功，使刘秀声威布于天下，即如公孙述、隗嚣这样能获一方拥戴的人物亦不能望其项背，更与刘玄、刘盆子等昏庸甚至暴虐的统治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不可低估的是，刘秀是汉朝宗室，加之从王莽时期始社会上就流行着汉室当复，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这在当时人心思汉和谶纬迷信盛行的社会条件下，更为刘秀增添了一种神圣的感召力。这又是其他割据势力包括刘永在内都不能具备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统一战争的胜利，刘秀在笼络争取一切力量归附与支持东汉，以削弱主要敌对势力方面，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刘秀对出自各个集团的人才均能委以重任，用其所长。如其主要将领，后世所谓之“云台二十八将”中，吴汉、盖延、王梁原是彭宠的部下，岑彭、来歙、王常为更始部属。又如名将马援亦出于陇西隗嚣，光武同样十分器重。东汉的文臣更是来源广泛，不分畛域，无论出身，贤能必用。刘秀一般不杀降将，对于一些有着很深私人恩怨的敌人，他也能释前嫌以争取之。像更始政权中的朱鲔等人，与刘秀有杀兄之仇，投降后刘秀不但不杀，且

① 《商君书·战法》。

均予以妥善安排。甚至对各地割据势力的头目，刘秀也每每设法争取成为同盟者，即使兵戎相见，也屡以优厚条件加以招降。像汉军兵到成都城下时，刘秀仍“必欲降之”，寄书公孙述，保证不计其刺杀爱将来歙、岑彭之过，允诺其“宗族完全”①。从刘盆子、张步、卢芳等人投降后刘秀封以侯王的事实来看，这种态度是认真的。这就更增加了刘秀及东汉政权的威望和声誉。

总之，刘秀及东汉政权在经济、军事和政治诸方面均有其突出的优势。而刘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则更加增强了东汉的力量。这些均为刘秀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时有士人评价说：“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刘秀）姓号见于图书，……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②。这较客观地概括了当时刘秀的有利地位及人心所向的情形。所以，东汉政权建立前后，包括彭宠、隗嚣、张步和窦融这样一些实力人物在内的许多力量都先后投附光武，实在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们中不少又先后反叛，但也很快因此而“羽翼外附，心膂内离”③；“游士长者，稍稍去之”，“而常有归汉意”④，导致失败，这同样不是偶然的。

二、军事指挥的正确

东汉统一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刘秀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这是东汉统一战争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刘秀在东汉统一战争中，贯彻的是

---

①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③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

④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先东后西、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一方针被历史的实际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先东后西，由近及远，明确了战争进程的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既首先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也大致做到了由易而难，一个一个收拾，先打好打之敌，再消灭强大的敌人。而各个击破，则决定了作战的基本策略，是文武两手并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集中力量消灭主要敌人。如果说，前者在客观现实的制约下几乎是必然的话，后者则突出地体现了刘秀高明的谋略思想，尤其值得称道。刘秀在东部作战时，攻王郎，团结了彭宠、刘杨、耿况、任光、邳彤，从而以弱击强，势力由小到大；攻刘永，成功地争取了西方隗嚣、窦融，并让其制约公孙述，使自己得以专心东方。而在解决西部问题时，他又在不断努力争取隗嚣的同时，要求隗嚣南攻巴蜀，"以溃其心腹"①，图取坐收渔利之效；并成功地团结了窦融对付隗氏。这些都是他贯彻上述方针的典型例证。刘秀在各地战场上也并不同时用力，每一时期着重解决一二个主要敌人，如攻刘永、董宪、张步时对彭宠取守势，且先打刘永，再打董、张；攻隗嚣、公孙述时对卢芳暂不大举出击；而陇右未得，南线汉军则不急于攻荆门蜀军，轻重缓急，张弛松紧掌握得极好，也都反映了上述思想。由于战略指挥得当，因此东汉统一战争的对象和战役虽多，却较为顺利，依次完成，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反复。

第二，高超的战役指挥。刘秀的战役指挥才能早在昆阳之战已经表露，在此后的战争中展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他善于料敌察机，因敌制胜。攻赤眉时，他告诫冯异、邓禹慎待赤眉粮尽东走，汉军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于崤函破之；平彭宠，以祭遵、刘喜与之相持，待其内变相机进取；攻董宪，他长途驰援桃城，至任城却坚壁不战，既达到援桃目的，又避免了与强大敌人决战；而当五校来救董宪，各将纷纷求战时，刘秀却令坚壁待敌粮尽而后动。事情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刘秀的正确。在许多战役中，他甚至远

①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居千里之外，却能决胜料败，洞若观火。这些都表明刘秀在战争中知彼知己，富有远见，因而总能采取适当策略打败敌军，这是刘秀最为突出的军事才能所在。

在战役指挥中出敌不意，用奇制胜，也是刘秀的用兵特点。他在更始军中及经略河北的过程中已屡以计谋胜敌，此后势力渐大，仍时出奇计破敌。洛阳战役，他以计离间朱鲔、李轶，瓦解敌军；西攻隗嚣，他命来歙劈山开道，袭据略阳，据敌腹心以策应大军上陇，便是两个精彩的谋略战例。即使有时汉军已是绝对优势，刘秀仍更愿意以巧致胜，张步的投降即其证。这里还应提到，刘秀的部将多善于用谋略致胜，几乎每次大的战役中他们都有出色的表现，像吴汉在成都之战中，冯异在峭底、栒邑之战中，耿弇在巨里、临淄之战中，以及岑彭在攻秦丰和公孙述等役中，都是如此。这应与刘秀的引导教诫是有关的，或是刘秀谋略思想熏陶的结果，如冯异峭底之役的方略为战前刘秀亲授，岑彭奔袭武阳，几乎是来歙奉命袭击略阳的翻版，就是很好的例子。汉军将帅普遍长于韬略，无疑是他们不断战胜敌军的重要原因。

第三，知人善任，扬长避短。这是刘秀军事指挥上的又一高明之处。刘秀麾下，猛将如云，各具特点，而他颇有汉高祖刘邦善于“将将”之风，总能予以适当使用。如有“大树将军”之称的冯异稳重谦和，刘秀令其专事关中，以克赤眉；马援谙熟西事，刘秀就在攻隗嚣及对羌作战中委以重任；岑彭“持军整齐，秋毫无犯”①，又在江汉一带驻扎较长，习知水军，刘秀令岑彭总率攻蜀汉军，而以大司马吴汉为其后殿；又如大将贾复勇猛轻战，刘秀便不让贾复独立带兵，常置于帐下亲自节制；而祭遵铁面无私，刘秀用为刺奸将军，执掌军法。古代兵家历来主张用兵“命在于将”，“置将不可不察”②，又有所谓“置将不善，一败涂地”③ 的

①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② 《六韬·龙韬·论将》。

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警句，刘秀深知其理。因而，汉军每次战役的前线将领，多能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灵活机动地施行正确的作战方针，勇战而用智，打出一场又一场的漂亮仗而很少失败。

三、各割据势力的弱点及其主观指导的失误

从另一角度看，刘秀之所以能够取得封建统一战争的最终胜利，与各割据者的客观局限和主观失误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客观条件方面来说，各割据势力一般都只有一隅之地，人口、经济力量和军队规模均有局限。战争过程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①，这就制约了他们同汉军对抗的能力。当时各割据者多是惟求专据方面，缺乏进取天下、逐鹿中原的精神，原因之一也就在此。而且因此，当刘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时，也就拥有了绝对或较大的优势。在东汉统一战争中不难发现，汉军兵多将广，军资充裕，遭到败仗总能很快恢复，不伤元气，而割据势力有一二次大的失利就一蹶不振。这种力量差异对战争结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更主要的则还在主观方面。各割据势力的首领人物多数不是刘姓，更无一能像刘秀那样，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而威信布于天下。他们有的是志大才疏的庸人，如刘永、公孙述；有的是见识短浅的武夫，如张步、董宪、邓奉等人；有的则是不明大势的无谋之人，如彭宠、隗嚣和卢芳。他们都热衷于称帝称王，快意一时，但很少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建树，像隗嚣那样懂得"谦恭好士"、延揽人才的已不多见，能够清明政治，重视民生，发展经济以图长远者更无一人。马援评价公孙述，说他不重人才，只知摆谱，是妄自尊大的"井底蛙耳"②，其他人其

①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实多更不如。这就使各割据势力在政治上均远逊于刘秀的东汉政权，得不到士人和百姓的广泛支持。当时有一位士人对隗嚣说："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① 这是政治差异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无法如刘秀以河北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与此相联系，各割据集团在军事上存在着许多严重失误。

首先，缺乏协同，各自为战。虽然一些割据势力相互间存在着一定的联合与支援，但总的来说他们的力量仍然是分散的。他们没有及时认识到刘秀是他们的共同威胁而合纵以抗，反而安于自守地盘，甚至如彭宠、隗嚣支持刘秀，给刘秀以各个击破的机会。等到他们意识到刘秀对自己的威胁时，再做联合努力甚至方举兵相抗，已经为时过晚，极不明智了。关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有头脑的人物看得十分清楚。公孙述的一位将领荆邯曾经对他指出：隗嚣在更始失败之际，"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他不乘此时进军关中，逐鹿中原，反而兴文偃武，依投刘秀，实属失策："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将来刘秀一旦攻陇，隗嚣必然崩溃。而隗嚣一败，蜀亦难保。所以，他向公孙述献计说："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② 荆邯的建策未必能改变历史的结局，但他指出不能让刘秀专心东方和自守待毙，而应乘刘秀还没有稳定在东方的统治，主动出兵，一争胜负，无疑是正确的，当时也犹未为晚。可是公孙述亦未采纳这一建议，其失败的命运也就注定了。而像隗嚣之所为则不仅自食苦果，而且是极其愚蠢

①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的。总之，没有有效地联合起来，打破刘秀的战略方针，从而被动等待刘秀的各个击破，是各割据势力主观指导方面最根本的失误。

其次，消极防守，战术单一。在汉军与各割据政权的历次战役中，后者的作战方式基本上均是固守要点，消极防守，缺乏谋略和战术上的灵活性。结果往往是要么为汉军所调动而被击败，要么要点被突破或绕过即无法应付，要么就是粮尽城破，遭至失败。我们很少看到他们运用伏击、奇袭、运动、断敌粮道等战术同汉军作战，这与汉军作战方式的灵活多变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在多数战役中，汉军即使在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也往往能针对敌军消极防守的弱点施用计谋，迅速转据主动。事实表明，在对汉军作战中实施谋略、积极防御而致胜是有可能的。较早如赤眉军在华阴大败邓禹、冯异，较后如彭宠在渔阳击破朱浮、邓隆，延岑在成都也几乎打败吴汉和刘尚，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战术水平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术思想及其运用的逊色，不能不导致战争的失败。

再次，麻痹轻敌，防御松懈。在历次战役中，虽然总的来说各方对刘秀这样强大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但局部优势或有利之时，因麻痹轻敌、防御松懈而失利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临淄之战，张步倚仗人多势众又在本土作战，中耿弇激将之计而失败。成都之战，吴汉在粮尽将退时示弱于敌，以求速战，公孙述因此出兵败亡。更值得注意的是，来歙袭略阳，岑彭袭黎丘、袭武阳，之所以长途穿插于敌境而未被查觉，固然与山深野旷有关，但隗嚣、秦丰和公孙述自以为关山重重，天险不可逾越而防御松懈，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些疏忽都是致命的。

第三章　东汉经济、政治概况

东汉历史，大致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中经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到和帝刘肇。在这80年中，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政治稳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是东汉政权较为兴盛、平稳的时期。后期从殇帝刘隆算起，经安帝刘祜、少帝刘懿、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到献帝刘协。在这110年中，统治阶级日渐腐败，宦官外戚轮流专政，政治黑暗，豪族地主势力膨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全面激化，是东汉王朝走向衰落、崩溃的时期。本章拟就东汉的经济、政治方面作一简要概述。

第一节　前期的经济与政治

一、东汉立国之初的社会经济形势与治国方针

东汉建国后，由于经过长期战争和自然灾害，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其中以青、徐、兖、冀和三辅地区尤为严重。

首先是物价腾贵，民用困乏，百姓饥馑。如建武三年(27年)，“黄金一斤，易豆五升”①。由于“谷价腾跃”，“米谷荒贵”，故荆州之地“百姓饥穷”；青徐之民，“弃乡流亡”；山东饥馑，“人庶相食”；三辅地区“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②所以光武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② 参见《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帝诏曰："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①。

由于经济凋敝，百姓虚耗，人口锐减，"十有二存"②。或"海内人民得而可数，裁十二、三"③。按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数字不过5900多万，到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初，仅存十之二三，或"十有二存"，则人口数量减少了十分之七八，其总数至多不过1500万人了。"户口耗少"的原因，除死于"战乱"之外，死于"饥饿"或"疾疫"者也有不少。如："会稽大疫，死者数万"④，"百姓饥饿，人庶相食"⑤，这都是例证。

在天灾人祸的动乱年代，由于生命难保，人们致力"耕稼"的情况少了。东汉刚刚立国之时，仍因"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据载：当时有位名叫淳于恭的人，"常独立田耕，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⑥ 可见，"莫事农桑"是当时百姓中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田畴荒废"，"大地萧条"。而田畴不耕，百姓挨饿，二者恶性循环。

当然，在一些边境地区，由于战争破坏较少，情况稍有例外，如巴蜀、交趾等地。但从总体来看，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东汉政权的创始者刘秀，面对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并由此带来的社会恶果，无不历历在目。严酷的现实和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使刘秀不得不"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制订出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的施政方针。

刘秀是汉高祖的"九世之孙"⑦。为治理战乱、灾荒所造成的创伤，他继承祖宗"家法"，基本上采取了和西汉初期相近似的统

①④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注引《帝王世纪》。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应劭《汉官》。

⑤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⑥ 《后汉书》卷三十九《淳于恭传》。

⑦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治办法。如果说有所不同，西汉初期是奉行“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而东汉之初，则遵守“仁政”原则，采取“柔道”为政的方针。在文献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建武十七年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刘秀）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①。刘秀“以柔道行之”的话，虽是在笑语中脱口而出，但这并非戏言，它确是当时“治理天下”的总体方针。

何谓“柔”？许慎《说文解字》曰：“柔，木曲直也，从木柔声。”柔可作柔软、怀柔、柔和等多种解释。古人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②“见小曰明，守柔曰强”③。“柔能制胜，弱能制强。”④刘秀的“柔道”，大概就是从这些理论出发的。这里既有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成分。光武帝刘秀是试图通过实行逸政、德政，采取柔软或柔和政策，来让社会恢复生机，最终达到稳定统治之目的的。

考诸史实，东汉初期以“柔道”治国的方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务用安静，让百姓宽息。史称：“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⑤这里说的“务用安静”，同西汉初年实行的“与民休息”是一致的。由于东汉初年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与西汉初年大体相似，故在对人民的统治方面，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例如：当时一反王莽之苛政，“议省刑法”，多次颁发“轻刑诏令”；田租由原来的“什一之税”，改为“三十税一，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易·系辞上》。

③ 《老子·五十二章》。

④ 《三略·上略》。

⑤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如旧制”；赈济贫乏，招抚流亡，要求二千石官吏“勉加循抚，无令失职”。① 同时，光武帝还以身示范，提倡节俭。他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綵，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②，以风范社会。“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这有利于当时封建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同时也使百姓宽息，有了个喘息机会。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其二是偃武修文，退功臣而进文吏。史称：“初，（光武）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③当时，虽然从各个方面强化集权统治，但重视“精兵简政”，省职裁军，不仅精简地方军，整编中央军，而且非有紧急，一般不主动用兵。由于光武帝主张“偃武修文”，当时尽管对大大小小的功臣，“优以宽科，完其封禄”。④ 但对他们一般“不任以吏职”，并未让他们参预政治。开国功臣二三十人，“诸侯百余”，而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仅有邓禹、李通、贾复等人而已，而多数功臣则“委而勿用”。相反，对“文士”，特别是那些过去不仕王莽的儒流名士，乃广为收罗，委以重任。对“晓习故事，多所匡益”的文吏，亲接下问，授官任职，恩宠优加。这种“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⑤的政策，既有助于防止功臣干政、权重跋扈，又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使集权政治得以加强。

“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于光武、明、章几代，似乎一以贯之，遵循不革。史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⑥ 到明帝永平后期，据说还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

①③⑤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④ 《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⑥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三十，牛羊被野”① 的景象。但“柔道”方针的实质，仍在“明慎政体，总揽权纲”②，即稳定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集权统治。

二、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各项措施

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形势，东汉前期，在“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下，曾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

（一）招抚流亡，赈济贫乏

招抚流亡，这是封建国家驱民“地著”，保持现有人户的一项重要政策。东汉之初，为使现存的人户稳定下来，首先，对“屯聚山泽”的起义群众采取了招抚政策。如建武六年（30年）诏曰：“……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③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④当时对各地的“盗”、“贼”或“谋反”者，多以怀柔、招抚为尚，且往往“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⑤。值得注意的是，为招抚流亡，还多次颁布诏令，对归籍流民“赐爵”。如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赐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爵一级。”又明帝永平三年（60年）、永平十二年（69年）、永平十八年（75年）等，皆有此类诏令。赐爵令的内容，或曰“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或曰“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或曰“赐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级”。⑥诏令行文基本一致。所赐之爵，皆为一级。这些招抚政策的实行，使“屯聚山泽”和流亡在外的农民，纷纷回到了原籍地著，“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⑦。收到了比单纯暴力镇压较好的效果。

在招抚流亡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赈济贫乏。如建武二十九年（53年）诏：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⑧

①④⑥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②③⑤⑦⑧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据载，从建武三年至和帝元兴元年（27～105年），类似的诏令达16次以上。对贫困户，除救济生活品外，还贷给生产资料。如“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① 而贫民有田业，但匮乏不能自农者，则“贷种粮”②。这些举措，虽然是统治者为了控制人户，不让编户脱籍，以保证国家的赋役来源，但它毕竟能使直接生产者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

（二）释放、禁止虐杀奴婢

奴婢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严重问题。王莽之时，虽曾改“奴婢”为“私属”，试图对之加以解决，但由于措施不力，反而加深了当时社会危机。

光武帝即位后，出自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接连多次颁布诏令，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例如：建武二年（26年）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建武六年（30年）诏曰：“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年）诏曰：“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建武十一年（35年）二月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八月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建武十二年（36年）诏曰：“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建武十三年（37年）诏曰：“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四年（38年）诏曰：“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③

在光武帝刘秀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所颁布的这些诏令中，释放奴婢的令文有6道；禁止虐杀奴婢，提高奴婢地位的令文有3

①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②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一上、下《光武帝纪》。

道。不仅次数多，而且法令规定得极为严格。所谓“敢拘执，论如律”，“其杀奴婢，不得减罪”，皆可说明当时用法之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秀每次宣布释放之奴婢，都有具体的范围和政策。如从年限上看，多是王莽当政后沦为奴婢者；从对象看，主要是原来就具有吏民身份的人因贫困而“嫁妻卖子”、或因“被略（掠）”而为奴婢的人。从地区看，主要是释放青、徐、凉、益等州的奴婢，即刘秀政敌区的奴婢。这说明“刘秀释放奴婢是同其政治、军事斗争相配合的，主要目的在于瓦解敌人、安定刚刚收复的地区。”① 所以，刘秀并非无条件地释放所有奴婢。事实上，终东汉之世，奴婢数量仍有不少，所谓“徒附万计，奴婢千群”就是例证。但刘秀的上述诏令，与王莽之时的政策相比，毕竟更为具体、有力，因而能使部分奴婢得到释免、提高地位。这对缓和阶级矛盾，增加社会劳动力，恢复当时经济、发展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假民、赋民公田，减省租赋

两汉时期尚存不少“公田”，包括苑囿园池、山林川泽和未垦荒地。为解决破产农民的无地问题，自西汉以来，就曾实行过“假民公田”、“赋民公田”的制度，东汉时期尤为显著。

“假田”的“假”字，古人有多种解释。李贤说：“假，犹租赁。”② 李斐说：“假”，即“主假赁见官田与民”。③ 可见，所谓“假民公田”，就是封建国家将拥有的“公田”，即国有土地，租借给无地贫民进行生产的意思。但国家对其一般要征收假税。不收假税是特殊情况下的优惠。例如：永元五年（93年）二月诏曰：“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同年九月又诏：“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④ 东

① 林剑鸣著：《秦汉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②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

③ 《汉书》卷九《元帝纪》。

④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汉政府假给人民的这些苑囿、林圃、陂池，在开始的二三年内，或有灾之年，不向生产者收税，过了几年后，于通常情况下则要征收“假税”。其税率往往因时、因地之不同而高低不一。在“假田”制下，假田民实际上已成为租种国有土地的佃农。但它也解决了部分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

“假民公田”之外，当时还实行过“赋民公田”或“赐民公田”。“赋”和“假”有别。但“赋”与“赐”乃同义，都是指赋予、赐给的意思。所谓“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就是将公田（国有土地）赋给农民进行生产。如明帝永平九年（66年）诏曰：“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永平十三年（70年）诏：“滨渠下田，赋予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① 章帝建初元年（76年）诏：“以上林池籞田赋与贫人。”② 这些赋予或赐给“贫人”的“公田”，与前面说的“假民公田”有别。封建国家采取这些措施，虽然都是为了“尽地力”、解困乏，赈济贫民，驱民地著。但“假田制”下的假田民，对公田只是“租赁”，不具备所有权，一般不得买卖；而“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则不然，当国家一旦对贫民赋、赐公田之后，就意味着贫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公田也就转化成为私有了。所以，“赋民公田”、“赐民公田”下的“民”，对国家交纳的不是“假税”，而是“田租”（土地税）。这种政策最初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国家把部分荒地赋（赐）给贫民，可以增加国家的租税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丧失土地的贫民得到了安置，对破产农民是一种扶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③ 但到后来，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豪族地主常常依势侵夺，兼并国家赋予贫民之田。所以诏令明文规定：“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当时，封建国家除着眼于解决贫困农户的部分生产资料即土

---

①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③ 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第110～120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地问题外，还多次下诏减、免租赋。例如：建武二十二年（46年）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① 中元二年（57年），"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② 永平五年（62年）诏曰："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③此类诏令还有不少，不必一一列举。当时减免租赋的范围、条件和减免幅度，因情况不同而异。减免的原因，或出于帝乡，或出于战争，或出于灾荒、重农等。就地区来说，有属局部地区的减免，也有属全国性的减免。减免幅度，有的只减免田租、刍税，有的则田租、刍租、口算、甚至逋租同时减免。减免年限，通常是一年，明帝永平五年在元氏县减免田租、更赋"六岁"，这当属特殊优惠。封建国家减免租赋的政策，有值得称道之处。尽管统治者所颁布的条文与实际执行有差距，同时受益较大者是地主阶级，但上述政策对减轻农民的租赋负担，发展社会生产毕竟有一定的好处。

（四）检核田亩，丈量土地

莽末汉初，土地关系非常混乱。史云："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④ 田亩不实，民数不周，这对初建的东汉政权当然不利。光武帝刘秀为掌握全国土地及人口的准确数据，并以之确定赋役的分配，于建武十五年（39年）元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⑤。这在历史上一般谓之"度田"。这实际上是从增加或保证国家的租税、赋役来源，对全国土地和户口进行清理、核实的一个举措。但由此却引起了极大的阻力。

首先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地主反对度田。所谓"郡国大姓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③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④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

⑤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及兵长”、“处处并起”。[①] 豪族地主“田宅逾制，不可为准”[②]。他们千方百计抵制清查土地，凭借其财势和度田官吏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特别是“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③]对开展度田的阻力尤大。且地方上执行政策的刺史、太守，也站在豪族地主的立场，而不认真贯彻“度田令”。如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④] 又云：“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⑤]由于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优饶豪右，侵凌下民，结果民怨沸腾，也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对。

刘秀面对度田不实问题，曾采取了些措施。一方面，“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对营私弄弊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⑥]。同时，也惩办了一些南阳豪族。如：刘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⑦]。另一方面，对反对度田而暴动的群众采取“自相纠擿”政策，“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⑧]只要能使“变乱”或反抗平定下去了就行。但刘秀这些措施，不仅未能使豪族地主俯首，而且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起来反抗，不少“郡国大姓”竟和“群盗”一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⑨]。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好让步，检核田亩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史实表明，刘秀“度田”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和王莽的“王田制”一样，都因触犯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而最终宣告破产。然而，光武帝刘秀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度田，不论其出发点如何，

---

①⑥⑧⑨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③⑤⑦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

④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注引《东观纪》。

仍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

（五）选用良吏，发展生产

为有效地推行政令，东汉前期很重视官吏的选任。刘秀在位期间，“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不仅亲自掌握朝廷百官的选举，而且对在职官吏要求甚严，以至“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①。

由于当时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选用官吏，因此，涌现出了一批忠于职守、发展生产的良吏。这方面，有不少史实可征。例如：邓晨任汝南太守时，“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② 郭伋为渔阳太守，“在职五年，户口增倍”③。李忠迁丹阳太守，“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④。杜诗迁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⑤。又王景迁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⑥。重视发展生产的官吏，还有一些，不必赘举。

东汉前期，重视生产的一些地方官形成两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移风易俗，教民农桑。除前引李忠外，还有茨充、卫飒等。如据记载：“南阳茨充代（卫）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结果“民得利益焉”⑦。其二是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如任延为武威太守时，“西河旧少水雨泽，（延）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⑧。何敞迁汝南太守时，“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⑨。由于这些官吏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

② 《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

③ 《后汉书》卷三十一《郭伋传》。

④ 《后汉书》卷二十一《李忠传》。

⑤ 《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

⑥ 《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景传》。

⑦ 《后汉书》卷七十六《卫飒传》。

⑧ 《后汉书》卷七十六《任延传》。

⑨ 《后汉书》卷四十三《何敞传》。

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方面，留下了业绩，所以不时得到民众称誉，或为之“刻石颂功”。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为恢复与发展生产，其政策的着重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解决土地问题；二是解决劳动力问题；三是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四是轻徭薄赋、赈济贫乏。还有一点，就是精兵简政，提倡节约。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史实表明，光武后期的国家财政就有了明显好转，到明帝时，人口增加，岁比登稔，牛羊被野，粟斛三十，百姓殷富等，不是偶然的。

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

鉴于西汉后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而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在光武、明、章几代，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的干政

君臣关系，特别是皇帝与功臣的关系，这在封建社会中至为重要。历史上，每一位开国皇帝往往都会遇到对功臣如何安置、协调的问题。对此，东汉光武帝刘秀吸收了西汉之初的教训，采取了和刘邦迥然不同的办法。

光武帝即位后，首先注意的是妥善安置功臣问题。他当时对大小功臣，均“优以宽科，完其封禄”①。如：建武元年（25年），分封功臣30余人为列侯。次年又封20余人为列侯。至光武末年，共分封功臣侯约130余人（其中8人随父）。光武帝对功臣不仅分封，而且对其高秩厚禄，宠赏优加。但当东汉统治基本稳定之后，却对功臣采取严加限制措施。其表现有二：（1）“不欲功臣拥众京师”②，使拥

① 《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有重兵的功臣远离京城。如令王霸长期处在边境，仅在上谷就有20余年。祭肜则“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①。此外，对领有重兵的冯异、岑彭、耿弇等人亦然，都是长期外处边地。据载：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②这不单是为了继续发挥武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使这些拥有重兵的将领远离统治中心，消弭反侧，即使为患，也不致发生全国性影响。(2)“不以功臣任职”③。史称：“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④东汉光武之世，大多数功臣，只是以列侯奉朝请，实际参政者很少，唯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侯”而已。不少功臣虽“英恣茂绩”，但“委而勿用”。可见，对他们防患之严。

对宗室诸王也曾严加控制。在实行家天下的封建专制下，宗室势力过大与皇帝个人独裁是存在着矛盾的。鉴于西汉的历史教训，光武帝及其继承者，一开始就对之当作大事来抓。为防止宗室诸王作乱，当时重申西汉“阿附藩王法”旧制⑤。严禁王子、诸王交通宾客，蓄养羽翼。例如：建武二十八年（52年），寿光侯刘鲤，得幸于沛王刘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⑥ 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刘英，因“交通宾客，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端”，被人告官，“逆谋不轨”，次年刘英自杀。接着，大兴“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⑦经过这样多次摧折之后，诸侯王交结宾客之风稍有收敛，他们“不

---

① 《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

②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③④ 《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⑥⑦ 《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敢复与亲故通”了。[1]北海王刘睦，在“中兴初，禁网尚阔，……千里交结。”但到“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2]由此可见，东汉之初，特别是明、章二帝时期，对诸侯王的控制已有一定成效。

至于外戚，在东汉前期，虽然经济待遇方面对其比较优容：“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3] 但当时明确规定：“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4] 即外戚不得干预政事。如：马援，跟随刘秀东征西讨，屡立大功，在东汉之初的功臣中，他是一位显赫有名的大将。但因其身为外戚，而不得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数中，所谓“以椒房之故，独不及援。”目的在于缩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又尚书闰章“精晓旧典”，且久任尚书之职，照例应委以重任。然因其二妹为贵人，故在明帝一朝，他久久不得升迁。这也是防止外戚势力扩大而威胁皇权的缘故。诸多事例说明，在光武、明、章几代，由于皇权较为强大，对外戚限制较严，他们难得高官显位。同时，不少外戚、后族，一般也能知守富贵而避权势。如刘秀的母舅樊宏“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5] 但自和帝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皇权和外戚的矛盾斗争便突出起来了。

（二）限制三公权力，提高尚书台地位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早已存在。西汉武帝之时，为限制相权，已有中、外朝之分。王莽时，将“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也是旨在“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6]。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八《冯衍传》。

②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③ 《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

④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⑤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

⑥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

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将“三公”的权力予以限制或裁削。仲长统就曾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①刘秀为推行他的集权政治，三公之职几乎架空，政事多由尚书台处理。从此，国家大权便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了。其时的三公，除太尉外，司空“掌水土事”，已不负责监察，而只管水土工程；司徒“掌人民事”，只管民政，权力较西汉时的丞相小得多。所以，范晔说：“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② 陈忠也说：“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③当时的现实及范、陈的言论，都表明自光武之后，三公的职权发生了变化。东汉的三公，虚有其名，并无多大的实权了，国家政事，已归台阁。

尚书一职，原仅负责公文的发放，资浅任轻。至成帝时起用士人，职权渐重。光武即位后，为集中皇权，进一步扩大尚书台组织，加大尚书台的职权。当时尚书台组织机构是：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他们的职权范围大致是：三公曹——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吏曹——主管选举、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管郡国二千石事；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苑之事；南、北主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事。④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忠传》。

④ 东汉“六曹”问题，史界说法不一。翦伯赞认为：“六曹”：一曰三公曹，二曰吏曹，三曰民曹，四曰二千石曹，五曰南主客曹，六曰北主客曹（《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8 页），这里采用林剑鸣《秦汉史》的观点，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5 页。

从尚书台的组织和分工状况可以看出，它比西汉武帝之前更完备了。其组织之庞大与职权之广泛，皆前所未有。尚书台俨然成了一个小朝廷。此后许多政务几乎不再经过"三公"管理了。尚书台成了真正的决策、发号施令机关。尤其值得注意者：一是他们权势颇重。尚书"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① "总领纲纪，无所不统。"② 口含天宪，权尊势重。二是他们地位高。每有朝会，尚书令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皆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不仅如此，而且三公、列卿、大夫、五营校尉行道中，若遇尚书令、仆射等，皆得"回车豫避"③。至于三公或大将军，只有经过皇帝恩准，加"录尚书事"头衔，方能参与中枢决策。在一般情况，三公只是受命办事而已。使用品级不高的尚书掌握机要，便于皇帝指挥，这是当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大重要措施。

（三）加强监察，控制地方势力

官吏之权集中于皇帝，地方之权集中于中央，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特征。为对百官进行有效的监督，强化集权统治，东汉立国之后也采取了些措施。

首先是复置司隶校尉。其属官主要有"从事"和"假佐"两类。据载："从事十二人"，包括都官从事、功曹从事、别驾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以及郡国从事等。"假佐二十五人"，包括主簿、门亭长、门功曹书佐等等。④ 从官秩看，"司隶校尉"是比二千石，"从事"秩仅百石，"假佐"当属斗食之吏，级别并不高。但司隶校尉既是京师官，又是地方官。"务举大纲，简略苛细"⑤，职权范围很大，有权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州部事务。除"三公之外，无所不纠"。当时外戚、权臣若有横行不法者，往往由司隶

---

① 《文献通考·职官》。

②③ 《汉官仪》卷上。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⑤ 《后汉书》卷二十七《宣秉传》。

校尉责斥之。如鲍永为司隶校尉时，光武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①。这说明司隶校尉对监察百官、控制权臣确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东汉之初还复置刺史。其属吏和司隶校尉差不多，皆有从事史和假佐等。刺史之设，开始时在于监察地方郡国，所察对象主要是二千石长吏及强宗豪右，东汉刺史的职权范围比西汉时扩大。主要表现在，刺史有选举与劾奏之权。有权"岁举茂才"。有权劾奏地方官吏。如前引《朱浮传》："旧制（西汉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②即是证明。东汉前期的刺史之设，对加强中央集权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后人永瑢曾经指出："汉代专重郡守，其临郡国之上者，惟十三刺史……唯刺史以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职专举刺，八月行部，录囚徒，考殿最，岁尽入奏，所荐得为九卿，所劾辄从黜罢。是刺史一官，固兼有今日司道之任也。"③最初，刺史没有行政权，仅负监察责任，是加强皇权的有力工具。但到东汉后期，刺史便发展为地方长官，以致形成一方的割据势力，而削弱皇权了。这应是刺史职权扩张的结果。

四、周边各民族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东汉前期，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虽然有时出现过矛盾和斗争，但相互关系也较密切，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有进一步发展。

（一）匈奴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王莽代汉后，由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汉以来中央政权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九《鲍永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三《朱浮传》。

③ 《历代职官表》。

与匈奴所形成的臣属关系导致破裂，直到东汉之初，汉、匈关系仍未得到改善。匈奴贵族利用刘秀政权刚建，军事力量薄弱的形势，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势力日益强盛。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骚扰北方边境。当时，东汉统治者由于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征战连年，“天下疲弊”，无暇北顾，只好采取以防为主的策略，对匈奴“赂遗金币，以通旧好”，① 但匈奴仍然“钞暴日增”，使“北边无复宁岁”，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当匈奴贵族向中原侵扰之际，其内部正孕育着危机。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单于舆死，匈奴贵族中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加之蒙古草原，“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②。匈奴日逐王比，遂派使者诣河西太守处请求“内附”。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大人拥立为南单于，并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塞外，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北匈奴）”③。刘秀接受了比的归附。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向东汉政府“奉藩称臣”后，建武二十六年（50年），东汉遣中郎将段彬等到南匈奴进行监护，安辑南匈奴部众。随后又让他们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汉朝戍守。东汉政府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给南匈奴，供给之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

南匈奴同东汉政府的这种臣属关系，解除了东汉政府北边的忧患，使原先撤销的边缘郡县得以重新恢复，已经内迁的居民得以返回故居，这对汉廷北方边境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有积极作用。在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也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先进文化，这对其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而汉、匈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斗争，加速了民族融合，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南匈奴归汉后，北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多次被南匈奴击败，“却地千里”。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数次要求与汉“和亲”。刘秀没有采纳，只是实行羁縻政策，厚加赏赐，玺书往来，但不遣使者。后来虽曾一度答应北匈奴的“合市”要求，但也为时不长。至永平八年（65年），北匈奴进攻河西诸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故自明帝以后，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对北匈奴进行了多次反击。

（二）班超出使西域

王莽统治时期，西域分割为55个小国，匈奴奴隶主贵族乘虚而入，控制了西域各地。但这时西域的莎车比较强大，它联合南道一些小国与匈奴抗衡，并保护了汉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建国后，于建武五年（29年），莎车王康檄书河西，询问中原情况。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以后，莎车、鄯善、车师前王、焉耆等国，皆先后遣使朝贡，或派送侍子，请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光武帝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莎车王贤见汉都护不出，于是攻破鄯善，又杀龟兹王。鄯善王上书东汉王朝，再次请派都护，并说：“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光武帝回答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样，鄯善、车师、龟兹等国先后投降匈奴。不久，西域诸国便大部分被匈奴所控制。

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县西）等地，在那里设置农官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在西域设立都护及戊己校尉，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并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长安扶风人，班彪之子，班固之弟。他自幼即羡慕张骞出使的故事。当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的任务是，联络西域各地君长，打通被北匈奴役属的南道诸国，使他们归附东汉。所以，由

他所率领的吏士 36 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决心，乘夜袭杀北匈奴使者，使鄯善为之震服。以后又至于阗，于阗王亦杀北匈奴使者而归附东汉。第二年春，即永平十七年（74 年），班超西至疏勒，逐龟兹所立的疏勒王，立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人大悦。经过班超的这一番卓绝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诸国基本排除，东汉王朝在那里的威望又重振了起来，而班超也获得了西域人民的广泛支持。

永平十八年（75 年），汉明帝死，窦固率军东返，北匈奴又乘机反扑。在匈奴贵族的支持下，焉耆等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并联合龟兹、姑墨进攻疏勒。这时班超孤立无援，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东汉政府诏令班超东归。但疏勒、于阗等国不愿班超离开，坚决挽留，“互抱超马脚不得行”①。见此情况，班超“又欲遂本志”，只好途中返回疏勒，继续联合于阗、疏勒等国，通好乌孙，重新稳定了南道形势。

东汉势力在西域的增长，引起了大月氏的不安。和帝永元二年（90 年），其副王谢率领 7 万大军越过葱岭进攻疏勒。但班超预计大月氏军队，数千里远道行军，粮运难于接继，遂坚决固守。几十天后，当大月氏军粮断绝之时，班超便遣兵阻击大月氏往龟兹的求粮使者，迫使大月氏求和。翌年，龟兹、姑墨、温宿皆投降东汉。这时，东汉政府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今新疆库车西南），坐镇北道；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永元六年（94 年），班超发鄯善等八国兵 7 万余人，讨伐危须、焉耆、尉犁，于是西域 50 余国“皆内属焉”。②至永元十四年（102 年）八月，班超返回洛阳，九月病死。享年 71 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 30 余年，经过他勇敢机智和艰苦的努力，恢复了西域同中原王朝的关系，重新打开了西域南、北二道的通路。这对加强东汉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至安帝延光二年（123 年），东

①②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

汉政府又以班超的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继续抵御匈奴的侵扰，经营西域。

班勇到西域后，发动鄯善、龟兹之兵，先后击败了匈奴伊蠡王等，取得了节节胜利。但这时腐败的东汉政权，竟以其出兵误期的罪名，将他召还下狱。从此，东汉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日渐削弱。但西域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汉族同西域人民的友好往来，却并未中断。

（三）乌桓、鲜卑等东北各族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东汉时期，东北地区有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和挹娄等族。

乌桓（乌丸）属东胡的分支，其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也种植耐寒旱的青穄和东穑等，手工业有锻造兵器和毛织、刺绣等。风俗习惯，贵少贱老，重女轻男。乌桓的社会制度，西汉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①“大人”由民主选举产生，不世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生产，不相役使。西汉初，乌桓为匈奴所破，受匈奴贵族奴役，每年要向它进贡牲畜，过期不送则掳妻子为奴。汉武帝时，汉军击破匈奴左部，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塞外，并设乌桓校尉管理。政治经济与中原联系更加密切。东汉初年，乌桓与匈奴联兵攻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3000骑兵出五阮关（今河北涞源东）击乌桓，失利。次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对其袭击，匈奴北徙。乌桓仰慕先进的汉文化，表示愿意臣服汉朝。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众多首领到洛阳拜见光武帝刘秀。东汉政府封其首领80余人为侯王，并允许他们居住塞内缘边各郡，充当东汉侦察匈奴、鲜卑的耳目。东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设置护乌桓校尉。乌桓在与汉人先进文化的接触中，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首领始为世

①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袭。东汉末年，乌桓参与军阀混战，曹操打败乌桓后，把他们迁入内地，以后逐渐与汉族融合。

鲜卑，位居乌桓东部，也属东胡一支。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基本相同，盛产貂、豽、鼲子等名贵毛皮。西汉时，鲜卑与汉朝往来不多。东汉初年，南、北匈奴互相攻战，匈奴力量损耗，鲜卑乘胜强盛起来。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归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建武三十年（54年），乌桓大人于仇愤至洛阳朝贡，刘秀封他为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祭肜以首功行赏的办法引诱鲜卑击杀北匈奴，于是鲜卑各邑落大人争杀北匈奴人，持首级到辽东领赏。为此，青、徐二州提供赏金，每年达二亿七千万。和帝时，北匈奴被东汉打败，向西远徙。于是鲜卑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匈奴人相融合，势力更为强盛。此后，鲜卑与东汉的关系极不正常，时通好时寇边，时降时反，到东汉末年，鲜卑力量乃走向衰落。

夫余，地处嫩江平原，宜种五谷，盛产良马，农业与畜牧业均有一定发展。东汉时夫余已进入奴隶社会，建有国家机构。国王之下，设置各种官吏，还有城栅、宫室、监狱和军队，刑法残酷，一人犯罪，全家没为奴隶。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至汉朝贡献礼物，光武帝回赠厚礼答谢，表示通好。此后一直保持友好交往，联系密切。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夫余王派嗣子（太子）尉仇台至洛阳朝贡，安帝赐尉仇台印绶和金綵。总之，东汉一朝同夫余联系频繁，大大促进了汉文化对夫余的影响。

挹娄，位居夫余东北，东临大海。挹娄人常依山居穴。种植五谷，纺织麻布，饲养牛、马、猪，缝猪皮为衣。善用弓矢射猎，勇猛能战。东汉时它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挹娄人虽然政治上臣属于夫余，受夫余贵族的控制，但也保持其相对的独立地位。

高句丽，居住在鸭绿江沿岸的山谷之中。少有农田，饮食节俭，但好修宫室。高句丽分为五部：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国王先出于消奴部，后由桂娄部所代。各部设职分官，有相加、对庐、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

衣先人等职。但没有监狱，有罪者经过评议，重的处死，没入妻子为奴。风俗喜歌舞，信鬼神，尚厚葬。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置玄菟郡，曾以高句丽为县，属玄菟郡管辖。东汉建武八年（32 年），高句丽派遣使臣向汉朝贡，光武帝封高句丽为王。后来，高句丽虽然对东汉边郡有过干扰，但基本上关系正常，能保持友好往来。

（四）羌族、“蛮”族和西南夷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羌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其居住地区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南到巴蜀（四川）西部，西北至西域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羌人初以放牧为业，居无常所，逐水草迁徙。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被秦拘执为奴，后来逃回被推为本部族首领，开始营田种植，发展畜牧，人口增加，分为众多部落。西汉时，羌人曾臣服于匈奴，并常与其联兵南下攻汉。匈奴受挫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交通。汉遣李息等率兵击败羌人，设护羌校尉进行统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等郡，与汉人杂处。他们苦于官吏和豪强的侵夺，时常起而反抗。东汉初年，刘秀在削平割据陇西的隗嚣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先后将羌族各部落迁到陇西、天水、扶风等郡。为防止羌族联合反抗，东汉政权又在大、小榆谷、龙耆（今青海境内）等地建立屯田区，实行驻军屯垦。故在一段时间内，汉、羌之间基本上处于“平静”状态。但到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羌人“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① 对其剥削压迫日渐加重，故激起了羌人的多次武装反抗。

“蛮”族，主要包括槃瓠部、廪君部、板楯部等部族。他们散居在我国南方的两湖、两广和四川等地。

槃瓠部，居于湖南境内。因所居地区不同，分称为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长沙“蛮”等。西汉置郡县以来，槃瓠诸“蛮”要向国家交纳赋税。规定：“岁令大人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名曰“賨布”。因而时有反抗。①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 年），武陵“蛮”精夫（首领）相单程等人起兵反抗。汉廷先后派刘尚、李嵩、马援等率兵镇压，战争持续三年之久，汉军伤亡者众。最后相单程等因饥困交迫，归降汉军。东汉设官管辖后，又由于“郡县徭税失平”，②官吏贪残，故常常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

廪君部，散居于四川东部和湖北地区。因地区之别，分为溇山“蛮”、沔中“蛮”、巫“蛮”、江夏“蛮”等。廪君“蛮”本有巴、樊、瞫、相、郑五姓。其中巴氏子务相被立为廪君。战国末年，秦惠王并巴中后，民户每年“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③这一赋制，两汉沿袭未改。东汉时，因“郡税收不均”，廪君诸“蛮”经常起兵反抗，彼伏此起。

板楯部，居住在陕西汉中和四川北部地区。相传秦昭王时白虎伤人为害，秦人无可奈何，后来巴郡“蛮”人用竹弩射杀白虎，立了大功。昭襄王与蛮人刻石为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④楚汉相争时，协助刘邦夺取关中。战事结束以后，刘邦遣送“蛮”人，规定板楯“蛮”君长免除租赋以示优待，其余民户，岁入賨钱四十文。东汉时期，因“赋役沉重”，故桓帝之后，他们经常起兵反抗，直到中平五年(188 年)还响应了巴郡黄巾的起义斗争。

西南夷，主要有滇人、哀牢人、邛都人、筰都人等。他们居住在四川南部和云贵地区。

滇人，生活在云南滇池一带。特产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⑤ 西汉时设益州郡。王莽时栋蚕、若豆率众起兵，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前往镇压而失败。东汉时，于建武十八年（42 年）栋蚕、若豆又率诸部众反叛。打败益州太守繁胜。次年，东汉政府派刘尚率兵镇压，至第三年正月才得平息。章帝元和年间（84～

---

①②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

⑤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87 年)，王追为益州太守时，在那里兴建学校，移风易俗，向滇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但灵帝之后，滇人对东汉多有反抗。

哀牢人，生活在云南西部的哀牢山地区。出产铜、铁、铅、锡等金属，还有各种珍宝和奇禽异兽，又种植五谷、桑麻，生产精美的丝织物和麻织品。西汉以前未与中原交通。建武二十七年(51 年)，哀牢王贤栗率二千余户诣越嶲太守要求内属，光武封贤栗为君长。明帝永平十二年 (69 年)，哀牢王柳貌率部内属，共五万余户、五十五万余人。东汉设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东北）管理哀牢人。从此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

邛都人，居住在四川南部。种五谷，产良马。更始二年 (24 年)，邛人长贵率人杀郡守，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并投降公孙述。公孙述失败后，光武帝刘秀依长贵旧号封他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 (38 年)，长贵遣使诣洛阳上计，光武帝又授他越嶲太守印绶。明帝时巴郡人张翕为越嶲太守，为政清平，深得邛都夷人的拥护。此后与内地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

筰都人，地居四川中部偏南，在越嶲郡之北。文化比较落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 (前 111) 设沈黎郡。天汉年间并入蜀郡。东汉明帝时期，朱辅任益州刺史，采用怀柔诸夷的政策，传播汉人先进文化，得到诸夷拥护，纷纷要求内属。但东汉后期，他们同中原人民遥相呼应，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此外，西南夷中，还有冉駹人、白马氐。他们在东汉时期，与中原地区也都有一定的联系。

第二节　后期的经济与政治

一、地主制经济发展与豪族势力的扩张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地主制经济在质的方面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在量的方面，如土地私有制程度、各类地主势力

的消长变化等，东汉后期和它以前相比，却存在着差异。

（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和田庄的兴起

由于东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措施，在尔后的百余年间，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农业生产技术有进步，水利灌溉事业有成就，耕地面积扩大，江南地区得到开发。同时，冶金、纺织、造纸、漆器等手工业也有显著发展。

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东汉一代，尤其是它的后期，大土地私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贵族、官僚、豪商三位一体，对土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例如：梁冀占有的土地，"西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界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南极鲁阳（今河南鲁山），北达河淇（即黄河与淇水，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一带）。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①。阳翟黄纲依仗程夫人的权力，不仅肆意掠夺民田，并且进而"求占山泽，以自营植"，②居然强占国有土地中的山林川泽。至于宦官，更是肆意掠夺农民的土地，桓帝时，"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④ 灵帝时，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⑤ 又"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⑥

在贵族、官僚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大商人也对土地进行了巧偷豪夺。尽管东汉政权曾经下令"禁民二业"⑦，商者不农。但

①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一《刘翊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侯览传》。

④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刘祐传》。

⑤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⑥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典略》。

⑦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

事实上，不仅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商业；而且商人拥有了大批资产后，同样把资本投向土地，成为商人地主。所以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①可见，到东汉后期，地主阶级或豪商地主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占有的土地数量也相当惊人！

当时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土地所有权由分散进一步向集中方向转移。土地买卖程度深化，人们"买卖由己"②，有依法行使处理土地的权力，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参予兼并土地的人比以前广泛，既有贵族、官僚、也有豪商等。这些人兼并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通过买卖占有大量土地；二是仗势强占，依靠政治势力或特权地位，掠夺农民的土地；三是通过高利贷，将资本投向土地，兼并农人；四是欺诈枉法，公开掠占民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纷纷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或沦为地主阶级的依附农民。

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土地高度集中，一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地主，除掌握大批土地外，又都拥有大量奴婢、宾客和徒附等，于是他们遂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

田庄是中国地主经济的早期结构形式，它萌芽于西汉末叶。据载：南阳大地主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他拥有的土地，"东西十里，南北五里"，有"田土三百余顷"。所起的庐舍，"皆有重堂高阁"。樊氏所经营的产业，除农业、手工业、高利贷外，还制造兵弩器械，达到了"有求必给"、"闭门成市"的程度。③可以说，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田庄。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② 荀悦：《申鉴·时事》。

③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列传》、《水经注·比水注》。

田庄在东汉之时已经不是个别的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东汉的画像砖、画像石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住宅、楼阁、院落、粮仓、磨房、猪圈、马车和农夫等，还可以看到在住宅附近的大片稻田、山林、池塘、盐井、渠道，还有收获、舂米、酿酒、纺织等图像。这些内容，虽然不能说都是属于田庄的情况，但其中有不少部分当是大地主田庄生产、生活的反映。

东汉大地主集中土地后，多以田庄的形式经营。史称：当时"百夫之豪，州以千计。"①"百夫之豪"即役使百家的豪族大地主，也就是指田庄主。东汉不仅田庄数量多，而且规模也很大。如梁冀的田庄，"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广开苑囿"，"多拓林苑"。表明范围甚广。仲长统对这时的田庄生活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他说："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钩游鲤，弋高鸿。讽对舞雩之下，泳归高堂之上……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②于此，不仅告诉我们田庄的规模及生产状况，也形象地反映了田庄主的生活情况。

崔寔的《四民月令》一书，是地主经营田庄的家历，若从该书记录的内容看，东汉田庄的经济体系已达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多种经营、自给自足。大地主田庄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等。这种综合经营的产品，除有余部分用于交换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田庄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按每年的季节有计划地进行着，且做了精心安排。自然经济色彩很浓。

其二，聚族而居，实行宗法统治。田庄主往往以自己的宗族

---

①②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为核心，纠集亲戚、宗人聚族而居。田庄中除了奴婢、徒附外，多数是田庄主的同宗、同姓。田庄主既是田庄的统治核心，又是宗族的族长。“宗人”要听从族长的指使，逢年过节，要向族长（田庄主）“称觞举寿”；平时要向族长“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又因为“同宗”而不“同财”，故每当青黄不接之时，为了维持穷人的生计，族长对贫苦的“同宗”，也往往做些赈济。所谓“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力图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来掩盖鲜血淋淋的阶级对立。

其三，设警守备，拥有私家武装。田庄主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安全，严加守卫，设有私家武装。据《四民月令》：每年农闲二月，要“顺阳习射，以备不虞”。三月“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这种私家武装的构成人员，既有同宗的依附农民，也有豪族子弟，是田庄的别动队。其任务是保卫田庄，镇压农民的反抗。

此外，田庄主为培养后继力量，对其子弟的教育也很重视。规定幼童入小学，成童以后入大学。学习课目有《孝经》、《论语》乃至全部《五经》。田庄中的这种文化教育当和京师的太学、地方上的郡国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

东汉大地主田庄是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地主田庄到东汉后期，便逐渐成为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

（二）豪族势力扩张及其对当时政局的影响

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豪族地主。

豪族地主的名称很多。在文献中常见的有豪强、豪大家、世族、名族、冠族、著姓、族姓等。这种种称谓，就其阶级内涵来说，都是豪族地主，或豪强大族。

豪族地主这个地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似在西汉一代尚未形成。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支持和纵容，大土地私有制

发展，这就为豪族地主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条件。与此同时，东汉统治者又大兴学校，提倡儒学、传授儒家经典，官吏多从儒生士人中选拔，并重视被选士人的“门第”、“阀阅”。所以，大大地助长了豪族地主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势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豪族地主疯狂兼并，广占田业。史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① 如前引的樊重、梁冀、黄纲等便是例证。还有洛阳、南阳一带的外戚、宗族也都是“田宅逾制”的豪强地主。如前所述，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徒附后，皆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田庄。

其次是垄断仕途，控制政权。豪族地主通常控制选举，世代为官。例如：刘恺于安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子刘茂桓帝时为司空。② 李郃安帝时为司空，顺帝时为司徒，子李固冲帝时为太尉。③ 种嵩桓帝时为司徒，子种拂献帝时为司空。④ 这些是二代为“三公”的家族。不仅如此，当时还出现了三代为“公”、四代为“公”，累世宠贵的情况。汝南袁氏这个家族，从袁安任司空开始，他的儿子袁敞安帝时为司空，孙袁汤桓帝时为司空、司徒、太尉，曾孙袁逢灵帝时为司空。“四代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⑤ 又弘农杨氏家族，从杨震于安帝时为司徒开始，其儿子杨秉桓帝时为太尉，孙杨赐灵帝时为司空、司徒，曾孙杨彪灵帝时为司空、司徒。⑥ 这也是四代相继登上了“三公”的高位，为“海内所瞻”。所以，《后汉纪》卷二十二称：“此时公辅者，或树私恩为子孙计，其后累世致公卿。”仲长统说：当时“选士而论族姓阀阅”⑦。王符说：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般传》。

③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④ 《后汉书》卷五十六《种嵩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及附传》、《三国志·袁绍传》。

⑥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

⑦ 《全后汉文·仲长统·昌言下》。

当时用人“以钱多为贤”，“阀阅为前”。① 东汉由于以阀阅作为选官标准，所以豪族地主子孙相继，代代为官，牢固控制着政权。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若要当官，谋求政治出路，就得投靠于豪族大家的门下，为其效劳，这就是“门生”。又凡曾做过三公、刺史等官吏的属僚，或曾经为他们荐举过的人，称为“故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② 可见，豪族地主的政治势力越大，门生、故吏越多；而门生、故吏越多，则其政治势力也就越大。到东汉后期，豪族地主的政治势力，已发展到了恶性膨胀。

第三，世代传经，崇尚儒学。东汉豪族地主大都崇儒通经，而且世代传经。他们往往以某种儒家经典为家学，不仅重视对其子弟教育，而且收徒讲学。赵翼说：“古人习一业，则累相传，数十百年不坠”。如伏氏自伏生以后，世传经学。桓氏自桓荣以后，以明经笃行，一家三代，皆以明经为帝王师，③ 而受到尊敬。当时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所传授的弟子“常数百人”。豪族地主多崇儒通经。当然，崇儒者也非都是豪族地主。不过豪族地主通过儒学，左右社会舆论则为常有。

综上所述，豪族地主是身份性地主，即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东汉后期已为恶性膨胀。他们往往以政治特权为手段，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以封建田庄为基础，以祖传家学相标榜，世代相传，雄踞一方。豪族地主虽然对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富有掠夺性和割据性，所以，对东汉后期的政局，尤其是对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二、宦官与外戚、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曾一度起了稳定封建统治秩

---

① 《潜夫论》考绩、交际篇。

② 《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③ 《二十二史劄记》卷五。

序的作用。但到东汉后期，由于豪族势力扩张，幼主无能，国运趋于衰败之时，这个强化了的专制集权体制，却又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

（一）外戚与宦官擅权

东汉的皇帝除光武、明、章三帝之外，几乎都是幼主继位，母后临朝。因而外戚与宦官之间引起了一连串的政潮。

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总揽朝政大权。窦宪诸弟如笃、景、环皆居亲要之职，大批窦氏党徒充满朝廷。朝臣上下莫不附之，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由于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和帝深居禁中无法亲接“内外臣僚”，所与居者唯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以“专谋禁中”。① 于永元四年（92年），年满14岁的和帝任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从此宦官参与政事，也是宦官与外戚斗争的开始。

元兴元年（105年），和帝死后，安帝13岁即位。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任车骑将军辅政，后转大将军，弟悝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皆领宫廷禁军。在这期间，提倡经学，深好儒术。邓骘为人，也还谦虚节俭，虽以外戚辅政，但能推进天下贤达，起用名士何熙、杨震、朱宠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至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死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诬邓氏曾谋废立，于是邓氏宗族皆被免官，邓骘自杀。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了宦官与外戚共同执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孙程等19人，拥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诛杀阎氏兄弟。孙程等19人皆封为侯，宦官的政治势力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便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梁商、梁冀父子为大将军辅政。

---

①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2岁）、质（8岁）、桓（15岁）三帝。这时，外戚梁冀的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因触犯了他的忌讳，皆被诬陷下狱而死。据载：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显赫一时。梁冀前后执政20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① 当时，朝廷大小政事，都由他裁定；官吏的升迁，皆得先到他家里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郡县每年朝贡进献异物，要先将上等的贡品送给梁冀，然后方许献给皇帝。梁冀不仅专横暴虐，而且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贪得无厌。他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者至十多人；他还掠取人民作奴婢，多到数千人，名之曰“自卖人”。梁冀当政之时，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加了十几倍，大批人民死于官府的箠楚之下。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联合宦官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人合谋，杀死梁冀及其家属。梁氏亲党被罪免者300余人，朝廷为之一空。事后查封梁冀的家财，达30余万万，等于当时全国半年的租税收入。

外戚梁冀势力被诛后，宦官独揽政权。单超等5人，因灭梁氏之功，桓帝对他们同日封侯，世称之“五侯”。单超早死，四侯专横。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专威作福，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民不堪命”。② 他们到处掠夺土地，中常侍侯览，在家乡山阳郡夺取民田118顷，住宅381所。他们还在洛阳“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③模仿

① 《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

②③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16区，且都有楼阁、池圹和苑囿。可见，此时的宦官贪侈骄纵，秉势擅权，已成为横行一时的权阉。

自和帝到桓、灵之末，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在专制集权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易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以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皆力图拥立幼弱的君主，以利实现自己的干政。同时，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之机，排除异己，鱼肉百姓。① 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及其对朝政的专擅，使得东汉的政治日趋走向腐朽和黑暗。

（二）清议与党锢之祸

在宦官的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至桓灵时期，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史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② 宦官专权，弄虚作假，权门请托，贿赂公行，破坏选举制度，使士人的正常入仕途径受到阻隔，引起了一些正直开明的官僚士大夫强烈不满。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改革政治，许多忧国之士怀着"澄清天下"的志向，纷纷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当时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于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反对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宦官势力展开斗争。"清议"便是其中斗争的一项重要手段。

清议原是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评论。是东汉士大夫品评人物的一种制度。关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影响察举和征辟。因此，很受人尊重。郭泰就是这样一个品评人物的名士，人物经他品评，即成定论，往往"先言后论，众皆服之"。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也善于品评人物，"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

① 参见《中国百科全书·秦汉史》，第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① 东汉后期，面对昏暗的朝政，士大夫和太学生便以传统的清议为武器，臧否人物，抨击朝政，以此造成反对宦官的社会舆论。如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② 当时太学是京师洛阳清议的中心，郡国学诸生，也同太学清议相呼应。由于清议“危言深论，不隐豪强”，故“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③对在朝的官吏尤其是宦官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太学生的“清议”、品评行动，受到了一些开明官员如李膺、陈蕃、王畅等人的积极支持。太学生称赞他们说："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④官僚士大夫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势力，而且在政治上对那些为非作歹的宦官实行打击。例如：李膺任河南尹时，力主惩办“臧罪狼藉”的宦官爪牙羊元群。李膺后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当他听到李膺的威严后，惧罪逃还京师，住在张让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带领吏卒往张让家中搜查，将躲藏在房舍合柱中的张朔抓获，“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李膺在办理此案过程中，不仅排除了宦官张让的阻挠，甚至当桓帝亲自出面说情时，李膺仍然毫不退让，义正严辞地给予回驳，有力地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⑤官僚士大夫中，主持正义、敢于打击宦官的事例还有不少。如北海相杜密在位期间，凡“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刘祐迁河东太守后，“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⑥又延熹六年（163 年）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奏免了一大批宦官党羽，其人数自将军、牧守以下达五十有余。所有这些，既鼓舞了太学生的斗志，更挫灭了宦官权阉的威风。

官僚士大夫支持太学生，并依法惩处宦官的举措，引起了宦

---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

②③④⑤⑥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官集团的恐慌。在宦官们看来，太学生和官僚士大夫是“党人”，他们立场相同，都是自己的反对派。于是窥测时机，向党人进行疯狂反扑，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年）。这一年，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河内巫师张成，预知朝廷将颁布大赦令“遂教子杀人”。李膺得知后，不顾赦令已经颁发，还是依法“督促收捕”，“竟案杀之”。此事再次激起了宦官对党人的仇恨，他们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震怒，于是“班下郡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寔等200余名党人，被先后下狱。当时不仅在京师洛阳抓人，还派员到各地，对那些逃遁不获的党人，“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各地的宦官爪牙，趁机乱捕无辜，全国处于恐怖之中。次年，由于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要求赦免党人，桓帝才将200余名党人“赦归田里”予以释放，但“禁锢终身”，党人从此不许做官①。

朝野正直之士和党人，虽然遭到废放与禁锢，但他们并没有为此所吓倒，反而激发了党人的反抗情绪，党人的声望更加提高。名震京师的郭林宗自洛阳归还乡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众宾为之送行。②在反对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党人中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如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番向、王章为“八厨”。这些享有不同雅号的人，是人们对他们德行、品格的形象概括。他们之中，有的为“一世所宗”；有的是“人之英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②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

杰”；有的“能以德行引人”；有的乃“以财救人”。[1] 这些人，在拯救社会，反对宦官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尚情操和英勇卓绝的精神。随着反宦斗争的深入与规模越来越大，宦官集团十分害怕，所以又举起屠刀镇压党人，再次制造了“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是发生在建宁二年（169年），当窦武、陈蕃谋诛宦官失败而被杀害之后，这年秋天，宦官侯览又使人上书，诬告张俭，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于是，灵帝下诏逮捕张俭。这时，宦官大长秋曹节火上加油，趁此建议有司将以前的党人统统捕捉。结果虞放、杜密、李膺、朱寓、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在对党人的镇压中，许多无辜者也被诛连受害，“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2]宦官集团的镇压，并没有使正义之士屈服，他们继续斗争。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贴出抨击宦官专权的传单。文曰：“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3] 宦官发现后，又一次大捕党人，“四出逐捕，及太学游士，系千余人”。[4]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竟被送入“槐里狱掠杀之”。同时“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5]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太学生和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当时是进步的，有它的正义性。因此，每当党人遭到逮捕、禁锢时，赢得了社会的同情。但从根本上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主要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故这仍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黄巾起义发生后，为了共同镇压革命人民，而宣布解散“党锢”便说明了这一点。

---

①②⑤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③④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崩溃。

（一）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

东汉自安帝以降，由于官吏暴虐统治，民族政策失当，故周边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矛盾日趋走向尖锐。

羌族这一古老民族勇敢、善战。他们对东汉政府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了不归顺的姿态。至东汉后期，汉、羌矛盾日益尖锐。汉廷与羌人的战争，不仅发生的频度高，而且持续时间长，战争空间广，具有此伏彼起的特点。例如：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人征西域，引起羌人的“相聚反抗”。[1]他们久居郡县，没有武器，用竹木当戈矛，用木板当盾牌，屡次打败东汉军队。顺帝阳嘉三年（134 年），钟羌寇陇西、汉阳。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反抗不断。[2] 桓帝时，羌人反抗更为激烈。延熹二年（159 年），烧当等八种羌人反叛，“寇陇右”。三年（160 年）勒姐羌围允街。四年五月，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同年七月，先零沈氏羌与诸种，“寇并、凉二州”，覆没官方营坞，“寇患转盛”。五年三、四月，沈氏羌“寇张掖、酒泉”。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等地。[3] 直至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金城的义从羌及陇西的先零羌仍在坚持反抗斗争。

面对羌人的反抗斗争，东汉统治者进行了疯狂的武力镇压。规模较大者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武力镇压开始于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于元初五年（118 年）结束，共进行了 12 年。第二次武力镇压开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冲帝永嘉元年（145 年）结束，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及卷八十七《西羌传》。

共进行了6年。第三次武力镇压开始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结束,持续了11年。东汉在镇压羌人反抗的过程中,大量征发汉人当兵,赋役征剥日渐加重。"白骨相望于野",不少边民死徙流亡,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有童谣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穫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① 东汉政府对羌人的长期战争,不仅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载:三次大规模平息羌患,第一次用费二百四十余亿,第二次八十余亿,第三次四十四亿。② 由于"军旅之费"增多,导致"府帑空竭"。

除羌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也在东汉后期纷纷进行了反抗斗争。这方面事例甚多,主要如:安帝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人,"以郡县徭税失平",联合充中诸种2000余人反抗。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率领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武陵蛮占山等4000人反叛,他们拘执县令,屯结深山,斗争持续3年之久。永寿三年,长沙蛮又进行反叛,他们屯聚益阳,抄掠郡县,众至万余人,起义坚持到延熹三年(160年)才被平息下去。在南方的"蛮人"反抗过程中,北方的鲜卑等族也相继反抗。如桓帝时,鲜卑"兵马甚盛",不断侵扰东汉边郡,多次打败汉军。至灵帝时,鲜卑又大规模地攻掠幽、并二州,使"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③。熹平六年(177年),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汉、匈3万骑兵,分三路并击鲜卑,大败而回,汉军几乎全军覆灭。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后期的民族矛盾是相当尖锐激烈的。引起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缘由,当然出自多个方面。但根本原因是东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部分官吏暴虐统治所造成的。灵帝时,贾琮出任交趾刺史后,曾"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

① 《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及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 《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

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① 又汉中上计程包也说：“板楯七姓……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然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② 可见，东汉统治者置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及生活习俗于不顾，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加之暴吏苛残，赋役征调过重，引起他们反抗是必然的了。

（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东汉后期，积累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民族矛盾尖锐，而且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

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扩张，封建大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苦难日深。加上长期对外战争，费用增多，赋役征调频仍，“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公赋既重，私敛又深。”③ 人弃农桑，死亡流离者众，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

特别自安、顺以后，政治腐败达于极顶。延熹四年（161年），桓帝公开卖官鬻爵。当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④ 到灵帝时期，更为腐败，卖官还标明价格。当时，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而且规定：“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⑤ 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也就成了合法行为。所以，官吏一到任，便大肆搜刮。如盖升为南阳太守时，“臧数亿以上”⑥，就是一例。诸多事实表明，东汉时的很多令长守相，皆“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

---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

④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⑥ 《后汉书》卷五十一《桥玄传》。

法令，侵冤小民"①。在吏治腐败，豺狼当道的情况下，官风十分不正，"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已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以各种名目剥削农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② 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政治昏暗，官吏的横征暴敛，敲榨勒索，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水旱、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贫困得"无以自存"，便四处流亡。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③其时，"流亡万数"，"百姓弃业，流亡不绝"的记载，屡见史册。更有甚者，在饥饿、流亡的驱迫下，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如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延熹九年（166年），豫州发生饥荒，十有四五的人被饿死，"至有灭户者"④。在灵帝时，就连夫妻也有相食的情况。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⑤ 人民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便纷纷起来反抗斗争。

查考史籍，东汉后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从安帝到灵帝的80余年中，农民起义未曾间断。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张伯路等率3000余人起义，自称"将军"，转战于沿海九郡，次年，与平原刘文河、周文光所率起义军会合，攻破厌次城等，"杀长吏，烧官寺，出系囚"⑥。顺帝永建四年（129年），青、冀、扬州接连发生农民起义。接着，又有曾旌、章河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攻打会稽等地，纵横49县。⑦ 汉安元年（142年），广陵（今江苏扬

---

① 王符：《潜夫论·考绩》。

②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③④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三十八《法雄传》。

⑦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及卷六《顺帝纪》。

州）人张婴等领导数万人起义，杀刺史，攻打于扬、徐之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① 建康元年（144年），在扬、徐地区有范容、周生领导的起义；在九江有徐凤、马勉等起义，攻打城邑，战败官军。② 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华孟组织起义，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③ 起义范围涉及九江、丹阳、庐江、历阳等地，同官军开展了激烈斗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太山琅邪公孙举等，聚众3万余人起义，攻打青、兖、徐三州。汉廷派兵讨之，连年不能克。④ 延熹三年（160年）有太山琅邪人劳丙、叔孙无忌联合起义，杀都尉侯章，攻没琅邪属县，“州郡不能讨”。⑤ 延熹五年（162年），长沙、零陵人民聚合七八千人起义，自称“将军”，进攻桂阳、苍梧、交趾等地，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官军不能克”。⑥ 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会稽许昭起义句章，自称“大将军”，众以万数，攻破城邑，斗争持续3年之久。⑦ 总之，东汉后期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从幽州到岭南，从凉州到沿海，到处都有农民反抗斗争发生，关东和沿海地区最为突出。不仅起义的地区广，次数多，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十人、上千人到数万人。有的起义军，还与羌、蛮等少数民族联合共同反抗东汉王朝。当时流行着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⑧ 这里，极其生动地反映了东汉农民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纲传》及卷六《顺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八《滕抚传》及卷六《顺帝纪》。

③ 《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④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及卷七《桓帝纪》。

⑤ 《后汉书》卷八十二《赵彦传》、卷四十一《第五伦传》及卷七《桓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⑦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⑧ 《全后汉文》卷四十六。

还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的这些农民起义，其首领往往自称“将军”、“皇帝”，或称“黄帝”、“黑帝”，或称“大王”、“真人”等，表示了他们与东汉王朝势不两立。这些分散的小股农民起义，虽然在东汉国家军队和豪族武装的镇压下先后失败了，但是起义群众的斗争烈火越来越旺，公元 184 年的黄巾大起义，就是此前多次起义的继续和总汇。

第四章　东汉的军制与边防

军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受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东汉建国后，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在军制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论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或是兵役制度、领导体制等，皆与西汉、王莽时期大异其趣。就是边防政策和边防设施，也和前制有程度不同的区别。东汉军制的改革举措，曾一度拱卫了封建政权，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但由于大量募兵，罢除"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加之后期政治腐败，边备松弛，"外兵不练，内兵不精"，故每战常负，战斗力很差。本章着重就东汉军制的发展演变及边防诸问题，分目做些必要的探讨。

第一节　军事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一、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

军事领导体制，包括最高军事统帅，中央和各级地方军事机关的设置、职权及相互关系等制度。这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功能作用，历来就为统治者所高度重视。东汉建国后，在总结前制经验的基础上，出于强化皇权，实现"长治久安"之目的，在调整国家行政机构的同时，将军事领导体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这里，仅就当时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演变和监军诸问题作些论列。

（一）中央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升降

东汉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与西汉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变化。在当时，中央仍设有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太尉和京师宿卫军

系统的光禄勋、卫尉与执金吾等，但它们的职权范围却有程度不同的变化。

1、太尉

太尉一官，在西汉之时带有皇帝军事顾问的性质，备咨询。它虽有分管全国军事行政的职责，然实际权力有限，太尉的属官也不多。同时，太尉时置时废，大凡有事乃置，事毕则省。皇帝对太尉的态度，既尊重，又戒备。一般不轻易委任，严防太尉权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武帝以后，改太尉为大司马，其性质也不过是个加官，冠于某将军之前，空有名号，并无多大军政实权。具有实权者，则为中朝的“大将军领尚书事”。

东汉光武帝复改“大司马”为“太尉”后，情况为之一变。首先，太尉在“三公”之中地位最尊。它名列司徒、司空之首。若太尉出缺，则司徒、司空依次晋升。明帝永平十八年(75 年)，司空牟融迁为太尉，章帝建初元年(76 年)，司徒鲍显迁为太尉，这便是例证。东汉“三公”制下的太尉，其地位既尊于当时的司徒、司空，更尊于西汉丞相制下的太尉。它实际上带有西汉丞相的性质。

东汉太尉的职权范围已相对扩大。除军事上备咨询外，还担负着综理军政的重任。据《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净之。”① 由于太尉的职权扩大，其属官也较西汉之时增多。当时的太尉设有“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其下领掾史属 24 人，分东西各曹办事：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此外，还有令史及御属 23 人：御属，主为公御；阁下令

---

①《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史，主阁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①]从东汉太尉的职掌及其宠大机构来看，它不仅议政、主兵，还分管吏治、司法、祠祀、农桑、盐铁、货币、交通等事，后世“六部”之事，几乎均已涉及，它远非西汉的太尉所能比。东汉太尉的职权之所以加重，其主要原因仍在于“录尚书事”。史称：“后汉建武二十七年（51年），复旧名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②]如司徒徐防，“延平元年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③]本初元年（146年），质帝崩，胡广“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④]在当时，太尉有权“谏诤”、“议政”，有权“定策”皇帝的人选等，这都与录尚书事有关。但要说明的是，为防止“三公”声望超过皇帝所能容忍的限度，在一般情况下，则“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前章说到，东汉“三公”中的司徒、司空权限已大大缩小，太尉虽然不同于司徒、司空，职权较西汉时加重，然实际上的军事行政权却在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尚书台可参与国防战略决策，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不过，总的来说，在东汉“三公”权力下降的总趋势中，太尉的地位相对来说却有所上升。

再者，东汉太尉的人选也与西汉有所不同。它不单是兵戎出身的武将，而是多为文吏。如牟融以“少博学，……名称州里”，而迁太尉。[⑤]桓焉以“明经笃行，有名称”，而代王龚为太尉。[⑥]杨震“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为太尉。[⑦]同时，在东汉的几十位太尉中，尽管有些人政绩较为突出，如赵熹、张酺、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② 《通典》卷二十。

③ 《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四《胡广传》。

⑤ 《后汉书》卷二十六《牟融传》。

⑥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焉传》。

⑦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

杨震、庞参等，能“内典宿卫，外干宰相”，对时弊有所匡正。然而其时多数为太尉者，乃皆是庸碌无能之辈。如明帝时的太尉虞延，“位历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①] 章帝时邓彪代鲍宣为太尉，“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政。”[②] 这表明，东汉太尉的人选，在素质上有逊于西汉。据粗略统计，从建武二十七年至献帝建安年间，有史可查的50多任太尉中，除了由于病罢、死免者外，大多数都是因失职、犯罪而被斥免的。他们中或因“灾异而免”，或“考狱不实免”，或“坐阿党免”，或“以寇贼免”，或“蛮夷反叛免”，如此等等。这方面的实例殊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③] 这种情况，在西汉是未曾有过的。

2、光禄勋、卫尉和执金吾

光禄勋是宫内总管。因其身居禁中，接近皇帝，地位至为重要。东汉光禄勋的属官大体与西汉相同，主要有大夫、郎、谒者、期门、羽林以及光禄掾、光禄主事和主簿等。[④] 光禄勋之下有五官中郎将，主五官郎，比二千石；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宿卫，比二千石；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比二千石；左中郎将，主左署郎，比二千石；右中郎将，主右署郎，比二千石；羽林左监，主羽林左骑，六百石；羽林右监，主羽林右骑，六百石。此外，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谒者仆射等。与西汉的主要不同是减少了车、户、骑三将；同时，各种郎官的人员，也多选自“孝廉”和“能笺奏”者，在品德和才能方面已有更高的要求。

卫尉统辖卫士，保卫宫门。它和光禄勋有明显分工：“殿外门署属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勋”。[⑤] 二者分工合作，互为表里。若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三《虞延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四《邓彪传》。

③ 参见熊方撰：《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补后汉书表》，诸以敦：《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钱大昭：《后汉书补表》。

④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及《王嘉传》、《张安世传》。

⑤ 《汉旧仪》卷上。

从组织机构看，其前后的变化也大。如西汉卫尉的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①]而东汉卫尉的属官则不然，当时省去了旅贲令。主要设：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秩六百石；南宫卫士令，掌南宫卫士，六百石；北宫卫士令，掌北宫卫士，六百石；左右都候，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六百石；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对卫尉系统的机构已作了较大的精简和调整。

至于执金吾，从机构到职掌，前后也有显著变化。西汉武帝时，执金吾的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武库、都船有三丞，中垒有两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初，寺互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②]东汉执金吾的属官则明显减少。除保留武库令外，以上属官皆省。当时省去了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③]实际上，式道、左右中候也省掉了。这些属官的职权往往由他官代替，"不复属执金吾"了。还要指出的是，光武帝裁并北军，省中垒后，并胡骑入长水，并虎贲入射声，将北军"八校"整编为北军"五校"。设置北军中候一人监领，统宿卫，守卫京师。同时，西汉执金吾的职掌是"徼循京师"、"禁备盗贼"、"掌金革以御非常"。[④]而东汉的执金吾则主要担负消防任务，所谓"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不与他政。仅存的武库令只"主兵器"。[⑤]在职权范围上，前后变化甚大。

（二）地方军事机构及其主官职权的升降

东汉地方军的建制和地方行政制度相适应，基本是郡、县二级制，到东汉末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在当时的军事领导体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太守兵权加重和末年刺史，州牧的崛起。

---

①②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③⑤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④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及注。

在实行郡县制下的西汉时期，郡的长官是太守，总管军民诸政。分治军事行政的长官是都尉。太守在郡虽也主兵，但若地方上有重要军情，一般得由中央任命将帅出征，太守不得擅自发兵。如太守发兵，必须要有皇帝的“虎符”。① 否则，将以“乏军兴”论罪，而受到惩罚。此制，一直到西汉末年，都未曾有变。

但东汉，自刘秀罢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② 后，太守的职权乃逐渐扩大。其表现之一是，地方凭虎符发兵之制已渐破坏。如杜诗上疏说：“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闻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寇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③ 由此表明，当时已经“未有虎符之信”，凭虎符发兵之制，没有严格执行了。所以才提出要恢复西汉旧制，以堵绝奸伪。

其二是东汉太守，已逐渐拥有发兵、领兵之权。太守集军政权力于一身，既保留了西汉“主民”之权，又是郡兵的实际统帅。地方上凡有军情，已多由太守领兵征讨。如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建光元年(121 年)，“秽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殁。”④ 顺帝永和二年(137 年)，“武陵蛮叛，围充县……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⑤ 太守不仅领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而且领兵镇压农民起义的事也很多。如冲帝永嘉元年(145 年)，“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⑥ 桓帝延熹八年(165 年)，桂阳胡兰、朱盖等起义，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⑦ 类似记载，不胜

---

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注引应劭曰。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 《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

④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⑤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⑥ 《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⑦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校举。仅据《后汉书》诸帝纪的不完全统计，东汉一朝，内郡太守领兵征讨之事有16次，边郡太守达24次以上，这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见于各传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不计其数。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割据的形成，这与太守、州牧兵权加重不无相关。

除太守外，在地方上刺史、州牧的军权也逐渐扩张。西汉时，在监御史基础上建置起来的刺史，秩六百石，以中央定的“六条问事”，专职监察地方郡太守及豪强地主的不法行为。起初没有固定的治所和属官。这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势力的一个举措。自西汉后期起，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出自当时政治需要，刺史或更名州牧，或复名刺史，职权逐渐扩大，秩级增至二千石，州牧居然可以“自选精兵”。①

东汉立国之初，刘秀出于统一战争需要，继续赋予州牧以统兵作战之权，战后又从限制地方军权角度出发，于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② 明确其监察职责而削弱它的军权。但到东汉后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加剧，刺史、州牧的军权又日趋上升，且演变成为“内视民事，外领军马”的地方军政长官，突出表现在：

1、它已有固定的治所和属吏。其属吏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部从事史等。

2、亲予庶政，刺史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如安帝诏曰：“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③ 又顺帝诏曰：“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④ 此类事例，多见史册。

3、拥有领兵之权。地方有事，刺史领兵征讨。如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张伯路、刘文河等起义，“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

---

①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④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史法雄讨破之。”① 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白马羌人进攻广汉属国，“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② 这些都是刺史主兵的实例。

此外，刺史还可以自行募兵。在大量实行募兵的东汉时期，地方军政长官临时招募兵员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光和元年（178年），朱儁任交州刺史时，就曾在本郡“简募家兵”5000余人。③ 这些招募而来的“州兵”，实际上已成为地方上的常备军。

刺史、州牧之设，本来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但到东汉后期，它却成了战乱的根源之一。

（三）监军制的发展和完善

监军是中央集权制在军事制度中的重要体现。为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自西汉武帝时起，对监军问题便日趋重视。当时设有监北军使者及建章监（羽林监）等，分别监领北军和建章营骑。不过，西汉时代尚未形成完整的监军体制。

至王莽时期，监军乃逐渐走向了制度化。其时不但向军队派遣监军使者，而且首次在军中设立了固定的监军职务，即“军监”。如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下书：“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有二人，诚欲以司不奉命，令军人咸正也。”④ 对所设的12名军监，明确规定它的职责是监督“不奉命”者，“令军人咸正”。除在军中设有固定的军监外，还对征战部队派遣众多的监军使者，实行督军。如居摄二年（7年），“王邑等破翟义于圉，司威陈崇使监军”。师古注曰：“为使而监军于外。”又始建国二年（10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使者驰传，以军兴法从事。”⑤这些监军使者，职责便是监督部队听命于中央。所以，王莽对监军制的加强，对此后的监军制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东汉光武帝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军队加强监

---

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④⑤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督、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前制的基础上，广泛推行监军制，并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监军体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中央直辖部队常设监军吏员。如北军五校尉，设“北军中候”作为监督官员，总监五营之事。① 羽林骑，分设“羽林左监”、“羽林右监”，以监督羽林骑兵；②黎阳营则设“谒者”监军，所谓“立黎阳营，以谒者监之”。此外，对中央的虎贲，有时也派员监督。如永平年间，桓郁“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③。东汉政权对中央直辖军大多设有固定的吏员，对之实行监督，这已是无容置疑。

其二，对征战部队派遣使者随营监军。如光武帝征隗嚣时，使太中大夫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④。建武九年（33年），“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⑤ 中元二年（57年），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讨烧当羌。⑥ 由于征战部队的流动性大，故几乎每次遣将出征，均有各种不同身份的监军使者随行，这种情况与西汉时代对征战部队的偶尔监督已大有不同了。

其三，对地方部队实行督军制。如建武年间，“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张）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⑦ 安帝元初三年（116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⑧ 顺帝末，扬、徐地区农民起义，官方派御史中丞冯琨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之。⑨ 其时，地方每有战事，中央常常派员出任督军，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督促地方州郡迅速讨伐；另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③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

④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⑤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⑥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⑦ 《后汉书》卷三十八《张宗传》。

⑧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⑨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一方面，也在于防范地方上的牧守图谋不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常驻地方的监军者，专以监督军事为职，这种地方督军制是东汉的首创。

在东汉时期，监军者的身份比西汉更为广泛。除中央直辖军的监军吏员比较固定外，其他监军者的身份均不甚固定，或太中大夫，或侍御史，或谒者，或御史中丞，或中郎将等。不论监军者的名称、身份有何不同，但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宠臣，都是奉皇帝之命到部队来督军的，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军者也往往持节实行监军，以体现其特殊身份和地位。

东汉监军者的权力也比西汉时代更大。他们的秩别虽然一般较低，如太中大夫只千石，侍御史仅六百石，谒者仅比百石。但是，这些监军者对秩别较高的将帅照样可以实行监督或弹劾。若发现出征将帅有不轨行为，监军者有权向皇帝奏报，以便使其受到惩处。如据记载："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奏（冯）绲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又辄于江陵刻石记功，请下吏案理。"① 又耿恭将五校士 3000 人及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惩下狱。"② 虽然这些监军使者在监督弹劾出征将帅的过程中，往往因受权力之争的影响而借机陷害，但这正反映了监军者监督弹劾权力之大。

监军不仅有权监督出征将帅的违法行为，而且当将帅缺如时，监军有权指挥部队。如郑兴"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郑）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③ 又和帝时，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击西羌，后来刘尚、赵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刘）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赵）代营屯白石。"④ 这都说明，当主将死亡

---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③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或斥免后，监军谒者是能代行主将的职责而总领全军的。①

二、中央军的建置与整编

东汉时期的中央直辖军，从形式上看，似乎仍然沿袭了西汉的制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却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

（一）宫廷禁军的组成和选拔

宫廷禁军是指以虎贲、羽林为主体的郎卫系统。它属皇帝的贴身禁卫。

西汉武帝时，在进行各项改革的同时，为加强宫廷禁军的建设，除原有的“诸郎”之外，于光禄勋属下增设了期门、羽林军。东汉时期，宫廷禁军仍属光禄勋统辖，但它的组织编制乃较西汉更为完备。当时在光禄勋属下，设有“七署”，即：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等。② 在人事组织安排上，作了更有利于加强禁卫军实力的调整。

东汉宫廷禁军的建制，与西汉相比，更加突出了虎贲（期门）、羽林的地位。表现在：一是东汉取消了西汉郎卫中的车、户、骑三将。二是扩大了虎贲的建制。东汉在虎贲中郎将之下，增设了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而虎贲又分中郎、侍郎、郎中及节从虎贲四等。但西汉平帝之前的虎贲，却只有“仆射”领之。三是加强了羽林的建设。置羽林中郎将，增羽林左、右监，其地位也比西汉时更高。正因有这些变化，故东汉时的省殿宿卫，主要由虎贲、羽林负责，在历次宫廷斗争中，也屡见虎贲、羽林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虎贲、羽林的任务，主要是“掌宿卫侍从”，负责宫廷宿卫。

---

① 参见李玉福：《汉代监军制的产生与发展》，《山东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例如："（帝崩）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昼夜行陈。"① 顺帝即位时"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②。桓帝元嘉年间，"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张）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③ 在当时，凡朝贺、大丧、大傩或皇帝即位等，一般皆有虎贲、羽林宿卫。

再是虎贲、羽林随侍皇帝出入。每当皇帝出行时，他们要担负武装警卫。如明帝东巡泰山，到荥阳，"有鸟飞鸣乘车上，虎贲王吉射之。"④ 又曹节于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⑤ 这都是虎贲、羽林随从皇帝出入的例证。护卫的次序是虎贲在前，羽林在后。

虎贲、羽林除"陛戟殿中"和"宿卫侍从"之外，还有个任务，就是奉命出征。如：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马严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⑥ 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⑦ 又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时，大将军何进，率左右羽林及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⑧ 此类事例甚多，不必赘举。因为虎贲、羽林军要奉命出征打仗，故通常"教以五兵"，⑨ 要进行训练。

宫廷禁军的人数，史文记载残缺，难于求得确切结论。西汉

① 《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

②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

④ 《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六注引《风俗通》。

⑤ 《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

⑥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⑦ 《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

⑧ 《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

⑨ 《汉官仪》卷上。

之初的郎卫似无定额，“多至千人”。①汉武帝时，增设期门郎1500人，羽林郎近2000人。②故当时的郎卫大约共计四五千人左右。东汉由于中央军整编，省去了户、骑、车三将，郎卫人数有所下降。其时，虎贲中郎将领虎贲郎1500人，羽林中郎将领羽林郎128人，羽林左、右监领羽林左、右骑，其中羽林左骑900人，右骑人数不明。③ 依此，则东汉光禄勋所辖，总共仅2500余人左右。但从虎贲、羽林大量出没于战场的情况看，这2500人是个不完全的数据，实际情况应当更多。

虎贲、羽林如何选拔？以往人们对之重视不够。有简言之为“募兵”。看来，只言“募兵”二字，稍嫌笼统。因为两汉的募兵有多种类型：有在“编户齐民”及“刑徒”中募兵的事实，也有单从少数民族中募兵者。同时，募兵的条件和标准非一。或伉健、或奔命、或精勇、或锐士、或先登。因需而异，各有侧重。再说，募兵的性质在各个场合和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或半强制的。因此，严格依据史实考之，虎贲、羽林的选拔方式，固然不是采用“征兵制”，但也不同于通常的“募兵制”，而是实行一种特殊的“待诏”或“选募”。

选募虎贲、羽林的办法，主要是以“有材力”和“善骑射”为标准。例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微行始出……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④ 又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⑤ 西汉如此，东汉亦然。当时，“有材力”、“善骑射”是选拔虎贲（期门）、羽林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是“良家子”。何谓“良家子”？各家解释不一。如

---

①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② 《艺文类聚·设官部》及《汉书·百官公卿表》。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蔡质《汉仪》。

④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⑤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淳说，“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① 周寿昌说：“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② 今人贺昌群说：良家子，又称良口、良民，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③ 不论何种解说，但都说明选拔虎贲、羽林的要求，比一般士兵为高。

虎贲、羽林的来源，非征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充实或补员：一是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如据记载：“（羽林）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④“中郎将一人，……属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⑤“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⑥ 这都是有力的例证。二是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据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⑦ 又云“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⑧ 这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虎贲、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三是选自征战有功者。史云：“光武中兴，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⑨ 又，耿恭等在对匈奴战争中，因为有功，“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⑩ 这是东汉以战功补为羽林者的几个例证。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虎贲、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勇

---

①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
② 《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
③ 《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⑤ 《汉旧仪》卷上。
⑥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⑦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刘昭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⑧ 《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引《汉官仪》。
⑨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注引《汉官仪》。
⑩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敢善战，知晓戎狄习俗的关系。究其发展过程，当是先“选募”，后来，同时也行“父死子继”。

但到东汉桓、灵之时，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就是皇帝竟然通过诏书，对虎贲、羽林公开标价占卖了。如桓帝延熹四年（161 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① 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② 这一事实，和前面所说，已有明显的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这一方面，反映了东汉战乱时期，虎贲、羽林的地位较高，欲为之者众；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国库空耗所致。

虎贲、羽林的设置和当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密不可分。设置虎贲、羽林，扩充高级侍卫队，不仅强化了中央直辖军的核心地位，而且为中央集权统治培养、储备了大批军用人才。光禄勋岁时科第这批宫廷禁军的品行、材力，使他们接受各种特殊的培养训练，“教以五兵”，“悉通孝经”等，造成一种绝对忠诚于天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然后把他们输送到第一线去担任将、校，统领军队，这实际上起了选拔将吏后备队的作用。当时不少将、校及边郡太守，大多选自光禄勋所领的宫廷禁军系统，能征善战的一代将领，不少是出身羽林而成为名将。但是，也要看到，由于虎贲、羽林“父死子继”，到东汉末期，他们便成为世兵制的滥觞。

（二）宫城近卫军的压缩与更代

宫城近卫军是指卫尉所领的卫士，它属宫城守卫部队。但东汉有别于西汉，已无“南军”之名。

卫士与虎贲、羽林不同。其主要区别是：（1）卫士由卫尉统领；虎贲、羽林归光禄勋。二者有统属上的差异。（2）卫士是离皇帝稍远的外层卫兵；而虎贲、羽林则是皇帝的贴身禁卫，高级侍从。（3）卫士不上前线打仗；虎贲、羽林乃经常和北军一道参

---

①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加征战。(4) 卫士一般征自内郡；虎贲、羽林乃多选自六郡的良家子。(5) 卫士按照规定每年定期“更番”；而虎贲、羽林则“以兵为职”，是一支贵族兵，带有世兵性质。

卫尉所辖的卫士，掌宫门卫，巡逻宫城，主要负责宫城的警卫治安。其职守范围与西汉之时大致相同。

按照汉制，凡进出宫城，卫士的警卫甚严。一般皆有“口籍”、“文符”，经过核验之后，方可入宫。如据《百官志》记载：“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官长史为封棨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汉官解诂》对此言之更详：“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凡居宫中者，皆施籍于门，案其姓名。若有医巫、僦人当入者，本官长吏为封棨传，审其印信，然后内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复有符。符用木，长二寸，以当所属两字为铁印，亦太卿炙符。当出入者，案籍毕，复齿符，乃引内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执御者官，传呼前后以相通。从昏至晨，分部夜行，夜有行者，辄前曰：谁？谁？若此不解(懈)，终岁更始，所以重慎宿卫也。”这引文中所说的“口籍”，近似后世的“口令”，而“铁印文符”，略似后世的“通行证”。从官亲近，持有符、籍，方可出入宫中。否则，乃不得通行。卫士白天负责稽查宫城的出入行人，夜间则四出巡行，以警不虞。从宫门至殿门外的地区，大约都是卫士守备巡警的范围。

卫士对宫城的保卫，除了平时执行核实“口籍”、“文符”，日夜巡逻的任务外，在非常时期还要披甲持戟，严勒门卫。所谓“陈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① 东汉明帝时，杨仁为北宫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杨) 仁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② 便是例证。守卫京师的各个官署是卫士的主要任务。但古人事死如事生，所以帝后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胡广曰。

②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杨仁传》。

的园陵寝庙也要由卫士看护，两汉皆然。

宫城卫士的员额，前后变化较大。西汉初期，京师长安的卫士大约 2 万人以上。经过汉武帝建元元年的裁减之后，卫士仅万人左右。① 元帝即位之初，又“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② 卫士的数量又有减少的趋势。但据有的记载又说：京师自高祖到汉宣帝期间，“各自居陵旁立庙……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③ 这 4.5 万余卫士，仅仅是守卫园陵寝庙的卫士。若此，西汉的卫士确乎不少。不过，劳干先生认为，这 4.5 万余卫士，是“按工而言，即每人服务一日算作一人”，实际上“宫卫的卫士当八千人左右，和卫士万人的说法，相差不远。”④ 劳先生的看法，可备一说。

东汉卫士的员额比较明确。据载：当时南宫卫士 537 人，北宫卫士 471 人，左都候卫士 383 人，右都候卫士 416 人，七宫门司马卫士共 639 人。总计卫士为 2446 人。⑤ 由此说明，东汉对宫城卫士经过整编之后，其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当时卫士压缩或精减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光武帝精兵简政，“文书调役，务从简寡”所致。再就是虎贲、羽林和五校尉等都参与了京城的警卫，故卫士有精简的可能。

卫士的来源，一般征调自内郡各地。卫士一岁一更代，每年送故迎新举行一定的仪式。迎新时，卫士初至，君侯亲自到都门外“劳赐”。⑥ 岁尽役满，遣送卫士之时，皇帝要亲自“临飨”，百官依序定位作陪，以示抚慰。史云：“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

---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九《元帝纪》。

③ 《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

④ 《汉代兵制与汉简中的兵制》，见《史语所集刊》第 10 卷 1942 年。

⑤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汉官》。

⑥ 《汉旧仪》卷上。

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① 皇帝临飨卫士的礼仪，其隆重之场面于此可见。建初三年（78 年）“帝飨卫士于南宫。”② 表明东汉章帝时临飨卫士的地点在“南宫”。由于卫士在役期间，担负着守卫宫城的重任，故东汉政府对卫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优待。

（三）北军五校与西园八校的组建

北军是指通常所说的京师卫戍部队。东汉的北军，包括执金吾及五校尉等所辖之兵。

西汉的中尉“掌徼循京师”、“禁备盗贼”，或谓“掌京师盗贼，按考疑事”。③ 汉武帝时，为加强京师屯兵并适应战争的需要，扩充北军，组建了“八校尉”；同时，他又将中尉（执金吾）所领的北军进行改革，把治安、纠察等职能从北军中分化出来，使之与作战的职能分开。故北军的组织机构及任务等，从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东汉时期，“北军”二字，沿用西汉旧名。它在形式上分为两部分：一是执金吾所辖之兵；一是五校尉所领之部队。

执金吾原由西汉的中尉转变而来。东汉的执金吾和西汉相比，官属减少，权力范围也大为缩小，仅“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及主兵器。④ 这时的执金吾，实际上只掌京师洛阳城门以内及宫城门之外的警卫，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其属下的部卒仅有缇绮和持戟两种。当时缇绮（骑兵）200 人。他们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史称：“舆服导从，光辉满道”，“仕者当作执金吾”，⑤ 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持戟（步兵）520 人。他们多出身于寒家，来源不

---

① 《后汉书》志第五《礼仪中》。

② 《后汉书》卷四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③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文献通考·职官考》。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⑤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注引《汉官》。

同，与缇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整编、压缩后的执金吾，其统辖的兵力不上千人，而且按照士兵的出身贫富来划分兵种，这是值得重视的。

五校尉所统之兵，东汉简称“北军五校”。所谓“五校”，是指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校尉，秩级均为比二千石。彼此之间无隶属关系。这是在西汉“八校尉”基础上整编过来的，但驻地已有不同。同时，另设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以监其军。

北军五校的职责是宿卫京师，担任京师守备及扈从车驾。如据记载：“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① 又云：“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② 于此可见，当时卫尉警卫宫城之门以内，五校尉则警宫城之外，任务是守备洛阳。所谓“五营校尉在前”，则是反映其随同车驾出入时的情景。

北军五校不仅负有戍卫京师、侍从车驾之职，而且还有奉命从征的任务。例如：和帝永元六年（94年），“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征叛胡）”。九年（97年）发北军五校征西羌。永初元年（114年），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叛羌。③ 又黄巾起义时，卢植“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④ 文献中有关北军从事征战的材料甚多。在东汉的较长时间内，北军五校实际上已成为中央军作战部队的主力。窦宪伐匈奴时，曾动用北军五校取得了胜利。后来，邓鸿、何熙征讨南匈奴，邓骘、马贤、张乔征讨西羌等，也都使用过“五校士”。⑤ 这说明当时北军五校从征的任务较多。

但到东汉末年，由于北军日渐衰落，京师洛阳守备空虚。故

---

① 《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

② 《文选东京赋》注。

③ 《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

④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

⑤ 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及西羌传。

于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东汉统治者为加强镇压，采取紧急措施，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洛阳附近），置“八关都尉”，从事防守。“八关”即：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洛阳市南）、大谷（今河南偃师西南）、轘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河南洛阳东北）、孟津（今河南偃师北）。这八关都尉归中央直接指挥，它显然是加强京师洛阳周围警备的一大举措。

至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政府又设“西园八校尉”。据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① 这八校尉的设置，固然与北军的腐败有关，但也是宦官与外戚矛盾加深的反映。因为当时外戚何进任大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官兵都归他统辖；但宦官蹇硕掌握八校尉之后，督司隶校尉以下，从而宦官与外戚分掌兵权，互不上下。他们之间的角斗，实际上使东汉政权濒于崩溃。因此，尽管增设了西园八校，仍然挽救不了东汉危亡的政局。

北军的数量，在西汉时期，随时而异。汉初究竟有多少北军之卒，难于详考。汉武帝扩充北军之后，其规模当较前为大。当时仅“八校尉”的兵力，就有不少，且多为精锐，不然难于适应战争需要。其士兵来源，自屯骑至虎贲七校所属，除长水、胡骑多为降汉匈奴兵外，其余皆为汉人，并募自三辅地区者居多。王莽末年，义军蜂起，“莽拜将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向。”② 则其时北军在数万人以上。当然，这是战时情况，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多。

东汉时期，北军的兵员略有定数。其时执金吾所统领的兵，缇绮 200 人，持戟 520 人，计 700 余人。至于北军五校，则员吏、营

---

①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②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士不等。其中：屯骑校尉营，有员吏 128 人，领士 700 人；越骑校尉营，员吏 127 人，领士 700 人；步骑校尉营，员吏 73 人，领士 700 人；长水校尉营，员吏 157 人，领乌桓胡骑 736 人。射声校尉营，员吏 129 人，领士 700 人。① 这样，北军五校的吏士总计约四五千人左右。其士兵来源，最初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秀的原从士兵改编而成。后来主要靠招募、靠外族兵，久之即职业化，并形成父死子继的制度。如汉安帝元初二年（115 年），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绮、五营子弟 3500 人屯三辅以备羌。② “五营子弟”，即五营兵士的子孙。至于买卖“缇绮、五营士”的情况，也存在。所以，不少“商贾惰游子弟”加入到了北军队伍，战斗力削弱与此有关。东汉末期的八关都尉及西园八校，史籍没有对其兵员数量及来源做明确交待，难于详论。

三、地方军的裁减与长期屯兵之设置

地方军即郡国兵，是指驻扎在地方上的部队。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地区性的军事任务，但每有战事发生也随时听候中央的调发。

刘秀建国后，在调整中央军的同时，对地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地方军制的面貌与西汉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

在郡、国并行的西汉时期，无论郡县或王国，都普遍建有与之相适应的军队。这在当时统称之为“郡国兵”。所谓“郡国兵”，就其实际内涵来说，就是地方军，也即分布在各个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钱文子说：“郡国之兵，则材官、骑士是也”，“材官、骑士，岁时讲肄，然其给事郡国。”③ 地方军的建制原则，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及注。另据《汉官仪》：长水校尉营的领士为 7367 人。

② 参见《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及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补汉兵志》。

当时采取“因地制宜”，视各个郡国的地理条件之差异，而分别建置不同的兵种。这正如文献所载：“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① 这表明，对地方军的培育建置，通常是根据地区条件而定的。

西汉时期，建置在全国各地的材官、骑士等地方军，人数众多。汉王朝动用它们时，动辄几万、几十万。如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发陇西、天水、安定的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计 10 万余人。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南越反，发南方的楼船士达 20 余万人。这只不过是两个例证而已。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地方军，占整个国家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是西汉军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东汉刘秀建国后，在精兵简政，并官省职的过程中，针对西汉特别是王莽“徭役烦剧”，“频发兵役”的情况，对地方军制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改革。具体表现在：

第一，罢郡国都尉，并其职于守、相。如光武帝建武六年（30 年），“罢郡国都尉官”，“并职太守，……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② 以后，尽管在右扶风、陇西、太山、琅邪等郡偶有都尉的复置，然皆时置时废，它已非通行之制。应劭说：“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③ 实是。裁撤郡国都尉的原因，似乎主要是为了精兵简政。光武帝自己就曾经说过：“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④ 可见，罢都尉而并职太守，主要是为了紧缩官员，节省财政开支。再说，郡守自秦汉以来就是一郡的军

---

① 《补汉兵志》。

②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补注引应劭曰。

④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政长官，兼领军事。所以，在并官省职的情况下，将“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都尉予以裁省，这既有可能，也是当时集中军权的需要。

第二，罢除定期训练、考核的“都试”之役。如建武六年，在省诸郡国都尉的过程中，同时又宣布“无都试之役”。① 所谓“无”，即罢除。这也就是罢除西汉以来定期举行的军训、校阅制度，取消军事训练。东汉之所以罢“都试”，是因为在此之前，往往有人借正卒于地方都试之时，起事作乱。如翟义就曾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隗嚣亦欲借都试之机劫持刘玄。尤其是光武帝刘秀本人，也曾有过这种举动。据云：“光武既深知（李）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② 由于光武帝深知“都试”之期，集合地方武装力量容易为反对势力所利用，故其当政不久，在“罢郡国都尉”的同时，立即将西汉传统的都试之制，予以了彻底的废除。这既是一种出于控制地方异己势力的举措，也是当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殊不知军队缺乏必要、严格的训练，又导致了战斗力的大大削弱。

第三，罢郡国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光武帝于建武七年（31 年）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③ 有人在论及光武用兵、掌兵、养兵之制时亦说：“光武有见于昆阳之一胜，故兵以少而精；有鉴于武帝之奢广，故官以简而当；有惩于新莽之烦碎，故赋以薄而赡。昆阳以寡敌众，诚知兵在精不在众明矣。是故建武七年，陇蜀犹未平，诏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以国有众军，并多精锐故也。”④ 过去一般认为，罢除秦汉以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②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③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 《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五十七卷《兵制部》插引《山堂考索》。

来的地方兵，即材官、骑士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国有众军，并多精勇”的关系，这自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实，除此之外，在东汉立国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户口锐减，征兵基础日形破坏等，也是罢兵的重要缘由。

东汉前期对地方军的裁减，诚然使军权更为集中，“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同时也部分地减轻了编户农民的一些兵役负担。但另一方面，则使地方军的实力大为削弱，乃至导致战略后备力量薄弱。本来地方军的任务是战时要听候中央的统一调发，奉命出征；平时则在本地服役，接受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定期轮番到京城或边防“屯戍”。然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以后，每有战事便主要有赖于招募来的中央军或采取其他措施了。

（二）内郡要冲之地的长期屯兵

东汉政权对地方军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士兵的取消，更非军备的彻底解除。恩格斯说：“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① 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不可能没有军队，它从来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东汉政权，更是不可能没有“武装集团”。时人应劭就曾说到：“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②事实上，东汉政权在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七年罢材官、骑士之后，由于出自当时政治形势和对外、对内职能的需要，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军事政策，当时尽管役法有变化，军事建制仍在发展。对西汉旧制虽有移革，军警武备却是未曾放松。

为弥补罢材官、骑士之后的缺陷，东汉政权在内郡要地及三辅地区往往设置屯兵，以代替番上的正卒。如光武帝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③ 安帝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刘昭补注引应劭《汉官》。

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注引《汉官仪》。

初四年（110年）设长安、雍二营。① 史称："京兆虎牙、扶风都尉，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② 黎阳属魏郡，在今河南浚县。长安、雍二营位处三辅重地。此外，在边郡要地还先后设置了度辽营、象林营、渔阳营、扶黎营等。当时每有战事，辄派将领率营屯兵作战。这些营屯兵，虽然是归中央直接统辖、指挥，但就其实质与作用而言，似与地方军并无二致。

东汉内郡要冲之地还设有许多坞屯兵。魏郡、赵国、常山、中山有坞616所；河内通谷冲要之地有坞33所；扶风、汉阳、陇道有坞300所。正如马端临所说："明帝以后，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置屯多矣。"③ 这些坞屯兵，名义上也归中央直接指挥。他们多以募兵或弛刑徒充任，既维持地方治安，也有担负戍守的任务。

除上述营、坞屯兵之外，就文献所见，东汉时期还有所谓的"河内兵"、"汝南兵"、"荆州兵"、"关中兵"、"苍梧兵"、"幽州兵"等等。这些不同称谓之兵显然都属地方军。绝非如有人所说地方军是"罕见之事"④。

大量史实表明，东汉罢除兵役制下的轻车、材官、骑士和楼船士后，并非从此就没有地方军了，而是各地通过临时招募兵员，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郡兵"或"州郡兵"存在。查考《后汉书》各《本纪》，自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之后，有关"州郡兵"、"郡兵"的记载仍多（请参见附表一）。

---

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 《汉官仪》卷上。

③ 《文献通考·兵考》。

④ 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

附表一：东汉时期州郡兵参战情况表

东汉纪年	公元	记　　事	备　注
光武帝中元元年	56 年	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	郡兵讨叛羌。
中元二年	57 年	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	郡兵败于羌。
章帝建初元年	76 年	武陵郡兵讨叛蛮。	郡兵讨叛蛮。
建初五年	80 年	荆、豫郡兵讨破武陵、溇中叛蛮。	郡兵讨叛蛮。
和帝永元五年	93 年	武陵郡兵破叛蛮。	
永元六年	94 年	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郡兵讨叛蛮。
永元十二年	100 年	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郡兵讨蛮夷。
安帝永初三年	109 年	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元初三年	116 年	苍梧、郁林、合蒲蛮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	州郡兵讨蛮夷。
元初四年	117 年	辽西郡兵与乌桓击（鲜卑）。	郡兵破鲜卑。
顺帝阳嘉四年	135 年	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发郡兵救之，乌桓退走。	郡兵退乌桓兵。
永和二年	137 年	九真、交趾二郡兵反。	郡兵起事。
建康元年	144 年	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范容、周生等起义）。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桓帝延熹三年	160 年	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叛，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兵讨之。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延熹五年	162 年	长沙、零陵贼起，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兵讨之，不克。	州郡兵讨农民起义军。
灵帝中平元年	184 年	黄巾贼起，发天下诸郡兵征之。	郡兵征讨农民起义军。
中平三年	186 年	武陵蛮叛，寇郡界，郡兵讨破之。	郡兵讨叛蛮。

这个表，当然是个梗概，但足以说明，东汉时仍普遍存在着“郡兵”或“州郡兵”。其中，使用“郡兵”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有之；使用“州郡兵”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情况有之；“郡兵”起事者也有之。在《后汉书》各《传》、《纪》中，有关州牧、太守率领“州兵”、“郡兵”进行“讨”、“击”、“败”、“救”、“破”、“讨平”等等记载，屡见不鲜。当然，随着内郡更戍役制的变化，这些地方军的兵源，当主要是来自招募。

地方军的任务，在于维护地方的治安警备。所谓都尉“典兵禁，备盗贼”。防捕“盗贼”，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亦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这是当时各类地方军的基本职能。东汉刘秀虽然罢省都尉，但每有剧贼，“仍予复制”①。又加之刺史、州牧及太守兵权的加重，故东汉地方军的镇压职能并未改变。

（三）地方军的特点及其与中央军的关系

东汉地方军和西汉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就其要者言之，大致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 东汉地方军由于废除“都试之役”，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制度，故“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②。战斗力较西汉时已明显削弱。(2) 东汉地方军经过精省、裁削之后，每有战事，主要靠临时募集，兵源不暇选择，被募对象成分复杂，既有“亡命奸臧”、“剽轻剑客”，也有“伤人偷盗”等各色人物，因而兵员的政治素质较西汉时有所下降。(3) 东汉地方军，到了后期组织杂乱，刺史、太守各自有兵，互不统属；加之除了“州郡兵”及“营坞屯兵”而外，还出现了许多“家兵”、“部曲”，即地主阶级的私家武装。故到东汉末期，地方军很难形成统一力量，中央对之亦已失去控制能力。

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关系，前后已有变化。在东汉前期，大致说来，它们如同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样，是地方与中央、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地方军必须从属于中央，成为中央军的辅助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补注应劭《汉官》。

力量和重要补充。具体表现在：

首先，地方军要接受中央王朝所命将领的统属。“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当时每有征战，皆由皇帝亲自选派和任命将领统兵，事迄乃罢。如光武之初，“发幽州兵……即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① 建武四年（28年），拜马成为扬武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② 由于将军是中央任命的，所以作为地方军，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的统率，不得有所违反。其次，地方军要配合中央军协同作战。如安帝之时，“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共击之。”③ 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在中央集权制还强的情况下，每当对外战争之时，郡国政权均当派出兵员和中央军一道协同作战，并且派出的军队要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第三，地方军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往往亦有独立从事征战的任务。如建武十八年（42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讨交趾征侧、征贰。”④ 安帝时，“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⑤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⑥ 大量事实表明，当时完全由地方军单独出征的情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军也就实际上成了中央军的代替力量。

但到东汉末期就不太相同了。当时，由于州郡、牧守不仅可以自行募兵、领兵，而且其募领之兵往往变成私人部曲，可以父子相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地方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如初平元年（190年），“（袁）绍遂以渤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

---

①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

⑤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⑥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① 这些州牧、刺史、太守等既管民，又领军，权力大增，实际上已形成割据一方的诸侯。中央已失去了对地方军的控制能力。

事实告诉我们，当中央军强大有力，中央集权制巩固之时，地方军一般能随时听命中央的调遣和支配，并致力于中央王朝；但若中央军一旦削弱，出现了封建的分裂割据，家兵、部曲势力强大之时，那么，地方军便站到了中央军的对立面，而加速中央王朝的灭亡。

四、边防军的调整与士伍成分之变异

边防军，通常是指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它主要担负守卫边境，抵御外来侵犯的任务。东汉的边防军，从其构成来说，基本上沿袭了西汉时的旧制，但由于通过对它的调整和改革，边兵素质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一）罢边郡亭候吏卒

"边防"二字，既是地理概念，又是历史、政治的概念。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边界时有变迁，因而其所构成的边防意义也就往往不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内，有关边防与边防军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西汉时期的边防军，在文献中统称之为"戍卒"。当时有"令戍卒岁更"之制。② 边境地区由于大规模地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故于边塞亭障，均设有重兵屯戍。且令戍卒"一岁而更"。③ 即每年从内郡征调戍卒番上戍边，这成为西汉的定制。

---

①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上。

②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起于高后五年。

③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残破，“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① 故在边防军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建武二十二年（46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② 即罢除西汉以来内郡戍卒番上戍边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东汉罢除边郡亭候吏卒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出自多种因素：第一，当时内郡人口锐减，“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加之征兵制度日渐松弛，难于从内地征调兵员到边境戍守。第二，东汉立国后，边郡的大量障塞、亭燧破坏不堪，甚至“绝灭”，在当时亭障暂未修复的情况下，没有征调吏卒在那里戍守的必要，罢除边郡番上戍卒则是事实上的一种认可。第三，或许与刘秀“偃武修文”的指导思想有关。刘秀久在兵间，“厌武事”，自陇、蜀平定之后，非有紧急，对外一般不主动用兵。如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与马武上书请攻匈奴，刘秀诏报曰：“柔者德也，刚者贼也，……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人。”③ 东汉初期，之所以“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④。这与当时以保境安民为宗旨的边防政策不无相关。

罢除边郡亭候吏卒，虽然大大减轻了编户的兵役负担，使“过年之徭”，“逾时之役”的情况少了。但实践结果表明，边郡没有当番守望的戍卒仍然不行，于是采取弥补措施，大量利用“弛刑徒”和“夷兵”从事防守，以代替从前的戍卒。或以中央军长期屯兵及边郡临时征募兵员等方式来应付边防作战的需要。

---

① 《汉官仪》卷上。

②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③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④ 《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二）边郡的各类屯兵和属国兵

西汉的边防军，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及属国兵所构成。东汉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是在量和质的方面有所区别。兹分述如下：

1、边郡太守所领屯兵

边郡之地，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战事频繁，负有防御作战的重任。故东汉和西汉时期一样，边郡太守之权比内郡更大，武官多于内郡。边郡太守往往称作“郡将”或“将军”，而太守府亦称作“莫（幕）府”。《汉官仪》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边郡太守既管民，又主军，而且统领着“万骑”的屯兵，实力颇为可观。在边郡之内，除太守主军事外，还设有长史、都尉、部都尉等协助太守，具体分掌兵马或负责各地区的军事。自“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其兵源主要募用“弛刑徒”及“夷兵”从事边郡的防守。但每有战急之时，在边郡“征兵”之事也为常有。

边郡太守统辖的屯兵，其任务是从事候望和防御作战。如明帝时，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拒之。”① 赵苞为辽西太守，“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抄……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②又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由于朔方以西的障塞多坏，鲜卑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乃上书乞修复障塞。冬十月，汉王朝下令“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③ 在当时，边郡太守所领屯兵分两部分：一是候望系统，其士兵一般称为“候望卒”，罢除番上的戍卒之役后，它多由招募来的职业兵组成。他们分布于边境的城障亭燧之中，其职责主要不是征战，而是“谨候望，通烽火”，侦察敌情，举烽示警，对入侵来犯做好防御和应付。二是防御系统，其士兵多为“骑士”（骑兵），他们的职责，主

---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

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要不是“候望”，而是根据需要奉命出征，故其人数通常比“候望卒”较多。

2、将屯兵

将屯之“屯”，是指“驻扎”、“屯驻”或“驻守”的意思。古代注释家对“将屯”曾有明确解释：“律：谓勒兵而守曰屯。”如淳曰：“有警则将卒而屯守也。”师古曰：“典军屯以备非常。”① 其实，“将屯”是一种军事术语，从其内涵来说，“将屯兵”或“营兵”，实际上是由中央委派将军率领，屯驻或驻扎于边防“要害处”的作战部队。

将屯兵渊源甚早，最迟西汉前期已有明文记录。如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②。又如武帝时，“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阵。”③ 由将军带领的屯兵，实行部曲编制，主要用于征战，类似后世的野战军，南、北边境皆存。

东汉时期，由于边防形势及边防政策的变化，故将屯兵通常较西汉时多。如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遂入寇河东……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④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屯汉阳。”⑤这些屯驻于孟津、汉阳的羽林、五校士，显然都是直属于中央的“屯兵”，自无可疑。不仅如此，东汉还先后设有各种名目的“营兵”，长期屯驻于边郡重地。考诸史册，东汉一朝，除前述内地的黎阳营、雍营之外，在边境地区还设有如下诸营兵：

度辽营：始设于明帝永平八年（65年）。当时“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⑥在开

---

① 参见《史记》的《傅宽传》及《文帝纪》注。

②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

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始，是为防止南、北匈奴而设的。其后，对鲜卑、羌人作战也多用此屯兵。

渔阳营：始设于安帝建光元年（121 年），当时，因鲜卑侵扰居庸关、玄菟等地，故“初置渔阳营兵”，“置营兵千人”，① 屯于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这是为防御鲜卑而设的屯兵。

扶黎营：建置时间待考。据载：“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史。”②该营设在辽东，目的大概也是为了防御鲜卑的屯兵。

征西营：据载：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西羌反叛，“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③ 这是为防御西羌而设的屯兵。

象林营：始设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 年）。因当时，日南、象林蛮夷反叛，虏掠百姓，焚烧官寺，斗争激烈。于是“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据载：“将兵长史居在日南郡，又有将兵司马”的设置。④ 可见，该营是防止南蛮而设的。

此外，当时还设有使匈奴中郎将屯兵、护乌桓校尉屯兵及护羌校尉屯兵等。如据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 年），始置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其所领屯兵除戍边的弛刑徒外，战时则发诸部“乌桓突骑”。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印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护之”。⑤ 至于护羌校尉，西汉已有，王莽时罢此官，东汉之时复置，驻“于陇西令居县”⑥。护羌校尉屯兵，通常数千人，多时二万余，

---

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及注。

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④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及注。又《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⑤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⑥ 《汉官仪》卷上。

治陇西、湟地，以断羌人与匈奴的联系。

将屯兵或营兵的任务很明确，主要是针对某一边区力量薄弱，而加强防务，奉命出征，打击来犯。它作为征战部队，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是东汉边防军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对保境安民，巩固边防曾起了重大作用。

3、屯田兵

屯田兵，又称“田卒”或“戍田卒”。是指“以兵营田”，且耕且守的武装力量。

屯田兵与将屯兵不同。将屯兵主要用于征战，而屯田兵虽有防御之责，然它主要是从事农垦活动；将屯兵由将军率领，屯田兵则多由农都尉管辖；将屯兵实行部曲编制，而屯田兵乃不尽然；将屯兵尽管有时当作屯田的劳动力使用，但“将屯”不是“将兵屯田”的省称。一句话，屯田兵的性质、任务、统领和编制等，和将屯兵相比，均有明显区别。

西汉自武帝之后，就曾在西北边郡开展了军屯。不仅屯田地区广，而且一度规模也很大，屯田兵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赵充国在总结当时屯田时说：“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①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东汉边郡沿袭了西汉的屯田旧制。如东汉早期有河西屯田，明帝以后，有西域屯田（包括伊吾、柳中等地）、河湟屯田、汉阳屯田。此外，在北地、安定、上郡、武都等郡也有屯田兵戍守。当时，“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② 农都尉的办事机构称“农府”。然屯田规模，东汉没有汉武帝之时大，如西域屯田兵的人数，一般为“数百人”、“千人”，最多时也只数万人左右，而且时置时废，屯田极不稳定，屯田士又多为弛刑徒。但通过各地屯田士的且耕且守，一方面保证了部分军粮的供给；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边郡的防御力量。屯田兵在巩固边防中同样起了积极作用。

---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4、属国兵

属国兵，有时称作“属国骑”或“属国胡骑”。这是在属国都尉统辖下服属于汉王朝的少数民族兵。

西汉武帝之后，对内属或降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均“置属国以处之”。自武帝元狩三年开始，到昭、宣时期，已先后设有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属国。① 它们各自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兵力。

东汉时期，对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张掖属国等仍继续存在或复置，且自安帝以后，增加了不少新的属国。例如：

广汉属国：故北部都尉，属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 37110，口 205652。其所领三城为阴平道、甸氐道、刚氐道。

蜀郡属国：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 111568，口 475629。其所领的四城为汉嘉、严道、徙、旄牛。

犍为属国：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另领二城。户 7938，口 37187。其所领二城为朱提、汉阳。

张掖居延属国：故郡都尉，安帝时别领一城。户 1560，口 4733。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

辽东属国：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六城。户口未见记载。其所领之城为原辽西郡昌辽（天辽）、宾徒、徒河和辽东郡无虑、险渎、房等。②

此外，东汉时期还有“酒泉属国”、“张掖属国”、“涿郡属国”等。③

“因其故俗，以为属国”④。边郡少数民族的“故俗”，除了语言与中原汉族不同外，更主要的还有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及社

①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② 以上属国均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③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及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会制度不同。中原王朝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不强行改变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而采用属国建置，实行“一国两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创新的举措，它不仅有助于分化、瓦解边境部落贵族的统治，而且对安定边境、拱卫中原王朝也有一定意义。

东汉时期，各属国设置的时间有先有后，其地理位置及规模大小也有不同。但和西汉一样，每个属国设有属国都尉一人，比二千石，总管属国军事与民政。属国都尉以下，多设长史，专掌兵马，典武事。属国兵由属国境内的百姓充任，多为少数民族，它带有部落兵的性质。

属国兵的任务，平时为中原王朝侦候、观察塞外敌情，招徕种人协助中原王朝守边。在边境战事紧张之时，属国兵则主要协同汉军征战。如桓帝延熹元年(158 年)冬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侵扰缘边九郡，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东汉属国常备兵并不多，往往战时临时募发少数民族兵参战。但由于属国兵善长骑射，了解胡俗，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往往能出奇制胜，它是东汉王朝边防武装力量的补充。

（三）边兵成分与士伍地位的下降

在实行以征兵制为主的西汉前期，兵员征集对象比较单一。边防军主要由国家编户中的农民承担。但自西汉中朝以后，尤其是在东汉一代，随着征兵制的松弛，加之“罢材官，骑士”，内郡更戍役制的废除，故边防军的成分则多以招募“夷兵”及“刑徒”来充任了。

东汉时期，在边境用兵中，使用“夷兵”，即少数民族兵的情况已很普遍。如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窦固击北匈奴，所部有卢水羌胡、乌桓、鲜卑等兵。和帝永元元年（89 年），窦宪击北匈奴也有羌胡兵。班超经营西域只有随行的 36 人，基本上全部依靠了西域诸国兵。东汉王朝在对西羌的战争中，也曾多用“夷兵”。如和帝永元八年(96 年)，护羌校尉史充发“湟中羌胡击迷唐”。安帝元初二年（115 年），零昌遣兵寇城，“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人，与（司马）钧分道北击零昌”。顺帝永和四年（139 年），护羌校尉马贤将“湟中义从兵以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此种例证甚多，故

史称："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大量使用"夷兵"，虽然有其"骄横难制"的一面，但在当时，对减轻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节省汉廷的军费开支等，仍有积极意义。

在边防军中，除"夷兵"之外，还有大量的"弛刑士"或"刑徒"。如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①。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候，保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②。西汉虽有使用弛刑徒屯边的情况，但当时主要是从更役番上制下征发来的戍卒担任，然东汉则为之一变，特别是自明帝以后，皇帝屡次下诏，经常调发弛刑士或刑徒从事屯戍。如见之于《后汉书》各帝纪者，有明帝永平八年、永平九年、永平十六年、永平十七年，章帝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永元八年，安帝元初二年、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永建五年、汉安二年，冲帝建安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永兴二年等，令刑徒屯戍边境的诏书，见于记载者不下18次之多。刑徒屯戍的地点，一般都在边境地带。但具体地址，则各个时期有别：如明帝之时，刑徒主要屯戍在朔方、五原、敦煌之边县及"军营"；章帝时，主要"诸屯边县"及金城；和帝时，屯敦煌、"徙出塞"；安帝时，主要屯戍在敦煌、陇西等地；顺帝时，主要屯戍在北地、上郡、安定及临羌之地；而冲帝、桓帝以后，则泛称"徙边戍"。当时对刑徒屯戍力量的使用，基本上是根据各个时期的边防政策和边防形势来进行部署的。东汉刑徒兵的数量不少，当时一次就发某地"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③。由于大量利用刑徒戍边，所以班超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④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应劭《汉官》。

③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

东汉的刑徒兵和西汉相比，已有显著区别：(1) 西汉的刑徒兵，一般发自“弛刑”；东汉则包括所有刑徒，死囚尤多。(2) 西汉的刑徒兵，通常是其单身个人从军，这有居延汉简中的弛刑名籍可证；东汉刑徒戍边，则往往“妻子自随，占著边县”，若“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迁徙的刑徒，均“赐弓弩、衣粮”。① (3) 西汉刑徒兵，只是在战急之时调发，带有某种程度的临时性；东汉征发刑徒戍边乃成为定制。且役期无瓜代之规定，往往终身为兵。甚至父死子继、兄亡弟代，是一种世袭的职业兵，到后来逐渐形成“士家”。

刑徒从军，虽然减轻了农民的兵役之劳。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安定。但它也促成了军人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秦至西汉时期，国家军队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民，当时实行军功奖赏，加之“尚勇重武”传统的遗风，从军虽然因时代的变异与其职业的艰险而不似以前那样令人向往，但军人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从军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故“私装从军”者时或可见。但到东汉一朝，由于偃武修文，军功不赏，征兵渐衰，又大量招募刑徒、夷人从军，军人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尤其被人卑视的刑徒入伍为兵后，他们终身为兵，父死子继，“出战入耕”，与国家构成强烈的依附关系，其地位大大降低。曹魏时期的世兵制度，或即由东汉戍边之刑徒终身为兵发展而来。

五、兵役制度由征兵向募兵的转替

兵役制度是军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保障兵员的更替和储备，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等至为关键。但兵役制度，往往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如果说，秦至西汉前期是以征兵为主，自武帝后征、募兼行，那么，到了东

---

①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汉时期则发展为征兵渐衰，募兵日甚。这也就意味着“兵农合一”，开始了向“兵农分离”的方向发展。

（一）**征兵制的渐衰**

所谓征兵制度，是指国家“编户”，在适龄期内必须承担一定期限军事任务的制度，它具有义务兵性质。

在实行普遍征兵制的西汉前期，适龄男子一般都有义务当兵。法律规定“为正一岁，屯戍一岁”，任役期为两年。征集兵员的办法，大体上说，由中央将征兵的任务数下达各郡，按行政区域或地缘单位进行征调；各郡征集何类兵种，实行因地而异，各有侧重；各郡适龄对象的“为役先后”，通常以身体、材力和丁口为准；各地负责征兵的主管单位是都尉、县尉及乡里基层组织。征兵制之所以能较好地实行，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具有与之相适当的基础和条件。有比较完备的户籍制度；土地问题不那么紧张，自耕农相对为多；推行了“军功爵制”；民间“尚武”风气较盛等。但自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征兵的基础和条件发生变化，征兵制有了松动，故在一段长时间内，采取了征、募兼行的集兵制度。

东汉时期，国家编户的“军籍”虽然还存在，每当遇有重大战事之时仍可征发，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罢材官、骑士及都试之役”后，惟宫城卫士仍保留番上更役之制外，而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役却已没有了。征兵制度已基本取消。至少可以说，它不再像西汉那样稳定和规范化了，征兵制业已走向了衰落。

首先，东汉在内郡很少有征兵之举。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北伐匈奴，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兵及卢水羌胡2万骑，出酒泉塞；来苗、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出平城塞。①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北击匈奴，发“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②。安帝永初三年（109

①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

年），“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击南单于与乌桓。① 所有这些，都是大量发自边郡及“夷兵”的例证。很少有征自内郡的情况。表明内郡的正卒之役业已取消了。顺帝永建元年诏曰：“幽、并、凉州刺史……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② 这是因为幽、并、凉三州地处边郡，由于战争需要，故“严敕障塞”、“简习戎马”。史籍中提到的所谓“戎马不息，疲于征发”，“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等，大概主要是指边郡的情况。

宋人钱文子说：“至于中兴，并尉职，罢都试、材官、骑士，还复民伍，盖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③ 此话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实际。由于征兵制破坏，募兵制代替征兵制，募士多，郡国正卒少，国家编户的兵役负担有所减轻，故东汉明、章以后的户口、垦田数大为增加，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消极影响，正如当时的郑太所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④。荀悦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悴几尽，不教人战，是谓弃之”。⑤ 凡此所云，都说明东汉自征兵之制废除后，逐渐使朝臣上下，忘战日久，战备观念淡薄了。此时已和西汉有了很大的不同。

由于内郡征兵制的基本的废止，于是每遇战事，往往临时集兵，匆促调发。如灵帝时，臧洪说广汉太守张超曰：“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⑥ 这是地方遇有警急，以“桴鼓”为号，临时召集兵员的一例。这种兵不习射，没有经过严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②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 《补汉兵志》。

④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⑤ 《申鉴》。

⑥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格训练的军队，临时调往战场，其战斗力是较差的。应劭就曾说过："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 反映军队战斗力差的实例殊多。如光武帝中元二年（57 年），汉廷与烧当羌之战，汉军大败于允街。谒者张鸿临时调发的天水军，因未经过训练，在允吾一战中，被羌兵打得惨败。由此可见，征兵制破坏后，有战临时调发，将不教战、兵不习射，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为什么东汉的征兵制度会日渐走向破坏?原因出自多个方面。主要是由于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自耕农破产、流亡，民数失控；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偃武修文、不尚武备，士兵社会地位降低；加之受到兵制自身发展规律制约等因素。由于当时存在种种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故征兵制最后被募兵制所代替。

（二）募兵制的日益发展

所谓"募兵"，是指广求士兵的意思，也就是募集、招募或集聚"应募"从军者，给予一定的经济、政治待遇，使其承担当兵任务的制度。

募兵渊源于战国②。兴起、发展于汉武之时。自西汉中期以后至王莽末年，在实行征兵的同时，曾常有招募之举，事见汉武帝元封二年，昭帝始元元年，宣帝神爵元年，元帝永光二年，成帝河平二年，哀帝建平五年，平帝元始二年，王莽始建国二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等。不过，当时的这种招募还不是很普遍，通常只是招募"勇敢"、"猛士"、"奔命"等从军，以组成精锐部队。

但到东汉时期，随着更戍役制的废除，募兵之制便大量推行了，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 年），马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② 参见《吴子·图国》、《吴越春秋》、《荀子·议兵》等。

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12郡募士及弛刑4万人征五溪蛮夷。① 明帝永平二年（59年），西羌寇陇右，汉廷派马武、王丰等将乌桓、黎阳、三辅募士，合4万人击之。② 章帝建初二年（77年），昆明夷卤承等应募讨哀牢王类牢。③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史，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击破之”。④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汉廷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以招募兵员征讨广陵张婴起义军。⑤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汉廷派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击西羌。⑥ 后又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长沙、零陵起义军。⑦ 桓、灵之间，“刘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过，要以后效，使各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⑧ 到灵帝、献帝之时的募兵记录，更是屡见史籍。这里不备一一列举。综观东汉一代，封建王朝募兵的场合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光武至献帝，有明确系年的招募记录达35次以上。每次募兵的人数，少则几百，多到上万。不仅招募对象有破产的农民，有刑徒，也有少数民族。当时募兵的使用范围很广，在京师中央军中有募兵；屯戍边郡要地有募兵；对少数民族的征讨使用募兵尤多；镇压农民起义同样大量使用募兵（详见附表二）。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

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三十八《滕抚传》。

⑥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⑦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⑧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附表二：东汉时期募兵情况表

东汉纪年	公　元	募兵对象、人数及使用范围	备　　注
光武帝建武十一年	35年	吴汉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3万人伐公孙述。 岑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 公孙述募敢死士5000人击吴汉。	《后汉书·吴汉传》 《后汉书·岑彭传》 《后汉书·公孙述传》
建武二十四年	48年	马援等将12郡募士及弛刑4万余征五溪蛮夷。	《后汉书·马援传》
中元二年	57年	马武等将乌桓、黎阳营及三辅募士4万人击西羌。	《后汉书·马武传》
明帝永平元年	58年	募士卒戍陇右。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八年	65年	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屯朔方、五原之边县。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十六年	73年	耿秉等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击呼衍王。	《后汉书·窦固传》
永平十八年	75年	耿恭募先登数千人击匈奴。	《后汉书·耿弇传》
章帝建初元年	76年	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9000人讨哀牢王类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建初二年	77年	昆明夷卤承等应募讨哀牢王类牢。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建初四年	79年	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4000人击澧中蛮。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安帝永初四年	110年	虞诩设三科以募求壮士百人。 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击羌。	《后汉书·虞诩传》 《后汉书·庞参传》
永初五年	111年	募兵斩杜琦与羌通谋。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二年	115年	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击零昌党吕叔都等。 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击澧中蛮。	《后汉书·西羌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东汉纪年	公　元	募兵对象、人数及使用范围	备　　注
元初三年	116 年	州郡募善蛮讨溇中、澧中蛮。 任尚遣假司马募陷阵士击零昌于北地。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四年	117 年	复募効功种号封刺杀零昌。	《后汉书·西羌传》
元初五年	118 年	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	《后汉书·西羌传》
顺帝永和五年	140 年	庞浚募勇士 1500 人屯美阳。	《后汉书·西羌传》
建康元年	144 年	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讨广陵张婴起义军。	《后汉书·滕抚传》
冲帝永嘉元年	145 年	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起义军。	《后汉书·冲帝纪》
桓帝延熹二年	159 年	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击羌。	《后汉书·段颎传》
延熹五年	162 年	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长沙、零陵义军。 度尚广募杂种诸蛮夷进击豫章艾县起义。	《后汉书·度尚传》 《后汉书·度尚传》
灵帝建宁元年	168 年	刘陶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者击顺阳县奸猾。	《后汉书·刘陶传》假设年代。
熹平元年 光和元年	172 年 178 年	孙坚募召精勇千人击会稽许生。 朱儁简募家兵及所调 5000 人讨交趾梁龙等。	《三国志·孙坚传》 《后汉书·朱儁传》
中平元年	184 年	孙坚募商旅及淮、泗精兵千余人击黄巾军。 又皇甫嵩、朱儁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万人讨颍川黄巾。	《三国志·孙坚传》 《后汉书·皇甫嵩传》
中平二年	185 年	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击边章、韩遂及羌胡。	《后汉书·应劭传》

东汉纪年	公元	募兵对象、人数及使用范围	备注
中平五年	188年	何进派鲍信，张辽等四出募兵合数千人讨董卓。	《三国志·鲍信传》《张辽传》
中平六年	189年	曹操、刘备等募召合众讨董卓。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讨羌氐反叛。	《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马超传》
献帝初平元年	190年	曹操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千人。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初平二年	191年	何进遣张杨还并州募兵数千人。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初平四年	193年	公孙瓒简募锐士数千人击刘虞。	《后汉书·刘虞传》
兴平元年	194年	孙策依舅氏因缘召募数百人。	《资治通鉴》卷六十一
建安二十年	215年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八百人击孙权。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此表只是一个梗概，凡未系年的招募记录，并未列入其中。但仍可反映出东汉招募兵员的轮廓和发展趋势。			

东汉招募兵员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应募对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所谓“壮士”、“勇士”、“精勇”、“先登”、“陷阵士”、“锐士”、“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等等。除了身体健壮，有材力外，还要掌握技巧，肯于效力，有勇敢精神。当时尽管还没有像宋代以后那样，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但募兵条件亦多，只是根据不同场合、任务及战术要求，各有侧重而已。

其二，应募士通常享有一定的“赏赐”或“赐钱”。如明帝永平元年（58年）“募士戍陇右，赐钱人三万。”① 顺帝建康初年，广陵张婴等聚众起义，汉廷“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② 可见，应募为兵，并非纯属“义务”。他们除生活费用由官府禀给或就地筹

①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八《滕抚传》。

措之外，还可得到一定的“劳赏”。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官府募兵镇压长沙、零陵人民起义，当时豫章艾县600余人前往应募。后因“不得赏值，怨恚，遂反”①，表明当官府招募士兵，若违背募约不付“赏值”时，是要遭到应募士反对的。当然，东汉末年，在“牢直不毕，禀给断绝”② 的情况下，将帅“放兵掠夺”之事，也为常有。

其三，东汉募兵，一般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不少募士往往来自宗族乡里，并由宗族、乡耆主领应募。如章帝建初二年，“邪尤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③ 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汉廷博求将帅，“广开赏募……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徐）凤，斩之”。④ 又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军起于魏郡，汉廷讨之，朱儁表请孙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余人，与儁并力奋击”。⑤ 这些主领“宗亲”、“种人”应募的宗族、乡耆，若有功劳，可以享受“封侯”、“赐邑”的优待，拥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如昆明夷卤承，汉廷就曾对他“赐帛万匹，封为破虏邑侯”⑥。主领“宗亲”应募的下邳人谢安，也曾封为“平乡侯，邑三千户”⑦。在募兵过程中的这种家族和地区观念，对魏晋以后影响很大。

此外，募兵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西汉的招募多为临时性质。东汉不然，自废除更戍役制之后，出现了“兵无守备”的情况，为扭转这种形势，东汉王朝先后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其兵源有的是临时征调的，但多数乃来自招募。由于内郡驻防和边郡屯戍的需要，募兵也就由临时使用转变为长期使用了。事实上，当

---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⑥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⑦ 《后汉书》卷三十八《滕抚传》。

⑤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时许多“应募士”皆以从军为谋生手段，成为长期在役的职业兵。《汉乐府》诗中有所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描写，正反映了募兵役期之长。

史实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募兵的性质和方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或半强制的。既有公募，也有私募。汉代的募兵和它同期的征兵制固有不同，而与其后世的募兵相比，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东汉募兵是一种早期的职业兵，有过渡性色彩，地域宗族性很浓，封建束缚也较严，受募者的身份不如后世自由，名为招募，实际上仍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这种情况和封建社会初期的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①

应该指出，实行募兵，这在生产关系的发展史上有它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因为它有助于减轻编户的一部分兵役负担，与实行普遍的征兵制有别。同时，募兵一般经过选择，体格比较强壮，它又是职业兵，长期在役，娴于战阵。就应战能力而言，募兵通常较征兵为强。所以，军队的职业化，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但是，在东汉的历史条件下，大量实行募兵却带来了和统治者事与愿违的后果。主要表现在：(1) 募兵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征兵制下，编户服役是“义务”，不得向国家领取“劳赏”。但东汉的募兵，国家要给“应募士”以一定的“偿赐”或“赐钱”。这就增加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加重了军费负荷量。(2) 募兵的大量使用，成分复杂，不暇选择，使士兵的素质下降。特别是一些“亡命奸臧”、“伤人偷盗”者等各色人物应募到了军中后，“不恤军事”、“趁机抄掠”，军风败坏，政治质量很差，严重影响了战斗力。(3) 募兵的广泛推行，在东汉后期为军阀割据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方便。募兵与割据，这二者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东汉豪族地主的黑暗统治下，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的

---

① 黄今言著：《秦汉军制史论》，第92～9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演变发展。刺史、太守军权上升，中央往往将募兵之权交给地方长官个人去便宜行事，任其招募、扩充兵员，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使其成为自己的部曲、宾客、义从。这样以来，东汉统治者的募兵，并没有起到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反而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开了绿灯，培植了推翻东汉王朝的武装力量。

（三）有关收降与料简问题

东汉的兵役制度比较复杂，前面讲到，自内郡的更戍役制罢除之后，当时主要的集兵方式是实行募兵制。其所招募的兵源，既有农民、商贾，更有大量的刑徒和少数民族。有关“刑徒兵”及“夷兵”问题，前面各节已多有论及。这里仅就东汉时期的“收降”与“料简”问题，略予呈述。

“收降”，这是东汉时期补充兵员的途径之一。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普通士兵往往难以支配自己行动，或者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很容易被人利用。刘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组织、扩大兵源，就曾采用过收编农民军降兵的办法。如他在河北击败了铜马军后，“悉收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①。后来刘秀迫降赤眉后，又收降卒及家属20余万人。东汉末年的军阀们在击败政敌之后，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采取收编降卒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军队。例如：董卓进入京师洛阳后，曾经收编了已故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曲；之后，董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②，变为自己的军队。又如：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也曾招降青州黄巾30万，简选精勇，组织了一支“青州兵”。这些降卒被收编、改组之后，更易旗号，自然也就成为曹操的军队并为之效力了。可见，东汉时期通过收降是扩充兵员的一个办法。这对后世颇有影响。

“料简”是指军阀集团在其控制的势力范围中选取精壮补充兵员的一个办法。料简的方式，既有征，也有募。料简对象既有自

---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②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愿，也有强制者。东汉末年“料简”的事例不少。如灵帝光和年间，交趾、南海叛变，朝廷拜朱儁为交趾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①。建安八年(203年)，吴将贺齐率兵讨平汉兴等地的叛乱后，“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②。又曹魏的吕虔领太山太守，恩威并济。“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③在这些被料简的人员中，主要是县邑农民，也有逃亡之民。统治者料取他们当兵，带有较多的强制性。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地方势力抬头，社会动乱不已。所以兵役制度也就相当紊乱。当时，除主要实行募兵制外，收降、料简也成了统治者补充兵员的途径之一。对此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第二节　边防政策与边防建设

一、边 防 政 策

东汉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很多。大凡说之，北方有匈奴，西北有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有乌桓、鲜卑。还有南蛮、西南夷等。其主要边患是匈奴和西羌等族，它们经常扰边或内犯中原地区。故这里需要谈谈东汉的边防政策和边防策略问题。

(一) 边防政策的变化

新莽时期，边防政策有误，四夷乱起。如：匈奴发难北方，羌人寇掠西北，句町患起西南。王莽面对这些边患，兴师动众，先后发起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由于“征发烦数，军旅骚动”，赋役加重，“百姓怨恨”，导致社会危机加深，新莽覆灭。

东汉立国之初，经过长期战乱，“边陲萧条，靡有孑遗。”④ 内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②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③ 《三国志·魏书·吕虔传》。

④ 《汉官仪》卷上。

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刘秀为稳定封建经济秩序，“拨乱反正”，实行“柔道”方针，主张“偃武修文”。于是在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对外不曾轻易用兵。如前面所说，在建武年间，匈奴因遭受饥疫、旱蝗等自然灾害，加之匈奴统治集团内讧，“自相纷争”。[①] 这时臧宫与马武上书，要求汉廷趁机攻伐。但刘秀却说：“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②] 自后，诸将不敢再言用兵匈奴之事。又如：西域的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曾遣子入侍，愿意重新归汉，而光武帝刘秀乃以“中国初定”为由，还其侍子而赏赐之。“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③]。不过，为保卫中原文化及东汉政权，当时对边境地区、尤其对匈奴的防御设施，还是相当重视的。针对北境“障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④] 的状况，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二十一年，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修缮“障塞、亭候”。从而使边塞的防御体系基本上得到恢复。可见，东汉之初，对边防是主守而不主攻的，采取了一种类似“无为”的“俱存不扰”政策。[⑤]

但自明帝开始，由于匈奴及羌人时有内犯，故边防政策便发生了转守为攻的变化。此后，除在边境筑了坞壁、驻屯重兵以扼冲要之地外，为加强军事守备，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加强北边军事实力，伺机出击匈奴。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特设“度辽营”，命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遣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间隔北匈奴与南匈奴之欲叛者。此外，设“使匈奴中郎将”安集掾史，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③ 《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④ 《汉官仪》卷上。

⑤ 《后汉书》卷五《和帝纪》。

静”[①]，以监护南单于。永平十六年（73年），汉廷又派窦固、耿秉等驻屯凉州（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备击北匈奴，并占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地区，置“宜禾都尉”，在那里从事屯垦，切断北匈奴与西域的联系。

其二，恢复护羌校尉，用兵西羌。明帝永平元年（58年），以窦林为“护羌校尉”。自后，为加强对西羌的防务，护羌校尉乃为常设。同时，明帝曾派马武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等4万人征西羌。章帝之初，遣马防、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3万人征西羌。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又拜马贤为征西将军，率领重兵屯驻汉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西）以讨伐西羌的反抗。[②]

其三，派员经营西域，使其重新归附东汉。明帝时期，除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打通南道诸国外，于永平十七年（74年），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加强对西域的镇抚。不过，此举罢置无常。如章帝建初元年（76年），设戊己校尉官，不复遣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复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官。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又罢。其后，敦煌太守曹宗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只同意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至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又提出要经营西域，安帝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可见，东汉虽然几度经营西域，但用力不如对付匈奴、西羌那么大。然班超父子及任尚、陈睦等人经营西域之功，殊不可灭。

其四，加强对南方的防卫。在和帝永元年间，面对日南、象林的反叛，汉廷在那里设置了“象林兵长史”，居日南郡，以防有变。

诸多史实表明，东汉自明帝开始，在边防政策上已不同于光武之时，对边防的守备力量较前加强，且多有进取。但到后来，因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腐败，加之征兵制度破坏，而募兵又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出于很多因素，故东汉王朝对边防的守备力量大为削弱。

（二）“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

这里说的“夷”，是沿袭旧名，实即少数民族。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共同制御内犯的少数民族。它肇源于频繁的民族战争。“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在西汉时期已见端倪。如武帝之时，为对匈奴作战，曾经征用过东北地区的乌桓兵。宣帝时郑吉进攻西域的车师，动用了“城郭诸国兵”出征，而取得胜利。王莽时期，为进攻匈奴，曾发高句丽、乌桓及丁零兵出击。说明自西汉中期至王莽末年，汉廷使用“夷兵”的情况，已非少见。

但是，统治者有意识而又大量执行“以夷制夷”这一边防策略，当是在东汉时期。自光武帝刘秀建国伊始，特别是明帝以后，东汉政权无论对匈奴、南蛮、西域作战，还是对羌人的战争，通常都使用“夷兵”。既有利用周边某几个民族之实力克制另一民族；也有以蛮制蛮、以羌制羌者。这方面有大量史实可兹证明。

首先，东汉政权动用过羌、胡兵征伐北匈奴。如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命窦固、耿忠率酒泉、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1.2万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遣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西河羌胡及南匈奴兵1.1万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1.1万骑出平城塞。这四路大军，是汉兵与夷兵的混合编队，军容极盛。故北匈奴闻之，急往幕北逃窜。后来，北匈奴逐渐削弱，则南匈奴攻其前，丁零攻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诸国击其右，使北匈奴势力大受其挫。这说明东汉政权在击北匈奴时，除用羌胡兵、南匈奴兵之外，还用了乌桓、鲜卑兵或西域兵。“以夷制夷”策略思想，于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东汉政权以西域兵攻打西域诸国，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章

帝建初三年（78年），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等国之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今新疆温宿西北），杀其守军700人。此后，班超又调集疏勒、于寘诸国兵2.5万人进攻莎车，使其降服。又和帝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7万人，征讨焉者，诱斩焉耆王广。最后终于使西域50余国，皆纳质归汉。班超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开初仅36人随行，后来，汉廷对班超只增加了弛刑、义从计1800人作为援军，其余皆以西域各族之兵攻西域，而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也是“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贯彻和成功实践。

此外，东汉政权还采用过以羌制羌之策。如明帝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汉廷患之。于是派马武率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羌胡兵及弛刑，合4万人击之。① 章帝章和二年（88年），羌族首领迷唐患边，护羌校尉邓训，对其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方面，招降迷唐的叔父号吾等800余户；另一方面则调集湟中地区的秦、胡、羌兵4000人出塞，击破迷唐军，迫使他们西逃。在当时，利用羌人克制羌人的事例甚多，无须一一列举。

综观东汉时期，由于征兵制度日渐衰落，动用“夷兵”的情况，远较西汉为多。见于文献记载者，不下80余次。当时凡遇重大战事，东汉统治者往往都在“夷人”头上打主意。灵帝中平年间，羌犯三辅，情况危急，汉廷在研究对策时，皇甫嵩主张征用“乌桓兵”，邹靖主张募用“鲜卑兵”，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开往战场。这三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要使用“夷兵”或“以夷制夷”乃是一致的。东汉统治者对“以夷制夷”策略的执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用上，都远远超过了西汉。

东汉实行“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主要表现在：(1)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兵，改变了汉军的兵员结构，弥补了它以往的某些缺限。少数民族兵懂得戎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武传》。

俗，善于骑射，比较精勇，它通常比内郡的士兵战斗力强。(2)对付边犯就地动用少数民族兵，有助于节省国家的财政军费开支。"以夷制夷"，就地调兵，聚集兵员快，也可减少后勤转输方面的一些困难。(3)广泛使用少数民族兵镇抚边境，既减轻了内郡人民的兵徭负担，又可使东汉政权坐享大功。史称：光武以来，"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① 又云："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② 同时，东汉实行"以夷制夷"策略，不仅充实了汉军兵源，而且对革新汉军的战略、战术有重要意义，对中原军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夷兵"，使兵役负担由内地人民向少数民族身上转移，加剧了民族矛盾。再说，"夷兵"难于约束，如果处理不当，往往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因此，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善用之乃收其利；不善用之，则大受其害。

二、军屯的推广和它的特点

且耕且守的屯田，不同于一般的农业生产，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而组织的农垦活动。军屯是边境地区民族战争的产物，也是中原王朝筹粮积谷、守卫边防的重要措施。

(一) 屯田区的发展和分布

自西汉武帝开创军屯之后，历朝皆有沿袭。

东汉初期，由于战争未尽，生产破坏，光武帝刘秀曾令诸将在内郡一些地区实行军屯，以增强经济实力，解决军粮的供应。如建武四年（28年）刘隆"屯田武当（今湖北十堰市东北)"③。建武五年（29年），张纯"屯田南阳"④。建武六年李通"屯田顺阳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

④ 《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

(今河南内乡西南)"①。同年王霸"屯田新安(今河南渑池东)",两年后,又"屯田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② 这些屯田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司隶和荆州一带。光武帝曾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③ 说明这些军屯收到了较好的效益。但时隔不久,由于作战对象转移,内郡的军屯便旋即罢废,陆续转向到边郡屯田。主要分布在如下几个地区:

1、北方边郡的屯田

东汉为防备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在北部边郡的不少地方设置了军屯。光武帝建武七年(31年),遣杜茂领兵"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④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在朔方、西河、上郡三处屯田,所谓"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⑤ 其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置玄菟郡屯田之部"。⑥ 这里,除玄菟郡的屯田是为了安定东北边郡外,其他如晋阳、广武、朔方、西河、上郡等地的屯田,主要是为了防备匈奴的进犯。

2、西域地区的屯田

王莽统治之时,因西域诸国反抗王莽的民族歧视政策,"西域因绝",匈奴乘机控制了西域,汉武帝以来的西域屯田遂止。东汉初年,因中原初定,无暇顾及,一度没有对西域进行经营。自明帝时起,便遵守汉武故事,"击匈奴,通西域",重新在西域屯田。但时断时续,屯田点主要集中于伊吾、柳中、楼兰等地。

伊吾屯田:始见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史称:当时汉廷"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

①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③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⑤ 《全后汉文》卷三十五应劭《汉官仪》下。

⑥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域。”① 伊吾卢屯田即今新疆哈密地区的屯田，于章帝建初元年(76年)，曾一度罢废。②但到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又重新“复伊吾屯田”。③ 可见，伊吾卢的屯田，时设时废，不太稳定。这与当时该地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

柳中屯田：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东汉击破车师之后，“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各屯置数百人”。④有关金满城的屯田，史文简缺，难于详考。但从此开始，柳中（今新疆吐鲁番）的屯田，则多有记录。如安帝延光二年（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第二年，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后，又收部众5000余人，“屯田柳中”。⑤ 接着，班勇便以柳中屯田区为基地，开展了讨平焉耆等国的军事活动。

楼兰屯田：章帝建初元年（76年），杨终上疏说：“自永平以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结怨边城。”⑥ 又载：“敦煌索励字产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积粟百万，威服国外”。⑦ 这说明不仅有楼兰屯田，而且效果不错，“积粟百万”。

明帝永平以后在西域的上述几处屯田，土质及灌溉条件较好，又都在西域东部的交通线上，属要冲之地。东汉政权在这些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屯田，目的在于反击匈奴对西域的控制。

3、河湟地区的屯田

东汉自和帝以后，汉族统治者与羌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为防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③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④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附班勇传》。

⑥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⑦ 《水经注》卷二河水注。

御塞外诸羌的掠夺和内迁降羌的反抗，东汉政权在军事征伐的同时，还在黄河沿岸及龙耆、湟中等地实行屯田。

黄河沿岸的屯田：这主要是指金城西南部黄河沿岸的屯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烧当羌迷唐在东汉“剿抚兼施”的策略进攻下，分化瓦解，部众向西远徙，余皆“款塞纳质”，归附于汉。于是汉廷命邓训：“遂罢屯兵，各令归部，惟置弛刑徒二千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①这是在河湟地区最早的屯田点。邓训所部的屯田，当在金城郡西南部黄河北岸的安夷、临羌两县以南地区。之后，于永元十四年(102年)，曹凤建议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地区“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接着，金城长史上官鸿建议：“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也建议：“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逢、留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② 由此观之，永元十四年以后，东汉在黄河沿岸的屯田，比邓训所主持的屯田地区扩大了，合起来有34部之多。

龙耆屯田：该地屯田始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其缘由即上引曹凤“广设屯田”的建议被采纳之后，“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尉以戍之”，“于是拜(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③这里的“龙耆”，在今青海省海晏附近，“徙士”的人数不详，估计规模较小。

湟中屯田：据载，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右扶风韩皓代马贤为校尉，次年，“(韩皓)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警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五部，并为十部。”④湟中，指今青海湟水两岸地区。这里屯田的起止时间不见记载。但湟中屯田规模不小，似无可疑。

除以上河湟地区的屯田外，灵帝时期在汉阳(今甘肃天水西

---

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附邓训传》。

②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北）地区也有屯田。如中平三年（186年），汉阳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①看来，汉阳屯田的目的是为了安置降羌。

（二）屯田的特点和作用

东汉的军屯和西汉比较有相同之处。二者都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的集体耕垦活动，屯田士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他们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耕牛、农具、衣食等由国家提供，屯田收获物一律上交国家。两汉军屯的性质是一致的。但是，东汉军屯也有不同于西汉的地方，具有它鲜明的时代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屯田的范围和地区来说，西汉时的屯区较广，包括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河西走廊的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赤谷城，以及河湟、陇右等地皆有军屯。屯田士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东汉的屯田，虽然也集中在北方、凉州、西域地区，但屯田点远不如西汉之多，屯田人数也比西汉减少。不过，东汉之初，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当时的屯田已发展到了内郡，开创了历史上中原地区屯田的先例。

其次，就屯田者的成分来说，西汉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戍田卒”，是内郡征往边郡“屯戍一岁”的服役农民。役期一年，“一岁一更”，瓜代明确。东汉时期，由于废止了更戍役制度，在边境地区，除临时招募、征发一些军队戍守外，还大量运用刑徒从事防守。故当时的屯田士，通常以弛刑和免刑罪人为主。如杜茂主持的屯田中有“弛刑徒”。② 马援在朔方、西河、上郡所建立的“三营”屯田，有“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③。邓训在河湟地区的屯田，“唯置刑徒二千人”在那里屯垦。④ 班勇为西域长史主持柳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引应劭《汉官》。

④ 《后汉书》卷十六《邓训传》。

中屯田，也有“弛刑士五百人”①，这都是例证。而且东汉的刑徒、免刑罪人戍边、屯田，没有明确的役期。

第三，就屯田的组织来说，西汉的屯田，通常设有单独的管理系统，如在大司农下，设有农都尉、农令、农长、农亭长等。东汉时的屯田则没有士兵、田卒之分，也无单独的各级屯田管理系统，军官就是田官，一身而二任。虽然有的郡设有农都尉掌管屯田(宜禾都尉也相当于郡一级)，但下级无单独的完整的管理系统，大致只分为营、部一类的组织。如汉阳郡的“四十余营”屯田，玄菟郡的“六部”屯田，金城郡的“三十四部”屯田等。②

至于东汉屯田的作用问题，可以说如同西汉一样，皆收到了一定效果。由于屯田士的且耕且守，一方面，保证了部分的军粮供给；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边郡的防御力量，开发了边疆，促进了西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安帝时的曹凤所说：“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无西方之忧。”③ 此外，范晔也曾说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之。汉世张骞怀致远之路，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役……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贾贩，日款塞下”。④这虽是就东、西汉合起来说的，亦非单论屯田，但东汉屯田的意义和作用是很显然的。

三、边防设施

为防备边犯，保卫中原王朝的安全，自秦汉以来，边境地区就已有许多的守卫设施。东汉时期，在边塞也修筑了亭燧、坞壁

---

①④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② 关于两汉的屯田问题，时人多有论述。可参见柳春藩著：《秦汉魏晋经济制度研究》，第82～8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光华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第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等一些主要的军事设施。

（一）亭燧

“亭”，似为乡亭之引申，汉有“十里一亭”之制。“燧”或作“隧”、“㷡”。《说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所谓“亭燧”，是指边塞基层组织的一种军事建筑，处边境防御体系的最前沿。“亭”有时又和“障”相连，称为“亭障”。这大概都与其“谨候望，通烽火”的功能有关。

亭燧或亭障，早已有之。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① 西汉之时，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史云：“击破姑师，虏楼兰王，列亭障至玉门矣。”②“建塞障，起亭燧”，“前以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谨候望通烽火而矣。”③ 当时为防御匈奴南犯，在北疆边塞修造了不少亭燧或亭障一类的军事建筑。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边境的“鄣塞破坏，亭队（燧）绝灭”。④ 当时尽管光武帝刘秀实行保守的边防政策，但对边防的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如建武十二年（36年），遣杜茂“将众郡施（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⑤ 建武十三年（37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⑥ 建武十四年，马武“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⑦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燧，

---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③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④ 《汉官仪》卷上。

⑤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⑥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⑦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保壁稍兴。"① 由于当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故西北边塞的亭燧体系基本上得到了恢复。

自光武帝之后，由于边境战事频繁，对亭燧也时有修筑。如顺帝永建元年（126年），"诏幽、并、凉州刺史……严敕障塞，缮设屯备。"②

建亭燧的目的，在于"谨候望，通烽火"。也就是窥伺塞外敌情，侦察敌方动静，以烽示警，传达军令。

为有效地实现"候望"，在亭燧戍所设有各种观察装置和侦迹设施。平时谨慎迹候，战时举烽报警，为塞防之耳目。"烽火"又称"烽燧"。据载：当时"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③ 对烽燧的解释，历来不一。事实上，烟易见于白昼，故昼燔燧，火易见于夜晚，故夜晚举烽。所谓"通烽火"，即迅速传递警示，举烽报警。其任务由"燧卒"或"亭候吏卒"承担。因此，亭燧不是指施政主民的机构，而是边塞守望、防敌的军事设施，是重要的边防工程。但到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对边境的亭燧建设较前有所放松。

（二）坞壁

"坞"和"壁"原是两种不同的军事设施。"壁"的出现早于"坞"。何谓"壁"？许慎《说文解字》曰："垒，军壁也"；"壁，垣也"。可知，壁是军营的墙壁式防御工事，是"军所止之处"，或"军营之垒舍"。④ 早在战国之时已有。至于"坞"又作"隖"。对此古人有多种解释。《说文解字》云："隖，小障也，一曰庳城。"《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通俗文》曰："营居曰坞，

---

①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注。

②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注引《前书音义》。

④ 参见《周礼·夏官·量人》及注。

一曰庳城也。”诸说大同小异，皆指用于守卫的“小城”，也属军事建筑设施。因为坞和壁的性质相近，故东汉时期，往往“坞壁”连称，有时坞壁也称“营坞”，或称之“城坞”。

“坞”这种军事设施，西汉中期的边郡已有。如据居延汉简：“五凤二年八月辛巳朔，乙酉，甲渠万岁隧长成敢言之，乃七月戊寅夜临坞，坠伤要，有瘳。即日视事，敢言之。”① 这是燧长夜间亲临于“坞”视事的记录，此事发生在汉宣帝之时。

东汉时期，有关“坞”或“坞壁”的记载甚多。例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贯友遣兵出塞，“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羌）。”②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时羌复屡入郡界，（樊）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③同年又“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114年），“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元初三年（116年）任尚击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④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⑤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⑥ 当时的“坞壁”、或“城坞”、“营坞”等，都是边塞上的军事设施，属守卫建筑物。所谓“坞候”的“候”，当指候望，是坞上的候望设置。东汉之时，不仅国家在边塞上筑有坞壁，而且豪族地主为保护自己的家院，有时也往往建造坞壁。如当时的清河大姓赵纲就曾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⑦ 这可能是边塞坞壁的发展。

坞壁的建筑形式，文献未作具体说明。大概是四周环以垣墙，

---

① 《居延汉简甲乙编》6·8。

②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准传》。

⑥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⑦ 《后汉书》卷七十七《李章传》。

设有门户可供出入的一种营居。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中，发现一幅坞壁图。图上坞壁呈四方形，四边环绕高墙，一隅带有角楼。① 这应是当时北方坞壁形状的反映。又在今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发现了一种楼院式的坞壁模型。这一坞壁的四周也筑有高墙，且正门上有门楼，四隅有角楼。除正门外，其他三面还设重墙，重墙各开一门，大门只设在正面；院中还建有五层高楼，楼的正面开门窗；门楼与角楼和各个角楼之间有带栏杆的天桥相通。②这座坞壁模型，比和林格尔的坞壁图在形式上显得复杂。这二者虽然出之于墓葬，墓主人或许是豪族地主。但这些考古资料，可以反映东汉边境的坞壁建筑形制，则似无可疑。

坞壁的大小不一。东汉末年，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③ 这当是大型的坞壁了。通常不一定有如此之大。

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坞壁内部的结构皆较复杂。如据汉简记载：“坞上矢目二，不事用。”（192）（68·95）“坞上转射二所，深目不辟除。”（242）（89·21）“临木燧长王横，外坞户下□，内坞户毋一〼”（196）（68·63）④。这说明，坞上不但有矢目、转射，而且有深目和表等，还有外坞与内坞之分。很明显，这种“坞”既与候望、侦察敌情有关；同时它又是边防存粮积谷、设兵屯守的重要阵地，其中驻有军队“警设守备”。

这里要说明的是，到东汉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豪族地主势力的扩张，军阀割据势力的膨胀，它们也都纷纷建筑起坞壁来了，并以之“拥兵自守”。但对国家边防上的坞壁设施却有放松，因而

---

①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③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④ 劳干：《居延汉简释文》。

削弱了防备力量。

第三节　在军制和边防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一、废除更戍役制度，战略后备力量薄弱

宋人陈傅良在总结东汉军制时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① 光武帝刘秀是依靠武力起家并夺取天下的，照例他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当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但刘秀立国之后，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著籍"者少，征兵制已失去了合理摊派的基础，要想按照西汉传统方式征集兵源已有困难。加之刘秀实行以"柔道"治国的方针，主张"偃武修文"，所以，在刘秀当政后不久，果断地采取了"罢兵"政策。

东汉罢省兵员是全方位的。不仅"内省营卫之士，外罢缴候之职，"② 对中央军进行了相对的调整和部分压缩；而且对地方军进行了大量的裁削。在当时，既"罢郡国都尉"③、"关都尉"④，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⑤，接着还"罢边郡亭候吏卒"⑥。这些大刀阔斧的"罢兵"措施，实际上是对西汉以来长期实行的更戍役制的废止。尽管其时编户的军籍仍存，然而兵役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它取消了西汉以来的正卒之制和内郡人民戍边的制度。

东汉政权罢材官、骑士，废除更戍役制，这对安抚小农，减轻农民兵役负担等诚然有利。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郡国无常设之兵，关隘无重兵驻守，边防也无当番候望的戍卒，更

---

① 《历代兵制》。

② 《历代兵制·东汉》。

③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⑤⑥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造成了“兵不能继”①，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的后果。

本来西汉之时，一般坚持“量地远近，就地调发”的用兵原则，如备胡通常发上郡、陇西、北地之兵，事越便发会稽、豫章之兵，击朝鲜乃举辽东之兵，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一再”。但东汉时，由于更戍役制废止，兵员不继，于是一方有急，便“羽檄被于三边”。如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嶙等反叛，汉廷公卿百官皆议："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进行讨伐。而李固则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槃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② 从李固之言可知，边郡有事临时征发，调兵远赴万里，困难殊多，很难适应急战之需。

由于郡国特别是边境缺乏应急之兵，兵不能继，每遇重大战争，只好常常依靠中央军出击，使“南北二军交惊于境”③。结果，“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④中央军被迫四出对付边患，京师的安全也就难于得到保障。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陈傅良认为，这主要是光武帝刘秀“销兵为之也。”⑤其说不无道理。

为弥补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的缺陷，东汉政权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⑥同时，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以代替番上的正卒；在边郡则利用弛刑徒、属国兵守边，以

---

①③④⑤⑥ 《历代兵制·东汉》。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替代从前的戍卒。再就是通过大量的招募来补充兵员。但由于内郡更戍役制的废止，东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兵源不继的问题。纵观东汉一朝，无论战略后备力量，战争规模、还是军事实力等，均不如西汉之盛。

二、军队缺乏训练、素质差，战斗力不强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人说："军无练习，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① 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军事训练有密切关系。但东汉立国后，鉴于翟义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的教训，出于控制地方异己势力作乱，配合当时的军制改革，故于建武六年（30年），明令宣布"无都试之役"②。

"都试"一词，在文献中有时称"校阅"，在汉简中称"秋射"。这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是对军队作战能力的一种考核和检验。在西汉一代，无论中央军或地方军，每年秋季都得举行一次。这种大讲武、大校阅的场面非常隆重壮观。都试的科目，因地而异。在设有楼船的郡国，演习行船水战；北方一些郡国则采取骑兵行射或巡行障塞的形式，有的还行"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核士兵的训练程度及材力。所以，《汉旧仪》说："岁终都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这种对士兵的考核、军事演习，一般都在郡治举行，由郡守、都尉负责，县令、长、丞、尉皆得参加。但东汉时期，由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主办都试的郡国都尉被罢了，都试主要对象即应征服役的材官、骑士等也被罢了，故都试之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可能。都试的被废除，也就意味着士兵定期进行训练、演习的制度被取消了。一句话，过去那种"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的情况，也成了历史。

---

① 《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②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军事训练从来就是为一定的战争服务的。它无不坚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的原则出发。面对东汉军队"无都试之役"的情况，当时就有不少人进行评议。如郑太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① 荀悦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卒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② 郑、荀二人都明确指出，东汉由于罢都试，"不教民战"，人们"忘战日久"，缺少军事训练，所以"不能为害"，军队战斗力不强。

东汉军队的另一重要之点，就是士兵自身的素质很差。前面讲到，刘秀罢材官、骑士，废除更戍役制后，征兵制已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其兵源主要来自招募，军队通常由募兵所组成。随着招募范围的扩大，人数不断增多，官方往往不暇选择。于是招募来的士兵成分日渐复杂。其中除农民之外，还有其他各色人员。如："伤人偷盗者"③、"亡命奸臧"、"剽轻剑客"④、"商贾惰游子弟"⑤，"弛刑徒"⑥、"杂种蛮夷"⑦ 等。这各色人员招募到了部队后，使士兵的素质显著下降。首先，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有奶便是娘，而且多有"趁机掠劫"之行。东汉统治者招募士兵，往往靠财物为诱饵⑧；而应募的亡命奸臧者流，亦往往"意在抄掠"，"暴横民间"⑨，"私自润入"，"不恤军事"⑩。再一表现就是军风败坏，不讲戎阵。史称："旧时（指东汉）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

---

① 《后汉书》卷七十八《郑太传》。

② 《申鉴》。

③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④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⑤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⑥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⑦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⑧ 《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传》。

⑨ 《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

⑩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稀）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①。由于临阵招募，对士卒既不简练，不讲戎阵，又不务营佃，不修器械，军纪十分松弛。此种情况，东汉后期尤甚。

由于军队缺乏必要的训练，加之募兵素质差。所以出现“外之士兵不练，内之士兵不精”②。“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③“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④ 军队的战斗力明显削弱。

三、官无警备，没有巩固的边防，酿成长期边患

查东汉一朝，武官出身于文吏者为数甚多。赵翼说：“东汉功臣多近儒。”⑤ 不仅东汉初的邓禹、冯异、贾复、耿弇、祭遵等人“好读书”、“通经术”，后来成为将军，到东汉后期的武官，更是文吏出身者居多。如牟融“少好学，名称州里”而迁为太尉⑥，桓焉以“明经笃行，有名称”，而代王龚为太尉⑦。在有史可查的五十多任太尉中，先文后武者占有很大比例。至于掌握地方军权的太守、令长，也往往多为“四方学士”，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的。文吏掌兵，有利于皇帝集中军权，统一指挥，防止骄兵悍将，“拥兵专制之虞”。但是，在这些文人学士中，除部分有识之士能匡正时弊外，有相当多的人乃通常只知经学章句，不懂兵要，甚

---

①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② 《文献通考·兵考》引章氏之说。

③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④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⑤ 《二十二史劄记》。

⑥ 《后汉书》卷二十六《牟融传》。

⑦ 《后汉书》卷三十七《桓焉传》。

至在观念上轻视军事。如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阵之法，故猾贼纵横，乖此无备。”① 由于他们主张“武功宜废”，不要武备，故反映在边防问题上也就多被忽视，最终未能形成巩固的边防。

首先一个表现，是边防指导思想保守。刘秀在位时，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重守而不主攻。自明帝以后，边防政策虽有变化，但在“以柔道行之”的方针指引下，边防政策仍较保守。当时，由于“疲驽守境，贪残牧民”。②“令长守相，不思立功”③，故对边境的防务，并没有落到实处。同时，面对羌胡的进犯，往往推行以“恩信招降”的政策。如安帝元初元年（114 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庞）参以恩信招诱之”④。永和年间，大将军梁商面对匈奴的进犯，也上书顺帝宜以“恩信招降”。⑤ 但这种政策，并未收到什么效用，有时反而“招致乖叛”，使羌胡犯边愈演愈烈。因为在边防战略上不图进取，故“羌戎溃叛，不由承平。”⑥

其二是边防武装力量单弱。自从“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取消了西汉的戍卒制度后，在边境地区，主要利用弛刑徒或少数民族兵从事防守。当时尽管汉廷在边境驻有度辽营、象林兵、渔阳营等，但基本上也多由招募的弛刑徒或“夷兵”组织起来的，而且这些“营兵”，后备力量薄弱，兵力也不多。特别是允许刑徒携带家属同往边境，很难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由于“边郡守御之兵不精”⑦，边防军事实力不强，所以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③ 《潜夫论》卷二《考绩》。

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⑤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⑥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⑦ 《历代兵制·东汉》。

第三是边防工程建设不力。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从公卿大夫到州牧郡守，“率多怠慢”、“不恤公事”。又他们多是内郡之人，“无守战意”，没有坚守边防的打算，故当时对亭障、烽燧等边防工程的建设不够重视；军事屯田时置时废，屯田点及屯田人数也比西汉少得多。边郡的“太守令长，畏恶军事”①，每有战急，乃“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② 由于没有巩固的边防，又未能“因俗而治”，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酿成长期边患，使边境地区“岁无宁日”。据粗略统计，自安帝至东汉末季，匈奴大规模的犯边有 20 余次，羌人犯边近 40 次，鲜卑犯边达 30 余次。至灵帝立，幽、并、凉三州，无岁不被寇抄。③ 这种情况，不仅百姓遭殃，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且战争消耗量很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军费负担。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

① 《潜夫论》卷五《实边》。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西羌传、乌桓鲜卑传等。

第五章　东汉的武器装备与后勤

武器装备与后勤，是军队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物质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不但是军力和政治的竞赛，同时也是物质的竞赛。军队如果离开了武器装备、粮草、衣物、转输能力等物质条件，要想克敌制胜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①毛泽东也曾说过："战争就是两军指战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② 战争的根本性基础是物质。本章专就东汉的武器装备与后勤问题，根据目前仅有的材料，择其要者略予陈述。

第一节　武器装备

一、武器的发展与储备

武器（兵器）是战争的工具，也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一个基本标志。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固然是首要的，但武器乃是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

（一）武器的种类及其演进

随着冶炼技术和锻造工艺水平的提高，西汉时期的武器种类已有多种多样。如当时的长柄兵器有枪、矛、戟等；短柄兵器有刀、剑等；远射兵器有弓、弩等；防护装具有铠甲、盾牌；锤砸、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90 页。

劈砍兵器有锤、杖、斧、钺等。这些兵器多为铁制品，质量较高，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东汉武器的种类和质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矛、戟、枪、刀、弩、箭、铠甲等项。

矛：矛是东汉军队装备的一种刺杀兵器。东汉时有的矛比西汉更长。

戟：戈与矛的合体，兼有勾、啄、冲、刺四种杀伤作用。东汉时，以戟为兵器的名将甚多，有长柄戟、手戟（短戟）和双戟。这些戟非常锋利，杀伤力较西汉时更大。

枪：枪也是一种刺杀兵器，形制与矛相类似。《通俗文》曰："剡木伤盗曰枪。"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提到了"枪"①。枪有木柄、竹柄两种。东汉时期，枪仍为军队的主要武器。

刀：西汉时出现了一种专用于劈砍的铁质短柄刀，又名环柄刀或环首刀。东汉时期，军队已普遍使用钢刀。如：1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永初六年（112年）"卅湅（即炼）大刀"。北京钢铁学院曾经对它进行了测验，证明它是由含碳0.6%～0.7%的炒钢为原料经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碳的分布相当均匀，刃口经过淬火处理，质量已达很高的水平。此外，还曾经出土过"百炼"钢刀，比"卅湅"的质量更好。② 表明制造钢刀的技术，在东汉已进入到了成熟阶段。③

弩：是一种远射兵器，即安有臂的弓，弓臂上设有弩机。这种"弩"，于春秋末年的吴、越等国已见使用。④ 西汉时期有用臂拉开的擘（bò）张弩和利用脚踏开的蹶（juè 决）张弩两种。到东汉时期，弩的种类增多，主要分"强弩"和"小弩"两种。强弩的射程和杀伤力比小弩更大。据载：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羌

---

① 见《墨子·备城门》："枪二十枝"。

② 见自然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③ 《文物》1974年第1期。

④ 见《孙子兵法·作战篇》。

众万余，攻围赤亭（今甘肃成县西南），（虞）诩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①《陈球传》说："以弦木为弓，以羽牙为矢，引机（弩机）发射，远射千余步”。强弩的射程可达千步之外。在居延汉简中，有关“弩”的记录很多。当时弩的射程和强度，通常以“石”计算，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八级，一般六石弩最为常用，大约可射 260 米。至于十石强弩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大。大量史实表明，“弩”是汉军的“长技”之一，东汉时期仍为军队的重要武器，且有所发展。由于弩的普遍使用，射弩的方法和经验日益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弩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作战中的进攻性和杀伤力。它比弓箭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弩的性能，便于较长时间的瞄准，提高了命中精度；同时，张弩射箭既可用臂力，也可用脚踏等方法，这就有助于拉弦力量的加强，使射程增远，穿透效能提高，从而增强了杀伤力。

箭：弓、弩所使用的箭，又称“矢”或“镞”。西汉的箭矢，形制和战国之时大体相同，但箭矢加长，分长尾和短尾两种。到东汉时期，已使用“毒箭”。即在箭矢上敷用毒药，以增强箭的效能。如明帝永平十八年（75 年），北匈奴攻金浦城（今新疆孚远县），校尉耿恭“以毒药傅矢”，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遂遁去。② 可见，在当时的战斗中，毒箭发挥了一定的威力，增大了箭的杀伤效能。

铠甲：是一种护体装备。铁兵器出现和弓弩的发展，促进了护体装备的改进。西汉之时，铁制铠甲日益增多。到东汉时期，铁制“鱼鳞甲”已在军中普遍使用。据考古发掘，在沂南画像石上有刻制了一领铁制的鱼鳞甲。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中，出土的陶制楼阁上也有披戴鱼鳞甲的武士守卫。在当时，随着炼钢技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术的提高，铁铠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提高，表现在铠甲的坚度增强，类型增多和防卫性能增大。在曹植《先帝赐臣铠表》中，出现有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等。诸多事例表明，东汉时期铁铠制作已逐渐完善。

东汉时期，不仅对西汉原有的一些武器，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发展；而且创制了多件新式武器。其突出表现是"钩镶"和"偃月刀"。

钩镶：这是把钩和盾结合在一起的武器。它见于武氏祠画像石和邹县黄陆屯画像石。①考古工作者在四川成渝铁路沿线，还发现了一种钩镶实物，铁质，长 54 厘米。据刘熙《释名》说："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是一种能攻可守的武器。

偃月刀：是一种安有长柄的大刀，故又称"长刀"，属劈砍兵器，也创自东汉时期。这种刀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如《典韦传》说：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关羽所用的也是长刀，形如"偃月"，所以当时人往往称它为"偃月刀"。步兵、骑兵皆可使用。后来，唐代的"陌刀"大概是由此发展而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②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战术是为技术所决定的。东汉时期，由于武器种类的增多，质量的改进，武器性能的逐步提高，曾经对战术各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

（二）武器的生产与储备

武器生产与经济条件、科技水平密切相关，它主要以生产力

---

① 《考古》1975 年第 2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第 12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

为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行政管理机构之发展，东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和其他官府手工业生产一样，已由多系统、多部门进行。不仅中央的考工、尚方生产武器，地方上的工官生产武器，甚至武库也还有生产武器的职能。

“考工”在西汉时属少府，东汉改属太仆。考工令，“主作器械”，掌武器生产，这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如《百官志》说：“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又崔寔《政论》云：“永平建武之际，去战未久，官兵劲利，有蔡太仆之弩，檀名天下。”① 此外，据考古资料，还有考工所造弩机的实物。如在河南灵宝张湾的东汉墓葬里，获得一件郭长 12.7 厘米的铜弩机，它的望山上有五道刻度，在弩郭的一侧有铭文曰:“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八石矶,廓工吴孟作,造工王山，太仆监古工掾□，令伧，丞诗，掾□，史旦主。”② 另据《汉金文录》也有“太仆京兆官弩”的字样。③ 这说明，当时的“弩机”等兵器，由中央的考工令所造，确无可疑。

“尚方”亦掌武器生产。《百官志》说：“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不少史实表明，尚方令不仅负责御用“刀、剑”的制造，也生产“弩机”等其他武器。陈直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指出：西汉的尚方令，分为左、中、右三尚方，它们皆可制造弩机。属于左尚方造的有左尚方几十四弩机。④属于右尚方造的有元康元年弩机。⑤属于中尚方造的则有中尚方弩机。⑥ 东汉尚方令所造的弩机有：明帝永平元年（58

---

① 见《北堂书抄》卷一百二十五。

② 杨泓：《古代兵器史稿》，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7 页。

③ 转引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 140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④ 《积古斋种鼎款识》卷十，第 2 页。

⑤ 《金石索·金索二》，第 126 页。

⑥ 《贞松堂集遗文》卷十六第 7 页。

年）中尚方弩机；[1] 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中尚方弩机。[2] 安帝元初二年（115 年）中尚方八石弩机。[3] 这说明两汉之时，三尚方皆可制造弩机等武器。至曹魏时，仍沿用此种制度。

工官是郡国生产武器的重要部门。史称："汉自郡国至京师，皆有武备，在郡皆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产铁之郡"[4]。当时凡有产铁之地，如河南、南阳、河内、河东、汝南、蜀郡等地，均设有工官，且一般皆负责制造兵器，两汉皆然。例如：在南阳，有"盾一完元康三年南阳工官造。"[5] 在河东，有"永元八年（96 年）河东铜官所造四石机"。[6]在河内，有"河内工官七千四百十甲"。[7] 在东郡，有"白马十石东郡白马郭任弩一石直八千。"[8] 在汝南，则有"汝南郡八石弩机郭，永平十八年（75 年），工李仲上造，护工史彪平兴，守令召坚，左尉□，丞召羽主。"[9] 除甲盾和弩机外，其它兵器也有由工官所造者，江苏徐州就曾发现东汉建初二年（77 年）蜀郡工官所造的剑。叫做"五十湅钢剑"。[10]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汉代工官的设置与铁有联系，"置有工官的八郡，除了广汉以外，都是铁的产地。由此看来，不妨认为工官是掌兵器制造的。"[11] 其说有一定道理。

武库具有生产功能，这在先秦时期已然，两汉仍旧。《百官志》说："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这里"主兵器"的内涵，除指"收藏"外，也当包括"制造"。见于记载的有"上党武

---

① 《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 2 页。

② 《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 17 页。

③ 《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 18 页。

④ 《汉唐事笺》卷六，兵器条。

⑤⑥ 《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第 16 页。

⑦ 《汉金文录》卷六第 28 页。

⑧ 《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卷下 34 页。

⑨ 《汉金文录》卷六第 15 页。

⑩ 《文物》1979 年第七期。

⑪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第 77 页，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库戟”。① 有西汉“下库”箭镞。② 这都是当时武库所属作坊里生产的武器。此种情况，东汉也当不会例外。可见，武库不仅是储藏设施，同时也是生产武器的单位。只是这时武库的生产功能较先秦有所削弱就是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武库令“主兵器”的职能。

诸多事实告诉我们，东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同样直接控制在国家手中，为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武备供应，当时对武器的生产，大体上沿袭了西汉体制，分为中央、郡国两个系统，设有专门机构和吏员。除中央的考工、尚方外，各级工官和武库令也有制造兵器的任务。同时根据秦代以来的史籍表明，统治者为保持武器生产的稳定性，不断改进和提高质量，当时对武器生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仅十分重视武器产品的规格，而且要求按计划生产，制造的武器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考评和验收。但自东汉安、顺以后，由于政治腐败，政府机构的纪律和效率败坏，因而致使武器的质量日趋低劣。如据当时人崔寔说："顷主者既不敕慎，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③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东汉官吏在制造兵器方面存在的弊端。由于官府计划不周，官吏贪污经费，工人偷工减料，所以出现了武器质量很差，不堪使用的情况。

东汉武器的储备量有多大？查考有关史籍，古人未曾留下系统而完整的数据。但当时每次生产武器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河内工官一次就造甲“七千四百具”④。东汉末年，有的一次造刀数千至一万把。从公元 25 年至 220 年的整个东汉时期，先后所进

---

① 《汉金文录》卷六。

② 《陶斋古文录》卷七。

③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崔寔《政论》。

④ 《汉金文录》卷六第 28 页。

行的各类战争达260余次，其所消耗的武器量是可想而知的，其间必有大量的武器储备，乃无容置疑。

为加强对武器的储备和管理，统治者非常重视武库建设。两汉之时，作为"精兵所聚"的武库，从中央到地方皆备。凡考工所造的武器，通常送入京师或中央级武库保管；郡国工官所造武器，藏入本地之武库，供地方部队或由中央统一调用。凡武库所藏的兵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要登记造册，设专官发放，没有皇帝的诏令，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库令，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或要员担任。武库系统，对军队武装力量的建设占有重要地位。各级武库拥有大量的军事储备，意味着国家握有一支庞大的物化了的军队。

二、车船的种类与制造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东汉时期，车、船制造业较前发展，产品数量日趋增多。车、船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

（一）军车

在汉代，尤其到东汉时期，车兵虽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但各种军用车辆仍大量使用。每次重大军事行动，所使用的车辆常常以数千上万计。例如：

东汉初，于建武元年（25年），邓禹自箕关（今王屋县）进入河东，破河东都尉，"获辎重千余乘"①。建武五年（29年），耿弇击败号称20万大军的张步，"收得辎重二千余两"。②

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为北击匈奴，率领"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③

---

①《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②《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③《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时，皇甫嵩军与张梁部众战于广宗。张梁失利，牺牲8万余人，被“焚烧车重三万余两”。①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徐黄巾30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军合。公孙瓒率步骑2万人交战。青、徐黄巾失利，“弃其车重数万两”。②

不仅中原地区的战争多用车辆，就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已普遍使用车辆运输军需。如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南匈奴反叛，汉廷使耿夔等击破之，“获穹庐车重千余两”。③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汉廷击北匈奴，“斩数百级”，缴获“车千余两”。④ 于此可见，当时少数民族的车辆也为数不少。

车的种类，在东汉时期主要有轻车、戎车、云车、指南车、辎车等种。

轻车：据《后汉书·舆服志》曰：“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辄辄弩服，藏在武库。”徐广注曰：“置弩于轼上，驾两马也。”轻车是车士兵种的主要装备，它常常成为车兵兵士的代名词。因为是战车之属，故平时“藏在武库”。可见，轻车就是驰敌致师的战车，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

戎车：《后汉书·舆服志》曰：“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车胄甲弩之箙”。注引《汉制度》曰：“戎，立车，以征伐。”刘熙《释名》称：“元戎车在军前启突敌阵，周所制也”。元戎，即大戎。它是用于战争的兵车。⑤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③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⑤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第259页，在“元戎车”条下，注引皮锡瑞曰：“史记集解引韩诗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阵之车，所以冒突启敌家行伍也。’”

云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昆阳之战中，“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注曰：“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这是战争中爬城用的车具。

指南车：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钧悟而作焉。”[①] 因为它具有“司南”的功能，可以用之辨别方向，对行军作战有重要作用。

辎车：《释名》曰：“辎车，载重卧息其中之车也”。颜师古曰：“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行者之资，总曰辎重”。[②] 可见，辎车即载重车。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于运输兵器、衣粮等军需物资的车辆。主要以马、牛牵引。《九章算术》称：“一车载二十五斛”，“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这里讲到的载重量及行速，当是指一般车辆的情况，辎车的实际载重量可能比一般车辆要大。

此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车，还有所谓“棚车”、“衝车”、[③]“軘车”、“轈车”、[④]“驰车”等等。[⑤] 这些战车的数量不一，用途有别，或用于征战，或用于攻城、陷阵。皆为军队不可缺少的装备。

东汉时期的车辆制造业比较发达。既有官营，也有民营。封建国家所需的车辆包括军车等，通常以官营为多。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有关部门，如“工官”等均有造车任务。费用开支来自大司农或地方财政。其时的民间造车业亦颇具规模，不少豪商、富人之家，有专门的“车舍”和“造车匠”。[⑥] 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因图异计”，“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⑦] 汉代画像石中，以

---

① 《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

② 《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注引。

③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④ 均见《说文车部》、《释名·释车》。

⑤ 这些车，有的名异实同，名称有别，然功能一样。

⑥ 见《隶释》卷十五《郑子真宅舍残碑》。又《后汉书·应奉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

⑦ 《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

创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亦为多见。①

造车的工序多，要求也高。《周礼·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多为。"《后汉书·舆服志》亦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为多"。这说明造车业内部的分工已相当严密。由于当时造车已大量使用金属部件，所以产品质量也相对为高。

（二）战船

船是水军的主要装备，在中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皆建有"舟师"即水军，不仅用于战斗的船舶增多，而且"以船为车，以楫为马"②，在水战中有娴熟的操船技术。

随着水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东汉时期，船舶被用在军事上的情况显著增多，战船的数量和种类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所出动的战船，往往动辄数千上万之多。如光武帝建武九年（33年），岑彭军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与吴汉等，"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③，同公孙述进行激战。当岑彭攻破荆门后，"长驱入江关，（吴）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④ 俟后，马援伐交趾，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曾经"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⑤ 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⑥ 建安三年（198年），"孙策攻皖城刘勋，收得船千艘，伐黄祖，获船六千余"。⑦ 建

---

① 见山东博物馆等：《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图181。

② 《越绝书》卷八。

③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④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

⑤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⑥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

⑦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吴录》。

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威迫孙刘，“悉浮以沿江。”① 建安十四年，曹操挥师东征，“大兴水军，凡舟万艘。”②这些史实表明，战船在东汉时期已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当时，除了战船数量多之外，为适应航区和战争的要求，其船制亦为复杂多样。查考史文，战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楼船：《释名》称：“楼船一层曰庐，二层曰飞庐，三层曰雀室。”杜佑《通典》说：“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礌石、铁斗，状如城垒。”这种船的结构，一般为三层。但也有的达五层十层。公孙述据蜀地时，聚兵积粮，曾造 10 层楼舰。东汉末年，曹操军与孙权军为争夺长江水面控制权，孙权使偏将军董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③，即造 5 层楼船。楼船的船体庞大，高 10 余丈，是水军作战的主要船种之一。

艨冲：《释名》曰：“外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杜佑《通典·兵法》云：此船“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是汉代水军的主力船型。东汉末年，孙权征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董袭将敢死士，“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结果黄祖战败。④刘表建设水军，也曾造有“蒙冲”。这种船形体雄伟，机动性强，便于水战。

冒突：有时又称“冒突露桡”。史云：“露桡，谓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⑤它有较完备的防护设施，主要用于袭击敌船。东汉初，岑彭在攻伐公孙述的水战中，这是主要的船型之一。

---

①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传》。

② 《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七引曹丕《沂淮赋序》：“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讙哗。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

③④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十《董袭传》。

⑤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注引《方言》。

赤马：又称“赤马舟”。《释名》曰：“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王先谦曰：“吴校删‘舟’字。”① 赤马，如马之在陆地上奔驰，行速很快，是一种高速战船。东汉末年，“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② 由此看来，似乎“舸”与“赤马”，名异实同。

斗舰：又简称“舰”。《释名》曰：“上下重版曰舰，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通典·兵法》云：“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也，船内五尺，又建栅与女墙齐，栅上又连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时，就曾建制蒙冲、“斗舰”以千数。③

斥候：《释名》曰：“五百斛以上还（环）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所谓“斥，度也”，“候，即候望。”这是一种专门用于侦察敌情的军用船。

在古代，军用船和民用船不好绝然分开，以上只是就其用途的初略分类。但当时各色多样的民船，有的也可军用，此乃无可疑。

东汉时期的造船业比较发达。船舶的产地分布很广。如长江流域的巴蜀、夷陵、江陵、庐江、豫章、会稽等地都有造船的历史，是造船工业集中的地区。东南沿海的番禺、南海等地，由于水上交通频繁，仍是造船的重要基地。关中的长安及渭河沿岸，在造船业方面也有一定的规模。不仅产地广，造船数量多，而且有的船舶之载重量也很大。如东汉末年，“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直坐之士三千人。”④ 又云：“孙权尝装一舡名‘大舡’，容敌士三千人。”⑤ 可见，当时船舶载重能力之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期造船经验的积累，两汉时期的造

---

① 《释名疏证补》。

②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七《张昭传》。

④ 《水经注·江水三》。

⑤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武昌记》。

船技术显著提高。首先是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造船设施。1976年于广州发掘的造船工场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据考古调查，这个遗址分船台区和木料加工区。船台有三座，平行排列。这些船台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用以扩大受力面积，避免船台局部下沉；木墩，约一米高，支架船体，以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作业；滑板构成倾斜的滑道，使船只平稳下水使用。又滑道的宽距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节。各个船台既可分别制造大小不同的船只，也可制造同一规格的船只。这个船场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官办工场。① 整个布局较为合理，充分反映了当时造船的技术水平。其次，当时所造船舶的设备也较前进步。据文献考古资料，船上已经使用了帆、舵、橹、锚等先进设备。帆的使用，开始了人类利用风力行船的历史。“舵”的使用，增强了操纵的灵活性，为提高航速创造了条件。“橹”是一种高效率的推进工具，也可起到舵的作用。“锚”的出现也很重要，据一些学者考察，汉代的锚抓力大，已脱离了锚的初级阶段，接近于近代锚的样式。②在船上增添的这些新设备。相对地讲是比较完善和齐备的，它和同期的罗马木船相比，要先进得多。发达的造船业，为装备当时的水军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军马的使用和管理

中国古代，马和戎有密切联系。许慎《说文解字》云：“马，怒也，武也。”东汉的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③ 在军事上，骑兵、车兵乃至运输等都离不开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也是边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

① 见《文物》1977年第4期。

② 据上海交大史话组：《秦汉的船舶》，《文物》1977年第4期。

③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一）马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

马被用于军事或战争的起源很早。到西汉武帝时，由于加强了马政建设，组建骑兵集团，动辄调动数万、十几万的骑兵出击。

东汉较武帝时代的马政有所“省约”，养马的厩、苑较前减少，马的数量相对缩小。但在边防战争中却依然大量使用骑兵。例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陇西太守马援“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①。二十一年（45年），马援又“将三千骑出五阮关击乌桓”②。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窦固击匈奴、通西域，指挥“四万三千骑兵”远征漠北。③ 永平十七年（74年）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④。章帝章和元年（87年），傅育“选精骑三千穷追（迷吾羌）”⑤。和帝永元六年（94年），鲜卑入塞，汉廷“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⑥。顺帝永和六年（141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羌）”⑦。东汉一朝，在边防战争中使用骑兵的情况，屡见史籍，而且为数不少。所以史称：“千乘雷起，万骑纷纭。”⑧

马在军事上除组建“骑兵”之外，用于传递军令或军情的情况也很普遍。当时，为传送军事情报，在交通干线上设有以轻车快马为主的邮驿。在驿有驿马，也称传马。汉简中有“驿马名籍”。两汉之交时，据《东观汉纪》说：“王郎举尊号，欲收（耿）纯，纯持节与从吏夜逃出城，驻节道中，诏取行者车马，得数十，驰归宋子（县）。”又云：“发取驿舍车马数十乘，载与俱驰。”驿马是主要的通讯工具。东汉初一度比较重视边境的邮驿建设，汉廷在西部、北部“缮城郭置候驿”，以加快军队文书的传递速度。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

④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⑤⑦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

⑧ 班固：《东都赋》。

据说有时“日夜兼行四百余里”，可见马的行速相当之快。

东汉时期，边境的军资运输也多用马驴。史云：“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①。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马驴自来就是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例如：当时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运道艰险，舟车不通”，曾使“驴马负载”。② 建武十二年（36年），为“镇守北边”，杜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③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人起义，夜有流星光照营中，“驴马尽鸣”④。这“营”中的驴马当有不少是作为军运的。后来，曹真伐蜀，杨阜上疏说：“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⑤ 看来，军中的转运，有不少一部分是以马驴来担负的。

总之，古代的马，在军事上使用很广，除用于组建骑兵外，邮驿、运输等都大量使用马匹。所以，马为“国之大用”，是部队的重要装备。

（二）军马的来源和管理机构

由于骑兵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自秦以来对马匹的积蓄已十分重视。汉武帝即位后，为支撑战局，组建骑兵集团反击匈奴，推行了适应战时需要的马政措施。不仅以国家名义征用民间私马，而且还通过抬高马价、卖爵得马、官马民养等政策刺激吏民养马。后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获取大宛的良马。其时养马、用马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东汉时期的马政与西汉相比，既有沿袭也有变化。当时解决军马的来源有以下几个主要措施或途径：

其一，继续实行官府养马的政策。光武帝刘秀在河内期间，就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上《杜笃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③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④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⑤ 《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二十五《杨阜传》。

曾“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 东汉统一全国后，官府的“厩马”、“苑马”仍有不少。不过，当时养马的规模和数量较西汉缩小，且政府时有减省养马的诏令。如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②。但根据需要，后来又设有长利、高望、始昌、万岁、汉平等养马苑及“丞华厩”。③这表明官府养马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其二，官府以强制形式征调民间马匹。这在王莽之时已是如此。如天凤六年（公元19年），“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公元20年），“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传车马不能足，赋取道中车马，取办于民。”④至东汉时期，官府强行征调马匹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中平元年（184年），围剿黄巾起义军，又“诏公卿出马”。⑤ 自东汉“调”的科派产生后，官府不仅向人民调取谷币财物，而且强行调取马匹。“车马衣服，一出于民”。⑥

其三，在对羌胡的战争中缴获一部分马匹。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耿秉与窦固合兵1.4万骑出击车师，“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⑦ 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马贤领兵进击羌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顺帝永和三年（138年），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烧何种羌，“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又建康元年（144年），“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

---

① 《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③ 见《后汉书》安帝纪、顺帝纪。

④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

⑤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⑥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⑦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羊二十余万头。”① 在战争中缴获敌方马匹的事例，东汉甚多。于此不备一一列举。

此外，在解决国家军队马源的问题上，东汉还通过购买、贡纳等方式。由于广开途径，所以，当时骑兵有足够的马源保障。

有关马的主管部门，前、后汉有些不同，《百官公卿表》云：“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駼、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初置路軨。”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太仆是全国掌管车马的最高长官，它虽然沿袭秦制，但其下属官吏时有不同。西汉武帝时养马最多，也许以上这些属吏或机构皆有，体制也较以前完备。西汉后期因苑厩减省，故成帝时有“罢六厩”的记载。② 可见，养马机构往往随着形势和时空的变化而有别，是时置时废的，它有个变化发展过程。

东汉初期，养马机构在西汉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精简。据载：“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③ 虽然东汉后期，于安帝时在越嶲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等，顺帝时也设置了“承华厩”。④ 但总的来说，东汉的马政机构不像西汉武帝之时那样庞大了。由于马的厩、苑大量并省，故在东汉的太仆之下，属吏不多。

由于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自秦汉以来，有关军马的管理方面已形成制度。据文献及简牍资料，当时明确规定：军马要烙印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汉书》卷十《成帝记》建始二年。

③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④ 分见《后汉书》本纪。

标记，登记造册，“盗马者，死”；对军马的饲料要按标准配给；军马若有伤亡，当及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国家对军马要进行定期的评比和考核等，这些制度，有的见于秦简、有的见于汉简，虽属秦至西汉的情况，东汉也当不会例外。还值得重视的是，两汉的“相马”技术已经很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相马经》。据说，东汉马援“好骑，善别名马”①。他南征时，“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②当时还有专门的“马医”和治马病的“药方”。这在居延、敦煌汉简中可以找到例证。

四、指挥、传令器具

军队的装备，除了武器、车船和战马之外，还有旌旗、金鼓等指挥传令器具。在古代，旌旗金鼓号称军之“三官”。③ 它在行军、作战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部队必不可少的装备。

东汉时期的旗帜，其意义和先秦之时完全一样，皆具有聚众和组织师旅的作用。故兵家、将领们对之十分重视。如据记载：

“……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旌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逄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④

章帝建初二年（77 年），在对羌人的战斗中，“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马）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

①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 《管子·兵法篇》。

④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①遂解临洮之围。

上举实例，充分说明旗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得当，便可取得意外的成功。

在当时，部队之所属，人数之多少，将领之级别，皆可在旗帜上得到反映。由于旗帜有助于聚众集兵和主帅指挥作战，故它在军队中受到尊重和保护。

军队的再一重要装备就是金鼓。

金鼓又称钲鼓。“金（钲）”与“鼓”是两种不同的器物。许慎《说文解字》曰：“钲，铙也，似铃。”“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在战场上金与鼓的传令要求不同。如据《尉缭子·勒卒令》说：“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金、鼓等器具，在战争中通常是配合使用的。

金鼓的起源甚早。至迟在商周时代，它便作为传令系统而广泛用于行军作战了。古代出征以金鼓为号，通过击金鼓来指挥军队。史云：“鼓战之法……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又云：“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鼓之则进，金之则止。”②

在行军、作战中，作为传令装备的金鼓，至两汉时期仍在普遍使用，金鼓的意义作用和先秦相同。例如：李陵与匈奴交战时，“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③光武帝刘秀在昆阳之战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④在当时，战场上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防传》。

② 分见《吴子》治兵、应变。

③ 《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④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必须以钲鼓为指挥信号而进退。同时，每当敌我双方势均力敌时，习惯上往往用“鼓旗相当”来形容。如东汉光武帝在给隗嚣的手书中说：“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①说明鼓和旗一样，在军中都很重要。

金鼓在战争中由将帅亲自掌握，是由将帅“亲执金鼓以令进退”的。金鼓主要起传令作用，以使全军统一行动，同时也可鼓舞士气。如果军队不听金鼓调动，“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也不可能有战斗力。因此，当时制定了严厉的军事刑法。若士卒违犯金鼓传递的号令，要受到严惩。

传令系统的装备除金鼓之外，还有烽火器具即布表、积薪、兜零等。这些传播信息的烽火器具，对及时准确地传递军情起有重要作用。“通烽火”是边塞戍卒的一大职责，为使烽火准确无误地达到报警之目的。在当时边塞防御体系中，形成了严密的制度。如烽火器具要经常检查，凡不合临战要求者要更换。吏卒要掌握烽品条文，若“不知烽火品”，或燔烽举火“不如品约”者，必须“斥免”，处罚极严。

第二节　后勤保障

一、国家对后勤的重视

“后勤”是“后方勤务”的简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所谓“储备”、“积贮”、“饷馈”、“委积”、“武备”、“转输”等，都是属于后勤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军队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物质保障。

“后勤”之本义带有“先勤”的意思。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人对后勤本意的集中概括。古代打仗，首先所准备的是粮草、武器。他们自来就把后勤放在先行地位。因此，从某

---

①《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种意义上说，所谓战争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勤准备。

后勤在军事上的特征，有它的时效性、经济性、科学性和保障性。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军事统帅，如果忽略了后勤，就必将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战争规模扩大、各种军资消耗量增多，特别是作战对象转移到了西、北边境的羌胡，故当时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后勤思想，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他们不仅强调了战争的基础在经济，阐明了粮饷、辎重在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将军屯、委积、给养、转输等后勤建设，提到了显要的议事日程。

后勤的内容和手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正确的决策。东汉的后勤基本上沿袭了西汉制度。为有效地保证后勤补给，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东汉重视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光武帝刘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 由于有完富的河内做后盾，有充足的粮甲、马匹等军资支援前线，因而刘秀获得了击败政敌的胜利。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在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由于接受来歙"益选兵马，储积资粮"的建议，"诏于汧积谷六万斛，驴四百头负驮"，大转粮运，② 遣兵进入天水。结果，"击破公孙述将领田弇和赵匡。"可见，动员战争后方发展生产，增加积蓄来满足前线军资的需要，是当时解决后勤补给的一大举措。

其二，东汉曾采用各种办法筹措军用粮饷。"粮谷，军之要最。"为保证军粮不乏，当时，除了在战争中"因粮于敌"之外，更为

---

① 《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注引《东观纪》。

主要的是着眼于“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同时在军事重地和京师洛阳兴建大规模的粮仓。如：除原有的敖仓外，在京师有太仓，地方有郡国仓，河西边防还有各种名目的仓。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东汉末年，董卓“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①，便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所有这些，均反映了兵家对粮储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军事屯田。通过士兵的且耕且守，就地筹划军粮的供应。东汉不仅在北部边郡及西域、河湟等地区有军屯，而且在内郡的武当（今湖北十偃市东北）、南阳、顺阳（今河南内乡西南）、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等地，也有军屯，开创了内地军屯的先河。东汉屯田的规模和效益，虽然不及西汉，但它也解决了部分的军粮供应。屯田之制，对后世影响甚大，多为历朝所效法。

此外，东汉为使军需物资得到及时补给，统治者一方面大量组织力量制造车船，发展运输工具；同时还非常重视交通干线的开辟。就陆路交通而言，东汉之初，汉廷曾命王霸、杜茂在北境主持修建“飞狐道”，自代至平城，长达三百余里。② 明帝永平六年（63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③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④ 俟后，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永寿元年（155年），也都对褒斜道进行了局部改造和维修。⑤ 可知，褒斜道自西汉武帝以来，曾进行了多次开辟。东汉政府开辟这些交通干线，除经济意义之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出于战争及军资转输的需要。它对巩固边防，加强国内的军事镇压，贯彻政令等，起了重要作用。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③ 据《金石萃编》卷五《开通褒斜道石刻》。

④ 《后汉书》卷六《顺帝记》。

⑤ 据《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及《右扶风丞李君开通阁道记》。

总之，东汉时期，国家对军事后勤已相当重视。它既沿袭了西汉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为后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

二、后勤补给中的粮草供应问题

后勤是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及各种先进技术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总称。后勤补给的范围比较广泛。就汉代来说，大体上它包括武器、车辆、船只、马匹、运输，以及士兵的口粮、副食、被服、装具、医药、军马饲料和军费等等。在这些内容中，有的在前节已做了介绍，有的则困于史料，目前难于详考。下面仅就士兵的衣粮和军马草料等有关给养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士兵衣粮的廪给

士兵的衣服，究竟是由个人自备还是国家供给？看来，东汉的情况和西汉之时一样，皆为官给。“王莽时，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① 所谓“仰县官衣食”，就是衣食靠官府供给。东汉沿袭前制，衣服也是官府供给的。如建武十二年（36 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杜）茂，镇守北边……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② 建武二十五年（49 年），乌桓大人郝旦归降后，“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③ 永平八年（65 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凡徙者，赐弓弩衣粮。”④ 诸多史实表明，东汉时代，军士的武备固然官给，而衣服也是由国家供给的。不论“刑徒兵”、“属国兵”皆然。《后汉书·百官志》说：“考工

---

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③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传》。

④ 《后汉书》卷二《明帝记》。

令一人……及主织绶杂工。”当时军服的生产，似由各地官府手工作坊承担，成品后，统供调拨于军队各部。所以，军队的服饰才能有统一格式或规格出现。东汉士兵衣服发放的数量问题，困于史文简缺，不如西汉明确，也难于详考，可能为数不会很多。

至于士兵的口粮，东汉时期更是由国家所供给。例如：光武帝时，寇恂在河内，“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①。顺帝永和三年（138 年），大将军从事李固说：“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② 这些都是有力的实证。再说，当时各地开展军屯，在军事据点大量兴建粮仓，亦是国家筹备军粮，为解决士兵的口粮问题。在“以农立国”的东汉时期，粮食品种已较丰富，黍、粟、麦、稻等，是当时军队主食的基本构成。

东汉士兵的口粮标准，据李固之言，每人每天“人禀五升”。于此，似乎沿用了西汉旧制。《赵充国传》说：西汉时，“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则平均每人每月用谷为 2 石 6 斗 6 升。按一月 30 天计算，每人每天用谷 8.8 升。扣除 30%～40%的加工消耗，大约折米 5 升左右。这和东汉李固的说法极为一致。但汉简中的士兵月粮供应量，有三种不同记录：（1）二石；（2）三石；（3）三石三斗三升少。造成数量如此悬殊，估计与发放口粮时所用的量器有关。因为汉代有“大石”、“小石”之分。可能（1）所记“二石”，属大石；（2）、（3）所记属小石。所谓“三石三斗三升少”的“少”即“小”。在当时，大石与小石的比率为十比六。即小石 1 石合大石 6 斗，故“三石”、“三石三斗三升”，若以大石计，则分别为 1 石 8 斗、2 石。这比赵充国所说的“二石六斗六升”至少少了 6 斗 6 升。这说明，赵充国向汉宣帝上奏的这个统计，是就高不就低的。目的在于向国家多要军粮；而东汉李固说士兵“人禀五升，折成

---

① 《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月谷量 2 石 6 斗多，也是偏高的计算，目的在于强调当时出兵日南在转输上的困难。实际情况皆略低于此数。

士兵口粮的发放时间，西汉通常是提前一个月付给。这在居延汉简中多有记录。东汉的情况，虽然未见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或许也当如此。但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吏克扣军粮的情况，亦为常有。如建武十五年（39 年），杜凉就曾“坐断兵马禀缣”①。顺帝时，“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所以，每当军队“食尽穷困”时，往往“乃煮铠弩，食其筋革”。② 或以“果实为粮”。

（二）军马草料的供应

军马用的草料或饲料，包括粮谷和刍稿，这也是由国家提供的。《汉书・赵充国传》说：“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说明西汉的军马和屯田士一样，其所用的粮谷皆由国家供给，而且为数不少。东汉时期，军队的“驴马之食”，也有用粮谷为饲料的情况，这从前引《李固传》提供的材料可资得到证明。于此可以不必深论。这里仅就刍稿一项，略予介绍。

何谓刍稿？《说文》曰：“刍，刈草也。稿，杆也。杆，禾茎也。”刍与稿有别。刍即牧草，稿即禾杆。刍稿是马、牛的主要饲料。故很早以来，国家便将刍稿列为专项税收，而向编户征课。

刍稿税的征收，在秦至东汉时期，屡见于史册。如《淮南子・氾论训》说：“秦之时……入刍稿，头会箕敛，输于少府。”高诱注曰：“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贡禹传》说：“农夫父子……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稿。”③ 大量史实表明，刍稿税是秦汉时期经常性的一种田租附加税，它和田租同时并征，有时也一同减免。当时国家征收刍稿的目的，主要是“以供国用”，为军用马、牛提供饲料。一般由大司农系统所掌握。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③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军马刍稿的发放办法，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简牍材料来看，它似乎按月付给。如据秦简《田律》："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驾车马牛的饲料，过期两个月没有领取或送发的，一概截止，不再领发。这表明秦代是以月为期的。汉代情况同样。如据《居延汉简》333·10号简文："□出茭千五百束，十一月□。"24·5号简文："出茭九束，正月甲子以食□□。"也是按月发放的。所谓"茭"也就是"乾刍"。但刍稿的供给标准如何？一匹马、一头牛每月供多少刍稿？困于史文缺如，难于详论。可能因时、因地之不同，而有差别。

军马用的刍稿主要来源于税收，即刍稿税，通常由大司农提供。但在边境地区，因路程遥远，运输困难，每当边塞补给不继之时，动员戍卒或边兵自行"伐茭"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三、军用物资的转输

转输是保障军队粮草、武器等物资供应的先导。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之初，在平击公孙述的战争中，刘秀由于接受来歙的建议，"大转粮运"，有充足的资粮，结果取得胜利。建武二十三年（47年），在讨伐武陵蛮时，由于刘尚孤军深入，"粮少入远"，转输不继，因而遭到失败。① 史实表明，后勤转输的大量工作是前送后运，它平时要保障部队建设的需要，战时要保障夺取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

东汉时期，由于长期战争，粮草、武器等各种军用物资需要不断补给，转输任务频繁。例如："光武追铜马、高胡群贼于冀州，（邓）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② 光武初即位时，"军食急乏，（寇）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③ 特别是远师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 《后汉书》卷十五《邓晨传》。

③ 《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

出征，转输任务更为繁重。如建武十二年（36年），汉廷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杜）茂，为镇守北边，“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① 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憐等反叛，汉廷拟发荆、扬、兖、豫州四万人前往讨伐，“远赴万里”，仅士兵口粮一项，就需“用米六十万斛”。② 其转输之烦费，于此可以想见。

军用物资的转输，有很强的时间性。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达到预期的工作效能。如果在一定的时、空里不能按计划完成转输任务，军队就会因缺乏物资基础，而导致战争受挫，甚至失败。因此，为使军需粮甲等准时运往预定地点，保证补给，东汉政府曾采取过各种办法组织运输力量。

其一，征调民役转输。徭役是封建政权强迫农民承担的一种无偿劳动。徭役的范围很广。为了战争的需要，东汉征调农民转输军需的徭役很多。章帝建初元年（76年），杨终上疏说：“自永平以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③后因凉州边郡战急，何敞亦说：“凉州边缘，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弱孤寡，叹息相依。”④ 至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庞参奏记邓骘说：“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遂乃千里转粮，运给武都西郡。”⑤整个东汉后期，因长期与羌人战争，军用物资需要量大，故造成“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当时农民担负转输的徭役极为沉重，甚至役及妇女。所谓“转输烦费”，“百姓苦役”，⑥ 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其二，组织“车父卒”、“棹卒”转输。除征调农民服徭役从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三《何敞传》。

⑤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⑥ 《后汉书》卷十六《邓骘传》。

事军运外，还有“戍卒车父”、“车父卒”等承担转输军需的任务。这种专门从事军运的“车父卒”，居延汉简中多有记录。例如：

“戍卒梁国睢阳第四车父南里马广”。①

“□□□等身将□车父卒□”。②

“长偏赍事并将车父卒董利□”。③

从简文中的“车父”，同时又称“戍卒”或“车父卒”来看，这些车父卒的身份当属于兵，是军队中担负转输的兵卒。他们与所谓的“漕卒”、“委输卒”之身份接近。其责职都是负责转输任务。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道，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郡，须毕具乃同时出。”④ 说明即使是募卒亦得兼事委输屯戍。军队士兵担负转输的情况，东汉继续存在。如征南大将军岑彭与大司马吴汉等，“发南阳武陵、南阳兵与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又骑五千匹会荆门。”⑤ 这里的所谓“委输棹卒”，即持棹行船之卒，也就是担负委输的水兵。在当时，军运部队，凡车、船一般皆编有序次，为保证指挥调度，带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纪律很严，行程不得有误。

其三，雇佣民力转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舟车制造业发展，东汉之时，在民间拥有相当多车辆和较大的运输能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运输的专业户。因此，每当服役农民及军队自身的转漕不足以解决军资的运输时，国家往往出钱雇佣民力转输。如据记载：“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

---

① 《居延汉简甲乙编》303·6，303·1。

② 《居延汉简甲乙编》484·67。

③ 《居延新简》E.P.T52：167。

④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

⑤ 《册府元龟·帝王部·委任》。

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① 这史文中的"僦"，是指雇人载运的意思。当时以专营运输业来为生之民户称"僦人"。所谓"僦直"，或"僦钱"，就是雇主付给被雇佣运输者的劳动代价。《九章算术·均输》云："车载二十五斛，与僦钱一里一钱。"虞诩"雇借庸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可见其运输量之大，亦说明其时军资的转输，有相当一部分是雇佣劳动力来完成的。

东汉军用粮饷的储备和转输，在组织领导上，中央归大司农总领其事。边防军的粮草供应，除屯田殖谷解决一部分之外，一般由大司农主持，从内地转运到前线。地方军的给养，则由当地郡国长官筹措。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军资转输的费用和损耗是很大的。如明帝永平年间，因北部边境的军需运输，在山地用驴车转运，从冀州入并州，曾想改陆运为水运，由邓训总其事。结果，"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而死者，不可胜算。"② 章帝元和三年（86 年），"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③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因羌寇转盛，"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途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④ 大量史实说明，当时不仅转运之费多，历程艰苦，而且在转运过程中，还断送了不少人的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四、保障后勤供应的物质基础

后勤保障取决于诸因素。大凡包括国家财政、经济潜力、科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②③ 《后汉书》卷十六《邓训传》。

④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技水平、民心向背以及政治基础等等。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或因素，后勤就建筑在沙滩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里单就后勤的物质基础做一般说明。

后勤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军队所需的武器、粮饷、装备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依赖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潜力。不然，后勤就成为“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东汉时期，战争频仍，自建武四年至中平五年（28～188年）的160年间，共发生各类战争260次以上，其中尤以对诸羌的长期战争耗费更大。如据记载：“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① 又云：“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② 当时的军费开支，除战争费用外，还有平日的军官俸禄、官兵衣粮、武器装备、军用车船、边防工程建设等费用，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要以一定的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

东汉政权之所以能支付浩大的战争费用，提供后勤保障，首先是与当时的经济潜力分不开。东汉立国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到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的垦田面积已达732.017万顷。民户923.7112万，人口5325.6229万。若加上隐田、隐户，实际情况当接近甚至超过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的最高数字。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农业战线，发展得尤为迅速。江南地区大规模开发，农耕工具多有改进，农田水利大量兴修，农业基础技术普遍提高。手工业生产也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冶铁、纺织、造纸、漆器、陶瓷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当时的工农业水平，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能够对军队后勤提供物质力量。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尤当提出的是，东汉统治者对军费之积极筹措，也是当时维系战争费用的重要经济支柱。恩格斯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① 这里讲到的经济条件，依我们体会，除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等等之外，还当包括足够的军事费用。统治者对军费问题自来高度重视。东汉筹措军费的基本途径，沿用西汉旧制，主要是实行"按丁、口征赋"：

算赋——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起征年龄，一般是 15 岁至 56 岁，赋额为每人每年 120 钱。如《汉旧仪》曰："令民男女，年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

口钱——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起征年龄自元帝以后，通常为 7 岁至 14 岁，征课量是每人每年 23 钱。《论衡·谢短篇》说："七岁，头钱二十三。" 正是。

更赋——由"役"变通而来的，是徭戍的代役钱。到东汉之时，它实际上已成为按丁、口征收的固定赋目。其交纳额为每人每年 300 钱。

东汉时的算赋、口钱和更赋，是每个编户一般都必须承担的法定常制赋目。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在对羌、胡的战争中，才能支付数十亿、几百亿的巨额军费。除主要按丁、口征赋提供军费消耗外，还有一项，这就是"调"的征课。

"赋"外加"调"，开始于明帝时期，作为赋敛专称的"调"，与军需征发有密切关系。如《刘陶传》说："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阵"，"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庞参传》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外伤羌虏，内困征赋。" 这些事例说明，"调"的征课也已成为东汉解决军费紧张的一大举措。

按丁口征赋和调的科派，尽管为数极大，是解决军费的基本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0 页。

源，但到东汉后期，随着政治败坏及连年战争，消耗巨大，军资短缺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例如：后车骑将军张温，为讨伐边章等人，发幽州乌桓 3000 突骑，就因“牢禀逋悬”，军资粮饷不继，而“皆畔还本国。”① 中平六年，董卓在对汉灵帝上书时也说：“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②

东汉后期为解决军费短缺、军资不足问题，曾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特殊措施。主要表现在：(1) 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如顺帝永和元年（136 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143 年），“贷王侯国租一岁。”③ 桓帝延熹年间，由于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于是“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④ 这种情况不少。故《冯绲传》说：“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2) 鼓励私人捐助，向百姓借钱。如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⑤ 此外，还有卖官鬻爵；加重税收，所谓“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⑥ 这些措施，虽然多少缓解了东汉后期军费的紧缺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于此进一步说明，要保障后勤补给，一定要有雄厚的财力和物质基础。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③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④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第六章　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

东汉前期，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亦日益密切，史称，“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①，呈现民族团结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及战争亦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东汉初年平定交趾“二征”和武陵“蛮”叛乱，以及明帝、和帝时反击北匈奴的战争。尤其是反击北匈奴战争的胜利，对东汉历史发展的进程、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社会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是在匈奴频繁南扰，汉、匈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发生的，具有“以战去战”、制止掠夺的性质。其显著特点是，以汉军为主体的多族骑兵集团协同作战，共同打击北匈奴势力，战争空间之大、投入兵力之多、行军路程之远，为东汉时期民族战争之最。

本章着重叙述汉匈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结果。东汉对交趾及武陵“蛮”的战争亦分别予以叙述。

第一节　对匈奴的战争

一、匈奴南下与汉军的防御

（一）匈奴南下

新莽时期，由于王莽采取了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致使维持

①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了几十年的汉匈和亲关系破坏。天凤五年(18年),匈奴单于舆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舆单于雄心勃勃,自比于英武一世的冒顿单于,乘新末中原战乱之机,扩充势力,控制了除莎车以外的西域诸国,鲜卑、乌桓亦置身于其奴役之下。东汉建立之初,又积极支持或联合与东汉敌对的割据势力,如卢芳、彭宠等军事集团,不断侵扰汉之边郡,给汉朝造成了巨大压力。

建立之初的汉政权正处在各方割据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乃是光武帝刘秀首要的战略任务。及至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平定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十六年(40年),称帝于五原地区的卢芳降汉,全国复归统一,刘秀又忙于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因而,在建武年间,汉朝对匈奴的袭扰无力顾及,从战略上采取怀柔与防御政策。建武六年(30年),东汉因匈奴与卢芳侵扰不息,乃遣归德侯刘飒使匈奴,以通旧好。"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①。然而,舆单于十分骄恣,"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②,毫无诚意,一面与汉通使,一面继续伙同卢芳袭扰北边。建武九年(33年),刘秀终于首次派大司马吴汉率军5万余人,北击匈奴和卢芳。这是东汉初年对匈奴采取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然而,这次出兵非但未能取得战果,反而助长了舆单于的骄横之心,史称,汉军"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③。刘秀只得紧急设防,诏令朱祐屯常山(今河北元氏县西北),王常屯涿郡(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并以王霸为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太守,以备匈奴。

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南下攻势,刘秀深感忧患,却又因"天下疲弊"而无力反击,遂权且容忍和退让。首先,对西域地区采取放弃政策。据载,西域诸国因不堪忍受匈奴重敛,"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④。建武二十

---

①②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一年（45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①。同时明确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②。由于西域诸国得不到汉朝的庇护，只得继续依附于匈奴。

其次，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③，刘秀被迫决定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39年）二月，正率军抗击匈奴的大司马吴汉，奉命迁徙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代郡（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县）、上谷三郡吏民6万余人，置于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倒马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④。

第三，加强边防。建武十二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诸郡弛刑徒，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⑤。建武十五年，东汉内迁边民后，“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⑥。正在常山、中山屯守的扬武将军马成，被诏令接替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⑦。又曾派人监造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⑧。

由此可见，在匈奴分裂之前，东汉对匈奴采取的是单纯防御和权且忍让的方针，这与刘秀“量时度力”⑨的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在当时“天下疲耗，思乐息肩”⑩的情况下，只有息边养民，稳定国内，发展经济，才能积蓄力量，作好大举反击的准备。所以，

---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③④ 《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参阅《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

⑤ 《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⑥⑧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⑦ 《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⑨⑩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刘秀“量时度力，举无过事”，表面消极，实际上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实现这个战略，需要较长时间，并付出一定代价，尤其是因不能有效阻止匈奴南扰，使缘边郡县长期处于兵灾之中，边民备受殃祸；放弃西域，亦使匈奴获得了一座巨大的人力、物力后库，增加了其南扰实力。

建武二十年（44年）五月，匈奴骑兵利用其行动快速的优势，连穿数郡，袭入东汉腹心之地上党（今山西长子县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和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北），迫近汉朝京城洛阳。同年十二月，再袭天水。次年十月，上谷、中山等地又遭袭扰，“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①。与此同时，乌桓、鲜卑亦协助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②。

就在匈奴得寸进尺，将战火日益南推之时，建武二十二年（46年），统治匈奴30年的单于舆去世，匈奴诸王为争夺单于位而发生内讧，匈奴内部一再分裂，各部贵族无心南下，汉、匈边境战火暂告平息。

（二）匈奴分裂和南匈奴归汉

匈奴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早在舆单于死前就已见端倪，其焦点是单于继承问题。匈奴自冒顿单于以降，实行的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单于位继承法。但从呼韩邪单于开始，明确规定，先“诸子以次立”③，即兄终弟及，然后父死子继。照此制，舆单于即位时，就应立其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为左贤王（单于储副，相当于皇太子）。然而，“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④，破坏了兄终弟及的制度。此事引起右薁鞬日逐王比的不满。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舆单于之侄，统领匈奴南边八部约4～5万人，驻牧于匈奴之南，拥有一定实力。知牙师被害后，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参阅《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

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他曾口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①又怕单于加害于己，因此很少参加单于主持的龙庭会议。这使舆单于产生了疑心，"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②。舆单于死后，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不久亦死，其弟蒲奴立为单于。比觊觎单于位已久，而终不得立，因而愈加愤恨。

此时，正值匈奴地区连年旱蝗灾害，"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③，自然灾害的破坏及贵族集团内部斗争的损耗，使匈奴的势力严重削弱。蒲奴单于恐汉军趁机来攻，便主动遣使至渔阳，请求和亲。此举正中刘秀下怀，"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④。与此同时，日逐王比经再三权衡，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与蒲奴单于彻底决裂。并加紧了同汉朝的秘密接触。

建武二十三年（47 年），比密遣汉人郭衡"诣西河太守求内附"⑤，并献上了一份厚礼——匈奴地图。监领比部军队的两骨都侯觉察了比的意图，遂于五月龙祠大会时密告蒲奴单于，"言薁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⑥。不料，此事又被正供职于单于帐下的比弟渐将王闻知，渐将王火速南下报比。比见情况紧急，立即召集所领南边八部人马，作好应变准备。不久，"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⑦。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因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附汉而使匈奴得以安定，遂建议比袭用"呼韩邪"的称号。比既得到众大人的拥护，归汉之心愈益坚定，于是遣使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表示"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⑧。刘秀正苦于天下初定，经济凋敝，百端待举，无暇顾及匈奴问题，匈奴的分裂及比的举动，无疑为他制定和实施新的边防策略提供了良机。然而，接纳一个长期与汉为敌的部族的归降，实乃关系到东汉北疆安危及其边防策略走向的大事，一向行事稳重的刘秀，决定召开公卿会议，听取众臣意见。结果会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情伪难知，不可许”①。唯对边事“素有筹策”的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认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②。耿国之议，实际上包含了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思想内容，是一项在新形势下的边防战略方案。刘秀以全局为重，从长远考虑，决意采纳耿国的建议，接受比的归附。

同年10月，比在东汉王朝的支持下，正式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三）东汉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对北匈奴的反击

南匈奴归汉的次年，呼韩邪单于立即将“永为藩蔽，扞御北虏”的诺言付诸行动，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兵万余人进击北匈奴，生擒薁鞬左贤王。继而乘势攻破北单于主力，俘获其部众万余人，缴获马7000匹、牛羊1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③。北匈奴的失败，使其再度分裂，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3万余人，向南匈奴投降。于是，“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④。南匈奴的辉煌战绩及其进一步亲附东汉的举动，充分说明采纳耿国之议、接受南匈奴归降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刘秀决定趁热打铁，加强对南匈奴的笼络和控制，把它作为抗击北匈奴的重要力量，纳入东汉重建北边防御体系的总体规划之中。为此，刘秀采取了下列措施：

安置南匈奴。南匈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归汉的，且匈奴乃“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⑤的游牧民族，若不尽快使其安定下来，将不利于边防战略的实现。所以，当南匈奴连破北匈奴的第二年，即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刘秀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在距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部塞80里处建立单于庭；同时下诏，特许南匈奴部众入居云中。

---

①② 《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

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⑤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又趁南单于感恩戴德、伏首称臣之时，以君臣名份大行赏赐，各种生活用品、粮食、牲畜、黄金动辄以千万计。

监控南匈奴。刘秀为把南匈奴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有效控制之内，有步骤地加强了对它的监护。当然，刘秀并非赤裸裸地把军队开入南匈奴，而是充分注意了时机的把握和策略的运用。建武二十六年夏，南匈奴发生了一起反叛事件，曾被其俘虏的北匈奴薁鞬左贤王率领其众，伙同南匈奴五骨都侯共 3 万余人叛逃，在距北单于庭 300 余里处另建单于庭，薁鞬左贤王自立为单于。刘秀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一方面大行赏赐安抚南单于，另一方面则以保护南单于为名，令中郎将段彬在南匈奴设置安集掾史，率领 50 名刑徒兵，"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①。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监护南匈奴的第一步。从此，"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②，关系日益密切。而自立为单于的薁鞬左贤王，尚未站稳脚跟，便发生内讧，"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③。同年冬，五骨都侯子率领其众 3000 人南归，北单于派骑兵追击，南归者全被俘去。南单于遣兵救援，交战失利。刘秀闻报，即诏南单于由云中郡迁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同时派中郎将段彬和副校尉王郁留居西河，"为设官府、从事、掾史"④；又令西河长史每年率领 2000 骑兵、500 刑徒兵常驻西河，协助段彬，护卫南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⑤。至此，监护南单于的使匈奴中郎将遂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常设职务，南匈奴完全处在东汉王朝的监控之下。

南单于迁居西河后，为报答汉廷恩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⑥。其防御部署如下：韩氏骨都侯屯北地（今宁夏吴忠县西南黄河东岸）；右贤王屯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今山西右玉县南）；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

①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郡。各王、侯、将军“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①。东汉北边防御力量大大加强。“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②北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对缘边郡县的骚扰。“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③。东汉北边诸郡遂得以安定。

南匈奴的归汉，对鲜卑、乌桓产生了巨大影响。匈奴强盛时，鲜卑、乌桓曾受匈奴驱使，多次连兵“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④。及至匈奴衰弱，内部分裂，才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转而归附汉朝。

乌桓、鲜卑主要活动于我国东北部，位于匈奴活动区域以东，东汉上谷、渔阳、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县东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以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若能联合乌桓、鲜卑，则东汉不仅可削弱北匈奴势力，增强自己的力量，且可对北匈奴构成东、南钳形之势。因而东汉在接受和安置南匈奴的同时，利用乌桓、鲜卑势孤力单急于寻找依靠之机，采取笼络政策，对其逐步加以控制。

东汉对乌桓的争取始于建武二十二年（46年）。是年，乌桓乘匈奴内部变乱之际，发兵击破匈奴，“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⑤。刘秀趁机“以币帛赂乌桓”⑥。乌桓依附匈奴时曾由右薁鞬日逐王比监领，比率南边八部归汉后，乌桓亦愿投归汉朝。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首先“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⑦，并有不少乌桓渠帅表示“愿留宿卫”⑧。于是汉朝大行分封，共有81人被封为王、侯、君长，“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

---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③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④⑤⑥⑦⑧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①。

鲜卑于东汉建立之前，与中原王朝没有交往，东汉初年才逐渐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与乌桓一样，鲜卑长期受匈奴控制，屡次寇略边郡，东汉深感忧虑。为加强东北边防，刘秀任命“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②的祭彤为辽东太守，于建武二十一年，大破匈奴、鲜卑联军，“斩获殆尽”③。从此鲜卑震怖，不敢再犯边塞。几年后，南匈奴归汉，北匈奴势力孤弱，鲜卑为求生存和发展，逐渐向东汉靠近，并于建武二十五年（49 年）与汉朝“始通驿使”④。而祭彤亦秉承刘秀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意图，主动以财利招抚鲜卑。结果其大都护偏何率先表示愿归顺汉朝，立功效命，并随即率部击败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 2000 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⑤。建武三十年（54 年），又有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部众归汉，皆被封为王、侯。

为了加强对乌桓、鲜卑的控制和管理，汉廷采纳司徒掾班彪的建议，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重置护乌桓校尉，开设营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质子移交、赏赐及边境互市等事务。至此，东汉争取鲜卑、乌桓以抗击北匈奴的策略亦获得成功。

从刘秀对待南匈奴、鲜卑、乌桓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东汉前期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和“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虽然实现这个策略，需耗费大量钱财，仅鲜卑即需青、徐二州每年付出 2.7 亿钱⑥，但是，由于南匈奴、鲜卑、乌桓的归附及其尽心尽职地宿卫边疆，不仅大大增强了汉军抵御和反击北匈奴的能力，确保了国内安定，而且为明、和二帝时大举反击并彻底击垮北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①③④⑤⑥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祭彤传》。

二、天山（白山）之战

（参见附图 4）

（一）北匈奴对西域的奴役和对河西地区的袭击

南匈奴、乌桓和鲜卑归汉后，北匈奴接连遭到攻击，损失惨重，加上连年的严重天灾，社会经济凋敝，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为了获得喘息之机，尽快恢复元气，远遁漠北的北匈奴暂时减少了对东汉边郡的袭扰，一方面主动向汉朝请求和亲，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精力转而向西，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外交攻势和军事控制。

建武二十七年（51 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至武威，请求与汉和亲。刘秀召集公卿廷议，决议不下。皇太子刘庄（即明帝）进言说："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① 刘秀认为所言在理，便诏告武威太守拒纳北匈奴使者。次年七月，北匈奴再派使者至京师洛阳，"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②。刘秀深感棘手，乃用司徒掾班彪之策，采取羁縻政策，"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③，予以打发。同时，考虑到南单于的情绪，又于次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④。北单于对东汉的态度似不甘心，于建武三十一年（55 年）又遣使奉献，刘秀即以"玺书报答，赐以缣缯"⑤，仍坚持不派使者。

北匈奴之所以在遭受东汉冷遇的窘境下，还再三遣使奉献，其意图正如刘秀所担心的那样，是想离间南匈奴与东汉的关系，以削弱东汉的边防力量，所以，明帝永平七年（64 年），当北匈奴的"合市"与"和亲"请求得到明帝的同意后，立即引起南匈奴部分贵族的猜疑和怨恨。史载："（永平）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

---

①②③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① 此次叛乱虽因郑众及时觉察而未得逞，但说明北匈奴的和亲并非真心实意。事发后，东汉王朝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于永平八年（65 年），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率黎阳虎牙营士，常驻于五原柏曼（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另遣骑都尉秦彭率军屯驻于美稷，以加强对南匈奴的监控，防止南、北匈奴的交往。

北匈奴请求和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缓和与东汉的关系，避免可能发生的东汉乘虚来攻的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域。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纷纷内附，汉朝先后设置西域校尉、西域都护对其进行管理。新莽时期，国内大乱，西域与中原断绝联系，匈奴趁机伸张势力，控制了除莎车等国以外的西域诸国。东汉初年，诸国不堪忍受匈奴重敛，多次遣使请求内属并恢复都护，但均被刘秀婉言谢绝，致使西域地区长期处在弱肉强食的混乱之中。这给北匈奴重新稳固对西域的统治提供了良机。对元气大伤的北匈奴来说，控制西域就等于保住了它的命脉，就能确保其西部地区的巩固和安定，保障其向北向西道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来补充其南下侵扰的力量。所以，北匈奴徙居漠北后，把主要力量用于经营西域。

北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凡不听命者即纠集诸国之兵予以讨伐。其具体策略和步骤是，尽量利用诸国矛盾，制造混乱，通过扶植大国傀儡入手，进而达到奴役整个西域的目的。为此，北单于先后扶植了当时雄踞西域南道的于阗王和雄踞北道的龟兹王，并派遣使者长期驻在于阗国内进行监督，强迫于阗人民每年交纳罽絮等物资。龟兹王也依仗北匈奴作

---

①《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靠山，欺凌北道其他弱国。鄯善、焉耆、车师等大国都屈从北匈奴的统治。莎车乃西域强国，因不肯充当北匈奴附庸，终于永平三年(60年)，遭到北匈奴与龟兹等国军队的围攻，而被迫屈服①。这样，北匈奴用武力控制了几乎整个西域地区，凭借这里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使其实力逐渐恢复，并又开始了对东汉边郡的频繁袭扰。

永平五年(62年)冬，北匈奴出动5000～6000骑兵大举进犯五原郡，随后又袭入云中原阳，均被南匈奴击退。这是自建武二十七年(51年)后北匈奴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此后的袭扰便日益频繁，给汉朝的压力也逐渐加大，史称"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②。永平八年(65年)，当南匈奴须卜骨都侯密谋反叛时，北单于立即派遣2000骑兵前去策应。因汉军有备，行动失败。北单于大怒，"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③。东汉北边郡县尤其是河西地区再次陷入兵灾之中。

尽管北匈奴的南下攻势咄咄逼人，明帝仍想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先是同意北匈奴的"合市"要求，后又于永平八年三月遣越骑司马郑众使北匈奴。然而，汉朝的举动非但未能起到安抚北匈奴的作用，反而被视为软弱可欺。当郑众到达北庭时，北单于态度傲慢，当众侮辱郑众，因郑众不肯下拜，竟下令"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④。可见北匈奴已今非昔比，其势力已逐渐强盛，不再需要和亲了。所以当明帝复遣郑众使北匈奴时，郑众甘愿冒丢官下狱之险，再三上书谏阻，指出："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

① 参阅《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④《后汉书》卷三十六《郑众传》。

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①]然而明帝不听，执意遣使北匈奴，郑众因在出使途中“连上书固争之”[②]，被追缴使节，革职查办。

北匈奴的南扰活动日益加剧，永平十五年（72年）十一月，又对河西地区进行袭扰；并曾协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③]东汉王朝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大举反击。

（二）汉明帝的决策

东汉王朝关于反击北匈奴之议，早在光武后期便已开始。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饥疫，自相分争”[④]，诸将纷纷请求出击。刘秀征询朗陵侯臧宫的意见，宫颇为自信地说：“愿得五千骑，足以立功”[⑤]。刘秀听后只是笑了笑说：“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⑥]。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重提北击匈奴之议，认为应乘当时北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的天赐良机，“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⑦]，一举击灭北匈奴。但刘秀没有采纳，原因很简单，“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且北狄尚强”，北伐条件尚不具备，“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⑧]。换言之，即当时东汉的国力尚不足以制服北匈奴。

明帝即位后，继续奉行刘秀制定的内外政策，致力于安定国内，发展生产，坚持不主动与北匈奴开战。十余年后，随着东汉国力的日益增强，北击匈奴之事逐渐提到了议事日程。其中对明帝决策影响最大的是谒者仆射耿秉。耿秉乃耿国之子，“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⑨]。任郎官时便曾多次上书明帝，

---

①②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众传》。

③ 参阅《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上》、《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④⑥⑦⑧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⑤ 《后汉纪》卷第八《光武皇帝纪》。

⑨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谈论北伐匈奴之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①。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战略思想。考察当时汉朝的综合实力及战备状况，不难发现，耿秉之议是切实可行且势在必行的。首先，从实力看，东汉经过了“光武中兴”、明帝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政治局面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并持续发展，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已具备相当雄厚的战争潜力。其次，从战备状况看，东汉自刘秀至明帝均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北边防御体系完备、牢固，汉军的攻、防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有南匈奴、乌桓、鲜卑骑兵的积极协助，汉、胡军队结合，兵源充足，战争活力更为强劲。而从北匈奴方面看，自南匈奴归汉后，其势力大大削弱，虽然通过对西域的奴役，其人力、物力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毕竟已伤元气。况且，随着东汉的强盛，西域诸国归汉之心更切，屈从于北匈奴的状况终难长久。总之，北匈奴貌似强大，实际上已处在强弩之末。耿秉“以战去战”的思想，便是基于上述客观情况而逐渐形成并成熟的。

永平十五年，耿秉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北击匈奴。明帝亦认为北伐时机业已成熟，遂决定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专门讨论北伐之事。

这次会议由明帝亲自主持，出席者除耿秉外，还有“明习边事”的显亲侯窦固、威振北方的太仆祭肜以及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耿秉首先回顾了汉武帝夺取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而使“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② 的往事，然后指出：“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③ 这是一个计划周详的战略方案。首先，它把

---

①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②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

③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参阅《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下》。

进攻的主要目标定在西域东部的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具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里分布着车师前、后部及伊吾卢城（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而“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①，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同时，这里又地当汉通西域的要冲，乃“西域之门户”，战略位置亦十分明显。“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②。若能夺取天山，则可打开通往西域的门户，进而控制西域诸国，“以断其右臂”。二是北匈奴呼衍王部长期驻牧于伊吾，既扼守着东汉通西域的咽喉，又可向东对河西诸郡构成直接威胁。先将其击破，则可扭转这一不利态势，削弱北匈奴南部势力，以“折其左角”。其次，先击天山，夺伊吾，破车师，后攻北匈奴本部，可避免因两面出击、战线过长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所以，耿秉的建议深得明帝的赞赏及与会诸将的认同。为了防止北单于调遣大军南下增援呼衍王，确保主力进攻天山，汉廷又决定另遣大军向北匈奴东部发动进攻，牵制其主力部队。

明帝定下决策后，立即调兵遣将，在西北边境地区集结军队。是年十二月，任命耿秉为驸马都尉，骑都尉秦彭为副将；任命窦固为奉车将军，耿忠为副将，分别率军屯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作好出击北匈奴准备。

（三）作战的经过和结果

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东汉发动沿边郡国兵，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骑兵共计4.4万人，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四路统兵将领、兵力配备、行军路线及攻击目标情况如下：

1、窦固及其副将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今甘肃张掖县西北）三郡甲卒和卢水羌胡兵共1.2万骑，由酒泉塞出发，向天山地区进击，目的是夺伊吾，破车师，控制东汉通西域的要道。

2、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南匈奴左贤王信率河东（今山西夏

---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县西北）、北地、西河羌胡兵及南匈奴兵共1.1万骑，从朔方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出发，向屯驻于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段）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部进袭。

3、耿秉与其副将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兵共1万骑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向驻牧于三木楼山（似在涿邪山西部）的北匈奴句林王部进攻。

4、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诸郡兵及乌桓、鲜卑军共1.1万骑，由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出发，向位于涿邪山东北面的匈奴河一带进军。

东汉四路大军同时开发，各依路线向目的地进发。然而，因北匈奴采取的是躲避退让策略，致使汉军除窦固一路战绩较大外，其余三路皆无功而回。耿秉、秦彭率军追寻句林王部，深入沙漠600余里，至三木楼山，未见敌军踪影，只得勒兵而回。来苗、文穆军抵达匈奴河畔，北匈奴军早已人走地空，未获任何战果。祭彤、吴棠一路更不幸，出塞后行900余里，见一小山，右贤王信素与祭彤不合，便谎称此山就是涿邪山。祭彤军未发现北匈奴人，便率军返回。结果祭彤与吴棠被定为“逗留畏懦”罪而免官入狱，不久，祭彤忧郁而死。

窦固、耿忠军战绩颇佳。该军进入天山地区，袭击了呼衍王部，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败逃，汉军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了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于伊吾卢城。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从外交上争取西域诸国，破坏北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合，以配合军事进攻。次年十一月，窦固与耿秉及骑都尉刘张合兵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再次兵伐天山，击破盘踞白山的北匈奴军于蒲类海上，进而兵临车师。车师分前、后两部，“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①。因车师后王距离汉军较远，且一路山高谷深，天寒地

---

①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冻，不利行军，故窦固欲先击前王。耿秉则认为后王乃二者之根本，击破后王则前王不攻自降。并主动率军北上，驱兵猛攻，斩杀数千余人，虏获牛马10多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①。接着车师前王亦主动降汉。至此，天山之战遂以汉军大胜而告终。

天山之战后，东汉政府恢复了西汉时期设置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领兵数百屯驻于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亦称金满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谒者关宠为己校尉，领兵数百屯驻于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于是，汉与西域的交通在中断60多年后又重新恢复。

天山之战，是东汉对匈奴重新确立“以战去战”战略方针后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除因汉军作战策划周详，准备充分外，战略策略的正确是其主要原因。其一，此役中，汉军首次采取联合少数民族军队共同打击北匈奴的方针，大量投入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羌胡骑兵，不仅造成了汉军兵力上的优势，而且弥补了汉军不适应匈奴骑兵战法的缺点，保证了袭击、追击等战术的灵活运用，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夷攻夷”战略的成功尝试。其二，汉军把天山作为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既考虑了它的战略地位，又选择了北匈奴易被攻破的薄弱点，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实施和最终胜利。通过这次战役，东汉基本实现了夺伊吾、破车师、通西域的战略企图，为和帝时再次北征并彻底击败北匈奴创造了条件。

三、稽落山之战

（参见附图5）

（一）北匈奴的衰弱

汉军攻占伊吾、车师，控制天山地区后，北匈奴不肯就此罢

---

① 《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

休，随后对屯驻车师的汉军发起反攻。于是，自永平十八年（75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汉与北匈奴间展开了一场对西域的争夺战，争夺的焦点仍是天山地区。

永平十八年二月，窦固、耿秉奉诏班师回京，北单于立即派遣左鹿蠡王率2万骑兵袭击车师。汉西域戊校尉耿恭遣军300人救援，道遇北匈奴大队骑兵，“皆为所殁”①。北匈奴遂破车师后王部，杀后王安得，继而勒兵围攻金蒲城。耿恭据城拼杀，用毒药涂箭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神箭，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遂解去”②。五月，耿恭移军疏勒城（车师后王部城名，非疏勒国）。七月，北匈奴卷土重来，耿恭招募“先登”数千人冲杀，将其击退。北匈奴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将金蒲城团团围住，并断绝城中水源。耿恭于城内穿井得水，北匈奴以为神明，便撤军而去。

与此同时，焉耆、龟兹发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屯田于柳中的己校尉关宠亦遭到北匈奴的围困。因明帝新丧，东汉救兵迟迟未发，车师又再次叛汉，与北匈奴联兵围攻耿恭。耿恭率领将士坚守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③，士卒仅剩数十人。北单于遣使招降，并以“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④相诱。耿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⑤，以示决一死战。北单于大怒，增兵攻城。天山汉军危在旦夕。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建议，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出屯酒泉，并行太守事，另遣酒泉太守秦彭（《后汉书·章帝纪》作“段彭”，今从《耿恭传》）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7000余人进军车师，救援被困汉军。建初元年（76年）正月，与坚守柳中城的汉军会合，大破北匈奴、车师军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斩首3800级，俘虏3000余人，缴获骆驼驴马牛羊3.7万头。北匈奴军惊恐逃遁，车师复降于汉。秦彭遣军吏范羌率2000人，乘夜入城，

---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

与耿恭会合。此时耿恭仅剩饥困交加的 26 人，撤离疏勒城后，又遭北匈奴军沿途追杀，至三月抵达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县西北)时，只剩 13 人。

这时中原正遭大旱，又流行牛瘟，“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①，社会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加之“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②，东汉国力已显疲敝。章帝乃听从校书郎杨终之议，于建初元年正月诏令撤回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建初二年(77 年)三月，又撤回伊吾卢屯兵，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了车师等国。至此，汉与北匈奴对天山地区控制权的酷烈争夺，遂以东汉主动撤军而告一段落。只有班超尚留在西域，孤军奋战。

北匈奴虽然重新占领了天山地区，但经过天山之战及后来对车师的反复用兵，损失惨重，加上班超经略西域对北匈奴的沉重打击，使其势力大大削弱。从此以后，衰颓之势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建初八年（83 年）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领部众 3.8 万人、马 2 万匹、牛羊 10 余万头，至五原塞降汉，引起北匈奴恐慌。北单于赶紧“遣使贡献，求欲和亲”③，并于元和元年（84 年）十二月向东汉提出“合市”要求，试探东汉的态度。章帝采用羁縻政策，诏令武威太守孟云同意与北匈奴互通边市，并以礼待之。于是，北单于派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赶牛马万余头与汉商交易，前来交易的北匈奴贵族官员，皆受到汉沿边郡县官吏的盛情款待。南单于获悉此事，有意阻止和破坏北匈奴与汉和亲，乃遣轻骑出上郡，袭击北匈奴商队，“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④。此后，北匈奴屡遭攻击，叛逃者日益增多。元和二年（85 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率部入塞降汉，陆续归附者多达 73 批。北匈奴已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南部（南匈

①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②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①，使其在漠北难以立足，只得把单于庭远远迁到安侯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以西去了。但南单于志在统一北庭，仍不断发起进攻。这年冬，南匈奴出动1000余骑兵搜寻北匈奴部众，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部发生遭遇战，击杀温禺犊王而回。

面对这种局势，东汉政府处于两难境地，章帝既不想与北匈奴重开衅事，以免烦扰民力，又欲安抚南单于部众，以避其离心。无可奈何之际便采取折衷方案，一方面敕令度辽将军及领中郎将庞奋加倍偿还南匈奴所掠北匈奴生口，另一方面又诏令南匈奴斩获北匈奴首虏，"计功受赏如常科"②。不意却更鼓励了南匈奴对北匈奴的出击，"于是南单于复令薁鞬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③。鲜卑亦趁火打劫，于章和元年（87年），大破北匈奴于其东部地区，斩优留单于。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乱，随即又有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连同8000精兵，南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降汉。祸不单行，正在这大混乱之际，漠北又因蝗灾而引起饥荒，北匈奴族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单于位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北匈奴迅速衰弱下去。这种状况为汉朝再度北征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二）东汉的决策

章和二年（88年）二月，汉章帝病逝，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幼不能视事，由其母窦皇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虽为女流，却深谙政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欲借光武、明、章三世奠定的雄厚国力，以及北匈奴衰弱之良机，扫灭北匈奴，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

是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率先上书汉廷，请求趁北匈奴连岁天灾、内部大乱之机，"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④。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1) 征发南匈奴及新降北匈奴精兵为主力，以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1万骑兵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1万骑兵出居延。两军约定于十二月在北单于居地会合。(2) 屯屠何单于本人亲率其余军队合1万人，屯驻于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①。(3) 请汉廷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率领汉军并力北上。(4)另遣北地、安定太守率军“各屯要害”②，以防不测。各部兵马将于九月集结于黄河一线，待命出征。南单于的奏议正合窦太后之意，但与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相悖，所以汉朝在进行北伐决策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窦太后首先召来耿秉，征求北伐意见。耿秉是东汉对北匈奴“以战去战”战略方针的首倡者，又参加过第一次反击北匈奴的战役，具有很强的运筹决策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指出：“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③耿秉之议深得窦太后赞赏，但遭到尚书宋意的反对。

宋意认为，自汉朝立国以来，多次征伐匈奴，结果都是得不偿失。“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考察鲜卑攻打北匈奴的原因，一是为了掠夺财物，二是贪求朝廷重赏。若听从南匈奴统一北庭，则必使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因此必成新的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④。

耿秉和宋意的意见，在当时汉廷中各具代表性，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耿秉主张“以夷伐夷”，抓住时机，一举消灭北匈奴势

---

①②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

力；宋意则主张保持“夷虏相攻”态势，使南、北匈奴、鲜卑、乌桓等互相牵制，而汉朝坐收渔翁之利。窦太后经慎重抉择，决定先按耿秉之议，发兵征讨北匈奴，彻底摧毁其侵扰势力；然后再依宋意的主张，扶植北匈奴傀儡单于，保持南、北匈奴对峙局面，以利分而治之。窦太后定下决策后，立即着手物色统兵将帅。恰逢其兄窦宪因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而获罪被囚，且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死罪，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征西将军，统帅北伐大军。临行时，三公九卿又纷纷进谏，反对北伐，但窦太后不予理睬。

东汉这次北伐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明确进攻目标。为此，东汉政府决定，首次投入宿卫京师的北军五校尉所领精锐部队，及黎阳营、雍营，以增强汉军的作战能力。另调发缘边12郡骑士和南匈奴、乌桓、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军队，协同作战。攻击的目标是涿邪山地区。其次更加重视联合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汉朝在进行作战策划时，决定大量投入以南匈奴军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约占汉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配备在各路大军之中。

（三）作战经过和结果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六月，东汉三路大军按部署集结完毕，开始北征。

窦宪、耿秉率8000骑兵，会同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所率1万骑兵，出朔方郡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西北）；屯屠何单于率南匈奴1万多骑兵，出五原郡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南）；度辽将军邓鸿率缘边义从（志愿从军者）及羌胡骑兵8000人，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的1万骑兵，出五原郡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三路军队共4.6万人，长驱北进，会师于涿邪山。窦宪获悉北单于屯驻在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古尔连察汗岭西北），乃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1万多精锐骑兵作前锋，窦宪、耿秉等统帅大军作后应，向稽落山挺进。汉前锋部队行至稽落山，立即与北单于主力部队展开激战，

“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①。汉军乘胜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泊）。此役共消灭北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俘获生口甚众，马牛羊驼100余万头。在汉军沉重打击下，北匈奴再度分裂，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81部20多万人先后降汉。窦宪、耿秉出塞3000多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作铭，记颂汉朝的丰功和威德。然后班师凯旋。

在撤离燕然山时，窦宪遵照东汉政府确定的对北匈奴“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的方针，派出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财物，前去招降北单于，并遣大军紧随其后以作威慑。此时北单于已率残部西逃，吴汜、梁讽跟踪追寻，沿途又招降了1万多人，抵达西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杜格尔湖）时终于赶上了北单于。吴汜、梁讽向北单于宣明汉朝威德，并赐以金帛等物，北单于感恩戴德，叩头拜受，表示愿意效仿呼韩邪单于，保国安民，臣服汉朝。随后率领部众与吴汜、梁讽一同东还。行至私渠比鞮海，得知汉军已撤回塞内，北单于乃遣其弟右温禺鞮王携贡物随梁讽入侍汉朝。

窦宪初征北匈奴，打垮了北单于的主力，取得了稽落山之战的重大胜利。这一震撼人心的喜讯传到京师后，窦太后不仅赦免了窦宪的罪，还遣使持节至五原郡，加封他为大将军。

四、金微山之战和北匈奴的灭亡

（参见附图5）

（一）汉军乘虚出塞五千里

北单于遣弟入侍而不亲自来朝，引起窦宪的不满，他一面奏请朝廷遣还北单于侍弟，一面积极准备再次出击北匈奴。

---

①《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

永元二年（90年）五月，窦宪遣副校尉阎盘率2000多骑兵，袭破屯驻于伊吾卢城的匈奴军，重新控制了伊吾卢地区，车师前、后王均遣子入侍。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基本被清除。七月，汉朝任命侍中邓叠代耿秉行征西将军事，协助窦宪进屯凉州。九月，北单于遣使称臣，并欲亲自入汉朝见。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出塞迎接。与此同时，南单于再次请灭北匈奴的上书获准，窦宪乃暗遣汉将与左谷蠡王师子率锐骑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乃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兵分两路向北单于庭袭去。左路绕西海迂回至河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湖西南）北；右路沿匈奴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拜达里格河）北上，绕天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脉），南渡甘微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汗河）。两军于河云北会合，乘夜包围北单于庭。“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①，连其阏氏（单于妻，犹言皇后）、玉玺都未及带走。此役，汉军共歼敌8000人，俘虏数千人。

河云北之战后，窦宪欲趁北匈奴微弱，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北单于残余势力。遂于永元三年（91年）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800精骑，由居延塞出发，直奔北单于驻地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破北匈奴军，歼其名王以下5000余人，缴获珍宝财畜无数。北单于偕数骑“遁走乌孙”②，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

金微山之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汉朝出师以来最远的一次征战。此役，汉军针对北匈奴飘忽不定、行动快速的特点，以少量精骑远程奔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终使延续几百年的汉匈战争得以结束。

（二）北匈奴的灭亡

金微山之战后，北单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

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停驻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遣使入塞请降。汉朝采纳大将军窦宪的建议，同意立於除鞬为北单于，并于永元四年（92 年）正月，派耿夔前往蒲类海，正式向於除鞬授单于玺绶，同时遣中郎将任尚屯驻伊吾卢城，持节护卫北单于，一切待遇与南单于相同。至此，东汉政府实现了既征服北匈奴，又保留北单于傀儡政权，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意图。

在是否再立北单于问题上，东汉政府内部一直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当初曾极力谏阻征讨北匈奴的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这时又坚决反对再立北单于，而建议让南匈奴回归大漠。与其相反，窦宪、耿秉等主战人物却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这次征战前与战后的形势。战前，北匈奴虽已衰弱，但西域某些战略要地如天山地区尚在其手，班超正在西域奋战，不乘其弱而彻底征服它，日久必又成为祸患；而战后，北匈奴已土崩瓦解，虽留北单于名号而无其实，且有利于分而治之。若照袁安等人之议，让日益强大的南匈奴返回大漠，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因此，窦宪、耿秉等人极力主张再立北单于，而新立北单于於除鞬也把窦、耿二人看作自己的靠山。但是，正当中郎将任尚准备奉命护卫北单于迁回漠北时，窦宪获罪被诛，耿秉也已去世。北单于失去依靠，恐遭不测，便于永元五年（93 年）九月，擅自率众叛汉北返。东汉遣将兵长史王辅率千余骑兵与任尚共同追去，用计诱骗北单于返回，然后突然袭击，将北单于诛杀，全歼其部众。北匈奴由此灭亡。

此后，北匈奴部众因失去政治统领中心而四分五裂，各自离散。金微山之战后遁往乌孙的北单于，率领一部分北匈奴人踏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残留在漠北的北匈奴人，大部分融入了逐渐西移并占据原北匈奴地区的鲜卑族；少部分在 4～5 世纪时被柔然族吞并。曾长期驻牧于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呼衍王部，仍经常出没于西域北道，经 60 余年后才不明去向。投降汉朝的北匈奴人，曾发生过 20 余万人拥立南匈奴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并叛汉北归的事件，但经东汉和鲜卑多次打击后，逢侯又重归汉朝。总之，北

匈奴灭亡后，虽然仍有少数匈奴人（包括南匈奴叛汉者）在边境地区骚扰，但对东汉王朝已构成不了威胁。

（三）汉、匈胜败原因分析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内民族战争。由于北匈奴贵族无休止地骚扰和掠夺，使东汉北疆长期处于兵灾困扰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东汉政府为消除边患作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采用和亲政策，同意边境合市以及加固边塞防务等等，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北匈奴的南扰。迄至明帝、和帝时，东汉王朝利用日益增强的国力，采取“以战去战”方针，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大举北伐，终将北匈奴彻底击垮。由于这场战争对于制止北匈奴贵族南下掠夺，平息北边战乱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得到了包括南匈奴、乌桓、鲜卑乃至西域诸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东汉战胜北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汉、匈双方国力看，东汉占有明显优势。自古以来，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东汉初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治国方针，致力于休养生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①，因而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至明帝永平十六年第一次北击匈奴时，已经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条件，使战争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了战争的顺利展开和最后胜利。而北匈奴始终政局动荡，民心不安，部民成批地投向东汉，势力一再削弱，加上漠北连年遭旱蝗天灾，经济大受破坏，国力更加衰弱。“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就此而言，北匈奴无论是政治抑或经济，均无法与国力强大的汉朝相抗衡。

第三，东汉战略、策略的正确。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很早就把准备对匈战争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予以高度重视，除在政治、经济上为战争创造必要条件外，军事上也作了充分准备。一

---

①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24 页。

是不断加固边防工事，于缘边要塞“筑亭候，修烽火”，增兵列守。二是大量遣送弛刑徒屯戍边塞，充实边防力量。永平八年（65年）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①。明帝以降，类似诏书时时颁发，成为东汉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三是有目的、有步骤地对南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进行争取和联合。这项策略的成功，不仅增强了汉军的防御反击力量，分化瓦解和孤立了北匈奴，而且为实现更深远的战略意图提供了可能。北匈奴的作战特点是飘忽不定、行动快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②，适应在荒漠、草原、山地进行骑兵战。建武九年（33年），刘秀曾遣大司马吴汉率5万汉军出击匈奴及卢芳，却经年无功；建武二十一年（45年），马援亦曾率3000精骑出击匈奴、乌桓和鲜卑，结果连踪影都未见着。说明汉军对匈奴骑兵的作战特点不甚适应。由于南匈奴、乌桓、鲜卑具有与北匈奴相同的作战特点，所以汉朝对他们争取、联合的成功，实际上为汉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它既弥补了汉军习惯于防御战法，而缺乏运用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机动作战经验的不足，又使汉朝先进的治军、作战思想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少数民族军队的作战长处揉为一体，从而大大提高了汉军的作战能力，使汉军在对匈战争中占有明显的战略优势。也正因如此，汉军才敢于并能够深入大漠，穷追猛打，歼灭北匈奴主力。以上战略、策略的成功运用，是汉军夺取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东汉作战策划周详，战术运用得当。东汉两次北伐都经过了慎密、周详的战前策划，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明帝和窦太后，也都能认真听取和采纳正确的建议，抓住最佳时机，果断决策，并依靠集体的智慧，定谋设计，作好战争准备。窦固、窦宪、耿秉、耿夔、耿恭等统兵将帅，也皆熟知边情，能征善战，在战

---

①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②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争进程中，表现出了积极进攻、大胆决断、灵活多变的指挥特点。如天山之战，先破呼衍王部，夺伊吾卢城，再兵临车师；先取车师后王部，再迫令前王部主动投降，体现了逐个击破的作战特点。稽落山之战，针对北单于势力衰弱、害怕决战的情况，抓住有利战机，先用精锐骑兵袭破其主力，然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河云北之战，利用南匈奴骑兵吃苦耐劳、熟悉地形的长处，远途行军，轻装疾进，分路包抄，乘夜袭击，使北单于措手不及。而金微山之战，又充分发挥了骑兵部队快速强大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远程奔袭，出其不意地全歼北单于军。在这些战役中，汉军始终能掌握主动权，环环紧扣，挥洒有序，使敌军毫无喘息之机，足见汉军将帅指挥艺术的精妙和战术运用的熟练。这也是汉军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匈奴所以在战争中失败，除了前述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主要是对东汉王朝的备战情况以及作战特点的改变，似乎毫无觉察，汉军第一次北征时尚能采取快速回避战术，保全主力；而面对汉军第二次出击，则全无应战对策，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步，加上其兵力分散，各部之间无法配合，因此在汉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以全军崩溃而告终。

第二节　对交趾的战争

一、交趾反汉的起因

交趾（又作交阯），开发较晚，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言语各异”，“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①。至西汉在这里设置郡县机构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交趾的统一管理，并大批迁徙罪人及其家属与当地居民杂处。于是逐渐接受了中原地区

①《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先进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有了较大的进步。

东汉初年，为了加强对交趾的行政统辖，光武帝刘秀任命锡光为交趾郡（今越南河内市东北）太守，任延为九真郡（今越南清化省清化西北东山县阳舍村）太守。锡光赴任后，积极从事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事业，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手工制作技术以及媒娉婚娶等礼仪教授给当地人民，并建立学校，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这些措施对改变当地的落后状况，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东汉政府的感召下，归附汉王朝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建武十二年（36 年），九真郡界外的俚人（古族名）张游因向慕中原先进文化，率族人归附东汉，被封为“归汉里君”①。次年，南越郡界外蛮夷也向东汉王朝贡献白鸡、白兔，表示内附。可见东汉王朝对南方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联系也日益加强，这是当时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趋势。

然而，面对东汉王朝对交趾地区统治的加强，以及中原文化的源源传入，当地一些奴隶主贵族深感恐惧和不安，力图阻挡封建制度的渗入和对其利益的冲击，希望保持原来的落后状态，以便继续享受各种特权。交趾叛乱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组织领导叛乱的是征侧、征贰。

征侧是交趾郡麊泠县雒越（古越族的一个分支）将军之女，“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②。因交趾太守苏定在当地贯彻法令，征侧的行为受到了约束，所以深感不满，遂于建武十六年（40 年）二月与其妹征贰发动武装叛乱。一时之间，交趾、九真、日南（今越南广治省甘露河与广治河合流处）、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等郡蛮俚上层首领纷纷响应，加入叛军，短期内便攻占了四郡 65 城。征侧自立为王，建“都”麊泠（今越南永富省安朗县夏雷乡）。因叛军来势汹汹，“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③，乃火速向京城告急。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二、作战经过

"二征"起兵反汉时，东汉虽然已经统一天下，但社会秩序仍不稳定，为抗拒刘秀推行的度田措施，"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①。刘秀为平乱而焦头烂额。建武十七年（41年）六月，在今安徽境内又发生巫师李广聚众反汉事件。李广攻占了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击败了汉朝谒者张宗率领的数千人马，气势一度较盛。刘秀调遣中郎将马援率军1万余人再次征讨，才将李广平灭。东汉北疆也因匈奴、鲜卑、乌桓等连年寇边而警报频传。所以，当"二征"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刘秀一时无暇顾及，直至是年九月马援平定李广后，才决定出兵讨伐"二征"，并诏令长沙、合浦、交趾郡守制造车船，修建道路桥梁，开通山谷河流，储备军用粮草，为汉军南下作好准备。同时，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中郎将扶乐乡侯刘隆为副将，调集长沙、桂阳（今湖南郴州市）、零陵（今属湖南）、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四郡兵共1万多人，并督率楼船将军段志的水军，向交趾进发。

汉军由长沙出发，水陆并进，马援、刘隆率步兵经零陵而入交州；段志率水军沿水路南下。两军至合浦郡会师后，段志不幸病故，刘秀乃诏令马援兼领水陆两军。马援欲乘船渡海进入交趾，因"船少不足渡，乃问山行者，遂缘海随山开道千余里"②，由东向西艰苦行进。建武十八年（42年）二月，进入"二征"活动中心封溪、麊泠地境。这一带属热带雨林地区，到处是深山丛林，低谷洼地，经常阴雨绵绵，气候潮湿闷热，瘴气熏蒸，汉军官兵不服水土，染病者极多。在重重困难面前，马援沉着冷静，丝毫不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

乱，他发现浪泊（在封溪县境）地势稍高，便于部队休整，亦有利于攻防作战，便指挥汉军迅速抢占这一高地。随后摆开阵势，向“二征”叛军发起进攻，歼敌数千，俘虏万余人。叛军残部逃向禁溪（在麊泠县境），汉军乘胜逐杀，叛军四散溃逃，“二征”躲入深山岩溪（或作金溪究）之中。建武十九年正月，汉军再次发起攻击，全歼禁溪之敌，斩征侧、征贰，传其首级至洛阳。

“二征”被杀后，其余党在首领都羊（或作都阳）、朱伯等率领下逃至九真，继续顽抗。同年十月，马援挥师南下，率领水、步军2万余人，大小船只2000多艘，向九真进军。汉军声势浩大，自无功县（今越南南定西南）至居风县（今越南清化西北），所到之处，叛军望风披靡。只有朱伯一行藏入深山丛林之中，既不出战也不投降。这里山多林深，犀象出没，极难搜捕，马援乃分出一军，沿东南海岸泛舟至无编县（今越南清化南），再与居风县汉军南北夹击，终于剿灭朱伯。这一战共歼敌5000多人，九真叛军全部肃清①。

三、战后一般情况

东汉对交趾的战争，粉粹了“二征”分裂割据的企图，维护了汉王朝的统一局面，为岭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为剿灭“二征”，汉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仅染疫而死者就近达出征将士的一半。为防止“二征”事件再次发生，马援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来重建并完善交趾、九真等地的封建统治制度，安定边境社会秩序。

马援平定“二征”之前，交趾、九真地区虽然设置了郡县，但县级机构尚不完善，除郡级长官由汉廷中央统一任命外，县级以下各级政权均保留了其原来的统治方式，由奴隶主贵族雒王、雒

① 以上参阅《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注》。

侯、雒将把持着地方军政大权，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央集权。所以，马援在平定交趾叛乱之后，首要的一项措施便是完善郡县制，重新勘定地界，设立县级政权机构。马援在奏请光武帝同意后，把人口多达3.2万户、偏远处距离县治1000多里的西于县，一分而成西于、封溪、望海三县（皆在今越南河内市北）。所设县皆由中央委派的县令、长进行治理。为了保证郡县机构有效地行使军政职能，马援又及时派人修治郡县城郭，加固城防工程。第二项措施是，修订雒越法律，依据汉律，摈弃越律中与汉律相违背和太苛严的条目，然后发布告示，公诸于众。第三项措施是，把参与“二征”叛乱的300多名奴隶主贵族迁至零陵郡，以剥夺他们叛乱的基础。第四项措施是，组织民力开凿渠道，引水灌溉，发展生产。此外，马援还开凿了一条由交趾安定（今越南南河省南定西北红河南岸）直通九真浦阳（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东南）的水道南塘，并在日南郡最南端，立铜柱“为汉之极界”①。

以上措施对加快当地向封建社会过渡，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马援平“二征”的军事行动深符历史发展潮流及当地人民的愿望，其治理交趾的事迹更受到雒越民众及其后人的称颂，成为历代佳话，至今还在我国南方边陲和越南一带流传。

第三节　对武陵“蛮”的战争

一、武溪之战

东汉时期，把分布在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笼统地称为南“蛮”，其中居住于武陵郡（今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注引《广州记》；参阅《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注》。

湖南常德市）的被称为武陵“蛮”。武陵地区与中原王朝联系比较早，战国后期即正式设郡。史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① 因这一地区开发较早，故其社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至东汉初期，在南方诸蛮中，武陵五溪“蛮”势力最为强大，一些部落首领开始利用东汉政权尚不稳固之机，不遵汉法，甚至公开举兵反汉。

建武二十三年（47 年）十二月，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等率众反汉，凭借武陵地区复杂险要的地形，大举攻掠附近郡县，郡县兵力难以抵挡，纷纷向京城告急。刘秀决定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前去镇压。

刘尚，生平不详，从其多次受命出征情况及其官职来看，是光武年间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建武十九年（43 年）九月，西南夷反汉，寇略益州郡，太守繁胜败逃。刘尚率军 1.3 万人出击西南夷，屡战屡胜，至建武二十一年（45 年）正月，平息叛乱。其间，越巂（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太守任贵谋反，刘尚分兵一部奇袭任贵，于建武十九年十二月一举将其诛灭。二十三年正月，又率军 1 万余人平灭了南郡（今湖北江陵县）“蛮”的叛乱。可见刘秀之所以选择刘尚担任征讨五溪“蛮”汉军的主帅，是有所考虑的，一是他近来战绩颇佳，二是对蛮夷作战颇有经验。然而，这次刘秀失算了。

刘尚刚平定南郡“蛮”叛乱，正踌躇满志，受令后，马不停蹄，立即调发南郡、长沙、武陵三郡兵共 1 万多人，由南郡出发，沿长江而下，至洞庭湖，再溯沅水（今湖南沅江）直入武溪（沅江支流，在今湖南泸溪县），试图对五溪“蛮”军实施突然袭击。相单程见汉军大举来攻，乃采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策略，不与汉军交锋。刘尚大意轻敌，挥军长驱直入，步入险境，“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②，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五溪“蛮”军见汉军受阻，即遣探马侦察汉军情况，得知刘尚军轻兵远袭，欲求速胜，故粮草不多，又不熟悉道路地形。于是分兵扼守险要之处，围困直至拖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垮汉军。果然，“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①。汉军首次出征以全军覆亡告终。刘尚被围时，刘秀曾“诏使（宗）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②，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待其赶到时，汉军已经覆没。

武溪之战，汉军主要犯了两个错误：在决策上，对五溪“蛮”军的力量及其“屯聚守险”、伺机出击的作战特点估计不足；在指挥上，刘尚急于求成，冒险深入，结果迷路、缺粮，堕入敌军圈套，最终招致失败。

二、临乡之战

五溪“蛮”军大败汉军后，势力更盛。建武二十四年(48 年)七月，相单程等率众攻占武陵郡治所临沅(今湖南常德市)。汉廷派谒者李嵩、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太守马成率兵进剿，又作战失利。汉军的接连受挫，使刘秀深感不安。消息传到伏波将军府中，年已 62 岁的老将马援再次向刘秀请求带兵南征。刘秀顾念他年事已高，不便让他再为征战之事而操劳，但早已立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③的马援，坚决要求前往。刘秀被其忠心所感动，又见他在试骑战马时，上下矫捷，来回奔驰，威风不减当年，于是立即任命马援为汉军主帅，与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统率 12 郡募士及刑徒兵共 4 万多人，征讨五溪“蛮”。

马援针对敌军占有天时地利之优势，吸取刘尚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以优势兵力将其各个击破。所以，当大军距离武陵郡尚远时，便下令在下隽县(今湖北通城西北)驻扎，研究作战方案。当时五溪“蛮”叛军主力仍盘踞在武溪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按：据考证，宋为宗之误，详见《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胡三省注。

③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一带，而从下隽进入这一地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按原刘尚军走过的路线，由沅水而入武溪。这条路比较近，但必须经过壶头山（今湖南沅陵县东），此地山高水险，地形复杂，有五溪“蛮”重兵把守，要通过这里困难较大。另一条路是沿澧水而上至充县（今湖南桑植县），再南下武溪。这条路平坦、安全，但却绕了个大弯。因而在出征之前，刘秀就犹豫不决，没作出决定，当汉军到达下隽时，马援又召集众将商议对策，中郎将耿舒欲图安全，极力主张走充县之远路。马援则认为这样既花时间又费粮草，不如抄近路，袭击并夺取壶头山，扼住五溪“蛮”军的咽喉，使敌不攻自破。从壶头山的地理位置看，即使五溪“蛮”军继续顽抗，只要汉军控制此地，则进可攻，退可守，从战略上争取主动。马援把两种意见上报朝廷，刘秀赞同马援之策，于是汉军立刻行动，渡洞庭湖进入沅水。

建武二十五年（49年）二月，汉军抵达临乡（临沅县城郊），正碰上五溪“蛮”军进攻临沅县城，马援立即指挥汉军投入战斗，大败五溪“蛮”军，斩获2000多人，其余敌军逃入深林之中。这是一次遭遇战，汉军既未料到“贼无故自致”①，五溪“蛮”军更没想到会突遇东汉大军。马援抓住战机，以优势兵力对敌军发起突然攻击，使其措手不及，迅速溃败。

临沅县乃武陵郡郡治所在地，它之所以常遭五溪“蛮”军的袭击，是因为自临沅县西至壶头山无一屏障，五溪“蛮”军可以畅通无阻地直奔临沅。所以，临乡之战后，马援一面让部队休整，一面组织民力，在临沅县西南建筑了一座新的县城——沅南，并于次年汉廷正式批准设县②。

三、壶头之战和武陵“蛮”的降附

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汉军乘船逆水进入壶（或作“胡”）头山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 参阅《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地区。在这里，汉军遇到了空前的困难。首先是沅水穿山而过，水流湍急，舟船无法行驶。据记载，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圆三百里，山下水际……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①，而五溪“蛮”军又据高守险，因此汉军处境不利。其次，天气逐渐炎热，瘴疫在汉军中流行，许多士兵染病而死，马援亦身患重病。险恶的气候、环境使汉军困在山下岸边，难以动弹。为躲避炎热，休整军队，马援下令凿穿山壁，以洞代房，就地坚守。这样，汉军与五溪“蛮”军互相对峙，汉军一时无法攻上去，五溪“蛮”军也不敢攻下来，双方形成僵局。

马援虽身患重病，仍坚持履行职责，每当听到五溪“蛮”军的动静，就不顾危险前去观察敌情。其行为使将士们深为感动，“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②。但耿舒因马援未用其策而耿耿于怀，趁汉军遇阻之时写信给其兄耿弇，先把他曾建议的从充县进军可能带来的胜利前景描绘了一番，然后说：如今兵困壶头，疾病流行，损失惨重。马援用兵就像西域商人，每到一处就停止前进，以致丧失战机③。耿弇收到书信后，立即上奏刘秀。刘秀便派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奔壶头，担任监军，并责问马援。然而，当梁松到达时，马援已经病逝。

马援去世时，汉军虽然还停滞在壶头，但补给线路仍牢牢控制在手中，所以汉军未垮，五溪“蛮”军却先因饥困而坚持不住，士兵中多有降汉之意。因马援去世，汉军失去主帅，眼前如何打算，诸将无有良策。这时，谒者宗均挺身而出，愿代行主将之职。宗均自援救刘尚未成后，被刘秀任命为马援的监军，一同进军壶头。他15岁为郎官，“好经书”，“通《诗》、《礼》，善论难”④，对刘秀“以柔道行之”的统治思想深有领会。因此，他在与众将商

---

① 《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 参阅《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议对策时，大胆地提出了伪造皇帝诏令，招降五溪“蛮”军的想法。众将大惊失色，“皆伏地莫敢应”①。但宗均认为“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②。于是矫制调令伏波将军司马吕种为沅陵（今湖南沅陵县南）县长，让他奉假诏书前往五溪“蛮”军营，宣明汉朝恩信，同时派大军紧随其后。五溪“蛮”军已因饥困而军心涣散，见吕种独入军营，更感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③。于是宗均率军进入五溪“蛮”军营，将其士兵遣回本乡，重新整顿县级机构，充实各级官吏，然后班师回京。

壶头之战，从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至十月，交战双方相持半年以上，最后以汉军招降五溪“蛮”军而告终，对东汉王朝来说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一战自然不可抹杀马援的功绩，他果断决策，进军壶头，抓住敌军主力不放，将其牵制在壶头山上；他指挥得当，攻一处巩固一处，保证后方供给线路的畅通，使汉军困而不败，反将敌军拖垮。这为宗均实行招抚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宗均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改变策略，对饥困绝望之敌进行招降，从而兵不血刃而达到战略目的。

---

①②③《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

第七章 东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

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吏暴虐，民族政策失当，周边少数民族与东汉统治集团的矛盾日趋走向尖锐。尤其是羌族这一古老民族，对东汉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了不归顺的姿态。自安、顺以降，汉、羌矛盾更为加剧。双方大小战争上百起之多。具有战争发生频率高、时间长、空间广、此伏彼起的特点。本章着重论述羌人三次大规模反抗战争的缘由、经过和性质，分析它的胜负原因及其严重后果。此外，东汉政权对鲜卑及南方“蛮族”的战争，也将分别作一简要的叙说。

第一节 对羌人的战争

（参见附图 6）

一、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起因和平襄之战

东汉建国以后，西北地区的局势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当时，全国范围内遍布各色武装集团，除了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以外，还有不少地主武装。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西北地区拥兵割据者主要有三支，分别是卢芳、窦融和隗嚣。他们的割据有一共同特点，即利用当地少数民族部民为兵。

三水豪杰拥卢芳起兵之时，曾“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后在匈奴单于的支持下，立为“汉帝”，都九原县，“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建武十二年（36 年），卢芳被东汉击败，“亡入匈奴”，后

请降，旋复反叛出塞，病死于匈奴①。窦融“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②。他在河西的武装割据历时5年，后在东汉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归顺。至于隗嚣，在更始之时，就趁先零羌封何诸种反叛王莽统治之机，“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③，扩张势力，至东汉初年，已是“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④，负隅顽抗了十载之久。直到东汉建武十年（34年），隗氏之势力才基本被平定。然而，“隗嚣灭后，陇右不安”⑤。主要是原来隗嚣“因抚集以为强”的西羌部众，并不屈服于东汉军队的征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⑥。因此，在东汉初年，即有来歙率盖延、刘尚和马援进击羌人于金城等地的大规模汉羌战争的爆发。尽管这只是东汉初统一战争在陇右等地区的延展，却也为后来汉羌间形成长期的战争状态留下了伏线。

对于陇右统一的问题，东汉在平定隗氏势力之后，曾一度采纳班彪的建议，在凉州复置护羌校尉，准备对凉州诸羌采取剿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为此，光武帝命降将牛邯为护羌校尉。随来歙大军赴平羌前线。牛邯，“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⑦，是个十分熟悉边情，且为羌人所信服的人物。起用牛邯为护羌校尉，是企图借其在西羌酋豪中的影响，迅速平定陇右地区。然而，牛邯就职后不久即死去，“及邯卒而职省”⑧，护羌校尉一职暂罢，表明东汉朝廷在对待西羌的问题上，从剿抚并用转变为全力攻剿的战略方针。从建武十年至十三年（34～37年），东汉军先后平定金城、陇西的先零羌和武都的参狼羌，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

① 《后汉书》卷十二《卢芳传》。

②③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④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⑤ 《后汉书》卷七十七《樊晔传》。

⑥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⑦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⑧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东汉初年，汉廷战胜西羌后，在陇右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使降羌与汉民杂处共居，并大量迁徙降羌于内地。与此同时，东汉又重新设立了护羌校尉。与西汉金城属国护羌校尉不同的是，东汉此时所设护羌校尉，专领兵一营驻扎在金城，主要用武力来威慑塞内外诸羌。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数代之后，族类蕃息”①。他们与汉族劳动人民友好共居，却遭到东汉护羌校尉及郡县官吏的奴役和镇压，汉族豪强对他们更是百般欺榨。据载，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②。居于郡县的羌人，由于不甘于汉廷的奴役和压迫，故从东汉初年起，就常常发动反抗东汉政权的斗争。班彪曾上书光武帝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③可见，东汉前期，朝廷在陇右的郡县统治并不巩固，羌人不断起事，塞内外诸羌部落遥相呼应，群起反叛。在此形势下，东汉护羌校尉，金城、陇西、汉阳、武威、酒泉等郡县的太守、令、长，时时处于戒备之中，或威逼以武力，或离间于羌胡，采取各种手段，将此起彼伏的羌人反抗斗争一一镇压下去。

然而，由于东汉在西羌地区的统治方式和残酷奴役、压榨羌人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羌人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酝酿、发展之中。

羌人首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武装斗争，发生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元初五年（118年）。

这次战争的爆发，其直接原因是东汉强征羌人通西域。西域自和帝永元初年窦宪大破匈奴以后，以班超为都护，驾驭属国，开拓疆域，“至于海濒四万里外”④，经营规模盛于空前。但是，和帝

①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②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死后，邓太后专权，西域诸国便趁汉廷主少国疑之际，又纷纷反叛，“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①，以致西域与汉廷“道路隔塞、檄书不通”。此时，汉廷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② 是年六月，汉廷决定暂罢西域都护，并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前往西域，将西域都护段禧及梁慬、赵博以及在伊吾卢和柳中屯田的吏士撤回。然而，王弘军行至陇右，却强令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千骑随军前往西域。羌人平时对官吏豪右的徭役负担已经相当沉重，难以承受，及此又被征远戍，且骑马须由自备，于是皆“惧远屯不还”③，怨声载道，而王弘及各地行政长官“迫促发遣”④，逼令羌人上路。队伍行到酒泉，羌骑多所逃散。汉廷竟命各郡出兵堵截，甚至将羌人行居之庐落予以拆毁。这一不明智的举措，使得本已惶恐不安的羌人更为惊惧。“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⑤。“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⑥。第一次大规模汉羌战争随之爆发。

这次羌人的反抗战争，虽属自发性质，并无准备和统一的领导。但是，战争进程迅速，来势猛烈。据《徙戎论》称：“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⑦ 参加反抗战争的羌人散在各地，少者数千，多者数万，在凉州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尽管羌人手中没有什么像样的兵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然而，各郡县守令皆“畏懦不能制”⑧。羌人反抗的战火迅即蔓延至整个陇右地区。

迅猛发展的羌人武装反抗斗争，极大地震撼了东汉王朝。在

①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③④⑤⑥⑧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勒姐羌和当煎羌当时居金城郡；麻奴为安定郡烧当羌首领；先零羌和钟羌则分布在陇西郡境内。

⑦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地方政权和边防兵无法遏制羌人武装反抗的情况下，汉廷遂组织中央军和调集郡国兵，前往陇右增援，企图以强大的野战兵团剿灭武装反抗的羌人。是年冬，汉廷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北军五校尉营西征，并命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诸郡合兵5万人，于汉阳集结屯守，以屏蔽羌人，捍卫三辅。与此同时，“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①。采取分化、瓦解、涣散众羌的策略，作为配合进剿的措施。

当时，汉、羌战争双方的态势是：羌人的主力是陇西郡的先零和钟羌。先零羌自汉初就盘踞在从襄武五溪聚（今甘肃陇西县西）至狄道、安故（今甘肃临洮南）的丘陵山区，亦称作“五溪羌”，实力颇强。史载：“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壍自守，州郡不能讨。”② 钟羌分布于先零羌以南，“种（钟）羌九千余户在陇西临洮谷（今甘肃岷县境）”③。羌人的武装反抗爆发后，先零羌、钟羌就在陇西，南北相依，互为犄角之势，切断了关中通往西域的陇道，此时，汉军由邓骘、任尚率五营抵汉阳冀县（今甘肃武山东），已与陇西羌人形成正面战线。然而，募集之诸郡兵未能及时抵达汉阳前线助阵，北军五营虽为汉廷精锐之师，但毕竟成为深入羌中的一支孤军。而且，汉廷中央军不熟悉当地环境，面对强大的先零羌和钟羌，显然处于被动的劣势。永初二年（108年）春正月，钟羌首先发起攻击，以数千人之众突袭邓骘军于冀西，一举将其击溃，杀死汉军1000余人，打乱了汉军的战略部署。

其时，正值梁慬率西域屯军在回师途中，行至敦煌，汉廷宣诏，命梁慬留兵于当地，以便从西线牵制凉州反抗的诸羌武装，支持东线的邓骘大军。梁慬兵至张掖时，“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杀略吏人”④，梁慬遂趁羌人不备，大破诸羌，并乘胜追至昭武，羌

---

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③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

④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军溃散逃亡，梁慬军继续东行，一路上击杀诸羌近万人，至姑臧（今甘肃武威），迫使羌人300余位首领投降①，凉州河西四郡羌人失利。在河东诸郡，羌人武装反抗的烽火仍在蔓延，在羌人武装的沉重打击下，东汉地方政权纷纷垮台。《后汉书·五行志二》载："其后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可见凉州地方官在当地根本无法立足。

邓骘并不甘心失败，等待时机纠集兵力准备反击。永初二年（108年）冬，汉廷募集的诸郡兵陆续抵达汉阳，邓骘命副将任尚和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出击，与先零羌首领滇零所率的羌军数万人，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展开激战，英勇顽强的羌人将汉军击溃，歼灭其8000余人，任尚军大败。

平襄之战是一次重大战役，它首次以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西汉以来，汉羌之间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如，武帝时有李息、徐自为的平羌之役；宣帝时有赵充国出征击西羌；元帝时有冯奉世讨平乡姐等七种羌人。东汉与西羌的战争更多，较著名的如"永平元年（58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②。和帝永元九年（97年）秋，遣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3万人，镇压寇略陇西的迷唐羌众，等等，这些战争皆以汉军的胜利而告终。而永初初年羌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汉廷调派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出击，却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惨败。如果说邓骘军与羌人在冀西之战，还只是汉军整个军事行动的前哨战，那么，在诸郡兵集结于汉阳地区以后，平襄之战，汉军就带有战略性的失败。晋代江统追述这次战役时说："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可见汉军败绩，影响至深。平襄之战以后，这次羌人的大规模武装反抗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①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二）羌人的大举进攻和汉军的防御策略

平襄之战以后，汉羌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羌众遂大盛，朝廷不能制”①。整个战局是羌人由对外线的防御作战，转变为内线的大举进攻，汉廷由派兵征剿，被迫转变为分头应付，整个战争形势于东汉极为不利。

陇西、汉阳当东西要道，是官军必争之地。为了避免与东汉主力正面作战，先零羌在取得平襄之战的胜利之后，由首领滇零率领，主动向汉军控制薄弱的地区挺进，从陇西转战至北地，并以北地富平（郡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为中心，建立起根据地。滇零自称“天子”，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反抗东汉统治的羌人政权，并以此号召西北诸羌联合抗击汉廷官军。

滇零在北地招集武都郡的参狼羌和上郡、西河的羌胡共同参加武装反抗，将战火扩展至并州和益州，从东、南两路攻击汉朝。东路，以“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②。其势迅疾，很快就到达武功（今陕西扶风东南）和美阳（今陕西扶风东）之间③，直逼汉室皇家陵园。南路，武都参狼羌攻入益州，杀死了汉中太守董炳，可见，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滇零以北地为主要根据地，联合东、南羌胡夹击官军的战略举措是十分成功的。首先，他避实击虚，不从汉军防守严密的三辅西线直入关中腹地，而改走凉州北部，突入并州，再由北而南，很顺利地攻入了三辅地区，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主动权。其次，参狼羌在南部的进攻，又从汉中威胁到关中之后背，有力地配合了北部羌胡的军事行动，使东汉处于腹背受敌，防不及防。其三，东路诸羌除了南下直逼三辅之外，还分兵向河北等地发展④，以运动战的形式四处歼敌，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使东汉统治集团惊慌失措。

在以滇零为首的众羌武装的打击之下，西凉地区社会一片混

---

①②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安帝永初二年。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七《梁慬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东犯赵、魏。”

乱，“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①。为阻止羌人东进的邓骘大军，在遭到惨败之后，已失去了继续驻守于汉阳的必要，况且，在后勤保障上也无力支持大军的供给。于是，汉廷接受庞参的建议，下诏邓骘班师，留任尚仍然屯驻汉阳，以节制诸郡兵马。根据庞参的建议，任尚留屯汉阳的主要任务是：“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② 由此可知，汉廷对羌人的战略，已由积极进攻，转变为收缩战线，屯兵驻守，待机反攻，其目的在于确保三辅陵园。故梁慬军在凉州西部作战取得胜利之后，也已奉诏屯兵金城，但得知羌军进击三辅地区时，便立即率军增援三辅汉军。转战于武功、美阳之间。数战数胜，羌军遭受挫折，才从这一带稍稍退散。

然而，三辅地区的羌众势力仍然不小，永初三年（109 年）春，汉廷再遣骑都尉任仁督率诸郡屯兵支援三辅汉军作战，可是，“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③。与此同时，在滇零号召之下，当煎、勒姐二羌攻克金城郡破羌县，钟羌则攻克了陇西郡临洮县，并活捉了东汉专门镇压西羌人民的陇西南部都尉。永初四年（110 年），羌军又大力进攻汉中郡褒中县（在今陕西西北），杀死新任汉中太守郑勤及其所领官兵 3000 余人。五年（111 年）春，滇零使羌兵由冯翊渡过黄河，进攻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转至上党（治今山西长子西南）、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二郡，直接威胁到赵国（治今河北邯郸）、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其锋芒直指东汉国都洛阳。

从上所述，自永初元年凉州西羌武装反抗斗争爆发至永元五年，前后短短 5 年的时间，以先零羌滇零为代表的羌军，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不仅攻克郡县，重创东汉官军，而且，在北地

---

①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郡境内还形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中心，其势力遍及西北广大地区：北面有安定、北地、上郡、西河4郡，东面至河东、上党、河内3郡，西面有陇西、汉阳2郡和金城郡之东部，南面则至汉中郡的西部以及武都郡、阴平道和蜀郡的北部。如此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汉族政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为数不多的。这对后来西北地区连续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此期间，东汉统治集团继续在凉州一带实行收缩战线的策略。首先，在永初四年初，汉廷鉴于驻扎在汉阳的"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今陕西凤翔西南），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①。此前，已任命极力主张收缩战线东撤的庞参为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②，东汉战略防御的重心便进一步移至三辅地区。其次，在同年，又因金城郡完全失控，而将郡治移至陇西的襄武（今甘肃陇西）。护羌校尉营也不得不从金城徙至张掖③。骑都尉任仁累战累败，而对于其部又放纵掳掠，本已闾阎攘扰的三辅之地，就愈发人心惶惶，骚动不宁。为此，汉廷"槛车征（任仁）诣廷尉诏狱死"④。五年春，又以"任尚坐无功征免"⑤，希图借此调整兵力部署，督迫汉军将士用力作战。

但是，东汉的军事策略似乎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当羌人武装向河东、河内发起进攻之时，屯驻于三辅地区的汉军并未能予以有力的阻截，结果，造成河东和河内二郡"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⑥。这样，羌军兵锋直逼东汉统治中心洛阳。情急之中，汉廷被迫于洛阳外围，再次筑起新的防线，调遣北军中候朱宠率京师五营吏卒出屯孟津（今河南偃师北黄河渡口，孟县西南），以阻止羌人南渡黄河，拱卫京师；接着，又诏令魏郡、赵国、常山国（治今河北元氏西北）、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等地，迅速修筑

①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防御工事，建起坞候616所①，以防羌人从河东、河内北入冀州，同时防止并州羌兵东进。此时，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已发展到最高潮，东汉政权岌岌可危。

在如火如荼的羌人武装反抗斗争中，东汉统治者处处被动挨打，损兵失地，无计可施。于是，朝中大臣对于平定“羌乱”的策略和凉州的弃、守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永初四年（110年），谒者庞参上书邓骘，认为，连年的汉羌战争使朝廷兵费日广，加上持续几年的天灾，农业歉收，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持旷日持久的军费开支。而长途跋涉将军粮、草料转输至陇右，更增加了无数百姓的赋调。沉重的军费负担又主要落在三辅等较为富庶的地区。这样战争的结果是，“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②。为此，庞参重弹放弃西北边郡的老调，主张“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③。庞参这一建议，得到了以邓骘为首的一班朝廷公卿的赞同。

另一群官员则仍然主张坚守凉州。当时太尉郎中虞诩极力陈说放弃凉州是错误的决策，他指出不应放弃凉州，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凉州是国家版土，乃先帝开拓的疆域，不能轻易地弃之于化外；第二，如果放弃了凉州，三辅则成了边塞地区，皇室陵园便暴露于外，于社稷显然有害而无利；第三，凉州吏民多骁勇善战，冲锋陷阵，父死子继。民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自凉州，因为他们是汉朝的臣属，所以羌胡畏惮，进入三辅地区尚有后顾之忧。倘若舍弃了凉州，便失去当地军民之心，反生怨望。假使有豪杰“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③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①。虞诩陈说利害的最后一条，实是汉廷统治的根本所在，故廷议辩论，原赞同庞参建议的大臣，又转而支持不放弃凉州的主张。因此，朝廷遂下决心平定“羌叛”，收复凉州。在虞诩建议之下，为巩固凉州民心，东汉采取了“辟西州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的措施，其目的在于“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②，以此表示朝廷仍坚持东西两线作战，决不放弃凉州的战略意图。

永初五年（111 年）三月，东线战场，汉廷又起用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③，稍稍解除了洛阳的警戒，东线战局有所缓和。但当时，西线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羌人占据了凉州郡县治所以外的绝大部分地方，并州河西一部分地区亦是如此。东汉地方政权大多成为“孤城绝郡”朝不保夕。而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二千石、令、长等地方官，又多是由汉廷从内郡委派去的。他们平日只知欺压羌民，作威作福，一旦有变，便只顾自身家室的性命资财，“并无守战之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④，因此，汉廷即使下定决心坚守西州，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将一部分确已无法驻足的地方政权向后方撤退，“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上郡徙衙”⑤。

以上移徙的四郡政权，除了襄武仍属陇西郡之外，美阳属右扶风，池阳、衙县俱属左冯翊⑥，只能在三辅界内遥制本郡了，可见羌人的战略重心地带是以北地为主，上郡和安定分别为其两翼。在这一带，不仅羌、胡少数民族积极参战，反抗东汉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一般汉族人民也不满汉廷的统治。因此，当朝廷下诏，

---

①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安帝永初四年。

②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③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⑥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李贤注。

要他们随同地方政权一道迁徙内郡时，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史载，移民时，“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①。东汉统治集团对付羌人大举进攻的战略防御措施，是以牺牲当地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和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代价的。苦难深重的汉族人民对东汉朝廷、官军的暴行也忿怒至极，一部分人响应并参加了羌人的武装反抗行列，使第一次羌人反抗战争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富平上河之战和羌人的失利

富平是北地郡治所在，先零羌首领滇零在此称“天子”之后，实际上，它已成为羌人各部反抗东汉统治的政治中心，因此，富平也成为汉军主力进攻的主要目标。然而，东汉地方官吏强制移民、迁徙而引发的汉阳郡等地汉族人民的反抗，牵制了汉军的主力和进攻方向，迟滞了东汉统治集团镇压羌人斗争的进程，使羌人的武装势力得以继续发展。

永初二年（108年），汉阳人杜琦与其兄弟杜季贡以及同乡王信等积极密谋，组织了农民军，曾发动过反抗东汉的斗争。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以杜季贡、王信为部将，自汉阳率军南下，攻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驻军于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汉廷派御史大夫唐喜前去镇压，经年不能取胜；更遣中郎将尹就出兵，亦无功而还。当时，广汉等郡的太守领兵屯聚于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北），束手无策，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杜琦军声势之隆②。至永初五年（111年），在东汉移民、迁徙政策的逼迫之下，许多不愿意离乡背井的汉人也投入了反抗的武装队伍。杜琦军力量更为壮大。随即，杜琦北上与滇零等羌军“通谋”，攻克汉阳上邽（今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华阳国志》卷二，阴平郡条。《后汉书》、《东观汉纪》皆以杜琦在永初五年起兵，与事不合。又，唐喜镇压杜琦农民军失败，并未被朝廷赐死。《华阳国志》所载也有不实，史实可与《后汉书》对参。

甘肃天水西南)，给汉廷以更大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汉廷不得不将主要注意力转至汉阳，下诏能得杜琦首级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杜琦者，给金百斤、银二百斤。是年冬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募得杜习为刺客，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暗杀了农民军首领杜琦。杜季贡、王信被迫转战，率众聚占樗泉营，农民军受到严重挫折。

次年，汉廷再遣侍御史唐喜出兵，率诸郡兵进攻樗泉营，克之。王信600余众惨遭官军杀害，家属子女500余人被官军俘虏。强迫为奴婢，“收金银綵帛一亿已上”①。农民军遭此失败，在汉阳已无法立足，遂在杜季贡率领下，北上投靠滇零，直接加入了羌人的反抗队伍。不久，滇零病死，其子零昌继立，因其年纪尚幼，羌人则以零昌同部人狼莫为谋主，又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富平附近的丁奚城。可见，杜季贡领导的农民军，在羌人反抗汉廷的武装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于是，杜季贡在丁奚城一带组织汉、羌军民开垦土地，种植禾稼，实行且战且耕的屯田，以对抗汉廷官军的进攻。此后，汉羌战争主要是对以富平为中心的羌人根据地的“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重心全面移至北地。

从北地羌人所居的战略地势来看，北有沙漠、黄河阻隔；东面除有黄河之外，素为汉廷着力经营的边陲，虽然在羌人反抗高潮时期，羌军曾经突破黄河，但是，汉军很快在黄河以东地区，缘河走势筑起了坞候600余所，防线重重；南面是三辅重地，汉廷派有大军驻防。因此，羌人在河套地区除与西面各郡仍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战略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汉军也首先由北地西侧的安定发动进攻，企图扫清羌人北地根据地的外围，切断零昌等与西部羌人的直接联系。

永初七年(113年)夏，汉将马贤、侯霸出其不意地掩击在安定的零昌别部牢羌，牢羌大败，被俘千余人，被掠牲畜2万余头②。这样，汉军基本上形成了对北地羌军的“围剿”的战略态势。元

①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初元年（114 年）春，汉廷为确保洛阳等东线的巩固，配合西线的大举进攻，“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以备羌寇”①。显然，这一措施，一是防备羌人在遭到西线进攻后向东突围，二可保障汉军后勤供应的渠道畅通无阻，说明东汉官军“围剿”北地羌人武装，是作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的。

为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羌人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了突破汉军的合围，零昌于元初元年五月遣羌军攻右扶风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其后，仍在陇西的羌族首领号多和当煎、勒姐等部落首领，各率其部落羌军，“分兵抄掠武都、汉中”，但被巴郡板楯蛮及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兵击败。于是，号多等退还陇西，“断陇道，与零昌通谋”②。号多等在北地外线的军事行动，虽未能取得出色的战果，却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汉军“围剿”北地羌人战略的实施。为了对付号多等羌军，马贤、侯霸纠集了湟中吏士及一些降汉的羌胡，在枹罕击破号多军，斩首 200 余级。但是，羌军却在狄道取得大捷，击败了凉州刺史皮杨，歼灭汉军 800 余人，皮杨因此而被朝廷免官。为了集中兵力，全力“围剿”零昌，汉廷对号多采取了诱降策略。此时，“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护羌）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③。号多在庞参诱降政策引导之下，于元初二年春，率 7000 余人向东汉投降。这样，零昌失去了西线的战略呼应。

号多投降东汉后不久，零昌又分兵南下，派部众吕叔都等攻取益州，力图突破汉军合围。汉廷则遣中郎将尹就率南阳兵为主力前往镇压。并发益州部诸郡屯兵合击。是年秋，尹就仍采用汉廷惯用的伎俩，募蜀人陈省、罗横刺杀了南下羌军领袖吕叔都等人。零昌南下攻取益州的计划又遭失败④。但是，吕叔都余部仍在益州坚持斗争，至元初四年，“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⑤。

尽管零昌羌军试图向西南打开汉军“围剿”的缺口，但始终

---

①②③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未突破官军的战略封锁。元初二年秋，汉廷在镇压吕叔都部的同时，诏命班超之子班雄以屯骑校尉的身份，领兵屯守三辅，作为镇压羌人的基地，又派左冯翊司马钧为行征西将军，督率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共约8000余人，北上直取羌人在北地的根据地中心富平，又另遣在陇西的护羌校尉庞参挟羌胡兵7000余人，由西往东北方向进军，与司马钧部对零昌形成夹击的战略态势①。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羌军以杜季贡为将军，出兵往西南狙击汉军，在勇士（今甘肃榆中北）以东地区，一举击败庞参率领的护羌校尉营之羌胡军，迫使庞参引兵后撤。然而，司马钧独自进军。趁杜季贡主力在西，羌人根据地内部空虚之际，一举攻拔丁奚城，掠得羌军大批财物。杜季贡因后方被袭，不得不率兵转战于周围山乡②。司马钧为扩大战果，命仲光、盛包、杜恢等在丁奚城附近抢收羌军屯种的禾稼。仲光等违背将命，不遵司马钧的节度，散兵深入到四周羌人活动的游击区，被羌军“设伏要击之”。司马钧在城中，怒而不救，致使仲光等俱被羌军包围，汉军败绩，死者3000余人。由于司马钧等孤军入北地，又损兵折将，在丁奚城无法立足，便于是年十月狼狈地逃回三辅地区。这次汉军对北地羌人根据地的夹击，两路兵马均先后失利，庞参因失期坐罪，司马钧则畏罪自杀③。可见，这次行动，汉军损失也是很大的。

不久，汉廷接受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重新任命了将领，加强镇压力量，又调整了战略战术，对羌人北地根据地再次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时，马贤取代了庞参为护羌校尉驻扎在陇西；任尚则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3500人，取代班雄屯驻三辅，并地方屯兵共约20余万人④。同时，任尚接受虞诩的建议，令诸郡兵出钱代役，“二十人共市一马”，组建了一支人数颇众的骑兵队伍。任尚采用羌族骑兵使用的运动战法，也遣轻装骑士对

---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丁奚城的杜季贡发动突然的袭击，杜季贡部猝不及防，被汉军斩首400余级，夺走牛马羊数千头①。元初三年（116年）夏，东汉度辽将军邓遵借匈奴南单于和左鹿蠡王须沈1万骑兵，在丁奚城以北的灵州（今宁夏永宁）进攻零昌，又斩首800余级，羌人失利。随后，任尚便率部攻克了羌军重镇丁奚城。

是年秋，东汉在冯翊北界筑候坞500所，进一步封锁羌人南下的道路，任尚招募陷阵士等充敢死队，在北地再次击败零昌。是后，汉军又获大胜，杀死零昌妻子家属，掳获羌人牛马羊等牲畜2万余头，并烧其庐落，斩首700余级，缴获羌人政权的文书及羌军诸将印绶②。羌军总部遭到严重破坏。

为配合正面的军事进攻，汉军继续采用暗杀手段。元初四年春，任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5人刺杀了杜季贡。秋，又募效功种号封刺杀了零昌，羌军首领便仅剩下了狼莫，力量被严重地削弱。而在这种形势下，汉军遂发动了全线进攻。是年冬，在任尚的统一部署之下，任尚率诸郡兵由东，马贤率护军校尉所领羌胡降兵由西，同时进兵北地，夹击狼莫。马贤军抵安定青石岸（今宁夏镇原西南），遭到狼莫军狙击，并被其打败。然而，任尚军已迅速进占了青石岸西北的军事要塞高平。于是，马贤遂率其部与任尚合兵一处，并力反击狼莫羌军。狼莫力不能支，引兵向北地北部地区退却。任尚、马贤尾随其后，紧追不舍，步步为营，将狼莫部逼迫至黄河岸边，两军相持60余日，最后，在富平上河（黄河至青铜峡一带称上河）展开决战。结果，汉军大破羌军，斩首5000余级，掳获牛马驴羊骆驼各种牲畜10余万头，狼莫率余部逃往上郡。西河虔人种羌11000余口向邓遵投降。次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刺杀了狼莫，自此，“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警”③。东汉后期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羌人武装反抗汉廷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二、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爆发和汉军的防御措施

北地羌人政权被颠覆以后，凉州羌人武装反抗斗争的高潮暂时过去，但斗争并未停息。据《西羌传》所载，从元初六年（119年）至永和四年（139年），20年间，凉州等地局部的羌人反抗斗争有上十次之多，均被东汉一一镇压。例如：

元初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120年）春，上郡沈氏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忽、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121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忽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

是年秋，忍良等与烧当羌麻奴兄弟，“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马）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122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

“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

阳嘉三年（134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四年，

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

永和二年（137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反叛连年”的武都塞上白马羌，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

“明年（138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四年（139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

《西羌传》的上述记载也仅仅是举其大者，零星的小规模武装反抗斗争，尚不可能载诸史册。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羌人的反抗斗争，既是第一次羌人大规模武装反抗斗争的余波，又是酝酿更大的反抗斗争风暴的前奏。其中，如钟羌、勒姐、当煎、先零诸羌都曾接受滇零和零昌的领导，在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滇零、零昌所建立的军事根据地和羌人民族政权虽然被颠覆了，但诸羌部落体制并未完全瓦解，他们仍然连续不断地进行反对汉朝统治者的斗争。有的羌族部落在被东汉官军追杀过程中，屈于形势的逼迫而暂时投降了，但一有机会，就会联合其他羌胡群众重新举起反抗东汉统治的义旗，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战争。

然而，汉廷在镇压了滇零和零昌政权之后，认为凉州“诸羌瓦解”，自是“无事”，仍在塞内的诸羌并无大患，于是，照旧执行东汉初年以来在凉州所进行的郡县统治政策，继续广开屯田，派兵戍边。被羌人用武力赶跑的汉朝统治机构，又陆续迁回原地。延光三年（124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①。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称，凉州安定、北地及并州上郡等地“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①。于是，顺帝采纳虞诩的建议，令安定、北地、上郡及诸县俱回原址，“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②。阳嘉元年（132 年），东汉在湟中增屯田 5 部。次年夏，便将镇压陇西降羌的南部都尉重新恢复。这些防范措施，对于东汉来说的确恢复或扩大了对羌人的统治地区，而且还节约了一定的军费，可以减轻内地人民税赋和转输的负担，“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本来就是针对羌人反抗斗争的，是镇压各部羌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缓和汉羌之间的尖锐矛盾，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战争。汉廷在西北边疆的军屯，从性质上而言，是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羌族人民利益相对立的，与羌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

永建六年（131 年），护羌校尉韩皓在湟中屯田时，把屯田中心移置赐支河与逢留大河之间，“以逼群羌”。羌人见屯田官兵向西移动，“恐必见图”，于是，诸部“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④，准备对汉屯田军展开斗争。恰巧，韩皓因事坐征，汉廷以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护羌校尉。马续在分析形势之后，改换策略，对羌人“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⑤。可见，汉廷在河湟地区推行的屯田政策，其主要目的固然在于防备和镇压羌人的反叛，但从客观上来看，却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西羌地区的发展。屯田势必会侵夺羌人的土地，驱逐羌人离开原有的耕地和牧场，直接激化羌人和东汉的民族矛盾，不但不能完全阻止羌人的反抗斗争，相反，还会激起羌人更大的反抗战争。实际上，东汉在第一次羌人反抗战争高潮过后所采取的加强西州统治的措施，以屯守、扩张版图为主旨的边疆政策，预示着羌人反抗东汉统治的一个新

①②③④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的高潮即将来临。

第二次羌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爆发于永和五年(140年)。战争导火线是东汉地方官对当地羌人无度的侵扰和压榨。在战争爆发前一年的永和四年，汉廷派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两人同时赴任所。关于此二人，于史无传，《后汉书》仅称其“天性虐刻”①。他们上任之时，颇晓凉、并二州“羌患”形势的大将军梁商，曾叮嘱来机、刘秉以及同时改任弘农太守的马贤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性素疾恶，欲分明白黑，……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②也就是说，在以郡县制统辖羌胡等少数民族的政策之下，地方官若能照顾到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体谅其切身利益，也就能减少矛盾，防止大的变故，但是，“天性虐刻”的来机、刘秉等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梁商的训诫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到州之日，多所扰发”③。东汉地方官吏的残暴统治，使羌人备受剥削、掠夺和杀戮之苦难，他们不甘于受人凌辱，终于再次掀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抗东汉统治的民族战争。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处于金城郡的羌人且冻和傅难两个部落，首先举行武装反叛，聚众攻打金城郡治，揭开了这次战争的序幕。紧接着，他们联合陇西塞的降羌和湟中地区“杂种羌胡”，向三辅地区进兵，沿途杀掉了许多东汉地方官员和僚吏④，其进军速度之迅速，令刚刚恢复对凉州郡县统治的东汉官吏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可见这次战争的爆发也是非常突然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东汉统治集团，首先是立即免去了来机和刘秉的刺史之职，接着，调发京师兵及诸州郡兵前往镇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之。东汉军主要由左、右羽林、五校士等中央军以及诸州郡地方兵组成，共约10万人，屯驻于汉阳，阻挡羌人东进之途。同时，东汉又在扶风、汉阳、陇道筑起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300所坞壁，各置屯兵，将散处于各地的汉族军民收缩于坞壁，形成一个个据点，与反抗的羌人武装对垒，战事从永和五年夏至六年春逐次展开，并形成高潮。

（二）射姑山之战和羌人的攻势

战争伊始，东汉军便显现出战略上的被动。先是，汉廷在选择大军主帅问题上出现争议。顺帝命马贤挂帅出征，而大将军梁商则认为马贤年老，不如派太中大夫宋汉为好，顺帝不允，决意以马贤为统帅。决策层用人的意见不一致，势必影响到前线的战略指挥。马贤军出征后，屯驻于汉阳稽留不进，且军无斗志，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武都太守马融上书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① 又曰："臣又闻，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寒不披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遝，儿子侍妾，事与古反。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将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② 布衣皇甫规也"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上书言状"，但"朝廷皆不从"③。这说明马贤的战略指挥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廷的实力派梁商等人从中掣肘，汉军的被动也就在所难免。

羌军则充分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面对强大的汉军，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洮水而东南，攻武都郡，另一路则在汉军的防线中穿插，乘马贤大军稽留不战的机会，沿渭河而东，烧毁陇关（今甘肃清水东北），逼近三辅境界，随即突破汉军的堵截，"寇三辅，杀令长"④，又趁机夺取汉廷圈养于这一带的苑马⑤，更增强了羌军作战的机动能力。

这时，屯驻于汉阳的马贤军已失去了阻隔羌军东进的作用，不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五年。

④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⑤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得不分兵尾随羌军而东。羌军却在永和五年底迅速北上，摆脱了前有长安强敌，后有马贤追击的夹击，挑选了汉军防守较为薄弱的环节，“围安定”①，继而向北地郡进攻。当时，南匈奴句龙王吾斯等立车纽为单于，联合乌桓和羌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②。且冻羌在三辅的军事行动虽未直接参与南匈奴、乌桓的对汉战争，但显然与其东西呼应，在客观上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因此，且冻羌军由三辅北上进攻安定和北地，意在与上郡的羌胡连成一势。尽管是年冬车纽被东汉匈奴中郎将张耽在马邑（今山西朔县）战败投降，但是，“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③，一旦且冻羌军进入并州，对东汉将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汉廷命马贤率部对羌军急起直追。

永和六年（141年）春正月，马贤率汉军五六千人追击且冻羌至射姑山，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射姑山位于北地郡中南部的泥水（今马莲河）中段以西，今甘肃庆阳以北，羌军骑兵转战至此，如要进入北地，须越过泥水。羌军因受泥水阻隔，陷于背水作战的绝境，不得不与马贤军作殊死搏斗，故士气高昂。而马贤军师老疲敝，本来就无斗志，这时更是闻风丧胆，因此，射姑山一役，双方交战仅仅一天，汉军就大败而归，马贤及其两个儿子均战死在射姑山下④。汉军在射姑山的惨败，震动了东汉朝廷内外，安定太守郭璜前因守御不力，后又配合失当，被汉廷下狱处死⑤。然而，汉廷镇压羌人的战略部署基本上已被打乱。

由于汉廷军事部署被羌军所破坏，各地武装反抗的羌族部落，便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于是，东、西羌遂大合”⑥，会师于北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②③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五年。

④⑤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⑥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另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永和六年春正月条胡三省注，东羌指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的羌族部落，西羌则是指居于陇西、汉阳，并伸入到金城塞外的一部分羌人。

地郡。虽然，东、西羌是按地理分布来划分西北羌族，但实际上，此后东羌也包括西汉时随匈奴而来的“羌胡”和东汉安、顺时从金城、陇西迁来的西羌，也就是说，史书上此时出现东、西羌之称，反映的是此前羌族在西北地区的两个地理分布的意义。而东、西羌的会合，使这种地理分布意义失去了实际内涵。羌人势力大增，向东汉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

会师后的诸羌，兵分三路向东汉进攻：东路由巩唐羌以轻骑三千先攻陇西，“遂及三辅”①，“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②。并消灭了追击之汉军，郃阳令任頵战死。北路由罕羌千余人攻北地，击败北地太守贾福和武威太守赵冲所领之官军③，与巩唐羌遂成犄角之势。西北路势力最强，由众羌八九千骑组成联军，在东路和北路两支羌军的外线作战，于是年秋到达武威，战线自东南向西北延长几至大半个凉州，东汉统治集团一片惊慌，“凉州震恐”④，不得不调整军事部署，重新制定镇压羌人的方针。

（三）东汉的招抚政策和军事反击之胜利

面对羌人的强大攻势，东汉朝廷先是急“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⑤，整顿前线军队，接着，又“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屯美阳（今陕西扶风以东），为凉州援”⑥，一旦凉州失守，以便阻止羌人进攻长安。当巩唐羌进攻三辅之时，武威太守赵冲追击败之，斩首400余级，掳获牲畜18000余头，巩唐羌2000余人向赵冲投降。这一胜利抬高了赵冲的声望，“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⑦，赵冲成为镇压羌人的前敌总指挥。但是，赵冲很快又在北地被罕羌所战败，诸羌又大肆进攻武威，凉州大部实际上为羌人所控制。东汉被迫再次将安定的郡治移徙于扶风，将北地的郡治移徙至冯翊，并派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等地方兵15000人屯守三辅，替换赵冲，而将赵冲改任护羌校尉。

---

①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②③④⑤⑥⑦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汉安元年（142年），赵冲上任伊始，便将全面军事镇压羌人的政策，改为对羌人剿抚并用。首先"招怀叛羌"①，然后再行军事征伐。在赵冲招抚政策的分化瓦解之下，冬十月，"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②。由于北地羌人对三辅的威胁解除，行车骑将军张乔军屯才得以撤罢。然而，烧何羌仍有三千余落占据安定参䜌北界③。次年四月，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联合向参䜌发起攻击，大破烧何，斩首1500级，得牛羊驴等牲畜18万头④。是年九月以后，凉州连续发生强烈地震，"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⑤。冬十月，赵冲却趁火打劫，猛攻羌人各部，屠杀了4000余人，又在汉阳郡阿阳（今甘肃静宁西）追杀烧当羌800余人。羌人受到沉重打击，加之赵冲百般诱降，各部落先后有3万余户向凉州刺史投降。

建康元年（144年）春正月辛丑，汉顺帝下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⑥汉廷在天灾人祸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也开始对凉州羌以招抚为主。但就在此时，在令居护羌校尉营内，发生了护羌从事马玄参加羌人反抗斗争的兵变。据《西羌传》所载："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⑦由此简要的记载可知，马玄是在诸羌的反招抚政策之下，被动员投身到羌人的反抗武装队伍之中的。而且，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之一，由他亲自引导羌众

---

①②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参䜌，县名，《西羌传》及《资治通鉴》原注俱称属安定。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图57～58将该县治标注于北地郡界内，恐有误。

⑤ 《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顺帝安汉二年。

⑥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⑦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卫瑶，《资治通鉴》作"卫琚"。

向塞外逃亡。从卫瑶虏获羌人的牲畜20余万头来推测，这次逃亡的羌人是很多的，说明大多数羌人对东汉的招抚政策，仍抱着怀疑、对抗的态度。当赵冲追击出塞羌人至鹯阴河（今甘肃靖远西北至景泰一段黄河）畔时，其部下一批降胡，趁汉军正在渡河之际，又发生了叛乱，600余众纷纷逃亡。赵冲急忙率数百人追击，途中遇到羌军伏兵，赵冲全军覆没①。但是，此役羌军也有较大损失。史书称赵冲“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②。

最后，到永嘉元年（145年），东汉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护羌校尉。左冯翊梁并也利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对羌人“稍以恩信招诱之”③，结果，陇西的羌族离湳部和狐奴部等5万余户，均向梁并投降。至此，羌人第二次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方告一段落，“陇右复平”④。

三、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战争

（一）战争的爆发和扩大

羌人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再次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对东汉的斗争并未停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三月，“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⑤。这次反抗战争，羌人参加者甚众，但持续时间不长，骤兴骤灭，可以说是第二次羌人武装反抗战争高潮的一个回声。但是，对于当时社会造成不小的震动。《后汉书·五行志一》说：“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史文记载元嘉时有如此大规模的汉羌战争，仅此一条，并不见诸《桓帝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此亦摈去不载。且元嘉仅二年，不当言“元嘉中”。考建和共三年，白马羌攻广汉属国，正在建和二年，并引发西羌及湟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中胡的大叛乱。因此，上述材料“元嘉中”当为“建和中”之误。从战争爆发的时间来看，白马羌攻广汉属国在三月，大致战争延至初夏，正是麦收季节，也与《五行志一》所说“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相合，由此可知，建和二年羌人反汉战争，时间虽短，但也几经反复，给东汉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此后，在陇右的羌人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从建和三年（149年）至延熹二年（159年）的10年间，汉廷先后以种暠为凉州刺史、汉阳太守，以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以第五访为护羌校尉。他们在凉州等地均奉行对羌人的安抚政策，致力于缓和汉羌间的民族矛盾，因此受到羌人的信赖。

在建和二年“西羌及湟中胡复为寇”时，种暠就参与了剿抚，“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①。永寿元年（155年）张奂初任安定属国都尉时，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率7000余人攻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东羌部落又准备响应。张奂军营中只有将士200多人，一面以攻为守，屯兵长城，收集兵士，一面派部将王卫到东羌部落主动媾和，再占据上郡龟兹（今陕西榆林北），隔断南匈奴与东羌的联系。张奂对东羌的“招诱”措施，使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②。此后张奂威信大增，“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请，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而洁己，威化大行”③。前南阳太守第五访在永寿元年替代死去的张贡为护羌校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六《种暠传》。

②③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尉，其人在任“甚有威惠，西垂无事”①，“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②。这说明，东汉地方官将对羌人统治和管理的政策，是关系到凉州等地治与乱的一个重要因素。羌族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较低，但对于相邻的汉族来说，只要不受到歧视、压迫和屠杀，他们还是愿意与之和平相处，并希望得到生产水平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的支持与帮助。汉羌间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是由汉朝统治集团挑起，由汉朝对羌人统治政策的错误所致。

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访在护羌校尉任上逝世，继任者是以残酷镇压山东农民起义而发迹的刽子手段颎。段颎对待羌人的态度正好与张奂等相反。他极力反对招抚，主张对羌人斩尽杀绝。据他自己后来上书所称：“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张）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会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③ 正是段颎主张的残酷屠杀政策，使他一上任，就在当年冬激起了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西羌八个部落的武装反抗东汉的战争。他们联合攻打陇西、金城两郡的塞堡。段颎率领官兵以及湟中“义从羌”骑兵12000人，出湟谷与羌人交战，众羌不利，向南渡河败退。段颎军亦随之追击，过黄河至积石山（今阿尼玛卿山），段颎命部将田晏、夏育在军中募“先登士”，“悬索相引”，在罗亭附近，再次与羌军交锋，大破诸羌，屠杀羌人酋豪以下2000余人，俘虏万余人，其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六《第五访传》。

③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余皆奔走①。这年战争一爆发，就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还仅仅是更广泛斗争的开始。

延熹三年（160年）闰二月，在塞内的其余羌人又与塞外的烧何大豪里应外合，在张掖发动了新的攻击，一举占领当地重要的军事据点巨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②，扩充军队，然后集中兵力，星晨奔袭段颎护羌校尉营兵。段颎猝不及防，到羌兵临近，才下马步战，激战自晨至午，段颎官军刀折矢尽，几至败覆。羌人也损失颇为严重。于是，“虏亦引退”③。而久经沙场的段颎，却抓住时机，连续作战，趁势向羌人追杀，“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④，终于取得这次战役的全胜。在得胜归途中，段颎又分兵击破在石城（今青海尖扎东南）的羌人部落。战斗在黄河边进行，羌人被“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⑤，烧当部落也有少数人向段颎投降。段颎军入塞后，再向屯聚于白石（今甘肃临夏西南）的诸羌进击，又取得了胜利，俘虏3000余众⑥。是年冬，勒姐、零吾二羌包围了允街（今甘肃永登南），“杀略吏民”，段颎又领兵“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⑦。延熹四年（161年），羌人在凉州等地的反抗战争此伏彼起，范围更为扩大。“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⑧，陇西郡的零吾羌和先零羌抓住地震使社会动荡不安的有利时机，合兵东攻三辅⑨。至秋，羌人“寇钞关中”⑩，在军事上又占了主动。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等羌部和鸟吾羌，也加入了羌人的联合进攻队伍，“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⑪。这就形成了第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战争的高潮。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并参《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汉纪四十六，桓帝延熹二年注引《东观记》。

②③④⑤⑥⑦⑪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⑧⑨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⑩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在这一阶段，参加战争的羌人部落之多，超过了以往，战争范围也比以前有所扩大，塞内外羌人互相响应，联合作战，以致段颎不得不两次出塞，军行千里，抵河首积石山，仍未能将羌人彻底镇压，反而激起了诸羌更大规模的反抗，危及三辅的安全。由于各部羌人在凉州等地分布较广，汉廷仅以段颎护羌校尉麾下一支包括了归降的羌胡等少数民族兵在内的官军，东奔西杀，往来援救，疲于奔命，虽然也剿杀了一个个反抗的羌人部落，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终不可能形成对羌人战略上的优势。羌人斗争还在不断发展，而东汉官军内部却隐伏着自我瓦解的危机。

（二）东汉的剿抚政策和逢义山之战

为了进剿凉、并二州的沈氐、牢姐和乌吾诸羌，延熹四年（161年）冬，段颎亲自率领护羌校尉营中"湟中义从"征讨。凉州刺史郭闳为了跟段颎争夺功劳，却故意阻滞段颎兵力，"稽固颎军，使不得进"①。段颎营中"湟中义从"本是小月氏胡之一部，他们原与羌人杂居，其语言、服饰和饮食等也和羌人相似，虽降顺东汉，长期充当护羌校尉的马前卒，但是，他们对于羌人尚存有一定的共同文化心理，一旦时机成熟，势必投入羌人反抗东汉的战争之中。此时，这些"义从胡"已连年跟随段颎四处征战，不得休息，对镇压羌人的战争已是厌恶至极，"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②，兵变骤然而起。郭闳为泄私愤，趁机将兵变的罪责全部推到段颎身上，使其因此而下狱。继任的护羌校尉胡闳，庸碌无能，"无威略"③，面对诸羌联合进攻，束手无策。羌军更为强盛，"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④，形势对东汉愈来愈危急了。

然而，昏庸腐朽的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面临羌兵节节逼近的形势，一些想有作为的东汉地方将吏，纷纷来到京城告急，并诉段颎之冤曲。"吏人守阙讼颎以千数"⑤，"素

---

①②④⑤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悉羌事”的太山太守皇甫规，刚率兵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又上疏“志自奋效”，愿前往参加平定羌人的战争。皇甫规主张对羌人“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①。情急之中，汉廷只好擢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领关西各路兵马，开始对羌人实施剿抚并用的政策。

皇甫规到任之后，一面诛免了当地的一些贪官污吏，如“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藉，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②；另一方面，皇甫规又对零吾羌用兵，取得胜利，“斩首八百级”③。接着，皇甫规对先零羌和沈氏羌等较大的部落实行招安，“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沈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④。东汉自延熹四年十一月，至五年二月取得了几个月的相对安宁。

延熹五年（162年），羌人的反抗战争又接二连三的爆发。三月，沈氏羌攻打张掖、酒泉，皇甫规征发先零羌诸部羌兵⑤，与东汉官兵“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⑥。七月，鸟吾羌复攻汉阳郡，陇西、金城诸郡官军前往救援，将鸟吾羌镇压下去⑦。“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⑧。此时，皇甫规因拒不贿赂、阿附朝中宦官，虽拥众立功，却被诬陷下狱。“六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⑨。可见，皇甫规离任以后，凉州羌人的武装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汉廷无以应付，只好在是年冬，“复以（段）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⑩，再次对羌人实施进剿。

---

①②③④⑥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⑤⑦ 《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汉纪四十六，延熹五年三月。

⑧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⑨⑩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段颎重任护羌校尉之后，也开始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法。迫使羌人降汉。延熹七年（164 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颎降”，但湟中的当煎、勒姐二羌，因与段颎等残暴的东汉将吏怨重仇深，“犹自屯结”，誓死不降①。段颎自七年冬率万余人出征，首先击破当煎羌，“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接着，从八年春至秋，辗转山谷间，穷追羌军，几乎“无日不战”②。可见他所采用的战术，是连续作战的运动战，这对羌军的确是很大的威胁，结果，先后“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③。其夏六月，段颎再度进军湟中，击当煎羌，遭到当煎羌猛烈抵抗，兵败被围。羌军设下几重封锁线，使段颎军 3 日不得脱身，面临十分危急的境地。当时，被围困在封锁线内的还有南郑人樊志张。樊志张“博学多通”，但“隐身不仕”，当时正在陇西游历，段颎慕名请教，故亦留于段颎军中不得离去。夜间，樊志张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向段颎献策：“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④ 段颎采纳了这一建议，“潜师夜出”，悄然突破羌军重围，争取了主动，然后，他“鸣鼓还战”趁羌人不备，从羌军阵后发起反击，“大破之，首虏数千人”⑤，这才将湟中当煎诸羌镇压下去。

陇右的西羌虽暂时被平定，但安定、上郡等地的东羌又纷纷起事。延熹九年（166 年）“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⑥。这次战争的爆发是因为鲜卑贵族率八九千骑入塞，并与东羌“共盟诅”。沈氐羌自上郡向西，另有安定先零羌向北与之会合，也向武威和张掖进攻⑦，一时声势浩大，缘边多被战火所残破。

永康元年（167 年）春正月，安定的先零羌五六千骑又南下攻入三辅，“围杀祋祤（今陕西耀县），掠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⑧。

---

①②③⑤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樊志张传》。

⑥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⑦⑧ 《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夏四月，先零羌又攻陷京兆虎牙营和扶风雍营，杀千余人①。冬十月，先零羌酋豪岸尾、摩蟞等再度率部落兵进攻，钞略三辅②。这年从春至冬，三辅始终处于东羌的骚扰之中，警戒不止。当时，汉廷以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军事，实掌北方边疆最高军事领导权。对东羌先零的不断进攻，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前往镇压，斩杀了先零酋豪，俘虏羌兵一万余人，三辅暂安③。

在东羌进攻三辅的同时，西羌并没有停止武装斗争，当煎羌约4000余人，“欲攻武威”，护羌校尉段颎率兵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并追击至鸾鸟（今甘肃武威南），将其战败，“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④。汉廷认为西羌已完全平定，遂调镇压西羌有功的段颎，“移兵东讨”，以解决“叛服无常”的先零等东羌的问题。

桓帝末年，段颎上言，分析当时东羌所处的形势，提出镇压的方略。他认为，东羌经皇甫规、张奂等实行剿抚之后，所剩仅3万余落，虽然“屯结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势”，但“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因此“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况且，东羌“近居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纵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⑤。段颎竭力主张将东羌斩尽杀绝，消除后患。于是，在段颎策划之下，汉军开始了镇压东羌的行动，遂爆发了逢义山之战。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二月，段颎亲自领兵1万余人，皆轻装出发，仅携15日粮饷，从彭阳（今陕西镇原东），直指高平（今甘肃固原），企图以长途奔袭的战术，捕捉东羌之主力先零羌，一举歼之。经过长距离的运动，段颎军到达了高平西北的逢义山，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六十五《张奂传》。

④⑤《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与先零羌遭遇，遂发生激战。初战之时，因先零羌人马多于段颎所率之兵，官军畏敌不前，“虏兵盛，颎众恐”，段颎乃令军中重新布阵，摆出集中优势兵力的作战队形，“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即以前后排列三排长矛队为主力，各配备强弓劲弩；两翼以骑兵往来驰援，协同突进，加强战斗力。战前，段颎对全体战士作了动员，表示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勉励部下：“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战前动员使段颎军士气大作，信心倍增。因此，双方交战，段颎奋臂一呼，“众皆应声腾赴”，段颎也身先士卒，亲自驰骑指挥，督战于大军之侧。在汉军突然发起猛烈的攻势之下，先零羌大溃，仅此一役，就被杀 8000 余人，被东汉官军掠得牛马羊牲畜 28 万头之多①。

逢义山之战，汉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并迅速取得大捷，首先是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对高平东羌主力所在位置判断准确，又以远离基地千里之遥的长途奔袭，迅速而果断地插入了羌人根据地的要害部位，取得了有利的战机和态势，可谓出敌不意，由此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次，在战争进程之中，作为主帅的段颎，能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队形和部署，改变战法，增强了汉军的战斗力，是他能以少胜多的关键。其三，段颎不仅十分注重精神激励、战前动员，而且以身作则，“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②，以实际行动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必胜的信心，这是段颎军能赢得逢义山之役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段颎受到汉廷的特别嘉奖，被拜为“破羌将军”。

逢义山之战以后，东羌在高平一带的根据地基本瓦解，被迫实行转移，开始了流动作战。

（三）羌人的转移和射虎谷之战

逢义山之役是东羌瓦解的关键一仗。羌军失败以后，遂向东

①②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北上郡转移，企图在这一带寻找援军，重新建立基地，立住脚跟。段颎军紧追不舍。建宁元年（168年）夏，段颎军至上郡走马水上游的桥门（今陕西子长西北），侦察到羌人主力位于奢延泽附近（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于是，段颎再次采用奔袭战术，“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①。羌军余部向奢延泽以南之落川（今陕西吴旗一带）溃退，“复相屯结”②。这时，段颎“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从东西两路包抄羌军③。羌军集中兵力六七千人反攻田晏，向东突围，战不利，继续溃走。段颎催兵马急进，率田晏等共追之，至令鲜水上游④。虽然，段颎军长途跋涉，连日作战，士卒饥渴，但仍不作休整，在段颎的催督之下，全军一鼓作气，夺得羌军所占据的水源，迫使“虏复散走”⑤。段颎尾随杀之。羌军且战且退，伤亡惨重。最后，羌军流动至灵武谷（今宁夏银川西北）一带，被汉军包围。段颎又“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羌遂大败，弃兵而走”⑥。

羌人北上寻找援军建立根据地计划未能实现，又被迫南下，重返安定郡。段颎军在其后穷追不舍，“三日三夜，士皆重茧”⑦，追至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羌军由于南北奔走，被汉军斩杀或逃亡者甚众，只剩下部众4000余落，已无力应战，更不能集中立足，不得不全部分散向西南的汉阳郡山区逃避，有的则暂时向东汉投降。

鉴于羌人反抗战争基本上被平息，汉廷针对如何处置降羌及其他羌人余部的问题，又发生了意见分歧。“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段）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⑧。但是，段颎仍坚持对羌人实行斩草除根，全面屠杀的政策。他请求朝廷赋予其更大的军权，须“军不内御”，“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⑨。然而，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决定，对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④ 一说在甘州张掖，一说当在上郡、北地界。宜从后者。

羌人还是先行实行招抚。

建宁二年（169年），汉廷“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①。段颎起而反对：“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②。于是，段颎在这年夏，独自率领营兵，向汉阳诸羌进攻。汉阳各部羌人虽然分散于山谷，但仍旧保留了原部落组织，形成了一定的军事政权③。因此，当先零等东羌进入汉阳以后，他们在分散中又有所聚合，力量又稍稍增强至2万人，其主力屯聚于凡亭山（今宁夏固原以南，六盘山主峰以东④）附近地带。段颎军抓住时机，迅速进至距凡亭山四五十里处扎寨设营，然后，派田晏、夏育率5000人，首先抢占了凡亭山的制高点，深入到羌人各屯聚点的腹心，进行内线作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羌人无比愤怒，尤其是对死死追杀的段颎部将田晏、夏育，以及护羌校尉营中“义从羌”恨之入骨。于是，“羌悉众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⑤在羌人的呐喊声中，汉军将士震恐不敢战。田晏等只好威逼、利诱，催督兵士上阵，经过殊死搏斗，勉强将羌军击破。“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⑥。羌军试图依靠射虎谷较复杂的地形拒守，作最后的抵抗，并伺机出塞。

为了防止羌人西奔出塞，也为了将其一举全歼，“不欲复令散走”⑦，段颎派遣千余人，在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伐木结成广

---

①②⑤⑦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③ 据辑本《东观汉纪》卷二十一，段颎曾掠得羌侯君长金印、铜印、锡印及长史、司马、涉头长、燕鸟校、棚水塞尉官印多枚。

④ 凡亭山，一作“瓦亭山”。

⑥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此载羌人溃败之势，语过简略，是时，羌人当由凡亭山向西而走，欲西奔出塞，复归其塞外老家，并与诸羌相联络。退至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被汉军堵截不能通过。无奈，再转而东奔至西县东北之射虎谷。射虎谷并非位于凡亭山以东。因此，凡亭山战役后羌人退却的走势，实际是向西奔走，受挫后才折返向东拒守射虎谷。

20步、长40里的栅栏，阻止羌人逃散，遮堵羌军的去路。随后，段颎命田晏、夏育等领兵7000，"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①，又命司马张恺等率3000人上东山，采用夜战、近战、奇袭，对羌人实施夹击。直到这时，没有足够战争经验的羌军，才发觉射虎谷东、西两侧制高点已被汉军所抢占，陷于被动的局面。为了摆脱困境，羌军遂选择西面作为突破口，向西山田晏军发起反攻，派人遮断山上的汲水道，打算困扼田晏军。然而，段颎自率的一支由步、骑组成的机动队，立即出击水上，羌军不支，退却奔走，东、西山上的汉军趁势而下，冲入射虎谷内，"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②，从而结束了射虎谷之战。

射虎谷之战是东汉镇压第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的最后一仗。从力量对比来看，汉军是强大的护羌校尉营兵，又有征调、募集而来的各郡地方兵与之配合，实力较强；羌人主要是由安定溃散至汉阳的先零羌余部，以及在汉阳郡收集的山区散羌，实为乌合之众，显然难以抵御汉军的攻势。在凡亭山之战时，羌军尚有一定能力与汉军对阵。其后，在汉军的围追堵截之中，羌军东奔西突，最后困守于射虎谷内，已失去了从正面反击的能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其失败被歼，当属必然之势。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汉军由破羌老手段颎所率，是一支惯于征战的精锐之师。段颎常使用的奔袭、近战和夹攻等战法，在此役中都运用自如。更为恶毒的是，为了贯彻对羌人斩尽杀绝的方针，段颎结木为栅，构筑了一条拦截羌人的封锁线，在战争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羌人缺乏足够的战争经验，基本上没有得当的战法，人数虽多，却在汉军的压力下，处处被动，始终处于内线防御之中，也难以发挥其骑兵的机动作战优势。拒守射虎谷，固然有客观形势所迫的原因，但也是战略上的一个较大失误。同时，随羌军一同转移的，

---

①②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还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和牲畜，这也是其战斗力较弱的原因之一。以如此庞大的人流去应付轻装奔袭的汉军，被动挨打，最终失败，也是难免的。

射虎谷之战以后，以先零为主的东羌被平定，另有冯禅等所招降的4000羌人，分别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3郡。延绵10年之久的第三次羌人大规模武装反抗战争，才宣告结束。

四、东汉对羌人长期作战的原因、教训及其后果

（一）东汉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错误

东汉后期爆发的三次大规模羌人反抗战争，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和教训时说：“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这揭示了东汉王朝及其地方将吏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严重错误。具体来说，就是东汉一反西汉时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秉承王莽时期的对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强行推广郡县体制，将降羌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西汉对羌人的属国统治，开始于宣帝之时，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①。所谓属国，即让内徙、降附的少数民族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史记》和《汉书》云：“因其故俗以为属国。”《史记正义》释为：“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曰属国。”由于当时中原与边疆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加上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按统一的郡县行政方式进行管理是很不适宜的。采取属国统治方式，使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体制与对汉族形成

①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不同的模式，尊重他们的民族传统，对于汉朝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王莽当政时，却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其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①。这不但使金城属国宣告瓦解，就连塞外边陲的西羌故地，也纳入了新莽的郡县版图。如，临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共和东南），以西的鲜水海（今青海湖），都归入了当时新设置的西海郡范围之内。王莽的这种做法，曾激起了羌人的强烈反抗。至新莽末年，天下大乱，"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②。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了10年统一战争，才基本上统一了陇右，对凉州等地的塞内羌人，重新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凉州共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10个郡和张掖属国以及张掖居延属国。两个属国均延置于西汉，主要是安置战败内徙的匈奴。而原来西汉安置降羌的金城属国，自王莽乱政之后，就未再复置③。这样，东汉一代，塞内诸羌完全置于封建中央集权郡县行政统治和管理之下。

此外，东汉进一步完善了护羌校尉之制。东汉护羌校尉领有一支校尉营兵，驻扎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是一支专事征讨、镇压羌人的作战部队。在金城郡和陇西郡的边塞，又分别设置了西部都尉（治龙耆，今青海海晏）和南部都尉（治临洮，今甘肃岷县），也是专门防御和镇压羌人的军事机构，当地的障塞俱归其统辖。尽管在羌人反抗战争的高潮中，护羌校尉驻地多次迁移，金城西部都尉和陇西南部都尉，也曾被羌人的武装所摧毁，但东汉政权仍未放弃这些军事镇压机器。在镇压了羌人的反抗之后，有

---

①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 详见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载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的迁返如故，有的废而复置。它们与州县地方机构一起，形成了一张将羌人困在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中的罗网，严重束缚着羌族特有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发展，这是造成东汉与羌人矛盾不断激烈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东汉对待降羌是将其纳入郡县统治之中，边疆豪强、将吏则视羌人为东汉王朝的贱民和奴仆，对他们肆意凌辱、欺压和宰割。《西羌传》载："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被纳入郡县统治的羌人，比在过去的属国统治之下，直接感受到民族的和阶级的残酷压迫。

首先，羌人可以被任意地强迫迁徙、安置。如，建武十一年（35 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①。明帝永平元年（58 年）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大破烧当羌滇吾，"徙千口置三辅"②。和帝永元十三年（101 年），烧当羌迷唐部被汉军战胜，"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③。强制迁徙羌人安置于郡县，不仅使他们脱离了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环境，而且，打断了他们之间原有的部落联系，造成了羌人难以承受的"跳跃式"的社会过渡。有多次羌人的武装反抗，迅速地蔓延于西北边郡，甚至将战火延烧到东汉的腹心地带三辅地区，就与那些地方"布在郡县"的羌人群起响应，有许多直接的关系。

其次，羌人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徭役负担，其中又以兵役负担为主。东汉奉行"以夷制夷"和"以夷伐夷"的策略，利用羌人骁勇悍斗的性格特点，常常挑动"羌胡相攻"，以取"县官之利"。因此在征西域、击羌胡的战争中，汉廷往往征发郡县降羌参加作战。永元八年，护羌校尉赵充"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次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永元十三年秋，"迷唐复将兵向塞，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阳嘉四年，谒者“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至永和四年，马贤又依靠“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①。

此外，降羌还要在亭障坞壁中戍守，为汉廷“保塞”，甚至被驱赴边远之地驻扎、作战。《华阳国志》云：“羌戎之民。其人半秦……汉世数征讨之，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其攻战垒戍处所亦多。”②而早在建武七年，史籍中就有“保塞羌诸营壁”③的记载，说明征发降羌充兵役，是东汉的一贯政策。

除了兵役以外，羌人还要承担汉廷的其他赋役。如《后汉书·马防传》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汉末，汉阳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④。在营中屯田役作的羌人称作“屯羌”。他们在屯官严格管束下服役。沉重的兵役、徭役往往成为羌人发动反抗战争的导火线，第一次羌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就是因此而爆发。

再者，郡县将吏和豪强对待羌人的手段极其凶狠而毒辣。章和元年（87年），护羌校尉张纡，假意接纳迷吾投降，却“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⑤。在战争中被屠杀的羌人，更是难以胜数。著名的镇压羌人反抗的刽子手，号称“破羌将军”的段颎，自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年），“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自永康元年至建宁二年（167～168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挥舞着沾满羌人鲜血的屠刀，实践着他自己对羌人“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⑥的诺言。

---

① 以上俱见《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② 《华阳国志·汉中志》。

③ 《后汉书》卷十五《王常传》。

④ 《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

⑤⑥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的迁返如故，有的废而复置。它们与州县地方机构一起，形成了一张将羌人困在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中的罗网，严重束缚着羌族特有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发展，这是造成东汉与羌人矛盾不断激烈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东汉对待降羌是将其纳入郡县统治之中，边疆豪强、将吏则视羌人为东汉王朝的贱民和奴仆，对他们肆意凌辱、欺压和宰割。《西羌传》载："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被纳入郡县统治的羌人，比在过去的属国统治之下，直接感受到民族的和阶级的残酷压迫。

首先，羌人可以被任意地强迫迁徙、安置。如，建武十一年（35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①。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大破烧当羌滇吾，"徙千口置三辅"②。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迷唐部被汉军战胜，"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③。强制迁徙羌人安置于郡县，不仅使他们脱离了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环境，而且，打断了他们之间原有的部落联系，造成了羌人难以承受的"跳跃式"的社会过渡。有多次羌人的武装反抗，迅速地蔓延于西北边郡，甚至将战火延烧到东汉的腹心地带三辅地区，就与那些地方"布在郡县"的羌人群起响应，有许多直接的关系。

其次，羌人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徭役负担，其中又以兵役负担为主。东汉奉行"以夷制夷"和"以夷伐夷"的策略，利用羌人骁勇悍斗的性格特点，常常挑动"羌胡相攻"，以取"县官之利"。因此在征西域、击羌胡的战争中，汉廷往往征发郡县降羌参加作战。永元八年，护羌校尉赵充"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次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永元十三年秋，"迷唐复将兵向塞，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内部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酋豪、豪帅实际上是各级大、小奴隶主，奴隶称“臧获”、“无弋”。从社会组织及其特点来看，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①。也就是说，西羌尚处在原始社会末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间，国家形态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体的外壳仍然保存着，血族制度的机关正逐渐转化为羌豪用以压迫本族羌民、掠夺外族人口和财富的工具。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称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民族，是以从事掠夺战争为其正常的职业。

在这一阶段，西羌社会分化特别严重，部落与部落联盟不断地在战争中分合、改组。史载：“（西羌）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羌）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②可见，直到东汉时，羌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

羌族有与汉族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他们仰慕汉朝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自西汉起，就有不少羌人部落自愿内徙，同时，也是借以躲避匈奴贵族的奴役和压迫。然而，处于掠夺战争时期的羌人所特有的野蛮性和掠夺性，又与汉朝的封建文明产生尖锐的冲突。汉武帝曾“西逐诸羌”，就是这种冲突的第一次大爆发。西汉在湟中实行属国统治之后，一方面让降羌在原部落组织形式下，实行一定的民族自治，另一方面，又派遣护羌校尉“理其怨结”，化解西羌部落内部及其与汉族边郡吏民的矛盾，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宣帝以后，西羌对汉朝边境的骚扰、掠夺战争并不多见。而王莽推行大汉族主义，才使“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③。显然，羌人既仰慕汉朝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又具有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社会特点，使得汉族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政权对其笼络之，则顺则安；对其压迫之，则叛则寇。正如《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所说："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东汉对降羌实行严酷的郡县统治，使羌人沦为战俘奴隶，不啻向塞外羌族部落宣示，汉与羌为敌对之"国"。故从东汉时起，以对外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羌族各部落，对汉朝的寇掠、骚扰又尤为突出起来。由于羌族部落众多，分布地域也较广阔，这种战争就往往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特点。如东汉初的建武年间，先零羌强盛，就数度寇掠金城和陇西郡；中元以后，烧当羌击破先零，又"每欲侵边"；建初时，卑湳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迷吾与封养种豪布桥等5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等等。塞外羌对汉朝的寇掠，也往往与降羌反抗郡县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前者在史书上多称为"寇"，后者则多称作"反"或"叛"。实际上来说，这两者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如中元二年（57年），烧当羌滇吾、滇岸寇陇西塞时，"守塞诸羌皆相率为寇"①；永元九年（97年）秋，迷唐寇陇西，曾"胁塞内诸种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②。东汉后期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也是塞内外羌人互为呼应，形成颇大的声势，其中，对汉族社会的寇掠也在所难免，总之，在汉羌战争中，这种寇掠占有一个相当高的比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羌人既仰慕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又具有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社会特点，极易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因此，东汉与羌人的长期战争，也与当时统一和分裂的斗争形势，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东汉初年，在西北地区割据的窦融、隗嚣、卢芳等，都曾借用羌胡之力，尤其是隗嚣则主动"招怀其（指羌人——引者注）酋豪，遂得为用"③。他依靠羌人为其主要兵源，西汉时的"保塞羌"多被他收编，因而能"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④，负隅顽

---

①② 《后汉书》羌八十七《西羌传》。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④ 《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

抗了10年之久。光武帝平隗嚣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游说（隗）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1]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隗嚣灭后，陇右未安”，主要是原来隗嚣“因抚集以为强”[2]的羌人，并不屈服于东汉的统治，“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3]。其后，便有来歙率盖延、刘尚、马援等进击羌人于金城等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实际上，东汉对羌人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东汉统一战争在新的形势下的继续。

东汉后期的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对于东汉政权来说，同样具有使凉州等地脱离朝廷控制的意义。激烈的战争，常使东汉地方行政机构孤悬于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有的不得不移徙他处。这使当地与中央的离心倾向潜在滋长，甚至导致了朝廷对西北地区统一问题的政策分歧，部分廷臣曾几度提出放弃凉州一些地方，这就折射出凉州与中央长期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因此，纵观东汉与羌人的战争，不是简单的寇掠与反击，反抗与镇压，实际上还体现出东汉政权内，统一与分裂势力的相互斗争。

永初时，郎中虞诩反对大将军邓骘放弃凉州的主张，其理由是：“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4]他更为担心的是那些掌握了一定军队的地方将吏，唯恐他们借羌胡之力，复扮演东汉初年窦融、隗嚣等角色，与汉为敌，即所谓“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5]。为了消弭尾大不掉之隐患，虞诩进一步建议：“诚宜令四府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② 《后汉纪》卷六《光武帝纪》。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

④⑤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第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① 尽管虞诩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多数廷臣的赞同，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如何控制羌人，使之不为地方豪强所利用的问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凉州军阀和西羌之兵相结合，成为分裂朝廷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此，由于羌人的社会特点，又由于东汉地方豪强若隐若现的割据性或离心性，更由于上述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才造成了东汉与羌人诸部的战争，呈现出复杂的起伏性和长期性。而所有这些，又因东汉在湟中等地实行错误的统治方式和民族政策，酿成多次大规模羌人反抗的战争，使汉羌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斗争更为尖锐而持久。

（三）汉羌战争对东汉社会矛盾的激化

东汉与羌人的长期战争，尤其是东汉后期镇压羌人反抗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给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逐渐被激化起来。

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东汉在镇压羌人反抗的战争中，以推行凶残的屠杀为其主要政策，其中以段颎为典型代表。在第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中，段颎率兵镇压羌人，使羌人“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②。这样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连一些封建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予以严厉地谴责。司马光就曾评论说：“羌人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③ 这种完全扼杀生产力发展的屠杀政策，是极其反动的。

在汉羌战争中，广大的汉族人民也蒙受了极大的灾难，而这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灵帝建宁二年。

主要也是东汉腐朽的政治和腐败的将吏造成的。在镇压羌人的过程中，许多东汉边郡的将帅、太守、令长，“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遗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①。尤其是强制迁徙汉族百姓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使“万民怨痛、流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②。兵燹所过以及东汉迁徙、屠杀等倒行逆施，使甘青地区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年）和《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140年）相较，数经羌汉战争的凉州，以户数计，北地郡东汉只及西汉时的4.8%，金城郡只及10%，陇西郡只及10.4%，安定郡只及14.3%，汉阳郡只及45.4%。详下表③：

年代 / 户口 / 郡名	西汉元始二年（2年）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		东汉户口为西汉户口的%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陇西	53,964	236,824	5,628	29,637	10.4%	12.5%
汉阳（天水）	60,370	261,348	27,423	130,138	45.4%	49.8%
金城	38,470	149,648	3,858	18,947	10.0%	12.7%
安定	42,725	143,294	6,094	29,060	14.3%	20.3%
北地	64,461	210,688	3,122	18,637	4.8%	8.8%

①② 王符：《潜夫论·实边》。

③ 马长寿：《氐与羌》，第134页。

可见，经过多次汉羌战争的摧残，到东汉镇压第二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期间，这一带的生产力已大大萎缩，以后每一次较大的战争，都不啻对社会生产的一场浩劫。

东汉政权为镇压羌人的反抗，先后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征募各地丁壮从军，为此而耗费的租赋，更是无计其数。据载，第一次大规模汉羌战争，东汉就“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①。在第二次大规模汉羌战争爆发后的永嘉元年统计，“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②。马贤所率官军有10万之众，赵冲的河西四郡兵及北地、汉阳二太守兵也在10万以上，有人估计，“悬师之费且百亿计”③。征羌的官军多客死沙场，“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④。第三次大规模汉羌战争，段颎一路取胜，也耗去“费用四十四亿”⑤。三次大规模汉羌战争，军费达360余亿之巨，汉军“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⑥。战争的影响已经不是西北的地区性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东汉经济、政治的社会问题。

在长期的战争中，大量的丁壮被招募为兵，或担负转输徭役，农村劳力受到严重影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⑦。而那些官僚、贵族与豪强却仍我行我素，“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采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大发战争横财，“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⑧。同时，“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⑨，有的利用战争大肆贪污，如邓遵、任尚，“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赃千万以上”⑩。统治阶级的腐败，使得“上下放纵，不恤军事”⑪，东汉军队的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

---

①②④⑥⑧⑨⑩⑪《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③《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⑤《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

⑦《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邀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①。总之，长期的汉羌战争使东汉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不仅激化了固有的阶级矛盾，而且东汉统治集团外强中干的腐朽本质被充分暴露出来。不甘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便趁着朝廷忙于应付西北的羌事之机，纷纷开展反奴役、反压迫的武装起义。从第一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爆发后的安帝永初二年（108 年）算起，东汉内地的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起强似一起，与此起彼伏的西北羌人反抗战争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对此，范晔评论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② 东汉后期的三次大规模汉羌战争，与内地的农民起义爆发、高涨，在时间上竟有如此的一致，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到中平元年（184 年）爆发全国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时，凉州的北地先零羌、金城"义从羌"等，再度发动大规模反抗东汉的战争。随即有边章、韩遂等汉人成为西北羌、汉人民起义的首领，"众十余万，天下骚动"③。一些东汉的边郡将吏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如前酒泉太守黄衍、前信都太守阎忠和凉州司马马腾等。当时有人指出："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④ 与此同时，一些汉族封建军阀，如董卓等，则利用镇压羌人的战争，使自己势力得以膨胀，并广募羌胡为兵，引军东向，终使东汉陷入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的混乱状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政权，并使之名存实亡。这固然是东汉豪族地主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② 《后汉书》卷三十八《张法腾冯度杨列传》。

③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④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经济和封建政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长期的汉羌战争，尤其是安帝以后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对东汉的内政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东汉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受到朝野士人普遍地关注。汉羌战争不仅削弱了东汉的封建经济，激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同时，也使早已潜在的豪族地主阶级的离心力和分裂割据性，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故《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云："羌虽外患，实深内疾……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这一评论是很能说明东汉对羌人的战争与全国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其影响和后果的。

第二节　对鲜卑的战争

一、鲜卑的强大和南下

鲜卑原是东胡部族的一个分支，因居住在鲜卑山（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而得名。西汉初，鲜卑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远遁于辽东塞外，因受乌桓隔阻，未与汉朝相通。东汉初年，匈奴强盛，鲜卑与乌桓依附于匈奴，并常受其驱使而"寇抄北边，杀略吏人"①，成为协助匈奴南下袭扰的重要力量。

鲜卑部族的崛起及其与汉朝关系的离合变化，始终与匈奴的兴衰密切相关。在鲜卑取代匈奴成为漠北之主前，它与汉朝的关系，经过了一个由敌对到依附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东汉建立之初至建武二十五年（49年）。这一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鲜卑由屈服于匈奴、助其南寇汉边，到向汉朝"始通驿使"②，开辟了鲜卑同汉朝关系的新格局。导致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1）匈奴的衰落及分裂。舆单于死后，匈奴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并演变成南北大分裂，势力大大削弱。尤其

①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是南匈奴归汉，更使北匈奴陷入势孤力薄困境，从而给鲜卑摆脱匈奴控制，重新选择靠山带来了机会。(2) 汉军的打击。建武二十一年 (45 年)，鲜卑与匈奴联兵进犯辽东，遭到辽东太守祭肜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鲜卑"由是震怖"①，不敢再犯汉境。(3) 鲜卑自身发展的需要。鲜卑与匈奴、乌桓等同俗，均为"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的游牧部族，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同政治、经济、文化先进，国力逐渐强大的汉朝建立联系，一可互通有无，二能依靠汉朝彻底摆脱匈奴的控制。由于以上原因，鲜卑终于紧跟南匈奴之后，向东汉派出了第一批使者。这是鲜卑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势力的发展由此开始。

第二阶段，从鲜卑"始通驿使"于汉朝，到永元三年 (91 年) 窦宪击灭北匈奴。在此期间，东汉政府按照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不失时机地对鲜卑进行笼络，使它与南匈奴、乌桓一样，成为汉朝捍御北匈奴的有生力量。而鲜卑亦依靠汉朝为坚强后盾，既效命于汉朝，又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开创这个新格局的过程中，就鲜卑方面而言，其大都护偏何起过关键作用。偏何是鲜卑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东汉政府招降的首领。建武二十五年，在辽东太守祭肜的招诱下，偏何向东汉政府"遣使奉献"，表示"愿得归化"③，并主动"诣祭肜求自效功"④，击斩北匈奴左伊育訾部 2000 余人。"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⑤。在他的带动下，鲜卑其他首领於仇贲、满头等纷纷率领部众，"诣阙朝贺，慕义内属"⑥；与鲜卑同族的满离、高句骊也先后向汉朝"上貂裘好马"⑦，以示和亲。永平元年 (58 年)，偏何为东汉击破赤山乌桓后，更出现了"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⑧的局面。东汉王朝以每年赐钱 2.7 亿的巨大代价，达到了利用鲜卑抗击北匈奴的战略目的，也无意中培养了一个新的强敌，留下了心腹之患。

---

①②④⑤⑥⑧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③⑦ 《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

和帝永元年初，北匈奴被汉军击破后远徙西方，鲜卑乘机占据了北匈奴故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①。这是鲜卑自身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机，从此它不仅占据了整个漠北地区，而且因势力的突然壮大而不愿再受东汉政府的节制，开始与汉为敌。永元九年（97 年）辽东鲜卑进犯肥如县（今河北卢龙县北），辽东太守祭参率兵抗击失败。永元十三年（101 年）入寇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县东南），并攻入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郡境。殇帝延平元年（106 年）再寇渔阳，太守张显及其部将严授、卫福、徐咸等皆战死疆场。

东汉王朝自安帝时起国力已逐渐衰落，面对鲜卑日益频繁的骚扰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虽然也间或出现了汉朝与鲜卑的和亲局面，但时间极短，且维系此种局面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鲜卑手中。如安帝永初（107～113 年）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②。这种关系仅维持了七八年，便迅速中止了。元初二年（115 年）、四年（117 年）、五年（118 年）、六年（119 年），辽东、辽西鲜卑连续掠扰东汉边境，“杀长吏”、“寇百姓”、“烧官寺”，使边地吏民无复宁日。永宁元年（120 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降汉，分别被汉朝封为“率众王”、“率众侯”，并“赐綵缯各有差”③。但第二年其至鞬即反叛汉朝，寇扰居庸（今北京延庆县）。可见汉朝已逐渐丧失了对鲜卑的控制权。

为了阻止鲜卑南下，东汉政府不断加强边防力量，元初五年秋“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④；其年冬“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⑤；元初六年“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⑥。然而鲜卑南下攻势非但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建光元年（121 年）鲜卑接连破斩辽东太守蔡讽、云中太守成严，围困乌桓校尉

---

①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徐成后，更是“胆意转盛”①，寇掠频繁。延光元年（122年）冬，鲜卑连犯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定襄（今山西右玉县南）、太原，“掠杀百姓”；延光二年（123年）冬，其至鞬亲率骑兵1万多人，分数路进击南匈奴，在柏曼（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破斩薁鞬日逐王以下1000多人；延光三年（124年）秋，再败南匈奴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县），杀其渐将王。

自永元九年（97年）至延光三年（124年），短短28年间，鲜卑大举进犯汉境的次数，见于记载的就有13次之多；袭扰地区由辽东渐次扩展至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辽西、雁门、定襄、五原等郡，甚至穿境破塞，攻入了太原郡境，给东汉王朝造成了巨大威胁，也表明鲜卑已正式取代匈奴而成为东汉北部最危险的敌人。

二、东汉对鲜卑的反击

东汉对鲜卑的反击，在安帝时期即已开始。元初四年（117年），汉朝利用乌桓酋长於秩居与辽西鲜卑酋长连休之间的“宿怨”，联合於秩居共同举兵出塞，袭击鲜卑连休部，“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②，夺得出击鲜卑的第一次胜利。延光六年（119年）秋，鲜卑入寇代郡马城塞（今河北怀安县西），郡兵不能抵挡。度辽将军邓遵调集积射士3000人，会同中郎将马续所率南匈奴军及辽西、右北平两郡兵马，“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③。次年（永宁元年），辽西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率众降汉。然而，时隔一年，实力强大的其至鞬又挑起边衅，对东汉边郡发起了一系列更猛烈的进攻，使汉朝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秋八月，其至鞬再次率众袭破代郡，

---

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太守李超战败身死。东汉王朝决定对鲜卑实施反击，并于同年十月发布诏令，调兵遣将，作好出塞进攻的准备：（1）诏令减免死罪以下刑徒，迁徙边郡，充实边防力量；（2）调遣精锐部队黎阳营出屯中山国（今河北定州市）北界，以防鲜卑军突入内地；（3）诏告幽州刺史，督令缘边诸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构成牢固防线；（4）从中央五校尉中挑选"弩师"，同时敕令缘边诸郡各荐五位精通箭术的"弩师"，充任教官，"令教习战射"①，有针对性地组织边防军进行战前强化训练。次年春正月，中郎将张国率先行动，派遣部将指挥南匈奴步骑兵1万多人出塞，击败其至鞬，获辎重2000余种。二月，辽东鲜卑出动6000骑兵进犯辽东、玄菟（今辽宁沈阳市东），护乌桓校尉耿晔调集缘边诸郡兵与乌桓率众王联合出击，歼敌数百人，俘、获生口牛马物资甚多，迫使鲜卑部众3万人投降。这两次反击对鲜卑打击较大，也直接鼓舞了汉军的士气，扭转了长期以来汉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后东汉利用乌桓、南匈奴骑兵频频出击，屡获战果：

永建三年、四年（128～129年），鲜卑频繁袭扰渔阳、朔方。六年（131年）秋，耿晔遣司马率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同年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破鲜卑，"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②。

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袭鲜卑，大获全胜。鲜卑在渔阳、朔方等郡连遭打击后，便转寇汉军防守薄弱的辽东属国（治所在今辽宁义县），但耿晔立即调遣军队移屯辽东郡无虑城（今辽宁北镇县南），防御鲜卑，抑制了其对该地区的袭扰。

阳嘉二年（133年）春，使匈奴中郎将赵稠（《后汉书·顺帝记》作"王稠"，今从《鲜卑传》）遣部将率南匈奴骨部侯夫沈等，出塞袭破鲜卑，斩获甚众。

由此可见，东汉王朝在永建二年至阳嘉二年（127～133年）

---

①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间，改变了以往被动防守、消极应战的状态，对鲜卑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使东汉在对鲜卑的战争中取得了有利地位。其次，汉朝继续运用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利用乌桓、南匈奴骑兵出击鲜卑，以众击寡，以快制快，使其“朝发穹庐，暮至城郭”的作战优势难以施展。此二点乃是汉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此外，鲜卑所占地域虽然广阔，军队数量亦较多，有“称兵十万”，“控弦数万骑”之称，但其各部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力量相对分散，因此便于汉军逐个击破，这也是汉军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汉军的连续打击下，鲜卑势力一度中衰，尤其是辽西鲜卑首领其至鞬死后，其南下袭扰明显减少，东汉北疆基本趋于安定。

三、夏育北征的失败

夏育北征的对象主要是檀石槐。

檀石槐是鲜卑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自幼遭父遗弃，经历坎坷，据载，“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檀石槐”①。由记载看，檀石槐当是私生子无疑，这既决定了其幼年的不幸，也使他自小养成了自强不息、勇气胆略超人的性格和品质。所以年仅十四五岁时便“勇健有智略”，在一次与其他部族的冲突中，“檀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敌，悉还得所亡者”②，一举震惊了整个部落。他不仅作战勇敢，胆魄超人，而且在治理部落方面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施法禁，平曲直”③，深为部众敬畏和拥戴，被推举为大人（酋长）。檀石槐的势力发展很快，不久便在距高柳（今山西阳高

---

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县）北300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建立王庭，声威大震，东西部鲜卑大人纷纷率众归附。在檀石槐的统帅下，鲜卑的势力向其四周呈放射性扩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①。他效法匈奴旧制，把鲜卑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涉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②鲜卑进入了一个各部统一、空前强大的新时期。

统一后的鲜卑具有更大的掠夺欲望和更强劲的战争动力。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秋七月，檀石槐亲率骑兵3000～4000人袭击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东汉与鲜卑之间持续20多年的相对和平局面宣告结束。

桓帝延熹元年（158年），鲜卑进犯北部边郡，汉朝使中郎将张奂率南匈奴等出塞反击，战果甚微。次年，鲜卑再次袭入雁门郡，“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③。延熹六年（163年）夏，鲜卑出动1000余骑兵袭扰辽东属国。延熹九年（166年）夏，檀石槐分遣骑兵数万人大举南下，纵兵杀掠，汉缘边九郡同时告急。汉廷再遣张奂率军迎击，但鲜卑采取乘虚而入、遇强即退的策略，迅速撤离汉境，使张奂军无功而回。

此时的东汉王朝国力已十分虚弱，面对檀石槐日益频繁的骚扰，既无力有效制止其南下攻势，又无其他计策可施，无可奈何之下，乃采取妥协政策，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幻想以此笼络之。然而，有恃无恐的檀石槐不仅拒受汉廷封号，反而“寇抄滋甚”④，加速了南扰的频度。灵帝即位后，汉边被骚扰的地区更为扩大，“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⑤。熹平三年（174年）冬，鲜卑袭北地，扰凉州；五年（176年）寇幽州；六年（177年）夏，鲜卑东、中、西三部同时

---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出击，寇略幽、并、凉三州。据当年护乌桓校尉夏育统计："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①。足见问题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王朝内部就如何制止鲜卑南扰、平定边境祸患，产生了重大分歧。一部分武将主张立即出兵反击，彻底击败鲜卑，其代表人物是夏育。夏育原为北地太守，任内曾于熹平三年（174 年）率南匈奴休著屠各击败过鲜卑，由此迁为护乌桓校尉。他极力主张征发幽州各郡兵马，出塞讨伐鲜卑，并颇有把握地认为"一冬二春，必能禽灭"②。此议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如议郎蔡邕认为，"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③，云云，主张放弃鲜卑，保塞自守。这种意见在汉廷大臣中颇具代表性，因此，夏育的建议最初未获批准。

从当时汉朝的综合国力来看，虽然按照夏育的主张未必便能真正实现"一冬二春"破灭鲜卑的目的，因为灵帝时期的汉朝正日趋衰亡，而檀石槐统治下的鲜卑却处在鼎盛阶段。但若依照蔡邕之论，一味忍让、退守，则更将招致无穷边患，因而汉王朝在最后决策时，还是选择了夏育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汉廷在进行这样一项事关军国大计的重要决策时，起关键作用的却是一位因罪被囚的将军和一位手柄大权的宦官。据记载，原护羌校尉田晏获罪下狱，欲立功赎罪，因与中常侍王甫相好，便请他向灵帝求情，以戴罪立功。王甫不负其托，及时倒向主战派，并推荐田晏与夏育一同统兵北征。听惯宦官摆布的灵帝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意发兵北伐的。由此可见，这项决策并非灵帝本意，它的形成和实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最高决策阶层的懦弱无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次北征的失败下场。

熹平六年（177 年）秋，东汉调集 3 万兵力，分三路出击鲜卑。其战略部署及进军路线为：护乌桓校尉夏育率 1 万骑兵出高柳，破

①②③《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鲜卑中郎将田晏率1万骑兵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匈奴骑兵1万人出雁门，三路大军同时进发，出塞2000余里。檀石槐闻报，即令其东、中、西三部大人各率部众迎战。结果三路汉军全线溃败，阵亡者十之七八，一切军实辎重尽皆丧失，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数十骑逃回。

夏育北征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东汉王朝因政治黑暗而导致社会危机、国力衰弱以及鲜卑力量强大外，主要有：(1)战争准备不充分。在对待鲜卑南扰问题上，东汉王朝从来实行的是一条消极防御政策，除顺帝永建二年（127年）至阳嘉二年（133年）组织过一些反击外，几乎全是被动挨打，至灵帝时，汉朝面对统一强大的鲜卑，更是一筹莫展，先是企图和亲，后虽有夏育等少数将领力主反击，但在朝廷一片妥协、退让的呼声中，其建议被搁置一旁，而中常侍王甫的只言片语，又使灵帝立刻改变初衷，执意北征。最高决策者在关键时刻如此犹豫不定，北伐的准备工作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事实上，且不说长远的战争准备，就连起码的战前策划也是十分仓促的。(2)与前述密切相关，汉朝料敌不准，决策失误，使汉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不明，兵力分散。统一后的鲜卑，地域广阔，有东、中、西三大部分，且“称兵十万，才力劲健”，行动迅速。针对这一特点，汉军应避其精锐，选择其力量薄弱处为突破口，集中兵力予以打击，以扭转败局、振奋士气、逐步扩大战果为首次大举北伐的目的。然而，汉廷却急功近利，在决策时犯下严重错误。首先，汉军由高柳、云中、雁门出塞，所攻之处正是檀石槐势力崛起及其控制的核心地区，兵力最为强大，汉军不易攻破。其次，汉廷对鲜卑的作战能力及其行军迅速的特点认识不足，作为汉军主帅的夏育，只是偶然小胜过鲜卑，便扬言“一冬二春，必能禽灭”，致使汉军大意轻敌，冒险深入，而未料到檀石槐三部军队能够如此神速地前来迎战。第三，汉军战略部署极不合理，三路大军平分兵力，正、偏师不分，重点攻击目标不明，各自为战，互不策应，致使兵力分散而被分别击破。

夏育北征，是东汉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对鲜卑的主动出击，它的失败，一方面直接助长了汉廷中本已盛行的妥协、退让之风，从此朝中再无他人言及北伐之事；另一方面，使檀石槐南扰之心更加骄恣，东汉“缘边莫不被毒”①，成为鲜卑随意进出的掠夺场所。

灵帝光和年间（178～183年），檀石槐死后，其子和连代立，才力平庸，“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②，鲜卑重新走向分裂。和连死后，其子骞曼、其侄魁头因争夺权力而酿成内乱，鲜卑部众尽皆离散，各部大人自相传袭，势力逐渐衰弱。与此同时，东汉王朝也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逐渐衰亡。

第三节　对南方“蛮族”的战争

一、安帝时对澧中、溇中、零陵“蛮”反抗的镇压

东汉时期，澧中、溇中（属武陵郡）、零陵、长沙“蛮”都是居住在今湖南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建武二十五年（49年），东汉平定五溪“蛮”叛乱后，加强了对蛮族地区的统治，十余年间，相安无事。迄至章、和时期，虽然还先后发生过澧中“蛮”陈从、溇中“蛮”覃儿健、潭戎等发动的武装叛乱，但都很快被镇压下去，造成的影响不大。总之，东汉前期，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接受了东汉封建政权的统治，与汉族人民一样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状况是与当时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一致的，也是东汉前期民族关系的主流。

自安帝时起，南方“蛮”族地区又进入了多事之秋。各部族

---

①②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的反汉斗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持续到东汉灭亡。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最突出的表现是赋税徭役的加重。从安、顺、桓帝时期蛮族的历次反汉事件来看，无不带有反奴役、求生存的倾向，这与东汉前期的反汉战争相比，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考察东汉时期对南方部族的战争，首先必须分清两种不同情况，即东汉前期为平定五溪“蛮”等部族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东汉后期为镇压南方各族反抗民族压迫、剥削的战争。虽然，就东汉王朝而言，后一种战争亦带有维护地方安定的一面，但战争的起因是东汉统治者政策的失误，高举义旗的南方各部族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战。

安帝时期，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轮流执政，东汉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亦逐渐激化。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因“郡县徭税失平”①，愤而起来反抗。他们联合充中“蛮”等部民众2000余人，“攻城杀长吏”②，矛头直指东汉王朝。事件发生后，东汉王朝采取其惯用的“以夷攻夷”策略，诏令州郡地方政府招募五里、六亭“蛮”兵，前往镇压，澧中“蛮”失败后投降。次年秋，溇中、澧中“蛮”又聚集4000多人，“并为盗贼”③；同时，零陵“蛮”1000余人在羊孙、陈汤等率领下，“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④，与溇中、澧中“蛮”遥相呼应。但不久亦被州郡招募的蛮夷兵镇压下去。

二、顺帝时对武陵“蛮”反抗的镇压

溇中、澧中和零陵“蛮”的反汉斗争失败后，武陵等地的少数民族迫于东汉王朝的武力威慑，暂时放弃了武装反抗，继续忍受着汉朝官吏的奴役和压榨。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于是，汉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朝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僚开始得意忘形，认为南方“蛮”族已完全屈服，可以加重征收他们的租赋。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当武陵太守首先上书提出这个建议后，立即得到朝中大臣的响应，惟有尚书令虞诩头脑清醒，认为不可，他指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① 应该说，虞诩这番言论是抓住了问题实质的。它包含了两层重要含义：（1）对南方“蛮”族应实行安抚政策，做到“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2）赋税的轻重是观测“蛮”族地区安定与否的晴雨表，轻则安，重则乱。所以对其征收的赋税额应保持稳定，严格按“先帝旧典”办事，不可随意增加，否则必将因其“怨叛”而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然而，因假象而盲目乐观的顺帝否定了虞诩的建议，作出了增加“蛮”族地区租赋的决定。

东汉王朝的错误决策，正如虞诩预料的那样，迅速招致了“蛮”族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当年冬，澧中、溇中“蛮”即因“贡布非旧约”而杀乡吏，“举种反叛”②。次年（137年）春正月，反汉队伍迅速扩大，有2万人围攻充城（今湖南桑植县），8000人攻打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汉廷紧急调遣武陵太守李进率军镇压。李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两手并用的策略，先用武力击败“蛮”军，斩杀数百人，再趁其溃败之际，施以恩信，结果其余反抗者均缴械投降。

澧中、溇中“蛮”的反汉斗争虽然失败，但客观上达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东汉王朝被迫改弦更张，调整对“蛮”族地区的政策。史称，“（李）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③，减轻“蛮”族民众的赋税负担。在李进治理武陵的九年期间，“蛮”族地区相安无事。至顺帝死，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因李进治理“蛮”族有功，受到增秩2000石、赐钱20万的嘉奖。

---

①②③《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三、桓帝时对武陵、长沙、零陵“蛮”反抗的镇压

桓帝即位后，外戚梁冀当朝，政治更加黑暗，边郡地区的安定与否，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吏素质、修养的高低及其统治措施的得失。武陵太守李进去职后，该地“蛮”族又开始叛离汉朝。桓帝元嘉元年（151 年）秋七月，武陵“蛮”4000 余人在詹山率领下武装反汉，“拘执县令，屯结深山”①，郡县无力平定。永兴元年（153 年），汉朝经公卿廷议，任命儒将应奉为武陵太守，前往镇压武陵“蛮”。应奉到任后，采取政治攻心策略，“以恩信招诱”②，对武陵“蛮”进行分化瓦解，结果“（詹）山等皆悉降散”③。嗣后，应奉又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④，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

然而，东汉王朝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因清官浊吏的频繁更换、政策措施的反复无常而激怒了蛮族民众。由此引发的反抗斗争，参加人数日益增多，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东汉王朝的冲击也愈来愈大。

桓帝永寿三年（157 年）十一月，长沙“蛮”反汉，屯聚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东）县境。至延熹三年（160 年）秋七月，其众发展到 1 万多人，“遂抄掠郡界”，“杀伤长吏”⑤。与此同时，零陵、武陵“蛮”纷纷响应，零陵“蛮”万余人攻入长沙，武陵“蛮”6000 多人攻打南郡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延熹五年（162 年）夏五月，长沙、零陵“蛮”共 7000～8000 人，进入桂阳（今湖南郴州市）、苍梧（今广西梧州市）、南海（今广东广州市）郡境，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而逃，苍梧等郡落入“蛮”族反抗者手中。

---

①②⑤《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④《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

汉廷急遣御史中丞盛修督率州郡募兵，前往镇压，但遭到失败。在这危急关头，汉军内部又发生募兵反叛事件。据载，是年八月，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艾县（今江西修水县西）600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①，“众至万余人”②。这支生力军与正活动于长沙地区的零陵“蛮”互相呼应，大败汉朝官军，奉命督军的谒者马睦与荆州刺史刘度仓皇逃跑。同年冬十月，武陵“蛮”急攻江陵，南郡太守李肃惊慌失措，欲弃郡奔逃，主簿胡爽奋力扣住其马首，强谏说：“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旌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③ 李肃竟拔刀杀死胡爽，逃命而去。荆州南部地区全被“蛮”军和其他反汉势力控制，反汉斗争进入高潮。

荆州战况传入京城，朝廷一片震惊。桓帝召开公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作出了以下决定：（1）鉴于马睦、刘度、李肃临阵脱逃和胡爽冒死劝谏的行为，分别予以严惩和重奖，“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④。（2）更选良将主持荆州军政事务，以政绩颇佳的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以熟知兵法战阵的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军平定“叛乱”。（3）鉴于当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状况，“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⑤，以弥补军费不足。此时的东汉王朝虽然十分腐败，但在大敌当前，国家危急的紧要关头，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仍能集思广益，作出比较明智的决策。事实证明，汉廷的正确决策，对于平定荆州“蛮”族的反抗起了重要作用。

度尚、冯绲受命后，分别行动，密切配合，度尚负责征讨以艾县应募士为首的叛军和正在长沙活动的零陵“蛮”，冯绲主要进

---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桓帝延熹五年。

③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击“寇略江陵间”的武陵“蛮”。度尚以其部曲为中坚力量，亲自率领，“与同劳逸”，又“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①，汉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很快击破零陵“蛮”和叛汉募兵，迫降数万人。

冯绲率领大军10万余人出征武陵“蛮”，临行前汉廷诏策冯绲：“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将军其勉之！”② 同时，一方面排除朝中阻挠冯绲出征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对他所提出的要求一律予以准允。如冯绲认为，原武陵太守应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③，请求一同出征，桓帝立即赦免其罪，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充当冯绲的军事参谋。在与武陵“蛮”的作战中，应奉“勤设方略”④，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冯绲所率官军，兵多将强，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延熹五年十一月，冯绲军途经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⑤。进击武陵“蛮”，大获全胜，斩首4000级，受降10多万人。

在度尚、冯绲的围剿下，荆州地区武陵、长沙、零陵“蛮”的反抗斗争全被镇压。

然而，南方“蛮”族并未因此而屈服，当冯绲军撤离荆州后，“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⑥。武陵“蛮”亦再次反叛，攻打郡城，武陵太守陈奉率军击破之，杀死3000余人，俘获2000余人。直至灵帝年间，武陵“蛮”及其他蛮夷的反抗斗争，仍屡见于记载，虽然均被州郡官军剿灭，但反映了南方“蛮”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

① 《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

②⑤ 《后汉书》卷三十八《冯绲传》。

③④ 《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奉传》。

⑥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八章 黄巾农民战争和东汉王朝的崩溃

东汉后期，由于地主制经济发展，豪族势力恶性膨胀，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宦官、外戚集团交替擅权，社会黑暗。加之对周边各族连年用兵，赋役征剥不断加重，“特选横调，纷纷不绝”，朝纲失绥，人心紊乱，社会危机加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全面激化。广大农民在长期反抗斗争的基础上，于灵帝中平年间，最终爆发了全国大规模的黄巾农民战争。本章拟就黄巾农民战争的历史背景、战争的准备、经过、特点和历史意义等作些探讨，同时，东汉政权对农民军的血腥镇压及其崩溃过程，也做些必要的论列。

第一节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的深化

一、赋役剥削加重和农民的流亡

东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加剧，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相擅权。各级衙署则因循苟且，贪污腐化。外戚、宦官的党徒，典据州郡，贪贼枉法。这些窃居要职的达官新贵，既无封建统治者要求的“德行”，更无治国安民的资历和才能，荒淫暴虐，极尽欺压人民之能事。政治上的黑暗，使统治集团日益骄奢淫逸，腐败堕落。这不但使东汉朝廷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徭役的负担。再加上水旱、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连年出现，将广大农民逼到了无以为生的绝境。

东汉政府的赋役剥削比西汉之时更加沉重。西汉在宣帝时每年的租税收入为 40 多亿，少府的山泽、川池、园林收入 13 亿，共

53亿。但东汉时期的人口和垦田数字低于西汉，而每年的租税收入却达60多亿。至于东汉后期其他方面的临时性调派，其名目就更是繁多了。

东汉除继续沿用西汉的田租、口算、更赋之外，还新增加了“调”的科派。刘陶指出，要想取得对西羌战争的胜利，使社会得到安定，“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①。《后汉书·韦彪传》也载：“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据史家研究，东汉之“调”，从征调的数额而言，无恒法定令。大概是因人因事而异，一任官府随时征发；从纳调的对象和方式来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大概是根据需要而定②。在东汉后期，这种非制度化的赋敛、科派，不仅可以大大扩充边疆战争急需的军费，而且也很方便朝廷上下搜刮、聚财。安帝时，“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债，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③。又《后汉纪》卷二十本初元年九月朱穆奏记云：“今宦官俱用鎰水为害，而京师之费，十倍于前，河内一郡，尝调缣、素、谷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更有甚者，“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④。可见，东汉后期，纷纷不绝的“特选横调”，是强加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更为沉重的负担，是东汉统治者对人民剥削率不断增长的确证。

外戚、宦官和各地豪族地主，在对人民的搜刮上，也是肆无

---

①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② 参见黄今言著：《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③ 《后汉书》卷五十一《庞参传》。

④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忌惮的。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或竞相侵吞国家财物，或假借土地，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史载，梁冀被诛除时，其家财竟值30余亿之多，相当于天下租税的二分之一。宦官集团的剥削更是有恃无恐，诸如侯览向史弼索“求假盐税”；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7000余万，等等，不仅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汉廷国库也被淘虚得山穷水尽。三次对西羌的大规模作战，仅前两次就耗军费合计达320多亿钱，东汉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时人描绘其困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所谓“三空”即“田野空，朝廷空，府库空”①，东汉国力遭到严重削弱。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再加上天灾频繁，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安帝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流民队伍。东汉统治腹心的司隶部、冀州、并州等地，“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幼相携，穷困道路”②。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③。三年（109年），“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④。顺帝时，灾情继续发展，受灾范围也不断扩大，连最富庶的荆、豫、兖、冀等州，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桓、灵之际，东汉统治到了它最腐朽的阶段，天灾人祸频仍至极。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一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熹九年（166年）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⑤。百姓因连年灾荒而冻饿至死，以及“人相食”的记录，史不绝书。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一片凋零残破、动荡不安的景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交织促进，达到了空前尖锐的境地，社会危机不断深化。

---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

②④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③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永初二年引《古今注》。

⑤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

随着东汉后期社会危机的加深，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崔骃写的《博徒论》描绘了被折磨到几乎失去人形的农夫令人心酸的形象："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耘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①。崔寔做五原太守时，见到"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②。农民的穷困不仅使社会的简单再生产无法维持，就连人口的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有的地方"小民贫困，多无养子"③，情景悲惨而凄凉。那些离乡背井的流民，则更是被抛出了生产领域，失去了生活的依赖。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斗争，改变现实的痛苦。

从安帝永初年间毕豪、张伯路等首先揭开武装起义的序幕起，不堪悲惨命运支配的农民就纷纷造反，各地起义的烽火逐渐燃遍了整个中国。到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黄巾起义爆发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虽然这些起义还只是地区性的，但必将给东汉王朝造成致命的威胁。桓帝时，刘陶就预言："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预言。东汉后期各地农民起义情况参见下列简表：

① 《全后汉文》卷四十四。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后汉书》卷六十七《贾彪传》。

东汉纪年	公 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安帝永初二年	108 年	“剧贼”毕豪起义，入平原界，打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	《后汉书》卷八十一《刘茂传》。
永初三年	109 年	“海贼”张伯路等 3000 余人，自称“将军”，转战于沿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	《后汉书》卷三十八《法雄传》。
永初四年	110 年	张伯路复兴勃海、与平原刘文河、周文光等 300 余人，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宁季起义军数千人，在朝歌一带“攻杀长吏，屯聚数年，州郡不能禁”。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三十八《法雄传》、卷五十八《虞诩传》。
永初五年	111 年	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八十七《西羌传》。
顺帝永建四年	129 年	青、冀、扬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	《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
阳嘉元年	132 年	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阳嘉三年	134 年	三月，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同上。
永和二年	137 年	八月，江夏“盗贼”杀邾长。	同上。
永和三年	138 年	“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志第十一《天文志》中。
永和六年	141 年	九江、丹阳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	同上。
汉安元年	142 年	广陵张婴等数万人起义，杀刺史、二千石，攻打于扬、徐之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卷五十六《张纲传》。

东汉纪年	公 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汉安二年	143 年	十二月，扬、徐“盗贼”攻烧城寺，杀略吏民。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建康元年	144 年	三月，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八月，扬、徐地区的范容、周生攻打城邑。战败官军。十一月，九江的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十二月，九江黄虎等攻合肥。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卷三十八《滕抚传》。
冲帝永嘉元年	145 年	正月，九江的徐凤等杀曲阳、东城长。三月，九江的马勉称“黄帝”。四月，丹阳的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七月，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眙。十一月，历阳的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	《后汉书》卷六《冲帝纪》。
桓帝建和元年	147 年	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东观汉纪》曰“江舍及李坚等”。
建和二年	148 年	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和平元年	150 年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永兴二年	154 年	闰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太初皇帝”。太山琅邪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守令不能破。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六十二《韩韶传》。
永寿二年	156 年	秋七月，太山公孙举等聚众 3 万人攻打青、兖、徐三州。汉廷派兵讨之，连年不克。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六十五《段颎传》。
延熹三年	160 年	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杀都尉侯章，攻没琅邪属县，州郡不能讨。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八十二方术《赵彦传》、卷四十一《第五种传》。

东汉纪年	公元	农民起义事迹	备　注
延熹五年	162年	四月，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交趾。交趾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汉军不能克。八月，被募来镇压起义的豫章艾县600余人发生兵变，据临湘、屯益阳，杀长吏，发展为万人以上的队伍，击败谒者马睦、荆州刺史刘度的地方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三十八《度尚传》。
延熹六年	163年	秋七月，桂阳"盗贼"李研等攻打郡界。十一月，南海"贼"寇郡界。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延熹八年	165年	五月，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王印、珪、璧、铁券、相署置。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永康元年	167年	五月，庐江"贼"起，寇郡界。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灵帝建宁元年	168年	九江"山贼"起，连年不解。	《后汉书》卷七十七《阳球传》。
建宁三年	170年	济南"贼"起，攻东平陵。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熹平元年	172年	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太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连战三年之外。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卷五十八《臧洪传》。
光和三年	180年	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战争持续多年。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从以上所列东汉后期各地农民起义斗争情况来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这些起义斗争发生频繁，持续较久，给东汉政权沉重的打击。在约76年的时间内，规模较大的起义就有几

十次之多，有的发展到数万甚至十多万人，有的坚持数年甚至十几年，呈现出连续不断、延绵起伏的特点。起义虽然不断被镇压下去，但给东汉一阵又一阵的强烈冲击，直接动摇着东汉的统治。尤其是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自称“皇帝”或“太上皇帝”等尊号，表明了他们要推翻汉家皇权的坚强决心。第二，起义爆发的地区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规模较大的起义军，活动于数郡乃至数州的广大地区，起义形势逐渐向南方扩展，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奠定了基础，积聚着力量。第三，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与内郡农民起义交相呼应，有力地配合。由于豪族地主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迫与剥削，一些汉族人民投入了少数民族反抗东汉统治的武装斗争，而更多的汉族农民起义，是在汉廷镇压边疆少数民族时趁机发展。因此，无论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战争，还是内地农民起义，都是东汉豪族地主阶级与各族人民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第四，东汉官军的士兵哗变成为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招募的官军，其成分以农民为主，在军队内也受到将吏的欺压，又被驱使作为镇压少数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的工具，死于非命。因此，有部分官兵反戈转向起义队伍，这充分反映出东汉政府的腐朽和虚弱，也说明其统治地位日益动摇。

尽管各地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也使农民意识到，既然地区性的起义会被豪强地主所扼杀，就必须形成全国性的强大革命洪流，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经过充分的准备，才能汇集力量，与汉廷和豪族地主进行一场决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帝以来各地的农民起义，为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准备了条件。东汉后期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最终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历史巨澜——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第二节　波澜壮阔的黄巾农民战争

（参见附图 7）

一、黄巾大起义的准备和爆发

（一）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公元 184 年黄巾大起义的爆发，是农民阶级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革命力量不断积聚的结果，也是东汉末年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的表现。张角等黄巾军领袖，为了发动群众，一举推翻东汉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

黄巾起义的酝酿和准备，利用了东汉后期社会上道教思想广泛流行的客观形势。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干吉①所藏“神书”170 卷，名《太平清领书》，即早期道教经典之一，后称《太平经》。《太平经》内容庞杂，言及天地、阴阳、五行、干支、灾异、鬼神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其中主要宣扬宗教迷信。但也有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太平社会的美好理想。在东汉豪族势力膨胀，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太平经》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宫崇向汉廷献上此书后，被当朝者认为“妖妄不经”而束之高阁。后来，在桓帝时，又有襄楷两次上献此书，同样被朝廷以“不合明听”为由而置之不理②。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希望借助《太平经》的宗教思想，要求东汉朝廷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改良。然而，这一要求被宦官统治集团所拒绝。《太平经》却继续在社会下层广泛流传，成为动员农民起来推翻东汉黑暗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

---

① 一作“于吉”。

② 《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

其时，据史书记载，巨鹿人张角获得《太平经》，并对之加以改造创立了太平道。张角传布太平道，主要以治病为手段，先使贫苦百姓入道，然后使之相信太平道的说教。“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① 这种治病的方法，和早就在巴蜀一带流传的“五斗米道”相似。五斗米道由张陵创立，亦以治病为名布道。凡“从受道者，出五斗米”② 或“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③。五斗米道认为病患是由罪过造成的，所以，在治病时，让病人处于静室“思过”，由鬼吏主为之请祷，“大都与黄巾相似”④。“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⑤这种原始巫术治病方法，或许有类似养生、气功等增强体质、抗御疾病的功效，但总体为迷信，在科学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却奉若神明。张角弟张梁、张宝也“自称大医，事善道。疾病者辄跪拜首过，病者颇愈，转相诳耀，十余年间，弟子数十万人，周遍天下”⑥。可见，张氏兄弟最初是以医生的面目出现，在行医过程中，以某些《太平经》的内容作为教义，宣传太平思想，在广大贫苦农民中间“事善道”，这给那些深受豪族地主、贵族、宦官压榨的农民，带来一丝慰藉。他们处于生不得温饱，有病无力医治的困境，张角兄弟的“善道”及其宣扬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很快使“百姓信向之”。太平道逐渐深入人心，从而为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张角等十几年的行医、传教活动，东汉统治者早有察觉。熹平末至光和初年，司徒杨赐曾言：“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⑦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②④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

③⑤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鲁传》注引《典略》。

⑥ 《后汉纪》卷二十四。

⑦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

说明在起义爆发的七八年以前，汉廷对进行太平道活动的张角等人有过“赦免”，但太平道势力却是日益壮大。杨赐建议：“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①此时，太平道组织已经形成，故有“渠帅”之称，而入教的主要成员是遍布州郡的各地流民。杨赐的建议，未曾引起汉廷重视，“会赐去位，不复捕录”②。直至光和六年（183 年）刘陶、乐松和袁贡等仍连名上疏，要求灵帝“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③。可是，“帝殊不悟”④，昏庸之君还是意识不到形势的严峻，对刘陶等人的意见，仍置若罔闻。因此，到灵帝光和末年，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以宗教为掩护的农民革命组织。

据《后汉纪》记载，太平道组织“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太平道在“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坊”本是流民组织⑤，太平道利用这一组织可以更合法、更隐蔽地发展自己的教徒。因此，太平道在发动起义以前，并未公开自己的组织形式，而是借流民组织之名，派领袖对流民进行组织和领导，从表象上来看，是有利于流民的安定。这或许是朝廷对杨赐、刘陶等建议置之不理的原因之一。然而，张角等利用流民原有组织，作为太平道的宗教组织进行活动，有效地起到了组织农民参加起义的积极作用。所以，起义一旦爆发，原有的流民组织“坊”，便可以迅速按战争需要，转变为黄巾军的军事组织“方”，以“方”为单位，形成类似现代的战略兵团。

---

① 《后汉书》卷五十四《杨赐传》

②③④ 《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⑤ 参见赵克尧等《论黄巾起义与宗教之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在长期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之后，大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张角等为全国性的暴动，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并逐步付诸实施。首先，他们确定在中平元年（184年，是为甲子年），发动全国性起义。他们利用东汉流行的“五德始终”历史循环论，采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四处散布这年汉运已衰的谶语，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用“苍天”暗指东汉王朝，“黄天”暗指太平道的理想政权，“甲子”为天干地支纪年循环一周之始，有更始之义。谶语寓义双关，指出从此将要开辟天下太平的新纪元。这一口号成为号召农民起来推翻东汉统治的总动员令。张角还派道徒“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以为各地响应起义的暗号和起义军集中攻击的目标。其次，为察探东汉王朝的虚实，以利发动起义，张角等曾亲自“窃入京师，觇视朝廷”①，掌握第一手军事情报。在了解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腐败至极的情况后，他们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制定了里应外合，同时起事的计划。在洛阳，他们发展了部分百姓加入太平道，甚至还有皇宫宿卫人员也准备参加起义。宦官中也有相信太平道者，中常侍张让就曾与太平道有往来，“多与张角交通”②。因此，张角派大方渠帅马元义多次来往于京师，联络了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并将先期收编的荆、扬流民数万人，调动北上集结于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待命，“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③。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犹如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二）黄巾大起义的爆发

就在张角等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并按计划部署行动之时，统治集团中许多人已经预感到将有大的变故，但面对宦官专权的严酷现实，“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④。然而，

---

①④《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

②《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传》。

③《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中平元年春，张角弟子济南人唐周叛变，向朝廷上书告发张角、马元义在洛阳等地联络起兵之事。马元义因此被捕，在洛阳被车裂牺牲。接着，灵帝将唐周所上奏章交付三公及司隶校尉，由钩盾令周斌率三府掾属，根据唐周提供的线索，“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张角道者”，当场屠杀1000余人，然后，移书命冀州追捕张角等太平道首领。张角等得知起义计划已被泄露，事情紧急，不得已将原定暴动时间提前，“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①。中平元年（184年）二月，起义正式爆发。

张角起义军“皆著黄巾为标识，时人谓之‘黄巾’”②。史载，黄巾军有36方，即有36个渠帅各将其军。据《后汉纪》卷二十四，则记载为“二月，角等举兵，往往屯聚，数十百辈，大者万余人，小者六七千人”，或许还不止36方之数。仅据36方每方平均1万人计，起义爆发时，黄巾军就有36万人之多，农民起义一开始就有如此众多人数投入战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③，成为这次农民大起义爆发的主要特征。尽管东汉朝廷事先已经获知起义的情报，欲行镇压，却正如杨赐所预言的，“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太平道以其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官府的追捕，成功地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起义。

黄巾军以张角、张梁、张宝为最高统帅。《太平经》讲天道、地道、人道，称天神、地神、人神为三公，因此，张角称“天公将军”，张梁称“地公将军”，张宝称“人公将军”，统领诸方。黄巾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是充分的，然而，从现有材料推断，黄巾军没有再提出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是里应外合的洛阳暴动流产以后，黄巾军仓促起义的一个必然结果，也说明张角等在军事准备上，还缺乏应变的第二套暴动方案。因此，诸方黄巾军起义后，在军事上的联系并不紧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

①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③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太平道组织主要分布在洛阳以东的青、徐、幽、冀、兖、豫、荆、扬等8州，即今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以至鄂西北等广大地区。按原定起义计划，洛阳暴动成功以后，“八州并起”。由于起义时间被迫提前，这一部署受到一定的影响，《续汉书·五行志》称：“是时，黄巾作慝，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立于中平二年（185年）的《郃阳令曹全碑》则记载：“訞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① 这都说明在黄巾起义之初，并未完全如愿实现“八州并起”。当时傅燮所上疏奏也说得明白：“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② 李贤注曰：“此云‘六州’，盖初起时也。”③ 总之，太平道的黄巾军，一开始只在六州或七州部分郡县组织起义，但其他州郡的太平道徒闻讯后，很快地参加到大起义的洪流之中，一时间也形成了“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④ 的全国性革命形势。

（三）黄巾军初期的胜利

由于黄巾大起义代表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为推翻黑暗的东汉统治，当时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军，作战格外猛烈。诸方黄巾军“往往屯聚”，“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⑤，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各地官府寺舍。对作恶多端的官吏、豪强予以坚决地镇压。史载黄巾军“杀人以祠天”⑥，其实主要是“杀害长吏”⑦。战争中，黄巾军多以火攻为手段，对封建据点和豪族地主的田庄、坞堡、壁垒的摧毁力极大。《荡阴令张迁碑》云：“黄巾初起，烧平城市。”⑧结合史书“所在燔烧官府”的记载和“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说法，可以想像，广大农民群众在武器装备不足的条件下，很自然

---

①⑧ 《金石萃编》卷十八。

② 《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

③ 《后汉书》卷五十八《傅燮传》注。

④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⑤⑥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⑦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地点燃起烈火，向东汉地方政权和豪族地主发起猛烈的冲击，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暴动，东汉地方政权和贵族、豪强惊慌失措，一时无力抵挡，“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①，黄巾军很快就占据了许多地方，“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②。冀州是起义爆发的中心地区，除了张角兄弟在魏郡（治邺县）誓师起义以外，安平（治今河北冀县）和甘陵（治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群众，分别抓获了平日作威作福的皇室贵族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以实际行动响应太平道发动的起义，参加到黄巾起义的队伍之中。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黄巾起义后，在邵陵（今河南漯河东北）击败了太守赵谦所率的官军，乘胜向颍川、洛阳方向推进，并汇合了在陈国（今河南淮阳）起义的黄巾军，成为实力较强的一支主力，对京师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兖州的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南），起义军活动频繁。在幽州，广阳（治今北京市）黄巾军镇压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在荆州，张角弟子张曼成称“神上使”，领导南阳黄巾攻杀了郡守褚贡，并占领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为据点，发展起义队伍，除此以外，许多黄巾军的暴动不详于史载。凡是起义爆发的地区，东汉地方统治无不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据上述黄巾军在各州郡的军事活动形势来看，尽管起义计划临时变更，黄巾军仓促发动起义，在冀、豫、兖、幽、荆等州郡的黄巾军主力，显然还是自北到南作为两翼，由东向西为中路，三面向洛阳呈环攻态势，矛头仍然直指东汉统治的中心。各路黄巾军虽然缺乏有机的战略联系，但这一态势足以构成对洛阳的极大威胁。至此，黄巾军以全面的暴动及对东汉强大的进攻势头，扭转了因叛徒告密而导致的被动局面，起义取得了初期的胜利。

在黄巾军暴动胜利的影响下，同年七月，五斗米道领袖巴郡张修聚众于汉中一带起义，攻打郡县；十月，在枹罕、河关一带，

---

①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有北宫伯玉、李文侯等领导的汉、羌等各民族反抗东汉暴政的起义，杀护羌校尉冷征，边章、韩遂也为义军所拥戴，攻杀了金城太守陈懿。这样，在东汉的西部地区，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浪潮，与东部地区的黄巾军遥相呼应，实际上构成了东汉末年黄巾农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黄巾军主力主要活动在冀州、豫州和荆州的部分地区，随着东汉政权纠集军队反扑，全国的战争形势也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局面。

二、东汉的军事镇压和黄巾军的英勇奋战

（一）东汉王朝的紧急决策和部署

黄巾军从四面八方掀起的猛烈冲击，大大震撼了东汉统治集团。汉廷大为惊恐，针对黄巾军三面环攻洛阳的战略态势，急忙调集兵力，首先加强京师的军事防务。“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①，并“修理器械，以镇京师”②，进入战争状态。同时，又在京师附近的关口要塞增设重兵，“置八关都尉官”③，控制人员出入。整个京师洛阳处于全面军事戒备之中。汉灵帝还“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④，这对于早已乱作一团的地方官来说，不啻一纸空文。

在匆匆忙忙布置完毕京师的防务之后，汉廷“召群臣会议”⑤，紧急商讨围剿黄巾军的对策。然而统治集团在分析起义爆发的原因，并商量镇压的办法时，发生了意见分歧。

黄巾起义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从东汉统治集团总结教训而言，宦官专权、蒙蔽视听，坐使太平道的传播和势力的发展

---

①③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② 《后汉书》卷六十九《何进传》。

④⑤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日增一日，因此，朝野上下纷纷指责。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① 中常侍张让等恐惧，遂诬陷张钧学太平道，将其逮捕，在狱中拷掠至死。侍中向栩对宦官当道、朝廷腐朽早已愤恨不已，又无可奈何，"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使将出师，疑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② 张让等宦官如此弄权，于镇压黄巾起义的决策不仅无补，反而会进一步分化、削弱统治集团的力量。因此，解决朝廷政治问题，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共同对付黄巾军，成为军事决策前的关键。同时，还必须在惩治贪官污吏方面作出一点姿态，以顺应百姓的愿望，达到消弭人民反抗的目的。

在宦官中，也有少数清正之人，他们更多地注意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吕强即是其中之一。他的对策是，"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③。吕强担心统治集团的内争，会导致失势的官僚集团与黄巾军联合，借用农民起义的力量，使东汉朝廷遭灭顶之灾。他警告灵帝："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④ 在群臣会议上，皇甫嵩也"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⑤，即在政治上，要赦免那些因不同政见而被禁锢的"党人"；在经济上，要求皇室将聚敛的财物和马匹散出，充作劳军之

---

① 《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传》。

② 《后汉书》卷八十一《向栩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八《吕强传》。

④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⑤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费或装备军队出征，调动全部力量对付黄巾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灵帝才采纳了吕强和皇甫嵩的建议，宣布解除党锢，让“诛徙之家皆归故郡”①，在地方上进一步组织镇压黄巾军的豪强武装。“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②，并“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③。东汉统治者已从惊慌之中冷静下来，在内部矛盾缓和以后，便立即有组织地部署对各地黄巾军的反扑。

黄巾起义爆发以后，起义军主力基本上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三个地区。冀州黄巾军由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率领；颍川、汝南、陈国一线的黄巾军由波才、彭脱等人率领；南阳黄巾军先有张曼成，后有赵弘等率领；从东郡到江淮还有卜己、张伯、梁仲宁、戴风等人领导的黄巾队伍，分别活动于一方。

对此，东汉王朝的军事部署，首先是针对距洛阳最近、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然后是指向黄巾军最高统帅所在的冀州黄巾，对其分别派遣两支官军，实行重点进攻。在南阳方向则加强防务，暂取守势。党锢解除以后，各地的地主豪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也都加紧修筑堡垒，扩大武装，或就地固守顽抗，或听调出征作战。

为镇压颍川黄巾军，汉廷拜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调发北军五校、三河骑士，以及临时招募的精壮兵勇，合4万余人，由皇甫嵩、朱儁各统一军，由西向东开进。对冀州黄巾军，则拜卢植为北中郎将，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之，也率一部分北军五校士，并调集诸郡国兵前往围剿。黄巾起义以后，汉廷从仓促应战，调兵拱卫京师，到紧急决策、部署兵力主动出击，前后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分散于各地的黄巾起义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势。

---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③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二）长社之战和颍川黄巾军的失败

是年夏四月，右中郎将朱儁率官军一部进抵颍川前线，与颍川黄巾波才部对阵交战。朱儁战败退却。东汉军另一部主将左中郎将皇甫嵩见起义军士气正盛，难与争锋，遂率军转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待机再战。五月，波才乘胜进兵，指挥黄巾军将皇甫嵩团团围住。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之下，长社弹丸小城岌岌可危。当时，官军人少势单，军心恐惧，朝不保夕。皇甫嵩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诡计多端。他一面严令官军坚守不出，等待和寻找突围的机会，一面仔细观察城外黄巾军的动静，图谋攻破起义军的良策。

黄巾军攻长社城一时难下，士气稍懈。波才又不懂战阵结营之法，令攻城义军紧靠草木葱郁之处安营扎寨，修整部队，准备强攻。皇甫嵩侦察到这一情况，于是召集军吏会议，稳定军心，布置方略。皇甫嵩指出："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① 碰巧这天夜里刮起大风，使皇甫嵩火攻的阴谋能够得逞。

当天晚上，皇甫嵩一面命令军士各持火把登上城墙，一面派精锐士卒趁夜幕潜出城外，趁风放火，偷袭黄巾军营寨。得手之后，夜袭军士在城外大声呼叫，城上官军点燃火把呐喊助威。一霎时，火光遍布，战鼓震天，皇甫嵩自率一支人马开城突出，奔向黄巾军营阵。在混战之中，黄巾军营寨四处起火，起义军战士惊乱奔走，布不成战阵，难以抵挡。正在此时，汉军骑都尉曹操又率一支援兵赶到，朱儁残部趁势反击，三支官军从长社城里外夹击，黄巾军遭受严重损失，数万人壮烈牺牲于激烈的鏖战之中。

长社之战后，波才率黄巾军余部退往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皇甫嵩、朱儁等乘胜追击，并向汝南、陈国黄巾发起攻击。六月，波才在阳翟战败。皇甫嵩、朱儁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大破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汝南黄巾彭脱部。豫州的黄巾军有数十万人被迫投降①。接着，皇甫嵩奉诏转战东郡，八月，在仓亭（一作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击败东郡黄巾卜己部，卜己被俘，黄巾军被害者7000余人。经过约4个多月的战斗，颍川、汝南、东郡、陈国一线的黄巾军终于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

长社之战，颍川黄巾军人多势众，在前次作战取胜后，轻敌麻痹，又缺乏实战经验。依草结营，犯了兵家之大忌，被东汉官军以火攻偷袭而溃散，遂与汝南黄巾失去联系，被官军击败。官军人数虽少，但主将是有长期作战经验的军事干才。皇甫嵩善于运用兵法谋略，在内线把握战机一举突破黄巾军的包围。在外线，则有朱儁及曹操的援兵，两方面配合默契，比之波才等的硬拼，自然是略胜几筹，才能以少胜多。长社一战是汉廷与黄巾作战的关键之役。汉军赢得此役，不仅较顺利地击溃颍川、汝南等地黄巾主力，并逐步将其一一歼灭，解除了心腹之患，更主要的是在战略上取得了中路突破的胜利，完全切断了南、北黄巾军战略联系的可能性，为对黄巾军进一步实施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廷开始第二步战略计划，调皇甫嵩军北上，镇压河北地区黄巾军，以朱儁军南下，镇压南阳地区黄巾军。汉廷由对黄巾主力的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进攻。

（三）宛城之战和南阳黄巾军的失败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领导下，趁朝廷无暇南顾之机，占领宛城达100多天。六月，东汉新任南阳太守秦颉，率军袭宛城，张曼成与之交战，不幸阵亡。黄巾军又推举赵弘为领袖，重整队伍，起义军由最初数万发展到十余万人，雄踞宛城，形成浩大声势。此时，朱儁在取得长社之战胜利后，奉诏南下，支援秦颉的地方官兵，荆州刺史徐璆也带兵至宛，与朱儁部会合共1.8万人，三路官军合兵围攻宛城。黄巾军英勇奋战，顽强固守。尽管官军攻势凶猛，但从六月至八月，黄巾军在宛城坚守，屹然不动。汉廷几

---

①《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

乎对朱儁的指挥能力失去信心，有人甚至奏请将其撤职问罪，另派将领指挥作战。在关键时刻，司空张温上疏，认为："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儁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①灵帝乃继续催促朱儁攻克宛城。在朝令压力下，朱儁军攻城更为猛烈。在宛城保卫战中，黄巾军统帅赵弘又壮烈牺牲，部众再推韩忠领导起义，继续坚守宛城。朱儁兵少，宛城攻克不下，"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又声东击西，"因鸣鼓攻其西南"，"儁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韩忠等未能识破诡计，悉众赴西南阻击，结果，官军在东北空虚时，"乘城而入"②，于是，外城失守。韩忠只得率余部退保宛城内小城。其实，形势已对起义军十分不利，韩忠发生动摇，惊恐地向官军请求投降。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及司马张超等皆欲接受韩忠的乞降。唯朱儁不同意，他认为："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③断然拒绝了韩忠的乞降，非要将黄巾军置于死地而后快。朱儁拒绝接受投降，黄巾军只有背水一战，因此，抱着与小城共存亡的决心，众志成城，拼死抵抗。官军轮番进攻，小城却坚如磐石，连战不克。

朱儁再次登上土山，侦察城内黄巾军的情况，领悟到黄巾军殊死守城的原因。他对张超说："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④于是下令撤兵解围，诱使韩忠出城决战。韩忠见状，果然率众出城突围，朱儁突然袭击，韩忠大败而逃，被朱儁追杀数十里，损失1万余众。韩忠不愿再战，"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⑤。黄巾军余部见主帅遭如此下场，群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情激愤，“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①，继续固守。

经过几番挫折，南阳黄巾军元气大伤。朱儁再度指挥官军攻城，黄巾军难以抵敌。朱儁部下佐军司马孙坚在进攻中，“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②。宛城陷落时，孙夏率残部向北突围，试图撤退到山区，依靠伏牛山延绵起伏的有利地形，与官军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但朱儁率官军紧追不舍，在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南），双方再战，孙夏军败，黄巾义军又有1万余人牺牲。其余遂四散而走，十余万人的南阳黄巾军就这样悲壮地被镇压下去。

宛城之战旷日持久。在秦颉攻城之前，南阳黄巾军已占据宛城达3个月有余。从六月朱儁军南下围城至城破，南阳黄巾军又坚守宛约5个月。从兵力上来看，黄巾军十余万人，而官军不足2万，仅是黄巾军的十分之一。兵力如此悬殊，黄巾军仍然战败，其主要原因是黄巾军主帅缺乏谋略，在阵战中又不是官军强兵悍将的敌手，因此，既不能妥善部署突围转移，又不能打退官军以解城围。结果，长期困守孤城，一筹莫展，愈来愈陷于被动，兵员众多的优势难以发挥。而官军则巧妙地运用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手段，强攻与诡计相结合，终于破城。当然黄巾军中大量是举家流徙的贫苦农民，妇弱老幼在军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大大影响到军队战斗力和机动性，这也是南阳黄巾坚守宛城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广宗之战和河北黄巾军的失败

在与皇甫嵩、朱儁进攻颍川黄巾军的同时，卢植也率另一支官军进逼冀州，按计划重点进攻张角、张梁、张宝统帅的黄巾军主力。冀州黄巾军约有20万人，人数虽然多于卢植军队，但也多由流民组成，战斗力远远不及五校精锐之师，何况有诸郡国兵与卢植的北军五校士配合。因此，卢植连战皆捷，张角部牺牲1万多人。于是，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② 《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一《孙坚传》。

张角决定采取守势，与张梁率主力退保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张宝则率别部北走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互相呼应。卢植紧追张角主力，包围广宗，"筑围凿堑，造作云梯"，猛烈攻城，一连3个月也未能攻克。灵帝大为恼火，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卢植军中观战督阵。左丰贪婪无厌，"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左丰回京师，在灵帝面前诬陷卢植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①灵帝震怒，命令用槛车押送卢植回京问罪，另派东中郎将董卓赴冀州为官军统帅，继续进攻冀州黄巾军。董卓军事才能逊于卢植，指挥官军围攻张角两个多月，仍无战功。

八月，朝廷又将董卓调回抵罪，而将镇压颍川、东郡黄巾有功的皇甫嵩调往冀州战场。皇甫嵩部渡过黄河北上，投入了围攻广宗的作战。这时，张角病死，张梁统帅广宗义军，虽然张角之死给黄巾军造成很大损失，但守卫广宗的黄巾战士依然勇猛顽强，多次打退官军的进攻。"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②

强攻不下，狡猾的皇甫嵩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闭营休士，以观其变"③，并以此懈怠黄巾军的斗志。这样，一直相持到冬十月，黄巾军长期守城，精力疲惫，又见官军数易主帅，均不能破城，逐渐放松了戒备。皇甫嵩了解到这一情况，故伎重演，准备夜间偷袭黄巾军。在一天深夜，他悄悄部署兵力，将总攻时间定在常人易于困乏酣睡的"鸡鸣"之时。总攻发起后，官军突然冲入黄巾军阵营，黄巾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黎明时，广宗城破，张梁战死，3万黄巾军阵亡，另有5万多人不愿投降受辱，赴河而死，壮烈就义。

皇甫嵩破广宗城后，大肆烧杀掳掠，"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④，对死去的张角也不放过，"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⑤，以宣扬他的赫赫战绩。接着，皇甫嵩移兵北攻下曲阳。十一月，皇甫嵩军与巨鹿太守郭典的地方兵联合，在下曲阳

---

①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

②③④⑤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

与张宝率领的黄巾军展开激战，张宝军势孤力单，下曲阳失守，张宝和十多万起义军将士死于皇甫嵩等官军之手。冀州黄巾军失败。

广宗之战，冀州黄巾前仆后继、坚韧不拔，表现了农民阶级反抗东汉统治的宁死不屈的无畏精神。然而，张宝与张角、张梁分兵别屯，有互为呼应之势，却没有实际上的支援，反倒被官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本来，官军数易将帅，黄巾军可乘机里外夹击，再度汇合，转战他处。但张角、张梁和张宝分别死守两个相距并不算太近的据点，被动挨打，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自张角于中平元年二月起兵，到十一月张宝在下曲阳战败，黄巾军主力持续作战 9 个多月，颍川、南阳和冀州等地黄巾军，在汉廷周密的战略部署打击下，遭到沉重的失败。分散于其他地方的小规模的黄巾军，也在豪族地主武装的分割、围剿中失利。然而，战争并没有结束，黄巾军余部仍在各地坚持武装斗争，并趁着东汉朝廷更加虚弱，地方州郡势力膨胀、豪族地主武装割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将起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黄巾军余部的反抗战争

（一）黑山黄巾军的战争

张角等领导的黄巾军主力失败以后，东汉腐朽政权的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改弦更张，相反，官军和豪族地主武装，变本加厉地对农民进行疯狂的反扑和清算。“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①。因此，在中平二年（185 年）二月，即起义军主力军失败后的二三个月后，活跃在太行山区的黄巾军余部再度发动起义，史称“黑山军”。

《后汉书·朱儁传》载：“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

---

① 《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这些农民武装四处攻击官府，劫夺豪强，影响波及晋、冀、鲁、豫。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张牛角和飞燕的队伍。飞燕原姓褚、名燕，是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人，黄巾起义爆发时，他响应起义，“合聚少年为群盗，在山泽间转攻，还真定，众万余人”①。张牛角是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也受冀州黄巾起义影响，“起众，自号将兵从事”②，与褚燕联合作战，褚燕推张牛角为统帅，共同攻打癭陶（今河北柏乡东）。张牛角不幸为流矢所中，受了重伤，临终前，嘱告部众奉褚燕为统帅继续斗争。张牛角死后，褚燕为表示不负张牛角所托，以安部众，改姓张，称张燕，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张燕作战勇猛，“剽悍捷速过人，故军中号曰飞燕”③。

张燕由于英勇善战，在部众中威望很高，其势力日益强大。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地的各路农民军，纷纷接受张燕的领导，农民军的山区根据地互相串通、连成一片。一些小股农民军的首领，如孙轻、王当等，均率部投到张燕部下。张燕起义军人数多达百万之众，以黑山（今河南鹤壁市东）一带为活动中心，故号称“黑山军”，成为北方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

黑山军蓬勃发展，而汉廷经过黄巾起义主力的打击则更加虚弱，地方豪强、军阀与中央的离心力愈来愈强。汉廷已无力主动出兵镇压黑山军。史称：“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指黑山军）害。”④可见，张燕领导的起义军对东汉地方打击之猛烈。在斗争中，张燕还利用汉廷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

①③④《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

②《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张牛角”疑即《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中的“青牛角”。

他派人至京师表示归降，灵帝顺水推舟，拜张燕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①，黑山军另一支队伍的领袖杨凤，也被汉廷拜为“黑山校尉”，与张燕一起“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②，张燕、杨凤的诈降或受招安的策略，使农民军取得了扩张势力的主动权，他们在合法的外衣掩护下活动，“后遂弥漫，不可复数”③，兵锋渐渐逼近京师洛阳。在这种形势下，汉廷不得不命镇压颍川和南阳黄巾的刽子手朱儁为河内太守，堵截黑山军的进攻。由于朝廷已无法调遣官军，朱儁“将家兵击却之”④，才把张燕军打退。

地主豪强的家兵、部曲武装，是农民军更为凶险的敌人。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黑山军的于毒、白绕、眭固（即畦固）等10万余人进攻魏郡，行至东郡击败官军。曹操指挥豪强兵入东郡，在濮阳击败白绕部，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次年春，于毒、眭固等农民军进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屯兵顿丘（今河南濮阳北）的曹操趁机挥军进入山区，以“围魏救赵”之策，先偷袭了黑山军的根据地。于毒等闻讯，急忙从东武阳撤兵回救，曹操又设伏兵于途中邀击之，使眭固部遭到惨重损失。

初平四年（193年）三月，于毒部乘河北军阀混战之际，再次出兵攻打魏郡。此时，袁绍为冀州牧，执掌河北军政大权。魏郡发生兵变，和于毒军数万人联合攻克袁绍老窠邺城，杀死郡守，取得重大胜利。但起义军内部也出现了投机分子的背叛行动，投向袁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六月，袁绍经过一番准备，从斥丘（今河北成安东）出兵，直奔朝歌鹿肠山（今河南淇县南）苍岩谷口围攻于毒。于毒率部抵抗5日，战败。于毒及1万余名黑山军战士壮烈牺牲。此后，袁绍沿山北进、围剿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部，均连连得手，又残杀义军将士数万人，扫荡了黑山军在山区根据地所建立的

---

①④ 《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②③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

“屯壁”。黑山军外围被袁绍一一突破消灭后，袁绍开始进攻黑山军主力。张燕联合四营屠各和雁门乌桓与袁绍在常山郡激战十余日。张燕拥兵数万，还有精锐骑兵数千，来往冲突，付出了很大代价。袁绍军队也疲惫不堪，无力再战，被迫退兵。

其后，黑山军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一部分曾帮助袁术，被曹操败于匡亭；一部分被公孙瓒所利用，“陆梁冀州，横断（袁）绍后”①，等等。至建安十年（205 年）夏四月，张燕率黑山军 10 万多人投降了曹操。张白骑部则被军阀马腾部将庞德所击败，坚持斗争 20 年之久的黑山军农民战争全部结束。

（二）白波黄巾军的战争

黑山军在冀州等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极大地鼓舞着被官军打散的其他黄巾军余部。中平五年（188 年），各地黄巾军重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最早出现的一支号称白波黄巾。

中平五年二月，西河（治今山西离石）黄巾军余部在郭太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力量，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西）举行起义。俟后，白波军汲取前期黄巾固守城池而败亡的教训，展开了运动战，辗转于各地军阀的混战之间。他们北攻太原，南破河东，打得这些地区的豪族地主纷纷逃奔到三辅地区去避难，起义军在这一带有相当大的影响，人数也达到十余万。

随着东汉后期封建军阀的割据战争愈演愈烈，并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地农民起义被分割在各个封建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并同封建割据战争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农民起义战争带上了更为复杂的色彩，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形式。某一个农民军为了抵抗直接镇压他们的军阀武装，往往联合其他地主武装，作为自己摆脱困境或求得发展的策略，黑山军就是如此，白波军也有类似的情况。各个封建割据势力，一方面要竭力镇压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为了与其他军阀势力作地盘和人力上的争夺，又往往拉拢其他军阀势力范围内的农民

---

①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

军，作为其战略棋盘上的一着。

次年（189年）四月，灵帝死，汉廷一片混乱，白波军趁机南进，逼近黄河，威胁洛阳。董卓遣中郎将牛辅前往镇压，遭到白波军的迎头痛击，“不能却”①。白波黄巾又趁势与进入中原的匈奴南单于於扶罗联合，共同攻破太原、河内。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山东州郡组成讨伐董卓的军阀联军西攻洛阳，白波军也乘混乱之际攻东郡，董卓被迫西迁长安。董卓死后，部将李傕和郭汜在长安混战不已，至兴平二年（195年）七月，汉献帝东归洛阳，途中受到李傕、郭汜的追兵阻劫。护驾的兴义将军杨奉和安集将军董承等向白波军请求救援。当时郭太已死，白波军由韩暹、胡才、李乐统领，在河东一带活动。白波军答应了这一要求，与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②。可以看出此时白波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此后，白波军韩暹、胡才、李乐等部一路护驾至洛阳，途中与李傕等战，损失颇大，白波军基本上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

在白波军的尾声中，韩暹参与建安元年（196年）的汉廷诸将争权战争，出兵攻董承，获胜，因而夺得大将军、领司隶校尉之职，仍与董承“并留宿卫”③，企图控制献帝。但是，韩暹与董承矛盾日益尖锐，董承因为“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④，妨碍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暗中拉拢曹操作为外援。曹操依杖自己军事实力，到洛阳问韩暹等之罪，韩暹料势力不支，又与杨奉联合。曹操便趁机挟献帝至许下。为了夺回汉献帝作为政治资本，杨奉、韩暹曾在车驾出洛阳时引军追之，尚未追上，途中被曹操所设伏兵击溃，遂转投袁术。次年，韩暹在军阀混战之中势力日益缩小，仅剩千余骑，“欲归并州，为张宣所杀”⑤。胡才和李乐虽然留在河东，但也没有注意发展队伍，在坚持农民反抗斗争上未有建树。胡才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⑤《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

被怨家所害，李乐病死。一度声势浩大的白波黄巾军消失在军阀混战之中。

（三）青、徐黄巾军的战争

中平五年（188年）十月，在白波军起义后不久，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军也重新起义。这支起义军仍坚持奉行“汉行已尽、黄家当立”① 的太平道主张，趁董卓、袁绍、曹操争夺东汉政权而混战之机，在青、徐、兖、冀一带“寇郡县”②，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迅速，“处处飙起”③。

当时，青州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④，只想着跟随讨董卓的关东军阀同盟到京师争夺权利，忽视本州防务。初平元年（190年），黄巾军张饶约20万人，突然从冀州转攻青州，抓住军阀混战的薄弱环节，取得对青州作战的胜利。史载：“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焦）和务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黄巾遂广，屠裂城邑。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贼不得渡，祷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陈于前，巫祝不去于侧；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也。”⑤ 起义军在青州攻城略地，声威大振。

青州黄巾军在北海国活动最为频繁。北海相孔融为东汉名士，企图与黄巾军对抗，“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⑥。但在与张饶等黄巾军交锋中，狼狈败阵，只好收拾残兵败将，退守朱虚（今山东安丘西），在那里又纠集4万多受到黄巾军打击的官僚、豪强武装，“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⑦，重新强化封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③④ 《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

⑤ 《三国志》卷七《魏书》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⑦ 《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

建统治，但立足未稳，就受到黄巾军的猛烈攻击。于是，孔融折向西北逃至都昌（今山东昌邑西），又被管亥所率的青州黄巾军团团包围。孔融情急之中，只好派太史慈突围，到平原相刘备处求援。刘备派 3000 官军前往都昌，才将管亥部击散，为孔融解了黄巾之围。

初平二年（191 年），黄巾军 30 万人攻入太山郡界，被应劭堵截，双方多次交战，黄巾军失利，牺牲数千人，被俘万余人，损失辎重 2000 辆，“皆退却”①。于是，黄巾军又北渡黄河进入勃海郡，“欲与黑山合”②，行至东光（今河北东光东）以南，遭公孙瓒率精锐步骑 2 万人袭击，双方展开血战，黄巾军又损失 3 万余人，遗弃车重数万辆，撤退中，“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③黄巾军遭此挫折，蒙受重大损失。这期间，黄巾军受到各地豪强武装的联合镇压，公孙范曾“以勃海兵助（公孙）瓒，破青、徐黄巾”④，徐州刺史陶谦也对徐州黄巾军连连出击，“击黄巾，破走之”⑤。但黄巾军仍保有相当大的势力，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含家属）仍在这一带四处征战，然而，随着战争的破坏，生产凋敝，社会萧条，黄巾军只能“群辈相随，军无辎重”⑥，只靠兵员众多的“人海战术”，以重大牺牲为代价，挫败一些豪强武装，当然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次年（192 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国（治今山东东平东南）。兖州刺史刘岱不自量力，率兵镇压，被黄巾军所杀。济北相鲍信与州吏万潜等，遂请曹操入兖，领兖州牧。曹操领大军进入兖州后，立即在寿张（今山东东平南）向黄巾军挑战。曹操自率前锋步骑千余人“视行战地，卒抵贼营”⑦，

---

① 《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传》。

②③ 《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

④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

⑤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陶谦传》。

⑥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⑦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但因后军未至，被黄巾军包围，曹操与黄巾军仓促接战，大败而走，在突围中，鲍信战死。黄巾军乘胜追击，又将曹操全军围困。曹军多由缺乏训练的新兵组成，而黄巾军数经大战胜利，兵皆精悍，士气高昂，使曹军不敢出垒迎战。曹操为济南相时曾毁淫祠，黄巾军认为他的政治主张与太平道一致，便发出劝降书，希望曹操顺应“天之大运”，与黄巾军共建“太平”的“黄家”政权，因而没有乘胜进攻。曹操得取喘息之机，“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击讨”，又“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①。曹操反败为胜，追击黄巾至济北（治今山东长清南），黄巾军饥寒交迫，无力反击，遂以保持独立编制为条件，降附曹操。是年冬，曹操将归附的黄巾军 30 余万人及其家属百余万口称作“青州兵”，从此，其实力大增，并依靠青州兵的力量，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四）其他各地起义军的反抗战争

黄巾大起义以后，除了黑山、白波、青徐等农民军以黄巾主力余部为主要成员以外，以黄巾名义再次起义的农民武装还有许多，他们虽然势力不及几十万或上百万，但也有几万人之多，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形势中，成为打击豪强、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力量。其中，以益州黄巾军和汝南葛陂黄巾军较具代表性。

中平五年（188 年）六月，益州马相、赵祗以黄巾为号发动起义。他们聚众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起义，攻克县城，杀死了县令李升。接着召集疲于徭役的当地贫苦农民参加起义，一二日内得数千人，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之后，遣王饶、赵播等率领一支人马攻打雒城（今四川广汉），杀了刺史郗俭。这时，起义军领袖马相自称“天子”，公开了建立政权的要求。起义军向邻近的蜀郡、犍为发展，“旬月之间，破坏三郡（蜀郡、犍为和广汉）”②。起义军人数已在 10 万人以上，然后，马相遣兵东向进攻巴郡，也取

---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得胜利，杀郡守赵韪（一作赵部），势力波及了益州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对益州豪强震撼颇大，西南少数民族也举兵响应，投入反抗斗争。《后汉书·南蛮传》："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战争和益州黄巾军起义，成为益州当时最激烈的战事。由于益州黄巾军的迅速进攻，一时占地太广、战线太长，相对而言，兵力分散，又未及时补充。主力攻入巴郡后，马相在犍为屯驻，力量比较单薄，州从事贾龙当时有兵数百驻扎在犍为，便以此为中坚力量，"遂纠合吏人攻（马）相，破之"①。马相失败后，益州黄巾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没有了统一的指挥，很快被益州的豪强武装一一击败，被镇压下去了。

中平五年四月，在汝南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一带的黄巾军余部再度集结起义，"攻没郡县"②，并打败了前来镇压起义的西园下军校尉鲍鸿。葛陂黄巾军分成许多部，各部之间并无统属联系，不能视作一个整体。他们也是家属随军，亦兵亦农，在割据范围内开展生产，积累了大批的耕牛和农具，成为坚持斗争的基础。到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③，此外还有龚都、吴霸等部。其势不比黑山、白波及青徐黄巾稍弱。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中，他们为了保障自己一块相对安定的地盘，发展生产，避免四处流徙的命运，采取了"初应袁术，又附孙坚"④的策略，这就不可避免与曹操相对抗。是年二月，曹操进兵，刘辟、黄邵等部与曹操作战失败，何仪等部则归降，龚都等部也在战争中溃散，或为豪强武装所吞并。建安五年（200年），一部分归附曹操的黄巾军曾再次起义，也被镇压。

从中平五年（188年）到建安前期，黄巾军余部的再度起义，从规模、范围和时间来看，均远远超过了中平元年（184年）的黄

---

①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②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③④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巾军主力大起义。而且，有的起义队伍仍然坚持太平道的“黄天”理想。在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演变为军阀混战的特定条件下，黄巾农民战争也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过去固守一城一地的死打硬拼，发展到流动作战，或在较广大的地区，利用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矛盾，进行山区、乡野的武装割据，农战结合，坚持斗争。这表明，黄巾军在反对封建豪强的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汲取教训，探索着通过武装斗争打击豪强、争取生存的道路。

四、黄巾农民战争的特点、教训和历史作用

（一）战争的特点

第一，黄巾农民战争是经过长期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的全国性战争。黄巾起义利用太平道作为思想武器，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反对东汉统治的战争，用宗教的语言描绘“太平”世界的理想，对农民起义的发动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在整个古代战争史上，这也是一个创举。尽管过去的一些战争发动者，也采用占卜、谶纬，或者像陈胜、吴广那样，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来作战争的思想动员，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些原始的迷信活动而不具有宗教思想，只是为一时的需要，而不能适应全局性的战争动员。利用宗教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比较适宜作长时期、大范围的准备而不被统治阶级所注意的一种较好形式，正因如此，当太平道在社会上发展了大批势力，对东汉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统治集团中已有人对此发出警告时，东汉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却“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①，不加禁止，因而起义的宣传组织工作得以较顺利地开展。同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虽然是使用宗教语言，套用五行谶纬之说，但是，对广大参加起义的农民

---

①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灵帝光和六年。

来说，“苍天”和“黄天”所指，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以此作为政治口号，发动战争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推翻“气数”已尽的汉家皇朝，建立农民理想中的太平“黄天”，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对团结和组织群众参加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黄巾农民战争是一场空前浩大的流民武装暴动。从参加黄巾起义的成分来看，无论是前期黄巾军的主力，抑或后期黄巾军余部各支队伍，都是以流民为主体的。在黄巾大起义爆发的前几年，杨赐等就曾提到太平道与各州郡流民的关系，希望朝廷让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大起义爆发时，“八州之民，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①，补充起义军队伍的，主要也是流民。这些流民原来大多是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因不堪官府的头会箕敛，或土地已为豪强所兼并，不得已背井离乡四处流徙。他们的生活状况极端悲惨，已陷入难以忍受的绝境。为生计所迫，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自然而然地投身于反抗东汉残暴、腐朽统治的战争之中。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以后，军阀混战又造成了更为广大的流民队伍，“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虽四关设禁，重加刑戮，犹不绝息”②，“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③。流民或投身于豪族大姓，以充其佃客、徒附和部曲，更多的则聚众自保，组成武装的流民集团，试图在战争中，争取重新获得自己一小块土地作为生存的依托。流民多是举家流徙，参加黄巾军便是全家同行，即所谓“群辈相随”。即使不以黄巾的名义而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也多半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组织起来，共同反抗东汉官府和豪强的统治。如“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为寇害”④，“东牟人王营，众三千余家，胁昌阳县为

---

①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汉纪五十，光和六年。

②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

③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邢颙传》注引《吴书》。

④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何夔传》。

乱"①，广陵"海贼薛州之群，万有余户"②，等等。流民队伍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而深刻所造成的，反过来又对社会统治造成极大的压力。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集团，认识到这一矛盾，善于组织和运用这一力量，才发动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可以说，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流民暴动。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强大威力和斗争精神。黄巾起义不仅有长时期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还制定了较为周密的"内外俱起"的暴动计划。当时，东汉王朝的统治虽然因内部矛盾、社会问题而有很大的削弱，但它仍然把持着政权，还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从东汉后期以来，若干次大大小小的反抗和起义，都因未能聚集较大的力量，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归于失败。张角针对这一历史教训，拟定了大规模起义的计划，并在军事上作了一定的部署，动员了大量群众参加。据粗略估计，前后起义的各支黄巾军总人数当在数百万以上，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力量，又经过长期的积蓄，然后突然在数州并起，使这次起义一开始就释放出农民潜在的巨大革命能量，像一股决堤而下的洪流，给封建政权突如其来的猛烈冲击，并取得了初期斗争的胜利。这样规模巨大的在各地组织同时暴动的战争局面，也是史无前例的。面对东汉朝廷和地方豪强的疯狂反扑，黄巾军主力能够坚持 9 个月，连同后期余部的斗争则坚持了近 20 年之久，"父兄歼殪，子弟群起"③，充分说明了黄巾军将士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许多起义军将士在战争失败时宁死不屈，甚至有数万人集体投河自尽，表现了与东汉誓不两立的崇高气节。

第四，黄巾农民战争具有显著的分散性、起伏性特点。黄巾起义虽然汇聚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迸发，但黄巾农民战争则始

---

①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何夔传》。

② 《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张邈传》附《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③ 《三国志》卷八《魏书》八《陶谦传》注引《吴书》。

终分散在几个地区进行，各部黄巾军实际上也处在独立的状态之中。起义开始时，太平道有统一的行动计划，但由于唐周叛变，使起义提前发动，仓促之间，起义军即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这固然有东汉官军和豪强武装迅速反扑的客观原因，但也是由于参加义军的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农民简单再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战争往往也显现出分散性特点。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一城一地之得失，是本部人马的进退和存亡，而缺乏全局的、战略的远见。所以，在战争过程中，三支黄巾军主力，基本上没有战略上的主动策应，从而被官军各个击破。后期黄巾军再度发动起义后，竟有几十支部队，除极少数联合以外，大多都是分散作战。这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战争的形式，带来了起伏性的特点。

第五，黄巾农民战争逐渐探索、发展了耕战结合的农民斗争形式。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来支持。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农民战争，一开始只能是靠剥夺地主阶级的财富作为军资给养，即地主阶级所谓的“军无辎重，唯以钞暴为资”①。随着战争的发展，后期黄巾军在继续剥夺地主阶级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创造条件，努力从事生产，解决军需和家属的生活供应问题。农民军利用山险建立起根据地，修筑壁垒等军事工事作为屏障，在封建军阀割据的环境中，建立农民的割据区域，屯聚结固，形成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大量的随军家属有条件在根据地内进行生产，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记载，许褚因为军中缺粮，乃“伪与贼和，以牛与贼易食”。农民军显然需要的是从事生产的耕牛。他们既有粮食去交易，又说明这支农民军根据地生产的粮食自给而有余。袁绍以董昭领魏郡太守，“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②。可见，这里的农民军利用与军阀势力暂时对峙并存的局面，在根据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记》。

② 《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地发展生产，拥有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物资。后期黄巾军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根据地内实行耕战结合，这是起义军能够较长时间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黄巾农民战争虽然声势浩大、波澜壮阔，但最终被东汉地主阶级所镇压。黄巾军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即使农民革命一时成功，农民阶级也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农民起义或者最终被地主阶级所镇压，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而告结束。黄巾军和其他一切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一样，不能违背这一历史必然规律。除此以外，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总结。

第一，东汉地主阶级还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朝廷腐朽、官吏腐败，封建国家的力量比过去大为削弱，但还不到一触即溃的地步，它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调动整个阶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起义军实行全面的镇压。尤其是东汉豪族地主这一阶层的力量空前强盛。在农民阶级武装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皇权和豪族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的妥协，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的斗争也可以暂时缓和，统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农民起义。这样，当灵帝宣布大赦党人之后，豪族地主、官僚士绅就成为东汉王朝的坚强支柱，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力量，比农民起义以前反而异常强化起来。如皇甫嵩、朱儁、卢植等豪族出身的将帅，纷纷率官兵镇压黄巾军，为朝廷效力，地方上的一些豪族地主也都依托自己的坞堡、壁垒，招募部曲家兵，与黄巾军为敌。就连豪族地主庄园里的佃客、徒附等依附农民，也在豪族势力的裹胁之下，成为黄巾军对立面。在政治上，黄巾起义受到东汉地主阶级全方位的压制，他们的力量还没有超过统治阶级。黄巾农民战争最终以黄巾军敌不过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告失败。

第二，黄巾军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准备和经验，是失败的主

要教训。

其一，太平道首领张角等为发动起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也制定了“内外俱起”，“八州并发”的暴动计划，并进行了部署。但没有看到更多的军事准备的迹象。张角等领袖的活动主要是行医传道，不可能对组织起来的教徒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也不可能收集大批武器武装徒众。在军事方面，黄巾军显然远远落后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官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大起义初期作战的胜利，主要是靠数州并发的暴动冲击波，震撼得东汉政权手足无措，州郡官吏纷纷溃逃。当统治集团从慌乱中镇定下来，派官军与之对阵作战时，黄巾军将士虽然英勇顽强，但大多缺乏战阵经验，取胜的战役并不太多，相反，官军仅以少量精锐之师，便可击败众多兵员的黄巾军。

其二，由于缺乏足够的军事准备和经验，黄巾军统帅在发动起义以后缺乏明确的战略策划。虽然黄巾军三大主力从北至南、由东向西构成了对东汉统治中心洛阳三面环攻的态势，但是，如何集结起义力量，起义力量向何处发展，怎样对付东汉军队的围剿等等战略问题，均看不出有积极的相应对策。起义军始终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缺乏战略上的配合。而东汉朝廷则制定了由重点进攻到全面进攻的战略计划，并派出了在洛阳地区控制着的相当数量的常备军，在各地豪强武装配合下，迅速集中兵力进行重点镇压。而起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力量尚未来得及集中，就被迫同敌人主力作战，以分散的力量对付已经集中的敌人，陷入被动地位是必然的。后期黄巾军分散性的特点更为明显，各地起义军没有统一的指挥，虽然有的起义军进行过联合、互相支援，但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起义军也不可能形成整体的战略配合，因而被地主阶级武装各个击破。

其三，在战术上，起义军将领不具备应有的谋略和运筹。起义爆发时，战争是以攻打州郡城池为目标，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内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这固然无可非议。但当遇到坚城之时，特别是敌人集中力量开始镇压的时候，仍继续攻

坚则是很失策的。如颍川黄巾军先进攻长社、后据守阳翟，南阳黄巾军反复争夺宛城，都给自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即使夺取城池后，又以守城作为与官军作战的主要形式，就更是被动挨打。如南阳黄巾军守宛城，冀州黄巾军守广宗和下曲阳，始终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几十万军队既难以回旋，也不容易发挥战斗力，无法摆脱困境，失城就等于失败，可见黄巾军将领不仅缺乏正确的战略指导，在战术指挥上也是十分笨拙的，缺乏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只知道和敌人主力死打硬拼，不懂得避实击虚。而皇甫嵩、朱儁等能征善战的东汉将领略施诡计，即可使黄巾军露出破绽。波才的依草结营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这些都反映出黄巾军将领不具备应有的军事素质，黄巾起义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了。后期黄巾军部分地汲取了这些教训，主要在山区流动作战，有的还建立根据地作依托，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一些策略上的灵活性，因而坚持了较长的时间。

军事准备不足，是历史上“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难以避免的通病，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制，这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的失败还有一些具体的难以克服的或难以预料的因素。例如：在内部出现叛徒，向朝廷告密，致使仓促起事，暴动计划不能完全实现，尤其是太平道势力在京师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没能发动京师暴动。这使得东汉统治集团能够安然地坐镇于京城，调度全国的力量，对黄巾军围歼追杀。在黄巾军与官军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黄巾军的最高统帅张角的突然病逝，给起义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削弱了黄巾军的领导和指挥。以流民为主体的黄巾军中，存在着大量非战斗人员的成分，老弱妇孺皆是黄巾军将士的家属，无依无靠、举家而迁的客观现实，使他们不可能脱离战斗队伍，否则，不毙命于荒野沟壑，便要丧生在东汉地主、军阀的屠刀之下。黄巾军的庞杂，是其难以施展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这些因素，导致了黄巾农民战争最终的失败。

（三）黄巾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黄巾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组织最好的一次农民战争。虽然由于历史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和起义军本身存在着的弱点，这次农民战争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仍然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缓慢地进步，历史作用应予以充分地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黄巾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豪族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在历时 20 余年的战争中，东汉过去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诸王，不是被义军杀死，就是在义军打击下望风逃窜。见于记载的，除了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被捉以外，刘氏宗亲被黄巾军镇压的还有刘忠之子和济南王刘赟等。下邳愍王刘意、淮阳王刘暠、彭城王刘昌等人，在黄巾军刀锋面前，则失魂落魄地逃离封国，有的丢掉了贵族特权，有的虽然勉强保住王侯的尊位，但也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和锦衣玉食的富贵。到建安初，东汉王侯"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①，贵族统治秩序完全给破坏了。战争对豪强大族的摧毁力量也是巨大的，不少地主田庄被冲垮，难以自保的豪族举宗远徙。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廓睹尘而溃。"其中主要是豪强大族躲避农民战争的锋芒而仓皇离开世居之地。如徐州黄巾军攻北海，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②。北海管宁、太原王烈则避乱辽东，管宁在辽东住了 37 年，到魏文帝曹丕时才得回归乡里。逃到交州的有汝南许靖、陈郡袁徽、沛郡薛综，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临淮鲁肃、陈留濮阳兴、义阳韩嵩、平原刘惇等，逃到荆州的有河内司马芝、颍川杜袭和赵俨、河东裴潜、琅邪诸葛亮等。这些地主豪富抛弃产业，远走他乡，不少人

① 《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

②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崔琰传》。

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世家大族的分崩离析，显然有利于以后阶级矛盾的缓和。

第二，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后期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得到暂时停滞，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由于黄巾农民战争消灭了一批贵族、豪族，另外一些地主则流落他乡，离开了原来土地集中最严重的中原地区。战争的打击，使这里出现了大量无主的土地，为生产关系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司马朗曾向曹操建议："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① 恢复"井田制"的建议，固然是不可行的，但也说明，统治阶级也认识到目前是调整土地关系的极好的时机。具有远见的曹操不失时机地将所控制的农民和兵卒投之于土地，用屯田的形式来发展生产，使原来失去土地的流民，重新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北方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封建生产关系也得到了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进步。同时，经过黄巾农民战争的冲击，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也有所减轻。曹魏时期的屯田实行分成租，屯田农民全部免除了徭役，有利于其生产积极性发挥；魏晋时则以世兵制代替了征兵制，除了军户以外，其他农民又免除了兵役负担。封建国家对大多数依附农民的直接人身束缚大大削弱，社会上存在的奴婢进一步获得解放。这些都是黄巾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第三，黄巾农民战争使东汉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名存实亡。东汉朝廷到桓、灵之世，已经非常腐朽。豪族地主田庄的迅速膨胀，造成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巨大离心力，从而形成了封建豪族割据、军阀混战的经济基础。外戚和宦官等反动腐朽势力交替把持的中央政权，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桎梏。不摧毁这一政治形式，历史就难以前进。黄巾大起义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直指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在黄巾军等农民武装的反复剧烈冲击下，东汉的政治、军事力量受到一连串的撞击而大大削弱，呈现出四分

---

①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

五裂的局面。东汉末年出现的军阀混战局面，主要应该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之中，去探寻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黄巾农民战争也确实给了一部分豪族地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更加迅速发展的机会，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的机会，逐步控制了州郡的政治大权，发展了个人的武装，取代了东汉王朝在地方上的统治，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有的进而觊觎全国最高统治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的统治虽然在形式上还延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已被各个割据的军阀集团所取代，所以，后来汉献帝的退位仅仅是一个形式，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第三节　东汉的崩溃

一、黄巾起义失败后的政治形势

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东汉朝廷也面临分崩瓦解之势。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中，东汉统治者不得不赋予地方官吏、豪强以更多的权力；同时，地方官吏和豪族地主逐渐认识到朝廷式微之不可逆转，纷纷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准备参加中原逐鹿，一决雌雄。所以，从黄巾起义到董卓入京前的短短数年之中，地方州郡牧守的权力恶性膨胀，逐渐形成了豪族地主武装割据的政治形势。

东汉后期，州由中央派出的地方监察机构，逐渐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域。刺史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郡、县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对上执行中央的政令，对下监督所属各县，举凡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及兵事等无所不统，也具有较大的行政权力。诸侯王国相的地位、权力与郡守相当。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长官和豪族地主都趁机发展了自己控制的权力和武装，对中央朝廷而言，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汉却在中平五年（188

年）“改刺史，新置牧”①。这一举措系刘焉所建议。“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请选重臣，以居其任。”② 州牧的设立，反映了东汉豪族地主集团对中央的离心力进一步扩大，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首先，州郡牧守攫取了地方人事权。他们纷纷荐举自己的亲属、亲信，以此培植私人势力，甚至自置郡县守令等朝廷命官，而不须经过荐举手续，上报朝廷任命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其次，州郡牧守攫取了地方的财政权。他们以组织武装抵抗农民军为借口，擅自将应上缴的赋税截留，以充军费，弥补朝廷支拨之不足，致使“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③，甚至在朝廷赋税之外，“复增私调”④，归州郡牧守自己所有和支配。财政权的扩张是地方牧守形成军阀割据的基础。其三，州郡牧守攫取了地方拥兵权。过去，郡守虽掌地方军政，但不得擅自募兵、发兵和领兵。农民战争爆发后，朝廷派兵镇压不力，地方兵平时体制远不能适应战时之需，许多地方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为此，许多州郡牧守都成为当地官军领兵作战的统帅，以对付突如其来的农民暴动。朝廷也被迫允许他们随时调动军队并亲自率领军队。随着战争的持续，军队统帅、将领和士兵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君臣关系。朝廷军队成为依附性极强的私人武装，它与豪族的私家部曲一起，成为军阀割据的工具。

州郡牧守通过攫取地方的人事权、财政权和拥兵权，瓜分了东汉政权在地方上的统治。他们名义上仍是汉臣，实已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州郡变成了互不相统的独立王国。他们不仅力图摆脱中央的控制，并且试图控制中央，夺取天下。中平四年（187

---

①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③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④ 《后汉书》卷八十七《宦者》《张让传》。

年），前中山相张纯与前太山太守张举就联合乌桓势力起兵，"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①。东汉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朝廷内外交困，已无挽回大厦将倾的颓势。中平五年（188年）八月，东汉政权试图重新收回兵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宦官蹇硕任上校军尉，以四世三公家族出身的袁绍任中军校尉，作为全军的正、副统帅；灵帝自称"无上将军"，作为最高统帅，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制于这一军事统帅中心。然而，西园八校尉对全国军队而言，仍同虚设，各地兵权仍由州郡牧守所控制，并没有起到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同时，朝廷内宦官、外戚和士大夫官僚之间的斗争又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中央权力的稳固。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后，何进便联合袁绍兄弟火并了蹇硕，立少帝刘辩，不久，何进又被宦官所杀，政权遂落入地方实力派董卓手中，从此揭开了军阀大混战的序幕。

二、军阀混战和三国局面的初步形成

中平末年的宦官、外戚集团的互相残杀，使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戚宦争权宣告结束，宦官、外戚集团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大军阀董卓专擅朝政。

董卓趁何进、袁绍召地方军队进京消灭宦官之机，举兵在北芒山（洛阳东北）"奉迎"汉少帝，逐渐控制了洛阳的局势。然后，他利用所掌握的兵权，胁迫百官众卿废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自任太尉，旋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②，权

①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倾当朝。董卓放纵部下在洛阳烧杀劫掠，对朝廷百官也是顺者昌、逆者亡，稍有忤逆，就滥施酷刑，置之死地而后快，“群僚内外莫能自固”①。董卓的暴虐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初平元年（190 年），各地的州郡牧守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争夺地盘、掠取权势。由于起兵的州郡都在关东（潼关以东），所以史称“关东军”。

关东军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纠集了许多豪强武装，从北、东、西三面来包围洛阳。一时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②，讨董战争声势浩大，给董卓造成一股强烈的威胁。此时，黄巾军余部白波黄巾正向今山西临汾境内集结，众至 10 万，有南渡黄河侧击洛阳后背的动向。董卓自知不得人心，又为避免两线作战，于是，于二月强行迁都，徙洛阳数百万口随驾西行至长安，并纵火将洛阳焚毁为一片废墟，企图以“焦土政策”来抵御关东军的进攻。

关东军讨董声势虽大，但内部利益并不一致，州郡牧守和各路豪强各有各的打算，谁都不愿与董卓决战，而是各守其阵，静观其变。董卓是极为残忍的军阀。在他挟汉献帝由洛阳西迁长安时，沿途以杀人为乐，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到长安后，又继续大肆聚敛，疯狂掠夺，“淫乐纵恣”，为保全自己，“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③。社会极度动荡，董卓集团内部矛盾也异常尖锐。初平三年（192 年），董卓部将吕布与司徒王允合谋，将董卓杀死，而后，王允又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所杀，关中大乱。

董卓死后，关东讨董联军并未就此偃兵息鼓，而是更进一步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混战。在战争频仍的地区，大批无辜的人民被战火吞噬了生命，杀人成性的军阀更视百姓为草芥，随意屠杀，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损失。如曹操在攻陷彭城时，就

---

①③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② 《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注引《典论》帝《自叙》。

曾“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①。涿郡原有居民十万余户，鄢陵县有五六万户，兵祸以后，前者还剩3000户，后者仅存数百户。辽阔的中原地区、富庶的黄河流域，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当时人仲长统就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②

经过几年的混战、兼并，到建安四年（199年），全国较大的军事割据集团便只剩占据江东（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策，占据荆州（今两湖地区）的刘表、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川和云南北部地区）的刘璋，占据凉州（今甘肃）的马腾、韩遂，占据辽东（今辽宁一带）的公孙度和占据中原地区的曹操、袁绍等。其中，袁绍占据冀、青、并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地盘最大。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曾收编黄巾降卒30余万，男女百万余口为“青州兵”，又于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都于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加上采用屯田的办法，解决了军粮问题，使得其势力足以与袁绍集团直接抗衡。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展开决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兵力虽然不及袁绍，但赏罚分明，唯才是举，比袁绍得人心。他又充分发挥了军事才能，利用袁军被暴露的屯粮之所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杀守将淳于琼，焚掉袁军粮草万余车。为此，袁军军心摇荡，士无斗志，终于全线崩溃，大将张郃又在前线投降曹操，袁绍仅带亲兵800余名逃回河北，其余7万多袁军士兵，全被曹操坑杀。官渡之战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官渡之战后二年，袁绍忧愤而死。其子袁谭、袁尚争位，互相火并。在几年之中，曹操攻下邺城，杀袁谭和袁绍外甥并州刺史高幹，驱逐袁尚，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袁尚投奔乌桓

---

① 《三国志》卷十《魏书》十《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王蹋顿，图谋再起。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率大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穿过500里山路，向蹋顿盘踞的柳城（今辽宁朝阳）进发。蹋顿、袁尚率数万骑兵迎战，在白狼山下的凡城（今辽宁平泉县境），曹操大破蹋顿和袁氏的联军，斩蹋顿，降服乌桓、汉人20余万口。袁尚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南起淮汉北至长城的广大北方地区。

曹操统一北方后，想乘胜统一全国。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兵锋直指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企图占领荆州后，一举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但曹军还未抵达荆州，形势就急骤地发生了变化。刘表突然病死，少子刘琮代立，向曹操请降。而刘备则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决心联络江东的孙权与曹操对抗。孙权为孙策之弟，在公元200年孙策死后便袭领东吴。他善于团结部下，在其属下聚集了一批谋士和武将。经过多年的开发和苦心经营，江东的经济也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有与之联合抵御曹军南下的基础。但江东集团内部面对曹军南下，分为两派，以张昭为代表的文臣主张投降，以鲁肃、周瑜为代表的武将主张抵抗。这时，诸葛亮来到柴桑（今江西九江），与主战派一起给孙权分析了抵御曹军的有利形势，孙权才断然定下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决心。

是年冬，曹操率水陆军由江陵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于是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约有20余万人，而孙、刘联军仅5万人，从数量上说，曹操占绝对优势。然而，曹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北方将士又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疫疾流行，更不习舟楫水战。刘琮新降，荆州人心不定，而韩遂、马腾盘踞西北，使曹有后顾之忧。加上曹操离后方较远，补给困难，却胜兵南指，骄傲轻敌，实际上暴露了曹军诸多弱点和不利因素。与此相反，孙、刘联军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它以逸待劳，用长击短，士气旺盛，补给容易，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双方在赤壁相遇后，曹军便初战失利，退驻江北乌林安扎水寨，并将船舰首尾相连，以免除北方军士受波浪颠簸之苦。东吴趁机派将领黄盖向曹操诈降，率载

满浇注膏油干柴的蒙冲斗舰数十艘，趁东南风骤起之势，急驶向曹营水寨。舰行至曹军不远，即放火直撞入曹军。顿时，曹军舰船燃起熊熊烈焰，同时延烧到岸上的曹军营垒。曹军大乱，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孙、刘联军水陆并进，曹操无力再战，率残兵夺路逃回江陵。

曹操赤壁之败，知道一时难以消灭孙、刘，便暂时放弃了南下东进的企图，对孙、刘开始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在南面，他放弃江陵，把战线收缩在襄阳、樊城一带；在东南面，他又放弃了皖城（今安徽潜山），把战线收缩在合肥一带。同时，曹操致力于整顿内部，巩固后方。建安十六年（211 年），曹操进军关中，经过近半年时间，平定了关中的割据势力。韩遂及马腾之子马超逃往凉州。曹操又继续进军凉州，韩遂被部下所杀，马超失败后投奔刘备，凉州也归曹操所有。建安二十年（215 年），曹操进攻汉中，在汉中割据的张鲁战败投降。曹操势力占据了大半个中国。

赤壁之战后，刘备乘机占领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势力获得很大的发展。随后又向孙权借得南郡，占有荆州大部，并向益州发展。建安十六年（211 年）至十九年，刘备打败刘璋，占领了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同时，刘备部将关羽在荆州进攻襄樊，大败曹操守军，威震北方。孙权在江东的地位也因赤壁之战的胜利而得到进一步地巩固。于是他一面同曹操争夺荆州和江淮地区，一面又派人招抚了占据广、交（两广及越南北部）的士燮兄弟，收服了岭南。关羽在荆州的发展，引起了孙权的不安，于是他派吕蒙袭杀了关羽，把刘备的势力完全逐出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三、东汉的灭亡

从黄巾起义主力失败以后，东汉皇帝就已经成为董卓、曹操所操纵的傀儡。尤其是董卓之乱以后，天下纷争，四分五裂，东汉王朝更是名存而实亡。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各军阀集

团所占有的地盘来看，统一的政权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当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就轻易地废掉汉献帝，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魏，都洛阳。刘氏家族的东汉王朝 200 余年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东汉灭亡后，刘备、孙权也先后称帝。

次年，刘备在蜀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史称蜀或蜀汉。公元 222 年，刘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以倾国之师东攻孙权，想夺回荆州。双方战于夷陵猇亭（今湖北宜昌东南，宜都北）。刘备战败，几乎全军覆没，狼狈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不久，刘备死，子刘禅即位，诸葛亮辅政，仍奉行东结孙吴、北抗曹魏的政策。公元 222 年，孙权称吴王，229 年，正式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三国鼎立相持了 40 余年。

第九章　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

东汉的军事思想与西汉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与同时期其他学科相比，亦显得较为落后。就兵书著述而言，民国陆达节在《中国历代兵书目录》中，虽然辑录了东汉兵书 9 部，然均因其影响较小而未能传世，数量上也远较其他朝代为少。究其原因，一是与东汉王朝的治国指导思想有关。刘秀统一天下后，确定了“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主张“偃武修文”，故军事思想未曾引起足够重视。二是谶纬神学的影响。自刘秀晚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这种神秘哲学更笼罩了整个思想界，多少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东汉时期的军事思想学科步履维艰，陷入了一个低谷。但是，军事思想是军事实践的产物，从东汉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及其他战争中，仍可发现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军事思想，如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等，均有借鉴意义。王符《潜夫论》中关于择将任将、实边固防等思想，亦不乏光彩之论。此外，一些杰出军事家和优秀将帅的运筹决策思想、统兵治军观念及战役指挥艺术，亦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军事发展水平，具有科学探讨的价值。

第一节　东汉军事思想概述

一、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

东汉时期关于重视战争准备的思想，虽然在理论方面缺乏完整、系统的学说，只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针对安、顺

以降战备松懈的状况，提出过“明修守御之备”的主张（详见本章第二节），但从东汉前期光武帝刘秀等人在对待民族冲突，尤其是为解决匈奴南扰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上，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战备问题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换言之，东汉前期在进行民族战争时，充分注意了综合国力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把边防建设与政治、经济的整顿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全方位地作好从事一切战争的准备。这在秦汉时期是颇具典型的。

东汉明帝、和帝时期对北匈奴战争的胜利以及最终灭亡北匈奴，固然与窦固、窦宪、耿秉等人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但究其根本原因，应是东汉王朝长期重视战争准备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战争中，汉朝的作战对象匈奴，是秦汉时期具有强劲战争活力的北方游牧民族。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欲以雄厚的国力基础彻底制服匈奴，虽然取得过多次反击战争的辉煌胜利，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匈奴的南扰，捍卫了北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因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汉高祖在结束楚汉战争后不久，即以胜利之师北伐匈奴，却招致了兵困平城的屈辱结果。而这一切均是东汉王朝的前车之鉴，尤其是汉高祖击匈奴失败的教训，对处境、条件与其相似的刘秀感触更深。刘秀的战略思想本来就体现了一个“稳”字，所谓“量时度力，举无过事”①，凡事策划周详，三思而后行，从不做胸无把握或力所不及的事，力求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从他在统一战争期间的战略决策及战役指挥上看得很清楚。所以，当全国统一后匈奴南下问题日益严重时，他并不急于兴师北伐，“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而是全力安内，就连西域诸王再三请派都护，都一律予以谢绝。

表面上看，东汉初年刘秀在对待匈奴问题上采取的是一条消极防守的政策，对匈奴南下容忍放纵，实质上刘秀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所作所为，正是针对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因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而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

刘秀深知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当时的汉王朝刚从战火中摆脱出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①，客观上综合实力不足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主观上民心厌战，渴望休养生息。若不顾一切，急于求成，必将重蹈汉高祖覆辙。所以当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等人请求联合高句骊、鲜卑、乌桓等族共击北匈奴时，刘秀的回答是："……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② 由此观之，刘秀并非不想一举"以灭大寇"，而是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息边养民，充实国力，等待时机，为汉匈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作长期、充分的准备，乃是根本大计。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东汉王朝自统一天下至永平十五年，致力于整顿政治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统一政权。而对周边民族的袭扰以及地方上的叛乱，则充分注意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如对交趾"二征"及武陵蛮的叛乱，因其直接影响地方建设和社会安定，且力所能及，故坚决予以镇压；但面对实力强大又远居塞外的匈奴的南扰，则因国力不足，无法在短期内将其制服，而采取屯兵防守，静观其变的策略，作长远的战略准备。由于东汉王朝采取了息边养民的政策，国力逐渐得到恢复。至永平十六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国家殷实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具备了相当雄厚强劲的战争潜力；同时，随着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打击北匈奴策略的实现，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出击北匈奴的一切准备。所以，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规模虽不如汉武帝时期，但却基本消除了因匈奴而引起的、持续几百年的边患，这一结局无疑是与汉朝决策者高度重视战争准备密切相关的。

---

①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② 《后汉书》卷十八《臧宫传》。

两汉初年刘邦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十分相似，都是从农民战争中崛起，通过统一战争建立政权、夺取天下。但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因指导思想不同，刘邦急于求成，国力不足而轻举妄动；刘秀“量时度力”，作长远准备，因而导致两种结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证实了先秦思想家反复强调的“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① 的战争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

纵观东汉前期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不难发现，汉王朝运用较多且卓有成效的一项基本策略，便是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作为东汉持续几代的重要策略，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刘秀略地河北时，势孤力单，白手起家，要想在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谋求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各股势力之间相互为敌的客观条件，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争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势力，以达到壮大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的目的。刘秀具有审时度势、统观全局的战略头脑，擅长政治攻心战术，又善于集思广益，采纳正确意见，因而具备运用这一策略的心理素质和客观优势。形势的压迫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使刘秀初步形成了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这一思想在东汉统一战争及对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王郎对峙时，刘秀的实力远不如王郎，但刘秀采取的策略远比王郎高明，政治上“延揽英雄”，组成了一支精明强干的领导班底；“务悦民心”，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军事上区分敌友，确定争取联合的对象和主要打击的目标，联合多数，造成我众敌寡的态势。所以，王郎虽曾盛极一时，但在刘秀联合信都任光、和戎邳彤、上谷耿况和渔阳彭宠的强大攻击下，迅速土崩

---

①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瓦解。

对刘秀来说，联合只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策略，联合的对象随时间、空间和形势的变化，可能成为永久的部属，也可能就是下一个打击的主要敌人。刘秀联陇和联河西便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陇西南接巴蜀，西连河西，东邻关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刘秀在东方未定、无力东西兼顾时，采取的第一步策略便是联合陇西隗嚣，这样既可破坏陇蜀联合，以陇制蜀，确保关中无忧，又可使陇、蜀在相互攻击中削弱力量，为日后图陇并蜀创造条件。由此可见，联陇制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先东后西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当关东之敌消灭后，刘秀得以全力西向，隗嚣便由联合对象转化为刘秀实施先陇后蜀战略的首要攻击目标，而河西窦融则成为刘秀打击隗嚣的新的联合对象。

从东汉联陇制蜀和联河西攻陇的策略中可以看出，刘秀处处胜算，着着占先，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隗嚣则自始至终被刘秀牵着鼻子走，先是惧怕实力强大的公孙述蚕食其地盘，欲借刘秀之力以确保陇西。待刘秀势力日益发展，隗嚣意识到刘秀的潜在威胁时，陇蜀关系已经破裂。欲拉拢窦融，使河西“与陇、蜀合纵”① 抗汉，但刘秀亦“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②，早已把目光盯住了河西。窦融原是汉室外戚后裔，本就“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③，又闻汉朝“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④，加上刘秀积极争取，遂拒陇而投汉。刘秀联合窦融的成功，更使隗嚣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成了刘秀的瓮中之鳖。

从联陇制蜀到联河西攻陇，刘秀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争取谁、利用谁、打击谁，均心中有数；对时机、分寸的把握，亦恰到好处，紊丝不乱，确实体现了相当高超的策略思想。

全国统一后，东汉王朝继续奉行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的

---

①②③④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

策略，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广泛运用于民族战争。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东汉前期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对北匈奴的反击。

东汉王朝在统一后对匈奴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防御到主动反击的过程，其转折点是匈奴的分裂。在此之前，汉朝因天下疲敝，无力外顾，对匈奴南扰采取以防为主的政策；匈奴分裂后，刘秀抓住有利时机，对南匈奴以及长期受匈奴控制的鲜卑、乌桓等族进行笼络，逐渐形成了以汉军为主体的多族军队联合打击北匈奴的态势。刘秀的这项策略是非常高明正确且完全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首先，匈奴一直是汉朝来自北方的最大祸患，特别是匈奴胁迫鲜卑、乌桓连兵南下，更给汉朝造成了莫大压力和威胁。争取联合南匈奴、鲜卑和乌桓，则既可防止北匈奴与他们再度合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北匈奴，又直接壮大了汉朝的边防力量。其次，匈奴分裂后，北匈奴成为汉朝最主要的敌人之一，但“夷狄情伪难知”①，“强者为雄，弱即屈服”②，南匈奴、鲜卑和乌桓等族也是不可忽视的不稳定因素，若对其处理稍有不当，则可能造成祸患。汉朝用笼络手段对其实行联合，虽然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财币，但却能带来几大好处，既可稳定这几个部族，又可通过对其控制，化害为利，实现“以夷制夷”的战略企图，还可造成“夷虏相攻”的局势，使他们在与北匈奴的相互攻击中，各自削弱力量。这也是东汉初纳南匈奴时耿国提出的“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③，以及后来耿秉提出的“以夷伐夷，国家之利”④ 的边防策略思想。第三，东汉初定天下，百端待举，需要一定时间来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力。联合南匈奴等部族打击北匈奴，可减轻内地徭役征发，确保国内安定，为大规模反击北匈奴作好准备。同时，汉军在与匈奴军队的作战中，往往表现出

①③ 《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

② 《后汉书》卷四十一《宋意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对漠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战法的诸多不适应，联合南匈奴等部族，则可弥补汉军的不足。

总之，东汉王朝采取的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打击北匈奴的策略，是刘秀固有策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它不仅立足于当时急需休养生息，无力外顾，而匈奴南下攻势日益加强的客观现实，致力于扭转眼前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而且充分注意了长远的战略目标，为日后大规模联合北伐，彻底击垮北匈奴创造了条件。所以，东汉取得天山之战的辉煌胜利，以及最后彻底灭亡北匈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东汉正确运用联合多数、攻击主要敌人策略的结果。

三、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

东汉统一战争期间，刘秀在军事战略上最有特色也最具典型的，便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集中兵力是古代兵法中“众寡分合”原则的核心问题，它根据敌对双方态势，通过众寡分合的灵活运用，达到“我专敌分”，用高度集中的优势兵力，逐个击破相对分散的敌军，从而实现战略企图。作为战役指导的战术问题，历代兵家对它均作过精辟的论述，所谓“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②，强调的均是集中兵力问题。刘秀对这一问题虽没有作过理论阐述，但在军事实践中，却超越了一般战术范畴，不仅在战役指导中高度重视兵力集中，而且在宏观决策时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理，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作战方针，表现出了高超的战略运筹思想和非凡

---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

②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的创造力。

刘秀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酝酿、成熟的。初建东汉王朝时刘秀的势力虽有较大发展，但四面受敌，除与实力强大的更始、赤眉作战外，还面对大大小小、遍布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的威胁，处在众多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所以，统一战争究竟如何展开，是刘秀战略决策的关键问题。而首先为他解决这一难题的是邓禹。邓禹是刘秀决策阶层的首要人物，初随刘秀时便以其远见卓识，向刘秀提出了两大方略：其一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① 的政治策略；其二便是军事战略上的发展蓝图，即以河北为基地，先“北取幽并”，“东举青徐”，再“南面以号令天下”，逐步实现统一大业。其文如下：“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② 邓禹的对策，既阐明了逐步夺取有利地区的重要意义，又包含了分清主次缓急、各个击破敌军的思想内容，对刘秀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刘秀在定都洛阳、平定关中后，基本按照邓禹的思路，确定了先关东后陇蜀、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从刘秀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切实可行的。其一，刘秀四面受敌，在力量对比上远不如敌对势力之和，若四面出击，死打硬拼，必然因兵力分散、众寡悬殊而受制于敌。但敌方力量分散，互不统属，各自为敌，便于通过众寡分合的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其二，东汉统治中心洛阳位于关东，关东之敌对其威胁最大，不就近解除这一威胁，则无法专意进军陇蜀，统一大业将半途而废或遥遥无期。同时，关东之敌与陇蜀相比，力量相对分散、薄弱，地理形势亦不如陇蜀复杂

---

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② 《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险峻，易于各个击破。因而，刘秀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战略指导方针，既符合敌对势力众多而分散的客观情况，也符合自己总体力量不足以同时出击的现实，反映了刘秀集团高明的运筹决策水平。

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和先东后西、由近及远的战略方针，刘秀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改变敌众我寡的形势。根据自己的实力，分别轻重缓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政治、军事手段，防备和争取次要敌人，先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威胁最大的东方之敌。在用兵关东时，又时刻不忘陇蜀之忧，采取联陇制蜀、联西河制陇的策略，解除西顾之忧，确保集中兵力于东方。待东方平定后，再折转锋芒，集中全力进军陇蜀。整个战争进程自始至终，基本依照刘秀的战略意图运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事史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

第二节　《潜夫论》的军事思想

一、重视将帅军事素质和修养的思想

《潜夫论》是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符的著作。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少好学，有志操”①，与名学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交情甚厚。生性耿介，不趋炎媚俗，以此不得晋升，遂郁愤而隐居，专心著书，共成30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②。

《潜夫论》共10卷36篇（含叙录），主要阐述其治国安民的思想主张和反对谶纬神学的哲学观点，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4篇，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些思想虽无更多创新和突破，但在军事思想领域极端沉闷的东汉，

---

①②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潜夫论》中所阐述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朝政荒废，官吏残暴，豪强肆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所以，《潜夫论》在探讨军事问题时，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上层统治集团不明军事、不修武备、不恤民生、苟且偷安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

东汉自安、顺以降，“羌乱”不断，边民备受战火之殃。王符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将帅素质的低劣，因而，在《潜夫论》有关军事内容的篇章中，他把《劝将》列于诸篇之首，以示对将帅在战争及战备中地位、作用的重视。他首先分析了汉军将帅在同西羌作战中所暴露的诸多弱点，指出，“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千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帅不懂治军用兵之道。概而言之：(1) 将帅不明战略，不懂战术。“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无断敌合变之奇”，故不能审时度势，掌握战争战役主动权。(2) 将帅不知以抚死禄生来激励士气。“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沮解，不肯复死者也”。这是造成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3) 将帅赏罚不明。“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其结果是“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士兵抱着这种态度去作战，自然只有失败。(4) 将帅荒废军事训练，不能爱抚士兵。“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仇，士卒缚手以待寇也”。

在分析了汉军将帅以上四个致命弱点后，王符进一步指出：“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

而欲合战，其败负也，理数也然。故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既明确指出了不能治军劝士、不会训练士卒的将帅，其战败的必然结果，又强调了将帅对于战争胜负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所以，王符充分肯定了将帅在扶危解难、救国安民中的主导作用，他在引用了《孙子》关于将帅乃“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言论后，针对当时边境郡县长官不懂军事的现状，提出了“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的建设性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对东汉光武以降“偃武修文”指导思想以及由此导致国防力量削弱后果的一个批判。

既然将帅在战争战备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对将帅的选择和培养，便无疑是事关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重大事务了，所以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他着力强调，必须认真选拔那些才智卓绝、深通谋略的难得之士来担任将帅，“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坚决制止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现象。指出，“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使典兵官”，并警告说，如果照此办法选拔将帅，就等于把国家交给了敌人。

王符对将帅素质、品格、修养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作了深入细微的阐述。他认为，将帅除应具备《孙子》中所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 五条标准外，还必须具有“敬”的品质。具体地说，“智以（折）[料] 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料] 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将帅只有集智、仁、敬、信、勇、严于一身，才可统兵破敌，辅主安民。可见王符不仅深明孙子兵法之微言要义，而且在论述中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尤其是“敬”的提出，是对孙子论将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关于将帅应如何统御士兵、激发士气，王符从人的本性在于

① 《孙子兵法·计篇》。

趋利避害、显名避耻角度出发，作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辞者，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不利显名，则利厚赏也；不避耻辱，则避祸乱也”。所以，一旦战斗打响，“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于死敌”的真正动力，并非士兵们“情厌久生”，而甘愿去死，而是“义士且以徼其名，贪夫且以求其赏尔”。作为“生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的将帅，必须了解这一人之常情，根据人的本性，抚死禄生，赏功罚过，使士兵为求名图赏，为避耻辱祸害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择将任将，是中国历代兵家兵法极为重视的问题，王符在吸取前人有关理论和总结当时将帅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其中不乏光彩之论，特别是关于将帅素质、修养的论述，具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是对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小小贡献。

二、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思想

王符针对当时西羌之乱日益剧烈，朝廷久无对策，士大夫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现实，特作《救边》、《议边》两篇，系统阐述了他对战争的认识及其救边安民与整修武备的战略思想。

王符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帝王立国“以富民为本”。因此，用兵征战，不是为了穷兵黩武，而是为了保国安民。他说：“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狎狁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战争是随着阶级国家的起源而产生、发展的，“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作为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既然自古以来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军队，所以不能去兵忘战，

“《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以废。’齐桓、晋文、宋襄，衰世诸侯，犹耻天下有相灭而己不能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符虽然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理解战争，但他对于战争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产物的论说，及其对正义战争的肯定态度和强兵方能安国的主张，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战争观，是一种进步的学说。

基于上述战争思想，王符以忧国忧民之心和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对当时边患不断，朝臣苟安，既不思救边救民之近策，又不图战争守备之远谋的行为，义正辞严地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指出：“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澹，卧委天（听）[职]。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己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礼谢，退云（无）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恳恻之诚，苟转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移，议无所定，已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望。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驰，羽檄狎至，乃复怔松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庶曰式臧，覆出为恶，佪佪溃溃，当何终极！”而促使官僚士大夫们不顾国家安危，不管人民死活，混混沌沌，消磨时间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有爱国爱民之心，边祸对其无切身利害关系，“痛不着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虏矣”。王符用极端利己主义来说明士大夫的丑陋心态，实是一矢中的的高明见解。

王符总结概括了朝臣士大夫中出现的一些荒谬言论，认为由这些“惑议”而形成的错误决策，是造成边害久难平息，且呈愈演愈烈趋势的根本原因，并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惑议”，论证救边救民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他着力抨击了四种谬论和倾向：(1) 朝臣面对“寇钞祸害”、“百姓灭没”的现状却熟视无睹，“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2) 当初，“边害震如雷霆”，“而谈者皆讳之”，“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

忧”，抱着一种大事化小、自欺欺人的态度，致使敌寇日益猖獗，边民惨遭横祸，“害乃至此，尚不欲救”，实在可恨。（3）平时“不明修守御之备”，战时又惊慌失措，毫无主见，“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在危急关头，“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这种主动放弃抵抗“示懦敌寇”的妥协投降政策，“不亦惑乎”！（4）边郡“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为费烦不可”，“不一命大将以扫丑虏，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这好比“探沙拥河”，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因徭役不断而扰边烦民。以上种种不修武振兵、御寇抗敌的言行，均是不思民，不爱民的表现。王符进一步用其理想中的“圣王之政”来论证救边救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因此他警告说：“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百万乎？《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所以他极力主张抗敌救边，边不救则国不保，这犹如“唇亡齿寒，体伤心痛”一样，“是故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王符从战略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分析了救边破敌的可行性。（1）边疆的巩固与否关系到国家安危，“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因而边疆有难必须迅速救援，切不可为求苟安而弃边不守。因为今日“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以此类推，“虽尽东海犹有边也”。所以只有坚守边疆方能确保国中。（2）从攻、守双方战略态势的优劣来看，往往是“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他举例说：“昔乐毅以传传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帅穷卒五千，击走骑劫，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这些都是“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的典型事例。况且当时汉之边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聊、莒、即墨也”，其不能坚守

的原因，“非苦城乏粮也，但苦将不食尔”。所以，只要边将愿意并尽力坚守，便一定能够取得成效。（3）从敌我双方实力对比上看，并非敌强我弱，而是我强敌弱。“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藉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①。而羌人则“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所以无论是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乃至攻守态势、军队士气，官军都占据上风，只因朝廷战守之策不定，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才使敌人猖獗横行。既然朝廷在与西羌对峙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应该当机立断，趁其“新擅边地，未敢自安”，而“百姓新离旧壤，思慕未衰”之时，派遣大军前去征讨，一举解除边患。“如宽假日月，蓄积富贵，各怀安固之后”，则敌寇亦站稳脚跟，此时再欲图之，“则难动矣”。

救边只是一种在非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只有使边疆永无祸乱，国家长治久安，才是根本策略。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明修守御之备”，时刻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为此，王符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1）“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面对眼前的失败，应吸取经验教训，振作起来，整修武备，加强边防，以待来日。“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皆是从失败中崛起、建大功于当世的典型事例。亡羊补牢犹未迟，只要纠正错误，制定合理的战备策略，便有成功的希望。（2）对边患问题在群臣面前，要耳聪目明，判断是非，切不可听信虚浮之言，“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对军国大事则应“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把一切重任推给将帅。如此则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也”。

三、充实边疆、巩固边防的具体设想

整修武备的主要内容，是巩固和加强边防，边防力量强大方

---

① 据清人汪继培笺，“定令”当作“守令”，“气利势”当作“处利势”。

能御敌于边塞之外，确保国家安全。而巩固边防的一个必要前提，则是充实边疆，建设边疆。这是王符国防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

实边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制定边防政策的主要依据，深为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早在西汉景帝时，晁错就曾根据当时汉匈对峙的局势，提出了“徙民实边”的建议，指出：“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①；宣帝时，赵光国亦对边疆屯田之利作了精辟的概述：“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②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已有的实边思想，在指出“先王之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的基础上，对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边与“固内”的辩证关系，作了更深入更精利的论述，并针对当时边疆形势的特点提出了实边的具体设想。

首先，王符分析了导致边郡虚废的根本原因。指出：(1) 家在内地的边郡长官畏敌怯战，放弃抵抗，争先内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2) 朝廷放任官吏强征暴敛，放任军队纵掠横行。“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由于朝廷采取了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及加重边地赋役的错误政策，致使边民背井离乡，“逐道东走，流离分散”，“饥饿死亡，复失太半”。所以王符愤怒尖刻地指出，“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边民遭受官府的痛苦“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吏所搜索剽夺，(游) [旋] 踵涂地，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

①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②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数也”。

其次，指出边郡虚废的严重危害性。认为“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如今边郡和内地在人口比例上严重失衡，“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才]置数百，而太守周迴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造成经济上严重的偏瘫症。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周书》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所以，土地多少与人口众寡的比例一定要适当。然而“今边郡多害而役剧，动入祸门”，边民留亦遭祸，徙亦难活，长此下去而不加以制止，必使边民因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敌寇亦“必生阚欲”，而趁机来攻，此“诚大忧也”。

第三，论证“实边”与“固内”的辩证关系。认为，“实边”的目的在于“固内”，只有充实边疆，加强边防，才能巩固内地；而内地巩固又反过来为边防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边郡守疆抗敌，内地从事生产，互相依靠，所以“实边”与“固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安中国也。譬犹家人遇寇贼者，必使老小羸软居其中央，丁强武猛卫其外。内人奉其养，外人御其难，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这好比“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倍，岂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内尔”。作为国君一定要懂得这一治国安邦的道理，“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王符关于“实边”与“固内”的思想，既深刻而合乎国情，又辩证而富有哲理，实为当时精辟独到的国防学说。

第四，阐述“实边”的可能性和具体设想。“实边”的主体是人口，而安土重迁，“恋慕坟墓”，乃人之共性，“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故边民“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边民的这种安土重迁的心态就为“实边”提供了可能。关键是应采用什

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稳定边民之心，使其安心并乐于从事边地生产，成为边防建设的主体。为此，王符提出了具体设想：（1）恢复中止已久的边郡举孝廉制度。“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一人，兼吏（世）[卅]举一人，益置明经百石一人”。并鼓励内地人民迁徙边郡，“内郡人将妻子来占著，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2）招募流民徙边屯田，在入粟拜爵及粮食物价上给予优惠政策。“又募运民耕边入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贾于内郡”。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就能使“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这便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王符不是军事理论家，也不是统兵将帅，所以他的军事思想并不完善和系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能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及军备状况，吸取前人的军事理论，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且有些思想如对将帅修养的要求，对“实边”与“固内”关系的论述等等，皆有精深独到且颇具新意的见解，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用，因而值得认真总结。

第三节　主要军事人物

一、刘　秀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汉朝宗室，东汉王朝的开创者。早年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新莽政权的关键性战役——昆阳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略定河北后，统帅东汉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逐步扫平各割据势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统一。

刘秀9岁丧父，依靠叔父刘良生活，“乐施爱人，勤于稼穑”①。

① 《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新莽天凤（14～19年）年间，曾游学于长安太学，“受《尚书》，略通大义”①。新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度“避吏新野”、“卖谷于宛”的刘秀，见“王莽败亡已兆”，乃与其兄刘縯举兵于舂陵，号“舂陵兵”，不久并入绿林农民军，成为重要将领。地皇四年（23年）二月，众义军将领拥立刘玄为汉帝，改元“更始”。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三月，刘秀与王凤、王常等攻占昆阳、定陵、郾城。五月，在昆阳之战中，刘秀沉着冷静，临危不惧，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率领义军大破王莽主力42万，为推翻新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反莽形势的日益发展，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亦逐渐激化，威望日增的刘縯、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的猜忌和排斥。在李轶、朱鲔等怂恿下，刘縯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主动驰至宛城谢罪，从而不仅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顾全了反莽大局，避免了更始内部的进一步分裂。新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秀积极争取脱离更始、独立发展的机会。是年十月，刘玄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头衔，“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

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要将这里纳于统一控制之下十分困难。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②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③的建议，“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④，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图河北以为根据，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所以，虽

---

①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纪。

②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③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更始元年”。

然刘秀曾被盛极一时的邯郸王郎所迫，“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一度处境艰危，但很快能组织力量进行反攻，并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经略河北的最大障碍。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刘秀为萧王的同时，一面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一面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自恃羽毛已丰，决心脱离更始，独树一帜，乃“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接着，先派吴汉、耿弇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遣吴汉、岑彭用计袭杀谢躬于邺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患。其间，又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手段，击破并收编了铜马军30万众，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人称“铜马帝”。

此时河北形势已逐渐明朗，赤眉军已开始西进关中，更始、赤眉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火并在所难免。鉴于此，刘秀开始了新的战略部署。他任足智多谋的邓禹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由晋南往关中，伺机进取长安；派刚毅果决的冯异为孟津将军，扼守黄河渡口，防止更始屯驻洛阳的朱鲔、李轶北渡；拜文武备足的寇恂为河内太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确保军需物资的供应。刘秀本人则亲统大军北上，肃清河北境内的残余农民军，终于实现了控制河北的首要战略目标。

更始三年（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城，年号建武，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

就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时，邓禹在关中取得重大进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连破更始主力于安邑、衙县，又避开赤眉锋芒，休兵栒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机南下长安的部署。冯异亦积极配合邓禹的行动，利用洛阳更始军军心动摇之机，转守为攻，北取天井关、上党，南下河东13县，迫降更始军十余万人，进而与寇恂合力进逼洛阳。刘秀即位后，立即派大司马吴汉统军十余万围攻洛阳，并随后亲至河阳坐阵指挥。刘秀采取政治诱降策略，不记朱鲔杀兄之仇，终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

建武二年（26年），关中方面形势不利，邓禹与赤眉反复鏖战，虽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自己亦几遭失败。刘秀见邓禹已难改变关中局面，遂于是年十一月及时更换将帅，以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代替邓禹，主持关中军事。冯异不负重托，迅速调整部署，于次年闰二月，以诱敌伏击战法夺得崤底之战的胜利，迫降赤眉8万余人。赤眉余部十多万人仓惶东走宜阳。刘秀早已断定“赤眉无谷，自当东来”①，此时已亲临宜阳，率诸军严阵以待。赤眉军正好落入圈套，十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刘秀取得了关中地区，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就在河北初定、关中将定之时，刘秀已开始着手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根据当时各支割据势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强弱，刘秀制定了由近及远、先东后西、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刘秀采纳来歙的建议，联陇制蜀，使汉军得以偏师扼守关中，主力则用于对付东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刘秀用5年时间，逐个剪灭关东之敌，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

东方平定后，汉陇联合倾刻瓦解，陇右隗嚣成为汉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刘秀利用河西窦融与汉朝宗室的特殊关系，积极争取窦融，使隗嚣处于腹背受敌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遣来歙率精锐2000人，长途穿插，袭取陇右军事重镇略阳，将隗嚣数万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刘秀亲率大军攻陇，与窦融的河西军两面夹击，大败陇军。嗣后，虽因巴蜀援军来救，汉军一度撤离陇右，但隗嚣已受致命打击，汉军重整兵力，于建武十年（34年）十月，彻底击垮隗氏集团，吞并陇右。

刘秀得陇望蜀，经短期休整后，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命吴汉、岑彭、来歙、盖延等分道伐蜀。同年秋，刘秀坐镇长安，亲自指导战争进程。在汉军强大而又巧妙的攻势下，蜀军连遭惨败，全线崩溃。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击杀公孙述

---

①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

于成都，蜀地平定。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后，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东汉一度兴盛。封建史家誉之为“光武中兴”。

从东汉统一战争的进程及结果看，刘秀确实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政治才能，不愧为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如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已在前面章节中有选择有重点地作过叙述，现分别简述如下：

(1)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刘秀在统一战争中，贯彻的是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逐个击破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刘秀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始终能集中兵力，创造条件，造成我众敌寡的相对优势，保持一个方面和一、二个敌人的主要用兵方向，渐次消灭敌人。

(2) 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思想。为了配合总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刘秀在确定主攻敌人后，总能根据需要和可能，争取联合次要敌对势力，使其或发兵助攻，或保持中立，或牵制其他敌人。如攻王郎，联合了耿况、彭宠、任光、邳彤等人，从而以弱击强，势力由小到大；攻刘永，成功地争取了陇右隗嚣、河西窦融，让其制约公孙述，使汉军得以专意东方；攻隗嚣，又成功地联合了窦融，对隗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总之，这一策略的成功保证了总方针的顺利贯彻，是刘秀逐个消灭割据势力的一大绝招。

(3) 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刘秀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在十四五年的军事活动中，从不把军事打击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手段，而是刚柔相济，文武两手并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刚以削其力，柔以笼其心，尽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即使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刘秀战争策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冯异出征关中，刘秀戒之曰：“今之征

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① 其义甚明。所以，定河北，招降铜马 30 万众；取洛阳，降纳杀兄仇人朱鲔且封以高官，等等，均非偶然，乃是刘秀施行刚柔相济策略的结果。在刘秀的影响下，其部将也多能以此法取胜，冯异、马援、邓禹等固不待言，就连军纪相对较差的吴汉亦能间或施行这个策略，其说降陈康而得鄴城及诛守长而平鬲县五姓之乱，就是典型的例证。刘秀的这个策略，终东汉一代久行不衰，被广泛用于镇压农民反抗、平定地方叛乱及民族战争，宗均、祭肜、窦固、虞诩、张奂、皇甫规等，都是奉行和贯用这个策略的优秀将领，说明它适用于各类战争。《黄石公三略》云：“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云：“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刘秀刚柔相济的策略思想大体渊源于此，其“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及“量时度力，举无过事”的办事原则，也都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发挥和实践。

（4）出奇制胜的战术思想。刘秀善于料敌察机，因敌制胜，战术运用灵活多变。如对赤眉的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攻陇蜀的长途穿插、以锐击疲，等等，均体现了出敌不意、用奇制胜的作战特点。

（5）扬长避短的用人思想。刘秀帐下猛将如云，各具特点，他总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而且能够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略企图下相机行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在统一战争中是常见的，在此之后亦始终未变，较为典型的是，谒者宗均擅自伪造诏书、招降武陵“蛮”而受到刘秀嘉奖一例，更表现了刘秀广阔的胸怀和气度，这与桓帝时段颎矫诏破鲜卑而被革职下狱之事，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②，是符合实际的。

---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刘秀的上述思想内容丰富，深刻高明，他用以指导统一战争，使整个战争基本按照他的设想，逐步、顺利地完成，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秀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全国，二是治理国家。所以对其军事思想也应从两方面来探讨，既肯定其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策略、战术、治军思想，又不忽视其在重建封建国家中的建军思想。以前人们往往依据东汉统一战争来评价刘秀的军事地位，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全面反映军事家、政治家刘秀的军事思想。刘秀自平定关东后，就已着手军制的调整和改革，从中可以看出其“居重驭轻”的建军思想。

（1）强调领导体制上的军权高度集中。其表现，一是削弱三公权力，突出尚书台地位，“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军事决策机构；二是强化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2）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如“罢郡国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以太守兼领兵权；废“都试之役”，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刘秀实行这些措施的意图很明显，是为了强干弱枝，防止地方叛乱。

（3）在边防问题上，废除了边郡更戍役制度，所谓“罢边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加强边防建设，不断修筑亭候烽燧，完善防御体系。这一措施与刘秀鉴于当时形势而采取的以防御为主的边防政策，有密切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刘秀的军事改革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也可收到稳定政局、安宁边境之效。就此而言，刘秀的建军思想

与其“柔道”治国方针是根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它过分强调“居重驭轻”，废除更戍役制，造成了东汉兵源减少，战略后备力量薄弱；罢都试之役，使汉军缺乏定期的训练、考核，以致于“每战常负，王旅不振”①，战斗力有所削弱。这两点教训是非常明显而深刻的。

二、邓禹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长于谋略，曾为刘秀定下“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② 的立国大计，并多次统兵征战，屡立战功。名列东汉“中兴”名将之首。

邓禹自幼聪颖，“年十三，能诵诗”。在长安从师受业时与刘秀相邂，知刘秀非同常人，“遂相亲附”，由此结下不解之缘。更始政权建立后，豪杰多向刘玄举荐邓禹，但禹不肯追随。后闻刘秀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于邺”。向刘秀进献夺天下之策。

邓禹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指出，要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必须具备“天事”与“人事”两个条件，即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就前者而言，新莽已亡，天下大乱，更始政权虽一度号令天下，但内部已出现分裂，所谓“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③；再则，“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说明更始已在各股势力面前失去号召力。这为刘秀谋取天下提供了良机。“古人有言：圣人不得违时，时亦不可失也”④，应把握并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就主观方面来看，刘玄本人是位无德无能的凡庸之辈，既无远大志向，又不能听取正确意见，其部将亦“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

---

① 《后汉书志·百官五》补注应劭《汉官》。

② 《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③④ 《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因而刘玄自蹈覆辙、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已经出现。与刘玄相比较，刘秀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邓禹为此概括了三点：(1)“公推诚接士，总览英雄，天下之人，皆乐为驱驰，公之德众所归也”①；(2)“初战昆阳，破王莽四十万众，天下闻之，莫不震靡，公之武众所服也”②；(3)“军政齐肃，少长有礼，赏善如不及，讨恶如虑遥，公之文众所安也”③。“德”能使人归，“武”能使人服，“文”能使人安，三者兼备则完全占有“人事”上的绝对优势。其次，鉴于上述情况，邓禹提出了刘秀应采取的对策：“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第三，指出了河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阐明了逐步夺取天下的具体方略。认为：“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

邓禹的对策正合刘秀之意。刘秀决心按照邓禹的思路制定其发展战略。从此，刘秀令左右尊称邓禹为“邓将军”，并让他“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成为刘秀的首席谋臣。

王郎称帝后，刘秀在信都太守支持下起兵反击王郎。此后，邓禹一方面为刘秀出谋划策，一方面大力举荐人才，吴汉、寇恂等名将皆因其荐而得重用。史称：“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

更始二年（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西攻长安，刘玄派王匡、成丹、刘均等分据河东、弘农以拒赤眉。刘秀料定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却苦于山东未平，不能东西兼顾，遂把西征重任交给邓禹，命他为前将军，领精兵2万西入函谷关。邓禹不负重托，自建武元年（25年）正月起，破箕关，围安邑，斩樊参，败王匡，攻坚破锐，围城打援，战术灵活，指挥得当，半年之内即定河东。刘秀称帝后，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在策命中称赞他

---

①②③《后汉纪》卷第一《光武皇帝纪》。

“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此时邓禹年仅24岁。

邓禹平定河东后，立即率军西渡黄河，进入三辅地区，先在衙（今陕西白水县）地击溃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所率十余万军队，接着与进据长安的赤眉军展开了激战。邓禹深知与赤眉军争夺关西，不光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政治策略的竞争。因而他特别注意申明军纪，约束部下，所过之地，秋毫无犯，这对饱经战乱的关西人民来说，无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政治感召力，与赤眉军“所过残贼”，“数暴掠吏民”，致使“百姓不知所归”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关西吏民“闻禹乘胜独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一时之间，邓禹威震关西。这是邓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邓禹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敌我双方态势，策划下一步行动方案。他先分析和比较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认为，“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然赤眉军纪渐坏，失去民心，领导者缺乏远见，部下将士又皆乌合之众，所谓“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因此赤眉军难以长久固守长安。据此，邓禹制定了休兵养士，积蓄力量，待机出击的方针，指出：“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邓禹率军北至栒邑，接连攻破赤眉军设立的许多营堡，所过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亦遣子奉书投降。

应该说，邓禹“休兵北道”的方针是切合当时实际的，但诸将不能理解，就连刘秀亦未予以支持，一再催他从速进兵。邓禹坚持己见，一面分遣部将别攻上郡诸县，一面征集兵员，调运粮草，屯军大要（今甘肃宁县）。就在这时，据守栒邑的冯愔、宗歆因争夺军权发生火并，冯愔杀宗歆，率军反击邓禹。这一意外事件打乱了邓禹的战略步骤。建武二年（26年）春，赤眉军西向扶风，邓禹乘虚南入长安。不久，率军与延岑战于蓝田，不胜，乃

“复就谷云阳”。说明邓禹仍想按原定方针，休整军队。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汉中王刘嘉的投降，但在对待傲慢无礼的刘嘉相李宝上，邓禹一时冲动，斩李宝而导致李宝弟的反叛，损失大将耿䜣，影响了邓禹的军心，休兵储粮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士兵疲惫，粮草缺乏，“归附者离散”。赤眉军又卷土重来，邓禹败走高陵（今属陕西）。刘秀见邓禹已无法挽回败局，便召他回京，代之以作战稳健的冯异。而年轻气盛的邓禹却“惭于受任而功不遂”，竟一反“沉深有大度”之常态，“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建武三年（27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共击赤眉，再遭重创，邓禹“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

邓禹由西征伊始2万人发展到号称百万，最后却仅与24骑狼狈败回，导致这种结局，邓禹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刘秀一再干涉邓禹的行动，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原则，使邓禹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饥卒与强敌作战，因失败又产生了急功近利，以全名声的思想。所以邓禹之败，根源应在刘秀。此后，邓禹虽保留梁侯印绶，并担任右将军，但未再参与重大军事活动。

建武十三年（37年），天下平定，刘秀大封功臣，邓禹定封为高密侯，食四县。中元元年，重任司徒。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永平元年病故，终年57岁，谥号“元侯”。

邓禹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刘秀定下了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使刘秀在处境艰危、前景难测的情况下，找到了制定战略方针的依据。所以，其对策虽不如诸葛亮“隆中对”、韩信“汉中对”著名，但就意义上讲是完全相同的。

三、冯 异

冯异（？～34），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东）人。博学谦恭，有文韬武略，善统兵征战，在刘秀定河北、破赤眉、灭

隗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杰出者。

冯异生长于两汉之际的动乱时代，自幼刻苦勤奋，“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①。及年长，遂成为既能运筹决策，又能治军用兵的将帅之才。他早年效命于新莽政权，“以郡掾监五县”，曾与父城县长苗萌共拒农民军。更始元年（23年），昆阳大战后，刘秀乘势略地颍川，久攻父城不下，便屯兵于巾车乡（地属汉父城县）。此时的冯异虽尚与更始政权为敌，但他并不想成为新莽政权的牺牲品，正静观时变，考察比较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优劣高低，以便择明主而建大业。而刘秀正是他理想中的明主。所以当其堂兄冯孝及同乡丁綝、吕晏等劝他归顺刘秀，同时向刘秀举荐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原归据五县，以效功报德”。并随即返归父城，向苗萌分析天下形势，认为：“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在他的鼓动和推荐下，苗萌、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先后归降刘秀，成为刘秀较早的一批人才。

冯异初投刘秀，即深受器重和信任，常在关键时刻，为刘秀定计决策，排忧解难。略地河北是刘秀脱离更始，扩充势力的首要战略目标，但因更始诸将的阻挠而难以实现。当时的更始政权，实际操纵在左丞相曹竟及其子尚书曹诩手中。冯异看出其中奥妙，力劝刘秀厚结纳曹诩，让他来为自己开路。刘秀依计而行，果然成功。刘秀自胞兄刘縯死后，一直陷入悲痛苦闷之中，又是冯异不时地予以开导安慰，并进献扩充势力，夺取天下之策。他指出：“天下共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来到河北后，基本按照冯异的建议行事，“遣（冯）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对于收揽人心，壮

①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大力量，起了积极作用。

王郎起兵后，刘秀一度陷入困境，冯异与邓禹等紧随刘秀，度过了一段艰苦而惊险的逃亡生活。至信都（今河南冀县）立稳脚跟后，冯异被派去收集河间（今河北献县）军队。返回后被拜为偏将军，参与了消灭王郎势力的战斗，并被封为应侯。更始三年（25 年），刘秀北巡燕赵，留任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河内二郡兵马，驻守黄河，与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相对峙。冯异用离间计分别击破朱鲔、李轶等部几十万大军，攻占了洛阳城外要地，为刘秀夺取洛阳之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建武二年（26 年），被封为阳夏侯。三年（27 年），任征西将军，赴关中战场接替作战失利的大司徒邓禹。他牢记刘秀“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的嘱托，“所至皆布威信”，西至弘农，便有“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与邓禹会合后，整顿败军，在崤底设伏，破降赤眉 8 万人，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局。继而扫平关中各股势力，击退进犯关中的公孙述军队；又采取措施，“怀来百姓，申理枉结”，三年之间，“威行关中”。

建武六年（30 年）春，冯异应召回京，参与平定蜀地的谋划。同年夏，在与隗嚣的作战中，冯异抢占战略要地栒邑，以逸待劳，大破行巡军，迫使依附于隗嚣的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投降。此后，先后兼任北地、安定、天水太守，其间又曾降附青山胡万余人，击败卢芳、匈奴联军，破斩公孙述部将赵匡等。建武十年（34 年）夏，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军中。

冯异一生最辉煌的经历是军事活动。作为刘秀麾下能“建方面之号”的杰出将帅，他无论是用兵还是治军，都深得兵家要领，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风格。

冯异不是单纯的武将，而是兼有较高政治素养和卓越军事才能的军事活动家。他用兵既矜持稳重，又刚毅果敢；既重视军事进攻，又讲求政治策略；刚柔并用，奇正结合，战术运用灵活多变。以下几次战役反映了他的用兵特点。

洛阳外围之战，先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分化离间敌军将领，再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更始三年（25年），冯异任孟津将军，屯兵黄河渡口。当时盘踞洛阳一带的更始军队，在朱鲔、李轶、田立、陈侨等率领下，号称30万，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更始政权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更始诸将的离心力也愈来愈大，将帅之间更是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冯异抓住敌军的这一弱点，采用离间策略，先利用李轶"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的矛盾心理，稳住李轶，使其"不复与异争锋"。然后专心并力，北攻天井关，连拔上党两城；南破河南成皋以东13县，迫降10万余人。继而迎击朱鲔遣来救援的武勃军，"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当朱鲔派人刺杀李轶，并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时，冯异又避其锋芒，与寇恂合力击破其偏师苏茂部3万人，然后乘胜进击朱鲔，将其逼回洛阳孤城。在这次战役中，冯异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他审时度势，料敌合变，政治分化与军事进攻同时并举，从离间敌军将领，攻占洛阳城外要地，到集中兵力先后击破苏茂、朱鲔大军，环环紧扣，一气呵成，堪称典型战例。

崤底之战，先期设伏，示弱骄敌，诱其出战，伺机突袭。建武三年（27年），冯异西入关中，与赤眉军遭遇于华阴，相拒两月，"战数十余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不久与邓禹会合。邓禹不听冯异再三劝阻，连续出动疲惫之师强攻赤眉，结果招致惨重失败。面对敌强我弱、敌胜我败的不利局面，冯异不急不躁，沉着冷静，在召集整顿残兵的同时，制定出了一套破敌的策略。他先与赤眉"约期会战"，然后派出精锐士卒穿上赤眉服装，事先埋伏在道路两旁。次日晨，当赤眉军1万人进攻冯异前锋部队时，冯异故意向敌人示弱，仅派小部分军队前去救援。赤眉见汉军势弱，便放心大胆，倾巢出动。冯异抓住时机，挥师接战，苦苦支撑到傍晚，趁赤眉军气势衰竭时，身着赤眉服装的汉军伏兵突然杀出，大破赤眉军，迫降8万人。在此战中，冯异利用了敌军连胜之后的骄傲心理，灵活运用战术，设伏、示弱、骄敌、疲敌、突袭，一环扣一环，环环至关重要。从中可见冯异用兵的老练持重。

枸邑之战，抢占要地，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建武六年（30年）夏，刘秀派冯异屯驻栒邑。栒邑位于关中至陇地的要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冯异尚在进军途中时，隗嚣亦遣部将行巡率兵前去占领该地。冯异部将认为“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主张暂且择地休兵，“徐图方略”。但冯异不以为然，他在分析了栒邑得失的利害关系后，指出：“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其意图很明显，不仅要抢先占领栒邑，而且要将敌军消灭在该城之下。按照冯异的方略，汉军倍道疾进，以神奇的速度潜入城中。然后紧闭城门，偃旗息鼓，待骄傲自大的行巡兵临城下时，冯异出其不意，突然纵兵杀出，行巡措手不及，大败而逃。从这一战中可以看出，冯异用兵与常人不同，既依据兵法，又不拘泥于兵法，情况越危急越能保持冷静，越能大胆决策，所以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冯异为人谦逊不矜，与诸将相遇，常引车避道；每当部队休止，诸将并坐论功，他却独自一人躲在大树底下，从不参与此种议论，因而军中将士皆亲切地称他为“大树将军”。他治军严谨，“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所以每当部队配备兵员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其谦退不夸的高尚品格及由此而来的“大树将军”的美名，成为历代佳话，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

四、马 援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人。通晓兵法，有政治远见，在击隗嚣、定陇西、平交趾等役中建有大功，并为我国历史上运用沙盘战术的第一人，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马援是战国名将马服君赵奢的后裔。12岁丧父，随兄马况生

活。“少有大志”，“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①。及年长，遂辞别家兄，自愿至边郡种田放牧。后征为郡督邮，在一次押送重囚犯时，马援起恻隐之心，“哀而纵之”，从此浪迹北地。遇赦后，继续操起田牧产业，“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然而殖货致富并非其志向，他认为“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并常对其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明确表达了他不愿作金钱奴隶的反世俗观念和成就大业的远大抱负。所以他断然把所有财产分给亲朋好友，开始了新的追求。

王莽末年，马援被举荐为新成大尹（即汉中太守），王莽败亡后，遂弃郡而“复避地凉州”。后被割据陇西的隗嚣请去担任绥德将军，深受敬重，成为隗嚣集团颇为倚重的决策人之一。当时，在洛阳即位的刘秀和称帝于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是两个势力最强大的政治集团，隗嚣为自身利益考虑，欲依附于其中一个，却拿不定主意，便派马援游走于成都、洛阳之间，视情况以决定去就。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好友，原以为相见后“当握手欢如平生”。然而，公孙述“盛陈陛卫”，大讲帝王排场，这使马援十分反感和失望，他对部下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辞归西州，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武四年（28年）冬，马援奉隗嚣书至洛阳，受到刘秀盛情款待。经推心置腹地交谈及细心观察，马援觉得刘秀平易近人，“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心生好感。刘秀亦非常欣赏他的胆略和才干，“以为待诏”，并派太中大夫来歙送他西归陇右。在马援的劝说下，隗嚣决定依附刘秀，遣其长子隗恂入质洛阳，并由马援携家属护送前往。这成为马援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隗嚣背叛刘秀后，发兵拒汉，在陇坻之战中，汉军失利。马援闻讯，随即向刘秀表示“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并提出以政治攻势瓦解隗军的策略。刘秀采纳此建议，派他率5000突

---

①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骑，"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建武八年（32 年），来歙采取穿插战术，出其不意袭占陇西重镇略阳，并与前来围攻的隗嚣主力形成对峙。刘秀抓住时机，亲率大军西征隗嚣。因陇中地形复杂不明，诸将皆劝刘秀不宜冒险深入，马援则认为"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并随后在刘秀面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眼界大开，欣喜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晨，即按马援所示路线，迅速进军至高平第一城（今甘肃固原县）。隗军大败溃逃。

建武九年（33 年），刘秀拜马援为太中大夫，担任来歙副职，统领诸将驻守长安。来歙平定陇西后，鉴于该地战略地位重要，又屡遭羌人及公孙述的袭扰，建议刘秀派一位智勇双全者来安定陇西局面，而诸将中非马援莫能当此重任。刘秀采纳其议，于建武十一年（35 年）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刚刚到任，便先发制人，派 3000 步、骑兵，"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迫降 8000 余人。遭受沉重打击的羌军，携家小、辎重转移至允吾谷，凭险坚守。马援"潜行间道"，突袭其营寨。羌军惊慌远逃，至唐翼谷复聚精兵据守山上。马援见山险难攻，便面山而阵，吸引羌军注意力，同时暗遣数百精骑绕至羌军之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建武十三年（37 年），马援又率军 4000 余人，进击寇扰边境的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参狼羌，军至氐道县（今甘肃武山县东南），羌军据山坚守。马援针对羌族游牧特点，采取釜底抽薪之略，抢占其周围水源、草地，从而兵不血刃而困疲羌军，"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马援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又采用政治怀柔的政策，治理陇西。当时朝臣中多认为金城破羌（今甘肃乐都县东）以西，路远多寇，不便治理，应该放弃这些地方。马援力排众议，上书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地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刘秀依其建议，下令遣还逃至金城

的客民回归本籍。接着，马援又奏请朝廷在陇西地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马援在陇西“视事六年”，不仅使“陇右清静”，塞外羌人“皆来和亲”，而且使该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此后，马援继续为维护东汉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而南征北战，先后平定巫师李广之乱和“二征”的分裂活动，最后在征讨武陵蛮叛乱的战争中，病死于沙场。

马援为人忠勇正直，注重操守，不阿权贵，亲贤士，远小人，居功不骄，重义轻利，宽以待人，严以责己。他有两句至理名言，一云“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二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他正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东汉的统一事业。千百年来，“伏波”精神一直为人们所传颂，“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更成为历代有志爱国之士的座右铭。

马援是一位集军事、政治才能和高贵品质于一身的著名军事家。他长于运筹，尤善兵策，深为刘秀所钦佩，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故马援“每有所谋，未尝不用”。马援对军事学术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其中为当今军事学界和历史学界所公认的有：沙盘战术的运用。在刘秀攻陇过程中，马援用米堆成战区复杂的地理模型，从而解决了因地形不熟而无法进军的难题。这是中外军事史上最早的沙盘模型，亦为沙盘战术最早运用的实例。充分显示了马援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战争策略及战役指导上，马援亦有其独特之处。他从不把军事进攻作为战胜敌人的唯一手段，而是注重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双管齐下的策略，如对西羌扰边及“二征”叛乱的征讨，均是刚柔并用，在肃清顽敌的同时，施以政治安抚。整顿吏治、修缮城廓、开沟凿渠、架桥修路等措施，均起到了安定民心，瓦解敌人乃至长治久安的作用。在指挥作战时，马援料敌准确，计划周详，其惯用战法是突然袭击，“间道潜行”，分路抄袭，出奇制胜。其次是善于应变，化不利为有利，如对参狼羌的征讨，“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战势对其不利。但马援迅速作出“夺其水草”之决

策，结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平交趾时抢占浪泊高地，征武陵蛮时“凿壁为室”，反困敌军于壶头山上，也都反映了马援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作战，是马援几次征战的特点。他作风顽强，勇气超人，在交趾热带丛林中，在武陵峭壁急流里，面对瘴气熏天，疾病流行，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与士兵同甘苦，表现出了一代名将的精神风貌和高贵品质。

五、吴 汉

吴汉（? ～44），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能征善战，智勇过人，在刘秀统一战争中身经百战，军功卓著，是东汉开国名将之一。

吴汉出身贫寒，早年曾任亭长。王莽末年因门客犯法而逃亡至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为求生计，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所至皆结交豪杰”①。更始政权建立后，被举荐为安乐（今北京顺义县西北）县令。更始元年（23 年），王郎于邯郸称帝后，一度声势较大，河北郡县纷纷响应。唯独吴汉与众不同，他素闻刘秀礼贤下士，有长者之风，认为将来必成大业。所以早有归顺刘秀之心。在他的极力劝说下，举棋不定的渔阳太守彭宠亦决定进攻王郎，投奔刘秀，并派吴汉率 3000 步骑军与上谷诸将合兵南下，破斩王郎大将赵闳。随后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投靠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刘秀攻破邯郸后，赐吴汉为建策侯。

吴汉为人质朴敦厚，性格内向，不善辞令，言谈时往往急促而辞不达意，但刚毅勇猛，胸藏韬略。所以，当刘秀征询邓禹，谁可担当征发幽州兵马的重任时，邓禹极力推荐吴汉，认为他“文能柔未附，武足断大事”②，“诸将鲜能及者”。于是刘秀任命吴汉

---

①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② 《后汉纪》卷第二《光武皇帝纪》。

为大将军，“与耿弇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阳奉阴违，暗勒兵马，命令诸郡拒不应调。吴汉以其非凡的胆略，仅率20精骑驰至无终（今天津蓟县）。苗曾欺其人少，不以为意，遂出城迎接。吴汉乘其不备，先发制人，诛杀苗曾，收夺其军。于是“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刘秀的力量逐渐壮大。不久，吴汉又采用攻心之策，说降更始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守将陈康，兵不血刃占领该城，并袭杀更始尚书令谢躬。在此期间，吴汉还跟随刘秀，参加了北击铜马、重连、高胡的战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表现突出。及刘秀即位，设置“三公”之职，诸将一致推荐吴汉，刘秀亦认为他“有建策之谋，又诛苗曾，收谢躬，其功大”①，因此任命他为大司马，并更封为舞阳侯。

建武元年（25年）秋，吴汉统率朱祐、岑彭、贾复等11位将领，围攻洛阳，激战数月，朱鲔投降。次年春，又率王梁、朱祐、杜茂等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大破敌军于漳河之上（地属今山西长治县），收降十余万人。为表彰其功绩，刘秀特遣使者奉玺书至吴汉军中，定封其为广平侯，食邑四县。接着进军南阳，连陷六城；南战秦丰，破之于黄邮水上（地在今河南新野县）。又与冯异合力攻破铜马、五幡等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耿弇、盖延大破青犊军于轵西（今河南济源县东南）。随即率领杜茂、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派部将周建率兵10万来救苏茂，吴汉初战失利，并“堕马伤膝”。面对强敌，吴汉不顾创伤，激励将士，选精兵与敌军决战，大败苏、周十余万军，夺取广乐城。继而马不停蹄，留杜茂、陈俊等驻守广乐，自率主力助盖延困刘永于睢阳。建武四年至六年（28～30年），吴汉又先后率军攻灭五校、长直、五里、富平、获索等军，并攻破朐县，消灭董宪。至此，关东地区全部平定。

---

①《后汉纪》卷第三《光武皇帝纪》。

建武十一年（35年）春，吴汉率步骑兵6.5万人会同征南大将军岑彭，讨伐公孙述，由荆门逆江而上，破其浮桥，进抵江关。岑彭遇刺身亡后，吴汉并其军，继续溯江直上，于建武十二年（36年）春，大破蜀将魏党、公孙永于鱼涪津。汉军乘胜追击，进围武阳，歼灭前来救援的蜀将史兴5000人。继而再破广都，派轻骑焚烧成都市桥（成都七星桥之一，在成都城外），蜀军震恐，武阳以东小城尽皆降汉。嗣后，在广都、成都间与公孙述大战，初因兵力分散而遭受挫折，被10万蜀军包围。后吴汉密秘调整部署，激奋将士，转败为胜，八战八克，进驻城郊。公孙述亲自率军数万出城决战，吴汉先派一部分军队出击，待两军苦战半日后，再遣高午、唐邯率数万精兵突入战阵，公孙述大败奔逃，伤重而死。次日，成都蜀军开城投降。蜀地平定。

全国统一后，吴汉还曾率军北击匈奴，并于建武十八年（42年），平定了蜀郡守将史歆发动的叛乱。建武二十年（44年）病故，谥号"忠侯"。吴汉戎马生涯20多年，对东汉统一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其战功卓著，刘秀决定按西汉大将军霍光死后待遇，发北军、轻车、甲士为其送葬。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他位置显赫，仅次于太傅邓禹。

吴汉自跟随刘秀至平定天下，一直在沙场上奔杀，是东汉开国元勋中经历战阵最多、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吴汉的缺点十分明显，一是治军过宽，军纪较差，二是不够重视作战部署，但其优点更为突出。在战役指挥上，吴汉老练持重，注重士气，善于应变，不论发生何种情况，他都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征讨获索时，敌军5万多人夜袭吴汉军营，使"军中惊乱"。但吴汉却"坚卧不动"，待敌军稍退后，即连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由于吴汉用兵的这一特点，使他往往能力挽危局，败中取胜。与刘永部将苏茂、周建战于广乐时，初战失利，并"堕马伤膝"，将士惶恐。面对危急，吴汉"勃然裹创而起"，勉励将士说："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将士激愤，士气倍增，次日决战，

大获全胜。成都之战时，吴汉因部署不当而被蜀军分割包围，面临全军覆没之危险。关键时刻，吴汉沉着冷静，号召诸将同心协力，共赴危难。并设疑兵之计，在军营中“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吸引蜀军注意力。自率全部人马乘夜偷出军营，与困于20里外的刘尚军会合，然后集中兵力，攻破蜀军，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局。吴汉败不气馁、“意气自若”、“激扬士吏”、力挽危局的用兵特点，确实表现了大将风度，所以刘秀曾感叹说：“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吴汉用兵极重效率，“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干脆利索，雷厉风行，因而常能掌握战争战役主动权。作战中善于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及战局的变化，确定或变更作战计划，一旦计划受挫则及时调整部署，此招不行则用彼招，直至将敌击破。一旦抓住有利战机，便攻势凌厉，连续出击，猛打穷追，不获战果决不休兵。所以，进攻凶猛如虎，退守稳重若山，是他用兵的又一重要特点。

吴汉并非只懂军事进攻，也能用政治策略来争取和制服敌人。夺取邺城时，便采取了先说降陈康、再伏杀谢躬的计策。更典型的事例，是建武四年（28年）降服鬲县（今山东平原县北）五姓豪强的反叛。事件发生后，吴汉冷静地分析了五姓反叛的原因，认为“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严令将士“敢轻冒进兵者斩”。随后在全郡各地散布檄文，宣布郡县长官的罪状，派兵逮捕守长，向城中百姓道歉。结果“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顺利制止了一场叛乱。在天下未平，战事紧张的时期，吴汉能够识大体重大局，尽量少树敌人，争取民心，是有战略远见的，所以诸将对他口服心服，称赞他“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六、耿弇

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东汉统一战争中，屡立战功，尤其在平定齐鲁的作战中表现突出，

为东汉“中兴”名将中的佼佼者。

耿弇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耿况博学多才，新莽时任朔调连率（即上谷太守）。受父亲及边郡环境的影响，耿弇“少好学，习父业”①，又“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耿弇是在刘秀处境艰危之际投奔他的。当时，王郎起兵于邯郸，声势较大，正欲投效更始的耿弇，于赴长安途中闻知刘秀正在卢奴（今河北定州），遂改道前往拜见。刘秀见他年轻，便只给他安排了个小官。不料，耿弇气志非凡，请求返归上谷，调发军队，以定邯郸。此举深为刘秀欣赏，“因数召见加恩慰”。这时耿弇年仅 21 岁。嗣后，耿弇多次奔走于耿况、刘秀之间，为刘秀联合耿况、彭宠，平定王郎起了重要作用。

消灭王郎势力后，刘秀受到更始君臣的猜忌，耿弇及时进言：“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这里，耿弇既客观分析了更始行将败亡的诸多原因，以及刘秀在政治、经济和个人威望上所处的优势地位，力劝刘秀脱离更始；又针对当时刘秀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益发精兵，以集大计”的建议，字字句句深符刘秀之意。于是刘秀任命耿弇为大将军，与吴汉一道北赴幽州，分斩更始上谷、渔阳太守韦顺、蔡充和幽州牧苗曾，悉发幽州十郡兵，刘秀势力大大增强。在平定河北农民军的过程中，耿弇常率精骑为先锋，屡立战功。

---

①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刘秀即位后，拜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至建武三年（27年），耿弇率军大破延岑于穰。复向刘秀建议“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刘秀对此大加赞赏，遂于建武四年（28年）诏令耿弇进攻渔阳。耿弇因其父耿况独据上谷，本与彭宠功劳相当，现进攻彭宠，怕招人非议，加之兄弟中尚无一人留侍京师，因而顾虑重重，不敢独自进兵，乃上书请求返回洛阳。刘秀深知其虑，诏报说：“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弇疑虑顿释，与朱祐、王常等击破望都（今河北唐县东北）、故安（今河北定兴西）西山农民军十余营。继而又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其间，耿况、耿舒主动出击，与祭遵、刘喜等破灭彭宠。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刘秀开始实施东进计划，即东攻董宪、张步，统一齐鲁。在这次用兵中，耿弇表现最为出色，他指挥北线汉军，连获大胜，仗仗部署慎密，奇计迭出，精彩无比，为刘秀平定齐鲁立下了显赫之功。

耿弇自随刘秀之后，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是刘秀麾下一员从无败绩的虎将。这与他高明的作战指导是密切相关的。

耿弇作战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料敌察机，根据敌我双方优劣态势，选择并确定最佳的作战计划。如击张步，耿弇率军渡过黄河时，张步已在历下、祝阿、钟城等地布兵屯守，严阵以待汉军。耿弇选择其力量较弱的祝阿为首攻目标，当该地敌军将被全歼时，却又故意网开一面，让残敌逃往钟城。钟城守军见祝阿已败，遂惊恐弃营而去。此战部署十分巧妙，一石二鸟，事半功倍。略取临淄、西安时，耿弇如法炮制，克临淄而得西安，再收击一得二之效。耿弇因兵少深入，连战疲劳，缺乏强攻张步主力驻地剧县的条件，乃决定依托临淄城池，诱张步来攻，反客为主，以逸待劳，终于击破号称20万的张步主力。以上诸例皆反映了耿弇的决

策部署能力。其次，善于利用主客观条件，创造有利战机，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战术。如夺取祝阿、钟城后，耿弇乘胜进迫巨里，巨里守军很易攻破，但为了消灭敌军主力，乃定计围城打援，故意制造将攻巨里的声势，实际只遣少量军队监视该城，精锐主力则登上高阪，待张步主力援军到达时，乘高冲击，大获全胜。取临淄、西安，耿弇决定先攻临淄，却声东击西，扬言将攻西安，使临淄之敌放松守备，半日即下该城。与张步主力决战则采取了诱敌来攻、以逸待劳的方针，让少量汉军示弱佯退，诱敌进攻；另遣部分汉军列阵临淄大城西南角的小城外，与其鏖战。继而率精兵出其不意地东出大城，从侧面冲击张步军阵，大破步军。后又料定张步困顿必退，设伏再败张步。其三，身先士卒，作风顽强。在与张步决战中，耿弇亲自陷阵，被流矢射中大腿，他用佩刀截断箭矢，继续指挥战斗，左右无人知晓。次日晨，耿弇带伤再次出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耿弇的顽强作风对其部下影响极大，是他屡战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耿弇平齐之功，刘秀曾发表过一番评论，其云："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此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七、来 歙

来歙（？～35），字君叔，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南）人，善谋划，能征战，在刘秀统一战争中，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表现突出，为刘秀贯彻先东后西战略方针及逐步剪灭隗嚣、公孙述割据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来歙出身于士宦世家，父亲来仲，为汉哀帝时谏议大夫，母亲乃刘秀姑母，与刘秀为表兄弟关系。来歙兄弟五人，唯"歙有

才略，多通，慷慨有大志”①，因此刘秀在起兵之前就“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②。新莽末，刘秀兄弟起兵加入绿林军，来歙因此被王莽逮捕，旋即被其门客劫狱脱逃。后供职于更始政权，随绿林军进入关中，多次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便借口有病而离去。其妹夫刘嘉被更始封为汉中王，都南郑（今属陕西），闻来歙离开更始，便派人将他迎入汉中。刘嘉拥有军队数十万，更始败后，成为雄踞一方的军事集团。当时群雄并起，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复杂，天下将归于谁，一时难以明了。但满腹经纶的来歙却料定刘秀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力排“拥兵自守”、“且观成败”之议，劝说刘嘉投降刘秀③。刘嘉本与刘秀亲善，乃从歙言，于建武二年（26 年）九月降汉，次年六月东归洛阳。刘秀见到来歙，格外欣喜，“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参与重大军事决策。

这时，刘秀正全力对付赤眉军及东方的刘永、董宪、张步等势力，对割据于陇、蜀地区的隗嚣和公孙述无力顾及，又担心他们乘机杀出，汉军腹背受敌。来歙深知其虑，乃提出联陇制蜀之计，他说：“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势，不足图也。”此计策的妙处在于，不费一兵一卒而既争取隗嚣归降，又利用他为阻挡公孙述东进的屏障。刘秀欣然同意并派来歙去执行这一重要使命。

建武三年（27 年），来歙第一次出使陇地。隗嚣虽未轻许附汉，但在马援等人的影响下，亦未与刘秀为敌，甚至出兵协助汉征西大将军冯异击破亲蜀势力吕鲔，并斩杀公孙述使者，“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④。建武五年（29 年），来歙再次

---

① 《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纪》。

②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③ 参阅《后汉书》卷十四《刘嘉传》、《后汉纪》卷第四《光武皇帝纪》。

④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

持节入陇，与马援等说动嚣心，“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此间，来歙与马援各奉其主来往周旋于汉、陇之间，为刘秀稳住隗嚣、牵制公孙述、专兵东向起了重要作用。六年，刘秀顺利平定关东，开始图谋公孙述，先派来歙使陇，诏令隗嚣从天水出兵协同汉军伐蜀。嚣听部将王元等言，以蜀地关山险阻、道路难行为借口，拒绝发兵。至此，隗嚣欲三分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来歙身在陇地，实陷虎穴，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愤怒斥责隗嚣说：“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①]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为此来歙险遭杀害。

刘秀决心按照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行征讨隗嚣。在建武六年（30年）至七年间，集中兵力与隗嚣多次交战，汉、陇形成相持局面。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刘秀再遣来歙、马援入陇，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隗氏集团。来歙在招降了其部将王遵后，于建武八年（32年）春，独率2000精骑，穿山越谷，出其不意地袭取了战略要地略阳；又在隗嚣数万重兵围困、“斩山筑堤，激水灌城”的险恶情况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坚守略阳几个月，终将敌军拖疲，为刘秀最后击败围城嚣军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在此役中，来歙仅率少量精兵伐山开道，长途穿插，先奇袭后固守，据敌之腹心以策应大军上陇，确是精彩战例。此役后，刘秀更看重来歙，在庆功宴会上，让他独坐一席，位在诸将之上。不久，诏令来歙留驻长安，监领诸将。

来歙任汉军统帅之后，上书刘秀，提出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的策略。他认为：公孙述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是因为他把隗嚣占据的陇西、天水作为屏障，如果扫平这两郡，公孙述就智穷计竭了。故当务之急，“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准备大举进攻隗嚣。同时，“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损其兵而为我之用。刘秀依计而行，于建武九年（33

---

① 伯春，隗嚣子隗恂字。

年）八月，遣来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五将征讨隗嚣，至十年十月，先夺天水，后在落门（今甘肃武山县）大破隗嚣子隗纯，一举平定了隗氏集团。

隗嚣灭亡后，原依附于隗嚣的先零羌等部族首领“皆营堑自守”，“数为寇掠”，“州郡不能讨”。来歙马不停蹄，“大修攻具”，率领虎牙大将军盖延、武威将军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先零羌，在金城大败羌军，斩、俘数千人，获牛羊1万多头，谷粮几十万斛。接着，“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来歙十分注意用安抚政策来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肃清余寇后，他见陇西一带人民饥饿，流离失所，“乃倾仓廪，转运诸县，以赈赡之”。这项措施不仅使陇西地区得以安定，京师洛阳至凉州的道路从此畅通，而且为刘秀全力攻蜀解除了后顾之忧。鉴于陇西战略地位重要，来歙又上书推荐智勇双全的马援担任陇西太守，确保该地的稳定。

建武十一年（35年）六月，来歙率盖延、马成入武都，连破蜀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乘胜向前挺进。蜀军大惧，乃遣刺客刺杀来歙。临终前，把盖延召来，委之以军务，然后亲自起草奏表，向刘秀报告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写毕，“投笔抽刃而绝”。

来歙自建武二年投汉，至十一年遇刺身亡，时间虽然短暂，但为东汉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联陇制蜀策略，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数次出使陇地，讲求信义，言出必行，知难而进，临危不惧，有力地配合了刘秀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他统兵征战，攻夺城池，神奇惊人；孤军坚守，沉着冷静；既能率小部队穿插、奔袭，又能统大军协同作战，确是刘秀麾下难得将才。来歙的品格亦难能可贵，他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要封官，至死仍是太中大夫（死后追赠中郎将）。所以，刘秀曾高度评价他：“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

八、祭彤

祭彤（？～73），字次孙，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南）人。

建武、永平年间，因治理辽东、招抚鲜卑、安定边塞而名扬北方，是东汉前期积极奉行联合北方各族、抗击北匈奴策略的主要将领之一。

祭肜早年丧父，“以至孝见称”①。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人们纷纷离家避乱，“野无人烟”，而祭肜却独自一人守奉在父亲墓旁。“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战乱造就了他坚毅刚强的品格。其堂兄祭遵跟随刘秀转战河北，成为刘秀爱将，祭肜因故于建武初年拜为黄门侍郎，常随刘秀左右。建武九年（33年）春，祭遵病故，无子袭爵，刘秀于追念伤悼之余，命祭肜为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县长，以便让他就近四季奉祠兄灵。不想刘秀的这一安排，竟成为祭肜政治、军事生涯的起点。

祭肜兼有政治、军事谋略。任偃师县长后，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致力于本县的治理。“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任襄贲（今山东苍山县南）县令。当时，刘秀虽已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但尚未在各地建立有效统治，有些地区社会秩序仍不稳定，襄贲县更是“盗贼白日公行”，十分猖獗。祭肜到任后，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诛破奸猾，殄其支党”，几年后，襄贲大治，受到刘秀的特别奖励。祭肜之志虽不在小小令、长，而是统兵治军、保塞安民，但在治理二县期间所显露出来的才干，已引起东汉王朝的重视，这为他以后投身边防事业并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时，匈奴势力正盛，尤其鲜卑和赤山乌桓依附于匈奴，三者联合犯塞，其势更难阻挡，“数入塞杀略吏人”。东汉政府深感忧虑，又无力驱逐，惟一措施便是“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祭肜便在这种时刻被调往边境，于建武十七年（41年），被任命为辽东太守。辽东北与鲜卑、乌桓、东与高句骊等族接壤，是东汉前期边患严重的地区之一，刘秀之所以让祭肜担当太守重任，是因为他不仅看到祭肜具有政治、军事权谋，而

---

① 《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且“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是勇谋兼备的难得将才。刘秀能慧眼识贤，祭肜亦不负厚望。在治理辽东，抵抗入寇之敌的过程中，祭肜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怀柔相间的斗争策略，先刚后柔，刚柔并施，尽力联合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获得巨大成功。

祭肜至辽东后，立即改变过去被动防御的状态，作好军事上的部署，厉兵秣马，随时准备迎敌；同时，广派侦骑，了解和掌握敌军动向。因此每当敌军来犯，汉军都能从容拒敌，而且每次迎战，祭肜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汉军将士极受鼓舞，士气大振，多次击退入寇之敌。建武二十一年（45 年）秋，鲜卑又出动 1 万多骑兵寇略辽东，祭肜率数千汉兵迎战。两军相遇后，祭肜亲自披挂上阵，挥军奋力搏杀，敌军抵挡不住，阵势大乱，四处奔逃，被迫入水中淹死者过半。祭肜穷追不舍，杀出塞外，“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此役战果辉煌，共歼敌 3000 余人，虏获战马数千匹，不仅“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而且为祭肜实现更为重要的战略意图——争取联合鲜卑以对付匈奴——创造了条件。

祭肜办事长于运筹，深谋远虑，善于因势利导，因敌制宜，逐步现实战略企图。他认为，鲜卑虽遭重创，近期不敢南窥，但从长远来看，鲜卑、匈奴、乌桓“三虏连和”，终究会成为边境祸根，应趁鲜卑新败畏怯之时，予以争取，破坏和瓦解“三虏连和”。不久后，匈奴分裂，南匈奴、乌桓先后附汉，“三虏连和”自行瓦解，而鲜卑尚未降附。祭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针对鲜卑上层贵族贪财图利的弱点，采取攻心战术，先将其笼络，然后逐步化害为利，使其为东汉王朝效命。经深思熟虑后，祭肜把第一个“攻击”目标对准了鲜卑贵族偏何。偏何乃鲜卑大都护，勇猛善战，在鲜卑、高句骊等部众中极具威望和号召力，若能争取他归降，则不仅鲜卑问题可迎刃而解，且为东汉添得一员勇将。于是，建武二十五年（49 年）正月，祭肜遣使至偏何处，“示以财利”。偏何果然心动，旋即“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开始了与汉的亲近关系。祭肜对其进行抚慰赏赐后，利用他为东汉招徕满离、高句骊等部

族，遂使归附者“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东汉政府则加倍给予赏赐。长期战火不断的辽东地区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气象，偏何邑落的各位首领全都归附东汉，并主动表示愿为东汉效力。祭肜深知鲜卑贵族急于邀功请赏的心态，对他们说：“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随即率军出击北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2000余级，“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至此，祭肜既达到了招抚鲜卑的目的，又收到了“以夷制夷”、“以夷伐夷”的功效。

祭肜为人质朴忠厚，稳重而坚毅，在治理辽东期间，对待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既施恩惠又守信义，因而深得他们的敬畏和爱戴，都愿为他拚死效力。光武晚年，赤山乌桓屡犯上谷，汉廷设悬赏责令州郡长官平定边患，但阻止不住。祭肜即把偏何召来，鼓励并派遣他前去征讨。永平元年（58年），偏何率领鲜卑军大败赤山乌桓，杀其首领，一举震骇了塞外。从此以后，祭肜的威名传遍了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战火经久不息的北方终于暂告安定，东汉缘边驻军也全部撤回。

祭肜治理辽东近30年，为东汉边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廉洁奉公，从不谋取私利，也不居功求赏，永平十二年（69年）被征召回京，拜为太仆时，竟“衣无兼副”，财产不到10金①。深为明帝赞赏，“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约”，此后明帝每见到祭肜，就叹息不止，认为他可以担当重任，曾说：“太仆，吾之御侮者也。”②

永平十五年，明帝召祭肜与耿秉、窦固等共同策划了对北匈奴的用兵，次年祭肜奉命参加北伐，因误信南匈奴左贤王谎言，未至目的地而回，获罪免官入狱。祭肜性格深沉刚毅，偏于内向，对自己被人欺骗未能立功报国悔恨不已，出狱几天便呕血而死。

祭肜是东汉前期边防将领中的杰出者，他能文能武，智勇兼备，治军用兵均有一套，尤其是对鲜卑施行的刚柔相济、以夷攻夷等策略，更体现了他高明的谋略思想。所以《后汉书》作者范

---

①② 《后汉纪》卷十《孝明帝纪》。

晔对他评价颇高，认为“祭肜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

九、窦 固

窦固（？～92），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永平年间统领汉军大举反击匈奴，取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为东汉彻底击灭北匈奴创造了条件。

窦固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之侄，娶刘秀女涅阳公主为妻，故其地位颇为显贵。初任黄门侍郎，中元元年（56 年）袭父爵为显亲侯，明帝即位后迁任中郎将，监护羽林军。后因其堂兄窦穆获罪而受牵连，“废于家十余年”①。窦固虽生于权贵之家，但并非靠门望而“贵显用事”。他生长于乱世之中，自幼深受伯父窦融影响，“好览书传，喜兵法”，尤其是随窦融在河西期间，对边地风土人情及边防事务了解至深，为他日后统兵为将、征伐北匈奴打下了基础。

永平年间，北匈奴扰边日盛，数犯河西地区。明帝决定效法汉武帝“击匈奴，通西域”，因窦固“明习边事”，于永元十五年（72 年），特召他与耿秉等共议伐北匈奴之事，并任命他为奉车都尉，与耿秉等率军出屯凉州。次年二月，以窦固为主帅，统兵 4 万余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耿秉、祭肜、来苗三路皆无功而还，唯有窦固一路战绩辉煌，一举夺得天山之战的重大胜利。永平十七年，窦固与耿秉等合兵，再战天山，破北呼衍王，降车师前后王，控制了西域咽喉。

窦固在作战中，善于捕捉战机，掌握主动，一旦得手，则穷追猛击，不让敌军有喘息之机，天山之战足以说明其战术特点和指挥艺术。同时，作为汉军统帅，窦固对控制天山地区乃至整个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西域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留吏士屯伊吾卢城”，遣班超经略西域，“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并以陈睦、耿恭、关宠等忠勇之将担当监护车师重任，均表明窦固具有战略远见。

窦固对待边境少数民族，采取了因其俗而笼其心的态度和策略，据称：“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固，固辄为啖，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① 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窦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对安定边境，维护汉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作出了一定贡献。

章帝即位后，窦固晋升为大鸿胪，因其“晓习边事”，常被召去充任顾问。建初七年（82 年）至八年，先后取代马防担任光禄勋和卫尉。章和二年（88 年）去世，谥号“文侯”。

十、窦宪

窦宪（? ～92），字伯度，扶风平陵人。和帝初曾统帅汉军大举北伐，一举破灭北匈奴，为东汉边境地区的安定发挥了重大作用。

窦宪是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曾孙，少时其父窦勋获罪被诛，他成为孤儿。建初二年（77 年），章帝立其妹为皇后，窦氏家族逐渐得势，窦宪也由郎官连升侍中、虎贲中郎将。从此窦氏“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②。后因以贱价强夺沁水公主田园而受到章帝责罚，“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再度成为朝中显赫人物。他生性果敢而急躁，报复心强，“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又权力欲望大，唯恐别人分享其权势，终于导致派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的事件发

---

①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固传》注引《东观记》。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生。此事发觉后，满朝哗然，窦太后不得不将他禁闭于内宫，以平众怨。窦宪为赎死罪，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不想死罪既免，更功成名就，身任大将军，“威权震朝廷”。位列三公之上。但因有前次教训，窦宪本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骄恣，而是尽力顾全个人的名声和影响。他曾先后谢绝“武阳侯”和“冠军侯”的封号，并辞退封地，毅然率领军队出镇凉州。然而，他终究未能从帝、后权力之争中摆脱出来。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诛后党，窦宪被收夺大将军印绶，不久被迫自杀。

窦宪在历史上留下过种种劣迹，在古今文人墨客眼中被公认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备受贬斥，以致于他的历史功绩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了。其实，客观地分析窦宪的一生，其人品虽属下流，其有些行为亦确令人愤慨，但他对东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作为当时无可争议的优秀将领，他统率汉朝大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和金微山，登燕然山，“刻石勒功”，逐北单于，迫其西迁。他的威名震撼了大漠南北，他所奠定的中国北疆新格局，既是东汉光武、明、章三代的夙愿，是中国边疆统一和中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渴望和平的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窦宪的历史功绩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从军事史的角度上看，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窦宪用兵，善于针对敌军弱点，及时掌握和准确判断敌军的动向，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方针，调遣优势兵力与敌主力决战。如汉三路大军汇集涿邪山后，窦宪根据北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敢与汉军正面交战的状况，派出精骑万余，向北单于庭所在地稽落山一带运动，迫使北匈奴主力出战，并一举将其击溃。此役后，窦宪继续主动出击，盯住北匈奴主力不放，又先后在河云北、金微山取得重大战果。窦宪在作战中，十分注意扬长避短，根据汉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兵力集中，但深入大漠、远离后方、不

宜久战的优弱点，以及北匈奴虽行动飘忽、反应快速，但力量薄弱，惧怕决战，且有大量老少部民拖累的实际情况，采用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往往轻装疾进，速战速决。如包抄、夜袭河云北，长途奔袭金微山，均收到了出敌不意、以奇制胜的效果。同时，一旦逮住战机，便不轻易放弃，每次击溃敌军后，均穷追猛打，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尽量在追击中歼灭敌人。

窦宪是位功过同样显著的人物，对于他的罪过，我们应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他的功绩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

十一、段 颎

段颎（? ～179），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有谋略，善用兵，东汉桓帝、灵帝年间，多次率军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因平定“羌乱”而名声大振，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并称“凉州三明”。

段颎少时便精通骑射，“尚游侠，轻财贿”①，长大后又“折节好古学”，遂奠定了文、武两方面的根基。后被举为“孝廉”，踏上仕途，先后任宪陵（汉顺帝陵）园丞、阳陵（汉景帝陵）令等小官，皆有政绩，因而迁任辽东属国都尉，开始了军事生涯。

段颎指挥的第一仗是对鲜卑的作战。桓帝永兴年间，鲜卑进犯辽东塞，段颎率军前去讨伐。鲜卑的作战特点与匈奴相似，飘忽不定，行动快速。段颎为了诱敌深入，乃于进军途中，派驿骑诈称奉皇帝玺书宣召段颎回师，段颎表面假装奉诏撤军，暗中却在道路两旁设下伏兵。鲜卑首领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驱兵追击。待其进入汉军埋伏圈，段颎下令出击，“悉斩获之”。此战规模虽小，却反映了段颎果敢决断的能力。经此一战，段颎初显身手，但也因此而“坐诈玺书伏重刑”，栽了个跟头。刑满后，在朝中任议

①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本传。

郎。这时，活动于太山（今山东泰安县北）、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一带的东郭窦、公孙举农民起义军声势较大，“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朝廷“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急需选拔文武双全的将领前去镇压。段颎应时而起，于永寿二年（156年）出任中郎将，领军出征东郭窦、公孙举，“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段颎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封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

段颎最主要的军事活动是对羌族的镇压。当时的东汉政府，内有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其腐败而黑暗；外有周边民族，尤其是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东汉王朝内外交困，陷入危机。作为地主阶级的军事将领，段颎死心塌地效命于这个腐朽王朝，为了平定“羌乱”，他提出了“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和“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斩尽杀绝政策。为了实现这个企图，他竭尽才智和勇力连年征战，几无间息，自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平东羌，“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终将羌族人民的起义烈火扑灭。究其一生所为，特别是对羌族的血腥镇压，实无可褒之处，就连封建史家都深感不齿，司马光曾严厉谴责他“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①，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当然，也不应否认，段颎在不光彩的军事活动中，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治军和用兵之法，是东汉后期一位胆略兼备、能征善战的杰出将帅。

段颎用兵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战术的灵活多变上，他善于统观全局，料敌察势，因时、因地、因作战对象的不同和战局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诱敌深入，设伏聚歼；募选“先登”，强行突破；遭遇强敌，近身肉搏；轻装疾进，长途奔袭；分遣兵力，两面夹击；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等等，各种战法运用

---

① 《资治通鉴》卷五十六“灵帝建宁二年”。

自如，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其次，治军得法。据记载，“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作战中，尤其是危急时刻，他常常身先士卒，亲自加入战阵，与敌搏杀，对激励将士，振奋士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朝廷在表彰段颎的诏书中称赞他“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所言十分中肯。

段颎一生几经起伏，西羌平定后，又多次宕跌，终因阿附中常侍王甫，而被朝廷下狱，“遂饮鸩而死，家属徙边”。

后　　记

这册《东汉军事史》，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军事通史》的组成之一。我们于1993年秋接受这一任务后，在日常工作较忙的情况下，一直未曾松懈，刻意求新，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军事学说，在阐明军事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从史实出发，突出以战争为主线，以军制为重点，全面探讨当时军事的内容、特点、源流和成就，力求揭示军事运动的发展规律，科学评价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的地位与作用，认真总结经验，做到古为今用。但本书仍属草创，限于水平，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深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九章。课题组成员的大致分工情况是：邵鸿起草第一、二章；卢星起草第六章、第七章的二、三节及第九章；赵明起草第七章的第一节及第八章；由我起草绪论及第三、四、五章，同时，对本书的章节结构、体例做了充实调整和审定，并负责全书的统稿。

这里尤当说明的是，军事科学院霍印章同志，曾给本书提供参考性的框架、提纲，并对本书初稿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查核史料费时也多，对我们帮助极大。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

黄今言

1995年7月1日于南昌